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

〔捷〕兹德涅克·姆林纳日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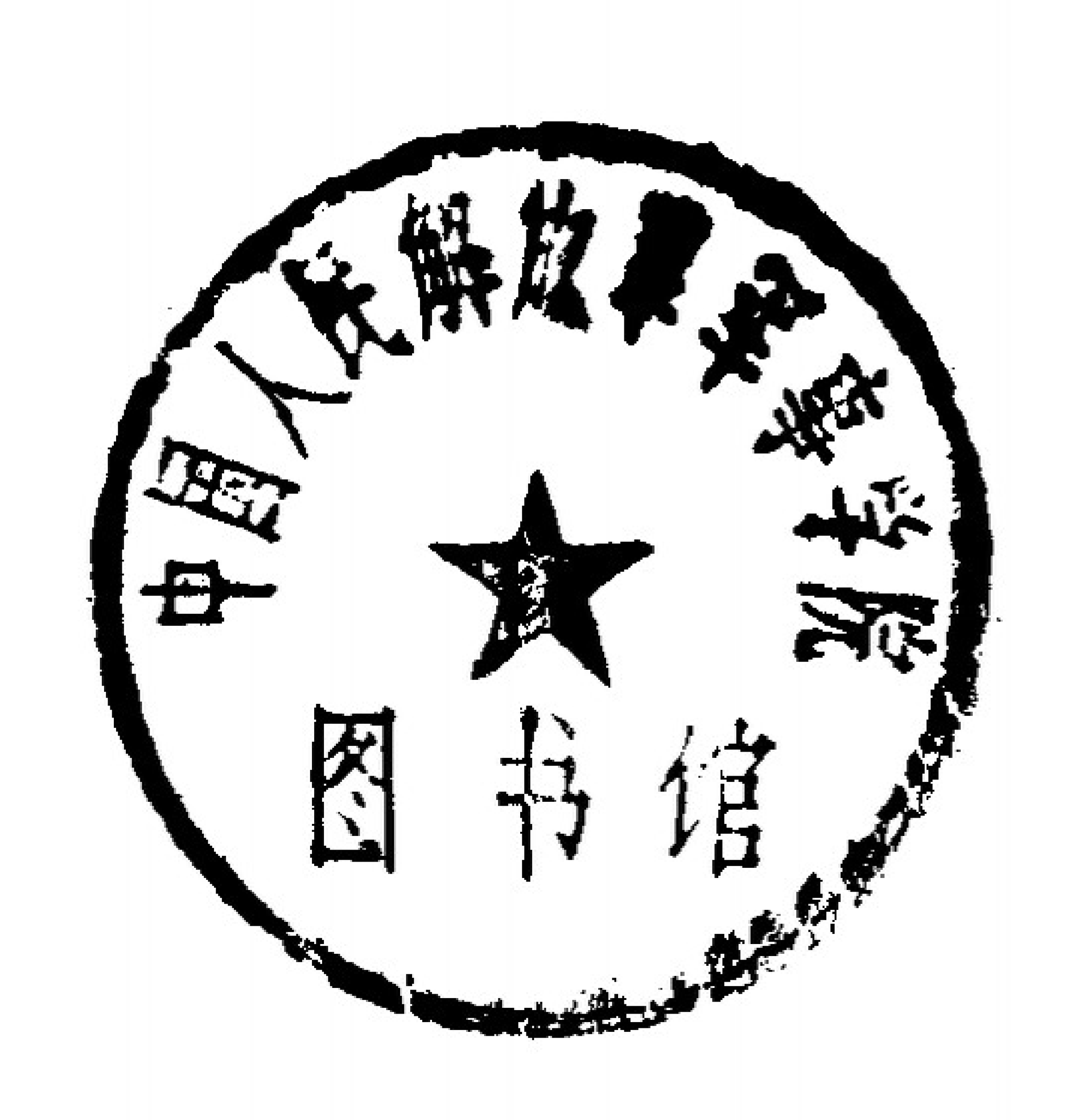


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

〔捷〕兹德涅克·姆林纳日著

新　征译

（内部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0年·北京

Zdeněk Mlynář

MRÁZ PŘICHÁZÍ Z KREMLU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Köln, 1978

根据科隆欧洲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捷克文版译出

封面设计：孙　政

（内部发行）

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

〔捷〕兹德涅克·姆林纳日著

新　征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外展览路24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9.5　插页：1　字数：223,000

1980 年 4 月第 1 版　　198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0

书号：3003·1604　　定价：0.98 元

被绑架到莫斯科的杜布切克（右一）和斯姆尔科夫斯基（左二）回到布拉格。右二为本书作者姆林纳日。

广大群众用汽车等阻挡苏联坦克并把它们包围起来。

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苏联坦克。



苏联坦克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土上横冲直撞。

目　录

前　言

一九四六年春，我参加了共产党，那时我还不满十六岁。一九四八年二月我国开始建立共产主义极权统治时①，我们这一批党员都只有二十来岁。我的政治经验是这一代人所具有的经验。那些比我们年长的人不仅有战争时期的生活经历和政治经验，而且还有战前一些年代所积累的经验，他们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与我们不同。在正常的情况下，五年的生活经验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但是，如果在五年中爆发了世界大战，那末，一个在战争初期已经成年的人和一个在战争末期才成年的人之间就有很大的差别。

经过暴风雨的锻炼，我们这一代人过早地政治化了，但同时政治经验又很贫乏。我们的经验是从战争年代和纳粹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时期获得的经验，那时我们基本上还是小孩。这种经验使我们对世界产生了简单化的黑白分明的看法：世界上一边站着敌人，另一边站着朋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第三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由此进一步得出如下看法：正确观念的胜利就意味着消灭或摧毁其它的观念。

我们把青年人所特有的热情全部投入到对敌斗争中去。我们认为政治美德就是彻底性和激进性。我们对父辈的谨小慎微很不耐烦，因为他们对同占领者合作的事都说得那么轻描淡写。如果

① 指“二月事件”。解放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了以共产党为首的联合政府。一九四八年，联合政府中的资产阶级政党代表人物利用国家的经济困难制造借口联合提出辞职，企图一举搞垮联合政府，由资产阶级政党取而代之。在人民群众的强大声援下，共产党粉碎了这一阴谋，重组政府。其后曾在各级政权机关中进行清洗。——译者

在战后初期有人劝我们放弃原始的激进主义的话，那末，他的言论就要被指责为谨小慎微和胆小怕事。什么是民主？我们从自己有限的经验中还不懂得民主并不意味着一种思想战胜另一种思想，或非要消灭或使其消亡不可。在战争年代，我们还是小孩，并没有参加过战斗，我们只是把战时的思想方法带进为我们提供了奋斗目标和条件的战后年代。

关于斗争的对象以及为什么而斗争的问题，时代只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回答：同最彻底的、最激进的力量站在一起反对旧世界，不要胆小怕事，不要向旧世界让步，用革命的手段克服或消灭它。当时，苏联被看成是这种力量，斯大林就是领导这种力量的政治人物。今天看起来这好象是荒谬的，但战后的最初几年确实是如此。

一九四五年解放时，全民热情高涨，决心要把捷克斯洛伐克建成一个自由、正义的新世界。在这一时刻，对苏联和斯大林的神化不但不会使人望而却步，相反，它正是这种热情的一部分，并为它增添了具体的内容：争取社会正义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从这个意义来讲，战后的苏联成了那些要求同过去彻底决裂、但却对苏联毫不了解的人们的希望。我们参加共产党并接受党的思想完全是出自内心的信念，并没有个人打算，也没有不可告人的动机。

在我们积极从事共产主义活动的初期，很难说我们已经懂得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如饥似渴地吞下当时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手材料。那时，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等已经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教材了。同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片段相联系的是一整套党内小册子所宣传的政治观点和人生哲学。

这些文献怎么样、又为什么能成为我的政治圣经，成为我坚信不移的世界观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觉得唯一正确的回答是：这

些著作所包含的思想能够给那些知之甚少或者实际上一无所知的人以一种自信，使他们觉得自己已经认识和掌握了人类和世界的发展规律，而且，要想达到这种境界也很容易，只要你相信这种思想就可以了。那些毫无所知或者渴望有所知的人是很容易相信这种思想的，因为他们一旦相信了这种思想，就好象是已经认识了真理。他的内心世界就会发生变化并获得正确的方向，虽然他依然是毫无所知，但他好象已经学会评价事物，懂得什么是进步的，什么是反动的，对于人类的前途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等等。他不必费心劳神去做那些具体的科学研究就可以懂得什么是科学的，什么是不科学的。在那些为继续探索前途而摸索前进的不觉悟的人群中，他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能够正确观察事物的超人。虽然他不是万事精通，但总算是有了觉悟。

信仰使自己的信徒凌驾于那些不相信它的人们之上，这种情况并非史无前例，也不是共产主义信仰所特有的。基督教在主观上就使信徒凌驾于多神教徒和无神论者之上。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要使信徒感到自己比非信徒优越？这种优越感要想使什么行为合法化？一九四五年后，我和千万个年青人所接受的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信仰，从一开始就是替反对异教徒的十字军辩护的。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正是由于上述情况才轻易地、自发地接受了这种信仰，因为这种信仰同我们在战时形成的爱憎分明的世界观是相联系的。世界上继续存在着敌我；目标是明确的：消灭敌人（这里是作为一个阶级）；采取激烈的、毫不妥协的方法进行改革，为正义的新社会打开大门（即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之间是平等的，没有引起社会紧张和战争的根源，全人类最后都过着幸福生活）。为此，就象国际歌所唱的那样，需要彻底地、坚决地进行“最后的斗争”。这种思想对我们这些没有丧失战时习性的人来说，是具有吸引力的。

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以前和其后一些年代里，我们头脑中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比老一代斯大林式共产党人的概念还要原始和片面得多。老一代共产党人的信条已经在自己的生活和政治实践中不断地得到纠正。我们的自信心比他们要高得多，也许只有西欧的毛派和六十年代末出现的“新左派”能够同我们相比。我们同任何教派一样，教徒们在派别内部感到幸福，他们有共同的人格和道德，而这种人格和道德使他们一再感到自己确实比非教徒、即不觉悟的人要优越。只要信仰要求我们无私和牺牲，我们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不论白天黑夜，还是周末或休假日，我们都曾自愿地到矿井、工地或农田里去参加义务劳动。在书记处，我们不仅仅是开会和工作，可以说我们简直是在那里生活。战后初期，捷克共青团这个小小的政治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工资是低于当时工人的平均工资的。

无论干什么，我们都是满怀着热情去做。在党的一切活动中，我们热情地担任了点缀或陪衬的角色。不仅如此，实际上我们还是党的忠实打手，党的领导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巧妙地利用我们这些人，不仅要我们呼喊激进的口号，而且还要尽力地行动。诚然，我们没有审判过任何人，也不是行刑队。但是，我们拥护党这样做，我们亲自进行镇压，例如：进行各种审查和清洗，剥夺那些反对或批评我们信仰的同辈人以及老一代人的学习、工作和生存条件。这个正在形成的极权专制政权捍卫着我们的利益，给了我们优先权，我们也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合乎道德的，是正义的。这也和我们的信仰和道德观是一致的。因此，毫不奇怪，外人并不认为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大公无私的。我们把批评我们的人看成是对我们的救世主的政治纲领怀有“阶级敌意”的人，我们对他们也采取了象老一辈人一样的手段去镇压和消灭。

党员之间在私下或在会上讨论五十年代政治罪行的责任问题

时，我多次听到有人说："我们那时对党所宣扬的那一套的确是信以为真的。"作为引述事实，这样说是可以的。但作为替自己辩解的论据，那就不够了。因为人们所争论的题目是：在党统治下所犯的（以及今天还在继续发生的）罪行之中，党员和党的积极拥护者所承担的责任和罪责问题。人们对自己的信仰也是应该承担责任的。所以当一个人宣布自己曾有过某种信仰时，这并不能减轻他应该承担的罪责，相反，恰恰是承认自己应该分担的责任。

当然，有人是用犯罪来支持当局的。有些人虽然执行命令，但心中从来就不相信自己执行的命令"从历史和阶级的观点"来看是一些必不可少的好事。我同这一些人是不一样的。但这只能证明我不是无赖也不是为了金钱和野心去支持邪恶而已，决不能免除我的责任或减轻罪责。

今天如果重新评价我所做过的事情，回顾我所扮演的角色，我必须承认，我对斯大林主义的信仰恰恰加重了我的责任。因为它妨碍我从日常生活的实践所提供的丰富的材料中得出正常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我们这些有坚定信念的年青共产党人，虽然和其他人生活在同一环境之中，但我们对这个环境的看法却与其他青年大不相同。长期来，我们认为这种不同正好说明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但其他青年却早已在同一环境中找到了许多反对我们立场的证据。

我的共产主义信仰就其逻辑和社会准则而言是自成体系的。任何个别的想法、论点或经验是不能动摇这个体系的。至于未经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也具有这种特征的问题，因为同本书关系不大，不准备在此加以探讨。重要的是在逻辑上和社会准则上的固步自封正是当时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特色。而当时的共产党员所接受的就是这种思想并用来指导自己的日常实践（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些党至今还是这样），那时的党员是真心实意地相信这

一思想的，他们的确称得上是有觉悟的党员。

应该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事物呢？对这些党员来说，唯一的标准是视其对实现党的目的是否有利。其它标准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因此，依据其它社会准则所进行的批评不能影响他们对自己思想的正确性的看法，因为在他们的眼里这些批评同党的目的无关。

在我们当时的共产主义信仰的思想体系之中，根本性的准则是“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它一切，包括经济和道德都要服从这种利益。列宁就曾明白地说过：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就是合乎道德的。如果有人指出，某一政治措施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那么他的论据对我们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因为这种说法就好象指责某一政治活动违背教规十诫一样，都是些资产阶级分子的批评。

但是，在实践中，什么是“合乎工人阶级的利益”的标准呢？是根据民主的原则形成的大多数工人的意见吗？不，对于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来说，这不是论据，因为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只有作为历史进程的抽象的主体——工人阶级，不存在一个个活生生的工人。至于具体的、活的工人在实践中则常常是不觉悟的，不能正确理解自己的长远利益，而只注意眼前的利益，这是他们从资本主义社会学来的。在实践中，斯大林主义者到哪里去检验工人阶级的利益呢？只能是回到自己的意识形态中去或回到党内去检验。在斯大林主义者看来，只有党和党所创造的意识形态才能正确地表达工人阶级的根本性的长远的利益。

当共产党在自己的逻辑和社会准则的体系内进行思考时，他们的思考对外界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就好象一只小松鼠蹬着转轮蹦跳一样，它的蹦跳对转轮以外的世界是没有影响的。当然，反过来说也一样，周围世界对这个松鼠也没有影响，因为它的立足点是

那只转轮，而不是转轮以外的大地。

有时，有些现象也会使有觉悟的斯大林主义者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某些疑点。但是，事实同我们自己的信仰之间的个别矛盾，不足以构成否定我们信仰的有力证据。只有当我们确信全部事实都同“工人阶级的利益”相矛盾时，我们才有可能从这一意识形态的迷宫中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和那些并不相信共产主义思想、只是为了赶浪头才参加党的人们相比，斯大林式的极权专政的柱石，亦即那些坚定分子，才是阻碍改革党的政策的巨大障碍。赶浪头的人只要时机对他有利，就会改变立场和态度，而坚定的有觉悟的共产党人只有等到他确信改革必要时才会同意改革。但赶浪头的人很难成为推行改革的人，因为在倡导新事物的初期往往对他们的功名不利，甚至要冒风险。相反，改革的积极推行者只能是那些有觉悟的人，但在他们下定决心之前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内心矛盾的发展过程。

从一九四六年入党到一九七〇年被开除出党，我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生活了二十五年。其中有二十年，我的思想处在矛盾的发展过程之中。我被开除出党以后，这一矛盾还曾继续了若干年。

* * *

一九五〇年九月，在捷克斯洛伐克正开动国家机器对共产党的领导人（已不是对非党员了）大搞政治迫害的时候，我被派到莫斯科学习法律。去学习的都是党的年青一代的精华，都在党内当过几年干部，思想上当然都是有觉悟的斯大林主义者。后来国内大刮怀疑风，到处揭露暗藏的“阶级敌人和帝国主义代理人”，到处要求提高“警惕性”。这种运动在留学生中也开展起来。党中央号召全体党员揭露党内“罪恶的破坏者匪帮”，我们就响应号召进行揭发。

我就曾给审查什林和什维尔莫娃①等在押领导人的委员会写过信。但这封信的遭遇却与众不同。当时，它只不过是档案中成千上万封信中的一封。但是二十年之后，一九七七年三月一日，《红色权利报》②从这封信中摘了几句话，企图说明我是一个没有人格的告密者；在胡萨克的统治下，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资格谈论人权的；我在《七七宪章》③上签名，只能表明我又在企图捞取名利和权力，等等。

我对“党内坏人”的积极揭露在一九五一年并没有给我带来名利。我们这些在温室般的环境里成长的党的精华很快就得出结论，认为必须在自己的周围去寻找“坏人”，就是说在我们之间互相找。根据布拉格流行的逻辑，真正的坏人一定藏在最高负责人之中。我当时正好是莫斯科留学生中党的负责人。

因此，在有觉悟的斯大林主义者给党中央的信中很快就有人提到莫斯科留学生中的“党内坏人”很可能就是我。同学们突然发现我的工作方法同党内主要的“帝国主义代理人”总书记斯兰斯基④有相同的特点。那时，他已经被捕。从我对苏联的言论和观点中，他们发现我在对苏态度上觉悟很低。于是，我被解除职务，等待布拉格的判决。那时，并非只有我一人有此遭遇，还有几个忠诚的斯大林主义者也被控犯有类似的罪行，主要是对苏联的态度

---

① 奥·什林（1912—1952），一九五〇年任捷共布尔诺州委书记，在大搞政治案件时期被捕，一九五二年被处死，一九六三年恢复名誉。

玛·什维尔莫娃（1902—），一九四九年任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副总书记兼组织部长，因政治案件被逮捕判处徒刑，一九六三年恢复名誉。——译者

② 《红色权利报》，捷共中央机关报。——译者

③ 一九七七年初，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反对苏联入侵的各派人士联名发表了一个宣言，要求保障人权。宣言的正式名称为《七七宪章》，姆林纳日是该宪章的签名者。——译者

④ 鲁·斯兰斯基（1901—1952），一九五〇年任捷共总书记，因政治案件被捕并于一九五二年判处死刑，一九六三年恢复名誉。——译者

问题。

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心理状态。我清楚地知道，人家控告我和我之控告别人都出于同样的动机。只有几个人是有个人动机的，大部分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为什么要控告我？我从自身中找到了一些原因，例如，我的工作方法确实是党内流行的方法。而这样的方法在不久前还被认为是优点呢！我检查了自己对苏联的全部想法，的确，其中有不少是同有觉悟的人应该有的想法相矛盾的，但这些想法都是从现实中得来的。我从苏联日常现实生活中得来的印象，无情地否定了我们来苏联以前所具有的关于"苏维埃人"的概念。

我做了真诚的自我批评，我承认所有事实，但拒绝承认有反党企图。我非常冷静地等待党中央的决定。我相信我出不了岔子，我认为这完全是误解造成的。在布拉格对斯兰斯基和其他被告进行审判的那些日子里（审判后十一人被判处死刑），我仍然是严肃而诚恳地这样想的。当然，我没有料到，那十一个被处死的人也是斯大林主义者，他们在被捕后也曾盼望一切"误解"都能够说清楚。

与这些人不同，我真的等到了预期的结果。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捷共两位最高领导人萨波托斯基和西罗基①来到莫斯科。他们亲自参加了莫斯科留学生的会议，处理"揭发敌人"的工作。萨波托斯基基本上公布了检举信的内容，然后像学校老师一样，把写信的人一一叫起来看了看。接着，他发表了简短的谈话，说这样的信谁都会写，党送我们出国不是来学习写这种信的，我们不应该互相猜疑，而是要相互信任，努力学习。他用大家熟悉的群众集会讲

① 安·萨波托斯基(1884—1957)，捷共创始人之一，长期从事工会工作，一九四八年起先后任政府总理和共和国总统，一九五七年病逝。

威·西罗基（1902—1971），斯洛伐克族，捷共领导人之一，从一九四五年起，先后任政府副总理，外交部长和政府总理，一九六三年受诺沃提尼的排挤去职。——译者

演的方式向大家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在家里盖了一间耳房，但不会计算怎样架柱子屋顶才不会倒塌。他说，党需要能够干事的人材，我们社会主义大厦的屋顶靠政治口号是支持不住的。你们要好好学习，真正掌握知识，这就是你们的任务。关于所谓"反苏"或对苏态度的各种指责，萨波托斯基宣布：你们在这里生活，看到了苏联人的生活条件，你们知道，我国人民在这样的条件下是活不下去的。当你们内部谈论这个问题时，不要把它当做什么大问题，要努力去理解这种现象，理智地解决问题。然后他又说，这一切都算告一段落，谁也不要再向中央写信了，没有理由从目前提出的怀疑中对任何人做出结论。这也是哥特瓦尔德同志① 的意见。

直接的亲身经历加深了我对党的信仰。一切都得到了公正的判断并当做误解来处理。后来，我长久不敢相信对我的命运进行积极干预的萨波托斯基，竟然在没有可信服的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能够在中央同意处死和自己长期共事的同志和朋友。又过了一些年，我得知，在他对莫斯科留学生讲演前一个月，就是这位萨波托斯基举手同意处死十一个人，而他清楚地知道对"斯兰斯基为首的阴谋中心"的全部审判都是虚构的，他知道这是斯大林的旨意，是不能反对的。在发表他那深谋远虑的讲演的前一年，萨波托斯基邀请斯兰斯基到他家晚宴。而那时他知道，斯兰斯基在回家的路上将被逮捕。当斯兰斯基在他家穿好大衣即将离开时，萨波托斯基亲自打电话给负责逮捕的警官，按照事先的约定通知他说："已经起身了。"今天，我一点也不怀疑萨波托斯基本人很愿意在莫斯科狂热的留学生中扮演慈父的角色，而不愿充当警察的同谋或法官。但是，他两种角色都演了。

---

① 克·哥特瓦尔德(1896—1953)，自一九二九年起一直是捷共主要领导人。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任联合政府的总理，一九四八年起，任共和国总统，一九五三年病逝。——译者

一九五二年的情况，我是在许多年以后逐步搞清楚的。当时，我们是党的有希望的接班人。党的最高领导认为我和其他精华不应成为当时政策的受害者。这些年青人将来会分化为原告和被告，究竟谁扮演什么角色，留待未来去决定，现在还为时过早，不需要过早卷进去。这些人应该学习，还没有到担任角色的年龄。我们在斯大林恐怖时期的经历是特殊的，是一种令人难堪的温和经历。恐怖的制造者把我作为有希望的接班人保护下来了。我在这个时期的感受完全不同于那些恐怖的直接受害者，也不同于人民大众，他们害怕得发抖，希望能够熬过这个时期。过了好几年，我才明白这个时期对捷克斯洛伐克普通老百姓意味着什么。但是，使我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的原因主要还是我们在莫斯科五年的感受，而不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大林式恐怖。

我所说的感受不是指那些使当时以至今天多数西方访苏人士感到震惊的事情。例如，苏联人民可怜的物质生活水平，日常生活的贫困和不文明；莫斯科是一个有许多木头房的大乡村；人们没有足够的东西吃；战后五年仍穿着战时配给的军衣；大部分家庭一家挤在一间屋里；没有抽水马桶，只有一个蹲坑通到下水道；在学生宿舍和街道上用手去擤鼻涕；在拥挤的场所，如防备不严，东西一定会被偷走；街上躺着醉汉，人们从他的身边走过，熟视无睹，根本不关心他是活还是死——像这样的现象真是不胜枚举。

这些现象都可以用过去的落后来解释。我们到苏联来也没有奢望能够看到消费者的天堂。战后刚刚五年，欧洲的任何地方都还没有以物质条件作为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准。我们把俄国的贫穷看成是战争的直接后果，把人民忍受艰苦的物质生活看作是“苏维埃新人”的力量的证明。我们把它的不文明说成是沙皇俄国可怕的贫穷落后的证据。这种消极的现象并不会危及我们对斯大林主义的信仰。对信仰起冲击作用的倒是由于缺少积极的事物，缺少

那种为信仰所强调的、对共产主义前景至关重要的社会准则。

我们把对公共事务的由衷关切看成是建设共产主义的"新人"的基本特点。对我们来说，把自己的命运同伟大的社会目标联在一起，服从"历史的使命"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理所当然的事。而我们所接触到的苏联人，大部分把政治和私人生活分开。他们形式主义地按照既定程序去完成公共事务方面的任务，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然后，他们便致力于自己的生活问题，而这时原来的政治态度就被置于脑后了。我们所说的都是自己心里所想的，这对于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而在苏联人的生活中就不是这样了。

我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很大一部分学生是来自前线的退伍军人。因此，苏联学校状况，无论年龄、社会成份和政治经历都同一般的学校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些士兵学生的习惯之一是爱喝伏特加酒。在学生宿舍里，人们找各种借口喝酒，个人的喜庆或国家的节日都要喝，往往是只要有人带来一瓶酒，就会成为喝酒的借口。

学生没有酒杯，大家把酒用装芥末的杯子斟得满满的，一饮而尽，这象征着大喝的开始。我们这些不是在俄罗斯长大的新手，开始时一喝就喝得酩酊大醉。直到我们也习惯了，而且可以和那些有经验的老油子们相媲美时，我才开始明白伏特加在苏联人生活中的作用。它可以使他们暂时忘记现实，产生对自由的幻觉。只有酒后，人与人之间才有正常的关系。我同六个退伍军人学生住在一间屋里，从政治角度看，房间的陈设也有象征性的意义。墙上挂的镜框里有一张宣传画，画着斯大林手拿铅笔在苏联地图上勾画伏尔加河流域草原上的防护林带，也就是描绘着共产主义的具体蓝图。但只要桌上一出现伏特加，宣传画就给翻了过去。在它的背面贴着一张蹩脚的彼得堡仕女像，这时她就俨然在屋中居于首位。房门被锁上，而心灵上的门却敞开了，人们无需乎伪装，尽

管醉得舌头不灵了，但说的话却愈来愈深刻。

我在那里听到的某些战争情况，同我出国前从苏联电影和文学作品中看到的苏军情况，是完全矛盾的。我意识到，如果我在这些人面前宣扬自己的觉悟的话，他们不会把我当成革命者，而是当成哈谢克《好兵帅克》一书中的候补军官比格勒尔式的白痴①。一位苏联共产党员向我讲述了他自己的一段经历。他们乌克兰的集体农庄庄员本来是期待希特勒的军队进来后能够取消集体农庄，让农民们分得土地过上天堂般的生活的。但是，德国人一来就烧毁村庄，杀死来不及逃跑的人。于是他们逃进了森林，遇到了组织游击队的党的书记，他们就参加了游击队。后来，他们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去战斗，因为不打仗就会掉脑袋。至于天堂般的生活那是根本不会有的。

伏特加更能使人反省。我们在俄罗斯古典文学中所熟悉的东西，如蔑视自己的弱点，自我怜悯，在实践中对自己所蔑视的事物又无能为力，诸如此类都曾被人们称为革命前的俄罗斯问题。但是，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问题竟然也成为苏维埃青年学生的思想和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我究竟是不是人？这个俄罗斯醉汉的老问题，现在又以各种形式反复地被提出来。可是我没有听到谁引用高尔基的名言“人！这是值得骄傲的称号！”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是猪，你叫我猪猡吧！”有一次，一个喝醉的布尔什维克干部把脸贴在我的胸上边哭边说道。事情是这样的：他的一个朋友同人打赌，说他敢只穿运动裤叉穿过学生宿舍的走廊。后来，他真的这样做了。按照莫斯科清教徒式的风俗，这样做就同在别的国家里裸体乱跑一样。为了这件事，他的朋友被开除学籍，而他在刚刚开过的干部会上举手同意了这个决定。这就是他忏悔的原因，

① 比格勒尔，哈谢克(1883—1923)名著《好兵帅克的命运》中的人物，是一个志大才疏、官迷心窍而又不识时务的人。——译者

而且，只要我不顺着他说他是猪，他就不肯安静下来。当时我也有些醉意，但我奇怪他为什么一定要我说他是猪，他才感到满意。他回答说："因为你不是猪，因为你相信他们"。我努力去说服他，我根本不相信穿运动裤跑过走廊就应该开除，我之所以不这样想是因为在我国这种事很平常。"胡说！"他打断我的话说："不是这个意思，你是自觉自愿地读列宁的书，你懂得这些书，你相信这些书"。

这个问题比我原来想到的要深刻得多。不过，忏悔者睡足了觉，松快了，也就又和过去一样了，这样一直到他毕业。后来他当了军事检查官。很可能直到今天他每处理一个案件都要醉一次，每次都要找人说他是猪。他何曾想到他那活生生的样板也对我的信念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对我们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里，可以找到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的答案。但对苏联学生来说，这些著作只是必读的课本。为了准备考试，他们大部分人都要熟背某些段落，以免主考人抓到他们错误的提法，此外就别无他求了。苏联学生也像我们一样能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正确地评价"那些他们自己还不了解的事情。区别在于：我们相信这种"评价"的正确性，而对苏联多数学生来说，这只是习以为常的表达方式，同自己的信念毫无关系。他们往往根本就没有自己的观点，因为他们对思想和政治问题是漠不关心的，他们关心的是另外的问题，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

五年的莫斯科生活使我懂得了，要想真正了解苏联人的内心世界，与其读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还不如去读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契诃夫和果戈理的作品。因为，即使我们指的是俄罗斯人本质上的积极面，那么，这种本质也是在旧俄罗斯的人道主义形态中表现得更深刻些，而在苏维埃的工业文明形态中则表现得很肤浅。至于说苏维埃制度给这些人带来的新的性格，

其中倒有不少是消极的。这些消极面的共同点是将生活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一方面是公开的、官方的、按一定规格定型化了的生活，在这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价值观在起作用；另一方面是私生活，那里则是俄罗斯历史形成的思想和价值体系起支配作用。

但是，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大多数人的真实思想、信念和信仰同官方思想在某一点上结合了起来，这就是“苏维埃爱国主义”。无数事实表明，大多数苏联人真的相信在世界其它地方，在资本主义世界，劳动人民的生活比他们要差得多（包括物质生活和消费水平），尽管他们对世界的情况实际上是一无所知。

一天夜里，隔壁宿舍的学生把我叫醒，要我去评判是非。争论的问题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农村是否全是砖房瓦顶而没有泥墙草屋或木头房屋？有一个同学在战争期间当兵曾到过捷克斯洛伐克，他坚持说那里的房屋都是砖瓦的。一个从农庄来的学生则坚决不信，其他人一无所知，无法表态。我看到屋内大约有十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学生。我表示那位士兵学生说的都是实情。辩论就此结束了，但主要反对者的脸上流露出并不信服的神色。他显然怀疑我是利用机会自我吹嘘，甚至是在撒谎。

眼界如此狭窄的人很容易相信官方宣传，他们每天都听到自己的国家在一切方面都是全世界的楷模。那些对世界有些了解的有教养的人也相信他们的国家正在起着救世主的作用。在这里，传统的大俄罗斯民族以救世主自居的感觉同官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维埃救世感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混合物，这种思想的基础是：苏联在战争中付出了最大的牺牲，从而拯救了人类的命运。因此，他们理应享受其它民族的尊重。而苏联人则和他们的政府一样常常把别人的批评当作是忘恩负义，当作是亵渎他们所付出的牺牲，尽管他们对自己的政府也有很多批评。

官方的意识形态和人们真实思想在另一个问题上也形成了奇怪的结合，许多苏联人的真正世界观是传统的俄罗斯宿命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推动人们按照这个阶段的划分积极地改造现有的环境的话，那末，许多苏联人则把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同宿命论的消极因素融合起来，认为一切只能听天由命。在日常的实践中，他们也把苏联官僚主义划定的各种条条框框看成是不可逾越的、命里注定的界限。俄国人有几句口头禅很能说明他们的人生哲学，例如："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无法分辨"或"地位高才能看得清楚"，等等。所谓社会主义先进集体培养出来的人物，所谓个人自觉地服从集体以及"苏维埃新人"自觉的社会纪律等新人新事，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另一回事，他们的实际思想不过是宿命论的世界观，如：每个人的福分早经注定，天道胜过人智，等等。

在莫斯科学习不仅能接触到苏联人，而且还能接触到机关，那些庞大的苏联官僚机器。不管你学什么专业，都会同它打交道，我是学法律的，接触的机会更多。这个官僚机器的活动就是我学习的科目，在实习阶段，我还曾在苏维埃国家机关中度过了几个月。

尽管如此，学习时我对斯大林时期政治恐怖的规模和形式并不了解。对我和其他同学来说，大规模的政治恐怖好象只是历史上的陈迹，因为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年青人本人并没有受到过迫害，那些能够进入大学的青年就更不会有这种经历，对他们来说，政治恐怖的受害者都是父辈的熟人或亲戚。

当然，年青人有时自己也不知道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对他们有着多么深刻的影响。我的一位同学的遭遇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同学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是作为莫斯科十年制中学的优秀生，被保送升入大学的。他是共青团的积极分子，在苏联学生中像他那样对官方意识形态深信不疑是少有的。有一次，在马列主义课的

课堂讨论上,他以挑战式的坚定口吻,按照从学校学来的东西,论述托洛茨基和其他犯了路线错误的人都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一九五六年后,赫鲁晓夫时代为受害者恢复了名誉。有一天,他接到了政府给他的父母亲恢复名誉的通知书,他的双亲作为托洛茨基分子已死在斯大林的集中营。这时他才知道他是由一对党员夫妇养育成人的,过去他视为双亲的人并不是他的生身父母。后来,他受不住刺激住进了疯人院。

我实习的时候曾多次出席旁听莫斯科监狱的审讯,也曾到过列弗尔特沃监狱。列弗尔特沃监狱是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老监狱,一进去就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不过我那时作梦也不会想到,这个监狱的某一角落竟会发生索尔仁尼琴后来所描绘的那些事情。我当时所能看到的都很正常,对刑事犯的审讯都是遵照诉讼法的规定进行的,我所看到的犯人也不像是遭到非法监禁或受到凌辱的人。反而是罪犯往往很凶,颇有点像美国的犯人,不少狱警的身上留有刀伤或枪痕,这种事在我们布拉格是很少见的。事实表明,人们可能对苏联公安司法机关的某些侧面很了解,而同时又对身旁的"古拉格"王国一无所知。

关于危害国家的刑事犯罪,也即政治罪的问题在大学法律教科书中写得很简单,很一般。这也很自然,因为法学院师生都有一种奉为公理的观点,即:凡是给政府造成麻烦的政治活动当然都是刑事犯罪活动。

有一次,我们讨论危害国家刑事罪问题。我在会上所做的发言使主持讨论的副教授大为尴尬。我的发言主要是想说明法律上所谓的"无罪推定"原则对于危害国家的刑事罪是不适用的。我列举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审判案件来说明,凡属这种案件总是首先从政治上断定某种特定的言行、态度和思想是属于敌对阶级的,然后才由司法部门根据上面的政治判断去进行处理。我所列举的

事实是没有什么争辩余地的，而且，作为真诚的斯大林主义者，我当时确实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苏联的教科书里也明明白白地写着：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法就是"上升为法律的工人阶级的意志"。而工人阶级意志的体现者是共产党。因此，当党的机关断定某种事实是反对工人阶级、危害国家的行为时，工人阶级的司法机关当然要以这种判断为依据来进行处理。

主持讨论的副教授的心里当然很清楚所谓无罪推定的原则在政治案件中是怎样实行的，但为了避免招来批评，他不敢肯定我的发言。我那时对这种不能坦率承认事实的情况觉得是难于理解的。不过副教授还是很有经验的。他表示这个问题应该是马列主义课的讨论题目，从而把这问题推了出去。当然，后来哪里也没有再讨论这个问题。

后来，当我从斯大林主义的迷宫中进一步解放出来的时候才明白，虽然我在苏联留过学，读过法学院，但我对法以及法对人类社会的作用等并没有真正了解。究竟什么是法，什么不是法，在斯大林时期的法学著作中对此只有法学实证主义的同义反复，即：法就是国家（或相应的机构）宣布为法的东西。直至今日，苏联也没有什么新的正式提法。按照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纽伦堡法① 也是法，只不过它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法西斯式的法罢了。根据这样的学说，纳粹的法律并不是对法的否定，而是法的资产阶级种族主义的表现。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这种法规的阶级内容是不能接受的，但如对之赋予工人阶级的内容，那它就又是无可指责的了。如果按照这样的思想方法来推论，那么封建老爷的"初夜权"也是法，只不过是一种为剥削者服务的罪恶法律而已。问题在于这样的东西应该说根本就不是法，而是非法的暴行，即使把封建

① 纽伦堡法：一九三五年纳粹德国当局在纽伦堡宣布的对犹太人实行种族歧视的法律。——译者

主换成工人委员会的成员，把农奴新娘换成工厂主的女儿也无法改变其非法的性质。因为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方只能是另一方的意志客体，根本无权成为主体。但是这样的想法在苏联的法学理论中是没有地位的。对他们来说，法只不过是行使权力的一种形式罢了。这样，除了法规的“阶级内容”各不相同之外，斯大林主义法学家和法西斯法学家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苏联法学院培养出来的法律专家不是那种善于根据法的概念和准则来思考的人，他们的专长就是能够知道在某一特定的情况下国家都有些什么规定，哪些事是可行的，什么事是禁止的。他们还熟谙大量法律条文，不熟悉的也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查找。他们无非是一些受过教育的官僚主义者而已。同不学无术的官僚主义者相比，他们也有一个优点。这种人在处理工作和对待下级时如果想干坏事，他们知道自己可以走多远，知道到什么地方必须止步，什么事是既无先例可循，又不会得到上级的批准的，等等。当然，在官僚主义横行无忌的地方，这样的优点也绝不是无足轻重的。

五年的学习使我成了“法律专家”，成了合乎苏联标准的官僚主义者。我知道苏联的法律条文允许干什么，鼓励什么，反对什么和禁止什么。我对集体农庄和工厂的生活，对苏联公民的家庭、财产关系，对政府机关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逐渐熟悉了。对苏联的官僚机构如何管理社会也有了相当具体的概念。

一方面，我觉得苏联的法律体系是庞大而宏伟的，一切都经过深思熟虑，每一个细节都得到周密的安排。我来苏联留学时脑子里带着一系列问题，例如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中都有些什么问题?新社会应怎样管理劳动和生活的其它领域?许多问题在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并没有具体答案。通过在苏联的留学解决了不少问题，我觉得回国后自己可以按照苏联的经验，本着为工人阶级服务的精神，在实践中正确处理许多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我也

觉得有许多苏联的实际经验是不足为训的，在捷克斯洛伐克是行不通的。

我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诚然是受了斯大林的影响，即使如此，在理论上，这种信仰同苏联现实的基本倾向，即官僚主义的倾向也是完全不能相容的。共产主义者在本质上本来就应该是激进的，而绝不应是官僚主义的保守主义者。靠诡辩虽然也能够办一些事，例如，我们可以自欺欺人地宣称，有些官僚主义者的作法可以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因此官僚主义也是革命的。但诡辩终究只是诡辩。

我在前面说过，我的苏联同学与其说他们像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中的英雄，倒不如说他们更具有契诃夫小说中所描写的俄罗斯人的特点。在苏联随时都会遇到的官僚们也是如此，他们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提到的设想毫无共同之处，而是很像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中的人物。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们根本不去理会共产主义思想所要求的自下而上的自治，这还谈不上。我所指的是这些官僚主义者的高高在上，他们对排着队领取各种"证书"的愚民们的傲慢以及他们的愚蠢无能和自命不凡，这一切我们过去在捷克斯洛伐克是从未见过的。

一九五四年冬，我在莫斯科市的检察院实习。那里每周有一天规定为"接待日"，听取劳动人民的申诉。每逢这一天总有成百的人挤在那里，等着向检察官诉说自己的苦衷。值班检察官总是听完了申诉当场就做出决定，一般处理一件案子只要五至十分钟。那些"苏维埃的新人"、"历史的创造者"们手里拿着帽子，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结结巴巴地诉说着自己的冤屈。检察官则一般是坐在大办公桌后面，一边办公一边听着，到最后，百分之九十五的申诉都被驳回。那些老工人和操劳过度的农村老大娘，他们的外表同描写十月革命的电影中的人物一模一样。不过他们不是高举着

拳头去争取权利，他们只是战战兢兢地等待着长官的裁决。这一切都使人联想到果戈理戏剧中的场面。

我们在莫斯科起初一直住在一个叫斯特罗门卡的大学宿舍。那是彼得大帝的一个团的兵营旧址，后来苏联政府加盖了两层楼房，改成宿舍，住了上万名学生。每一个房间住七至十五个人，平均上百人才有一个带盥洗室的公共厕所和一个公用的厨房，院子里有一个俄罗斯式的澡堂。一九五四年秋我们才搬进莫斯科大学在列宁山上的新校址。新校舍很舒服，有现代化的单人小房间，两个人合用一个抽水马桶，一个淋浴龙头。就是用我国的标准来看，这也是很现代化的住宅了，对大多数苏联同学来说，很可能这是他一生中住得最阔气的房屋。我在检察院实习时已经住上了这个高级宿舍了。

有一次，一个距莫斯科大学二十来公里的集体农庄，派了一个请愿团在接待日来找检察官告状。他们说，一年多以前，为了保证新大学的用电，发电厂把他们好几个村子的电都停了，当时电厂表示这只是临时性的措施，但一年多过去了，现在仍然没有电，……。

检察官听完向他们解释说，法律上没有规定必须供电，也没有说你们一定应该有电，这是个经济能力问题，不是违犯法律的问题。因此，检察机关无法干预。

庄员们说，他们写过信，从电厂到法院都跑过了，对他们的困难谁都不予置理，等等。但他们的诉苦丝毫没有感动检察官。一位庄员为了引起检察官的重视，就说人们现在都在点煤油灯，点松明，一旦引起火灾，谁来负责？这话显然惹火了检察官，他怒气冲冲地问道：“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用电？”“一九三八年。”“好吧，”检察官说：“在这以前你们点什么？还不是松明？这说明你们不是不会使用松明。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我们就把罪犯抓起来，依法制裁！”于是，国家的另一个主要统治阶级的成员——集体农庄的庄

员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恭恭敬敬地离开了办公室。会见结束后我问检察官，像这一类的事情检察部门是否也可以做点工作。他告诉我说，如果插手这样的事，市委会就会把检察长叫去批评一通，然后他回来再批你。管不得，这种事情复杂得很。接着，他又自我解嘲地说，反正这些人早就习惯点松明了，他们来纯粹是给我找麻烦。

后来有相当一段时间，我在宿舍里一点灯就想起这次接待的场面。苏联官僚主义给我留下的这一类的印象还很多，以至当时像我这样有觉悟的人，对这种做法也不敢苟同，也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应这样对待人民；在这些方面捷克斯洛伐克不应效法苏联。

在五十年代初期到苏联留学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年青党员中间，多数人对自己的信仰有了一些动摇。我们去莫斯科时都抱着一个信念，认为了解苏联的今天就是看到我们自己的明天。可是当我们看到了这个“明天”的时候，我们又不情愿承认它。我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使我们不愿意相信自己的经验。但对多数人来说，这个信仰的一个重要环节已经出了问题，我们已经不相信苏联就是我们的理想，就是我们必须无条件学习的榜样了。可以说，在这方面党中央向苏联派留学生的目的大半落了空。学成归国的人虽然还不失为斯大林主义者，不过已经不是学有专长的更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而是未来的异端分子的后备军。“苏联榜样的约束力”——党的这个紧箍咒，对于这些人已不那么灵了。他们仍然相信斯大林主义并且用贬低斯大林时代的某些现实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的信仰。后来在赫鲁晓夫时期和诺沃提尼①时期，党中央所采取的实际上也是这种办法。

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思想中既有对社会主义的论述，也有对

---

① 安·诺沃提尼(1904—1975)，解放后捷共领导人之一。一九五三年当选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一九五七年又被选为共和国总统。一九六八年一月在捷共中央全会上，被解除第一书记职务，同年三月辞去总统职务。——译者

资本主义和整个世界的看法，因此，我们对它的信仰不会由于某些亲身的经历而完全动摇，何况有些方面我们也无法去亲身体验。此外，尽管我们那时不认为苏联事事处处都是我们的榜样，但在当时，苏联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坚持社会主义前途的国家，它也是在国内阶级敌人和国际帝国主义进攻的面前唯一能够用武力保卫社会主义的国家。

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虽然不像苏联的年青人那样幼稚，但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是一样的。我们那时也不可能亲自到世界各地去检验我们的看法。去西方旅行对大多数共产党员来说是根本办不到的。说老实话，我们那时也不屑去那里。国内有那么多革命任务有待于完成，到阶级敌人那里有什么好看的呢？我们认为世界就是党报所描绘的那个样子。我这样说只是叙述事实，丝毫没有为自己辩解的意思。

此外，尽管在苏联可以看到这样那样的坏事，但那里没有资本主义的剥削，没有工厂老板，没有继承祖产的财主，也没有失业。那时我们还认为，那里没有致力于侵略的政府或政治力量，也没有发动战争的势力。我们把当时冷战气氛和与之相适应的宣传看成是理所当然的。朝鲜战争的冲突使我们丝毫也不去怀疑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所进行的明显的扩军备战，相反，我们觉得这是为提高防御帝国主义的能力而采取的合情合理的措施。我们那时还认为，纳粹主义在西德真的正在重新复活。至于美国的政策，那当然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人们观察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形势时，脑子里想的是自己所熟悉的德国占领时期或慕尼黑协定以前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① 时期的情况。因此，人们很容易相信，西欧必然会再次出现

①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从一九一八年建国到一九三九年被德国占领之前的这一段时间称第一共和国时期。——译者

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人民和失业者的贫困化的局面，并且认为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老一辈的人由于有战前的经验也会轻易地相信这种宣传。我们相信，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如果有可能在其它国家逐步获得胜利，那么在世界范围内就有可能防止三十年代的历史的重演，就能防止新的世界大战。

基于上面所说的这些想法和认识，我们在国内政治生活中虽然遇到一些足以在我们信仰的某些环节打上问号的事情，但我们对之并没有给以足够的注意。而当时的国际环境又恰好构成一个大惊叹号，要求我们强化自己的信仰。

第 一 章

从赫鲁晓夫到杜布切克

我的思想发展到前面所述的阶段时，一九五六年的事件发生了。当时，赫鲁晓夫在莫斯科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约·维·斯大林个人迷信”及其若干罪行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的揭露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犹如一颗炸弹，使我也大吃一惊。但同我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多数同志相比，我对此事毕竟内心还是有些准备的。这是我“在苏联受训”的结果。斯大林逝世后，我在莫斯科生活的最后两年时间里，已经感到斯大林的继承人有可能起来“从上面”开展对斯大林的批判。

一九五三年三月斯大林逝世时，我正好在莫斯科。在那些日子里，一个清晰的认识闯入到我迄今的经历中来：斯大林对苏联人来说，不多不少恰好是个可怕而又受人爱戴的沙皇。

当电台广播了斯大林遗体停放在莫斯科工会大厦的消息之后，我很自然地与我国留学生和苏联学生一起，加入了成千上万人的行列，前去瞻仰斯大林遗容。当时，任何机关都没有公布吊唁人员去工会大厦时要走哪一条路线，成千上万的人杂乱地涌向莫斯科市中心。在城郊地区，街上行人不多，一切都还算正常。在靠近莫斯科市中心的地方，大街小巷越来越多，其中有许多用卡车设起街垒，由军警把守，禁止通行。由于这些障碍挡住去路，人群东撞西闯地探索着可行之路，以便接近逝世的领袖的棺柩。他们终于到达莫斯科内行线的主要街道，这里仅有一条路可通，人们排成几

公里长的队伍，缓慢地走向棺柩。

在那里，人群需要改成四路队伍行进，但编队的方法使人想起了沙皇哥萨克兵当年袭击彼得堡工人示威队伍的情景。军警组成的人墙把人群推向街道的一侧，坐满军警的卡车一排排停放在那里，从大街中心到房屋围墙之间留出半条街作为通道，让人群在其间依次列队缓慢行进。人群不时地冲破军警的防线，或穿过卡车筑成的保护墙。在这种时刻，骑马的警察就跑出来维持秩序。这些警察和沙皇哥萨克兵不同，他们既未开枪射击，也未挥舞军刀砍人。他们也没有必要这样做。排得密密麻麻的军马的长队冲向人群，军马和人群挤在一起。马毕竟比人要厉害一些，结果人被挤得往后撤退。在人马相遇时，有些军马前蹄悬空高高地站了起来。面对军马的铁蹄，人们自然会现出自卫的本能。于是，人群就象遇着军刀迎面砍来一样退缩回去，有时还可能遭到骑兵的橡皮棍的袭击。

人群象市民抢电车一样拥挤不堪，成千上万的人不断从后面挤过来，前面有军马和士兵，两侧是卡车筑成的障碍和房屋的围墙。天气寒冷，湿雪上路滑难行。人跌倒后很难再爬起来，谁也没法给他什么帮助。到底多少人被踩伤，死伤的总人数又有多少，照例是从来不发表任何消息的，人们很难作出全面的判断。我在当晚就亲眼看到有几十人受伤和失去知觉，有些人当场就死去了。死伤人员后来被装上卡车，由军警陆续运走。

在人群被强行驱赶在一起的地方，在防线被冲破和骑兵恢复“秩序”的地方，人群的拥挤情况可想而知。从远处望去，这些地方白烟翻滚，清晰可见。人群把这些地方叫作“瓶子塞”，年轻人拼力往那里冲挤。他们边挤边喊，开始是自发的，后来便汇集成“一、二，咳！”有节奏的叫喊声。我没有费多大劲便随着人流穿过了第一个“瓶子塞”，几小时后又通过了五处这样的地方。在遇到下一

个——显然不是最后一个“瓶子塞”时，我通不过去了。因为我被挤到人群的最外层，紧靠着卡车筑成的一道车墙。当时的情况很危险，因为我不是挤在柔软的人体上，而是靠在硬梆梆的卡车车帮上。皮大衣撕破了。我已不能动弹了，人流挤着我向前滚动。那时我只盼望滚到车头时能被抛上汽缸盖，然后爬起来跳到卡车对面去。这样一来，虽然看不到停放在棺柩里的斯大林遗体，却也避免了自己被人放进棺柩的危险。我选择了这条路，逃过了这场灾祸。

那个滚滚向前、踏着同伴尸体奔向斯大林棺柩的人群，其实想的并不是斯大林。他们毫无悲伤之感，因为悲伤总会使人比较守纪律，不致于起哄肇事。而他们只要有可能，就象是去看足球赛一样，沿途议论纷纷，谈笑不止。人群里甚至有人偷东西，跟女同伴吊膀子，从口袋里掏出酒瓶喝伏特加。他们都是抱着且去看一看的目的，至于去看葬礼还是去看处决犯人，那是无关紧要的。我于是想起了在苏联电影上看到的相反的镜头：纪律严明、异常悲痛的人民奔向列宁的棺柩。很可能这仅是电影里的镜头，实际情况也许跟现在一样。但我觉得现在和那个时候确是有一些区别。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我所看到的人群，同当年在俄罗斯广场上观看公开处决犯人、观看沙皇加冕典礼时的人群，肯定是完全一样的。现在，他们则是一些参加沙皇葬礼的人群。

当我深夜两点过后回到斯特罗门卡学生宿舍时，我同房间的六人中有四个人已经熟睡了，桌上放着两个装伏特加酒的空瓶子。他们中间的一个人被我惊醒了，看了看我穿的被人撕破的衣服，然后说：“你这个傻瓜，快睡吧！天亮后带上你的护照，乘地铁到市中心下车，要装成不懂俄语的样子，只会讲‘长官’一个字。这样，警察就会带你去找警官，警官就会把你带到斯大林那里去。”按照他的这个主意，后来我真的来到了斯大林棺柩前。

在斯大林逝世后的日子里，在莫斯科的苏联学生和公众心中，笼罩着一种悲痛的气氛，而且他们简直是处于休克状态，对未来感到忧虑甚至恐惧。在同苏联朋友的谈话中，我逐渐得到一种印象，他们无法设想国内今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人们虽未明确讲出自己的看法，但流露出一种情绪，使人感到今后可能出现某些非常根本性的变化。在后来的日子里，这种趋向更加明显，年底逮捕和处决贝利亚后，整个变化的迹象就十分清楚了。人们原先对未来的恐惧心理消失了，造成这种恐惧心理的隐秘的内幕开始在人们面前呈现出比较清晰的轮廓。

事情越来越明显，我所熟识的那些苏联人，当斯大林还在世时，他们实际上就已清楚地看到斯大林主义恐怖气氛所起的作用了。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间，人们越来越公开地议论这些问题。甚至报刊上也逐渐改变了腔调，开始写文章强调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必须反对苏维埃官僚主义，必须开展批评。另一方面，反对"世界主义"的运动不搞了，疑神疑鬼的气氛缓和下来了。赫鲁晓夫去贝尔格莱德访问，一下飞机就把不久前的"帝国主义代理人"和"双手沾满鲜血的走卒"铁托称为"亲爱的同志"，从而把这一切变化推到了顶点。表明"上面"情况有变化的各种消息，越来越多地从党的领导机关传到普通党员和群众那里。

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报告使我最为吃惊的是，它以具体的材料列举了苏联安全机关的罪行，并且谈到了政治审讯中刑讯和逼供情况。当时这些都是我不可想象的事情，同时这也直接关系到捷克斯洛伐克，因为每个勤于思考的人都感到对不久前的政治案件有必要重新加以考虑，而过去我们这些自觉的斯大林主义者是从来不会这样想的。至于其它方面，苏共二十大的政治路线总的讲来是同形势的发展相适应的，我在莫斯科期间对此也已有所准备，因此，它对我并不是什么预料不到的晴天霹雳。

对捷克斯洛伐克虔诚的共产党人来说，情况则不同了。斯大林逝世一周以后，似乎是为了表示对莫斯科毕恭毕敬，哥特瓦尔德也去世了，萨波托斯基和诺沃提尼成了捷共的领导人，党的政治局成员原封未动，仍然是斯大林逝世前几个月把十一名领导人送上断头台的那些人。斯大林逝世两年之后，布拉格还为他的豪华的纪念像举行了揭幕仪式。斯大林逝世和贝利亚被处决以后，捷克斯洛伐克还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审讯，一九五四年审判了胡萨克①等人的“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集团，同年在一系列的政治司法谋害中，又将一些人处死。一九五五年夏季，诺沃提尼制订了完成农业集体化的强硬路线，警察和司法机关全线出动，对不愿入社的农民横加迫害。斯大林提出的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思想，成了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官方指导思想。实际上，斯大林的逝世对捷共来讲成了一个号召：始终不渝地走斯大林的道路，完成已故的“世界无产阶级领袖”的事业。

一九五五年夏天，我回到了布拉格时，简直就象突然来到另一个世界，与我五年前在那里的情况完全不同了。过去有觉悟的年轻共产党人之间的那种亲密无间的气氛一去不复返了。我当年生活和工作过的书记处，现在已经变成个大机关，配备了领取高薪的工作人员，那里官僚等级制度森严，并且专门制造各种指示和公文。这些机关里大多数是我根本不认识的新人，他们也不了解我。我过去认识的人中有许多已不再担任政治领导职务，有些人还在这些年的清洗运动中受到各种迫害。就是那些比较年轻的共产党

---

① 古·胡萨克（1913—），捷解放后曾任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捷共中央委员。一九五一年二月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罪名被开除出捷共，一九五四年被判无期徒刑。一九六三年恢复名誉。一九六八年任政府副总理。一九六九年四月起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一九七一年改为总书记），一九七五年兼任总统。——译者

人也是心怀恐惧，心口不一，除了极少数密友之外，跟谁也不讲真话。共产党人自己审查自己的思想，删改自己的言论。一般来讲，人们都保持着政治上忠顺的仪表，背后则深深埋伏着各种矛盾和冲突。对这些矛盾和冲突，现在人们只能凭感觉去捉摸它们，而一九四八年时则是公开议论的。

这种现象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我这次回到国内的感觉同五年前刚到莫斯科时在许多方面都有类似之处。在莫斯科时使我感到不快的那些东西，这期间都搬到捷克斯洛伐克来了；相反，近些年来莫斯科发生的缓慢、然而明显可见的变化，已开始打破我们过去照抄照搬的那些东西。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借助诡辩论力图证明，他们生活中发生的变化是革命的、进步的变化，他们这样做符合苏联的理想。然而同一时间内莫斯科却在悄悄地就此展开讨论，认为这些东西恰好是“个人迷信的恶果”。开始时很难跟朋友和熟人讲清楚，使他们理解我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以及他们同一时间内在国内经历过的那些事情。

在这种气氛下，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报告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确实象是一颗炸弹，它使整个捷共处于休克状态，随后引起了党员的一系列讨论。自一九四八年二月以来，这是党内的第一次讨论，它清楚地表明，从那时起捷共的面貌变了，捷共已不再是由相信党的纲领的人们自愿联合起来组成的政党，它变成了一个按照人们对权力的态度把人们联合起来的组织。它虽然把权力的信徒们联合在一起，但它联合的也仅仅是从权力中得到好处的人，对这些人来讲，信仰是无关紧要的。

苏共二十大在党内引起的这场讨论中，形成了三个主要派别。第一派由虔诚的斯大林主义者和怀有野心的分子组成，这些人同当时受到批判的事情很有瓜葛，并负有直接责任。他们只有把批判的浪潮平息下去——哪怕暂时平息一下，才能继续保住自己的

阵地。他们对批判斯大林主义采取否定态度，使得许多斯大林主义的真实信徒向他们靠拢。后者对政治恐怖局面虽然并不负有什么个人责任，但内心深处非常赞同斯大林的整个政策，他们不能设想可以离开这个政策，他们把对斯大林的批评看作是“偏了方向”，认为这是“阶级敌人”试图削弱党的行为。

与这一派相对立的另外一派，其成员在此以前也是思想上虔诚的斯大林主义者，但是他们对党的政策和自己过去的做法是否正确，早已抱有怀疑，而赫鲁晓夫的报告则推动了他们公开表明自己的这一立场。一般来讲，他们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主义的那些事情并不负有直接的责任，相反，他们中间的某些人甚至还曾受到过种种伤害。

第三派捷共党员没有怎么卷入讨论，采取观望态度。他们多数人参加捷共是为了赶浪头，但他们与怀有野心的分子不同，后者极端狂热，对所批判的事情负有个人责任。他们这一派人对事物一直持观望态度，仅仅为了对政权表示忠顺或者为了自己一般的功名，他们才去做一些必须做的事情。这一派人内心深处倾向于赫鲁晓夫的报告，但暂时尚不愿为此自找麻烦。如果表决的话，他们则会举手赞成“苏共二十大的路线”。

因此总的来看，在捷共组织中，对赫鲁晓夫方针的支持占优势。但在党的各级机构中，力量的分布情况是不平衡的。在党的高级机关中，拥护斯大林主义的第一派人的势力比较强，在政府机关占据要职的党员中间，这一派也有很大的势力。相反，在知识分子和党的年轻干部中间，对斯大林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一派势力较强。

当然，一九五六年春天在捷共党内进行的讨论中，人们对党的极权专政制度的基本方面，一般尚未提出什么怀疑。例如，人们通常还是认为，捷共在国家内的一党统治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

义建设”的必要条件。同时，人们实际上也不否认阶级斗争势必导致政治专政的论断。他们只是对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做法，特别是对党员实行专政的做法表示了怀疑。

讨论中出格的情况很少，主要是在知识界中有这种现象。知识界提出，斯大林主义的思想体系歪曲了事物的真相，并且认为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这就为辩论极权专政制度的基本问题打开了一条道路。当然，在多数情况下，这仅是一场抽象的、理论上的辩论。当时，最激进的那一派党员也并未要求取消专政，他们仅仅要求享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自由。

当时在捷共内部的讨论中提出的最重要的激进的政治要求，是要求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党的领导人认为这个要求直接威胁到他们的地位，从而起来反对。后来，代表大会没有开成，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代表会议与代表大会不同，它无权选举新的党中央委员会。代表会议自然表示赞成莫斯科的新路线，并且宣布，斯大林主义的某些思想和政治论断在捷克斯洛伐克也是无效的。但是，代表会议未能使捷共领导和关键性的政治部门发生质的变化。

捷共领导把赫鲁晓夫新路线带来的许许多多政治成果压了下去。不过，捷共领导无论采取什么措施，也无法阻止赫鲁晓夫报告的影响，报告给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斯大林主义信仰以沉重的打击。我觉得，赫鲁晓夫试图把一切过错和责任都推给斯大林，并且提出党员个人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他这样做本身就是对斯大林主义信仰的一个沉重打击。

直至今日，改革派共产党人中的马克思主义者通常在反对赫鲁晓夫时所使用的主要论据就是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主义只是对斯大林个人的批判，而其实应该批判斯大林主义制度本身。人

们通过这一点仅仅看到了赫鲁晓夫批判的消极之处，为了克服其局限性，通常又仅仅主张把批判扩大为对制度的批判。但是，事物实际上是相当矛盾的，从某种思想是否合理的角度来讲，对制度进行批判虽然是更激进和更根本的批判，但是道义方面的问题，造成这种制度的人的责任问题，却象斯大林主义思想本身一样被放到了次要的地位。与此相反，赫鲁晓夫所作的初步批判合理地把个人的罪过和责任问题提到了首位。姑且不论这个问题会得到什么样的回答，重要的首先还在于他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们这样一些斯大林主义的信徒，在个人责任的问题上，当时没有遇到许多麻烦。根据我的信仰所特有的准则，最后决定某种言行正确与否的东西，不是我自己的判断，而是此种言行在客观上具有什么意义，是否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就是说，是否符合革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利益。实际上，一件事情客观上具有怎样的意义，这个问题是由党来判定的，而所谓党，指的无非是党的机关和党的领袖。在这里，站立在金字塔顶端的是斯大林，因此，他的立场通常就是最高一级的立场，在我这个人的心目中，也是判断我个人的言行是否正确的标准。

当然，斯大林、哥特瓦尔德、党的政治局或者党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从未达到上帝对虔诚的天主教徒那样神圣的程度。他们同我的关系，很象教皇、红衣主教、教团和教会同忠于宗教的天主教徒那样一种关系。虔诚的共产党人心目中的上帝是历史的客观法则，它确保"工人阶级的利益"得以实现，确保人类能根据共产主义信仰实现进步的转折。当然，虔诚的共产党人和忠于宗教的天主教徒一样，他设想教皇和红衣主教也尊敬上帝，他相信，教皇和红衣主教的言行是他们的灵魂同上帝融合的结果。作为虔诚的斯大林主义者，我甚至还一向认为，我的教皇斯大林不是无误的，他也可能失足，红衣主教和教团就更可能失足了。但是，他们竟然不肯

把上帝，即历史的客观法则置于自己之上，竟然会不以“工人阶级的利益”为标准反复地根据最好的良知来衡量自己的言行，这实在同我最初的信仰是不能相容的。

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时明确提到，教皇斯大林是自行其是的，并且已经多次证明他是目无上帝的人。他之所以大量杀人，并不是由于历史的客观法则要求他这样做，而仅仅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因此，他把忠实的信徒也杀掉了。对这些东西，我们这些红衣主教们都知道或者至少感觉到了，但是我们没做任何事情，因为那样一来，我们自己也会被他投进监牢和送上断头台。那个直接帮助教皇和腐蚀教皇的最坏的红衣主教，已经被我们处死了。对这一切事情，我们都集体进行过研究，我们得出的看法是，我们不需要教皇。究竟什么东西才是历史的客观法则的真正要求，这个问题有待于我们始终不渝地集体加以探索，我们也将同你们这些信徒们商量这个问题。请继续相信我们和历史的客观法则吧。我们一定能够实现“工人阶级的利益”。这一次是认真地实现它，不会再歪曲它了，历史的客观法则是存在的，教会“基本上”一直都准确地看到和注意到了这个法则。

赫鲁晓夫用批评“个人迷信”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用历史来比喻的话（当然，比喻总不会完全确切），就好比是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博尔贾①死后，他的红衣主教们聚集一堂，为防止教会的分裂和新教得势，宣布他们是“集体教皇”一样。但这些红衣主教们是不会成功的。不仅是由于他们也不会对制度进行批判，而且还由于教徒们发现教皇和红衣主教原来都是些不信上帝的家伙，因此，他们就摒弃红衣主教和教皇，在对上帝的信仰中自寻出路，寻找自己同上帝的直接联系（这是新教改革的宗旨）。概括一点说，

① 博尔贾，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一四九八至一五〇三年任罗马教皇，是历史上以荒淫贪婪著称的教皇。——译者

就是关于一个人的信仰和行为如何对上帝负责的问题，教徒们自己已经作出了新的回答。因为他们发现，已经不能再把教皇、红衣主教和天主教会当作自己同上帝联系的保障了。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在共产主义的信徒当中也必然引起同样的问题，而且无需对制度进行批判，就可以出现这种问题。许多共产党人对这个新问题也开始作出新的回答。然而，共产主义信徒的处境同教徒们的处境是不同的。教徒们可以把宗教信仰的基本精神充实于自己的内心，可以把自己个人的生活同上帝融合为一体。但是共产主义信仰的基本精神就不同了。如果不实现社会关系的改变，如果个人生活的外部条件没有改变，共产主义信仰的基本精神就无法实现。基督徒有自己的灵魂和良心就行了，不一定需要教会。而共产主义信徒则需要超乎他个人力量的变革手段，因此，没有党是不行的。

所以，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在"工人阶级利益"或历史面前自己要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负什么责任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有机地同党的建设问题，同如何改革"蜕变了的"党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作为"蜕变了的"党的党员，共产党人要么放弃自己的信仰，要么只是在理论上承认自己的信仰（这是一种自由派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只要能把自己的思想写到文章中去，他们就满足了）。如果不选择上述两条路的话，他就只剩下一条路，即：就党员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负什么责任的问题，作出新的解释，同时对党进行改革，以便根据对个人责任的新的理解在党内努力实现党的基本目标和精神。

在一九五六年，我只是开始想到这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但是我对它们却远未清楚地理解。我只觉得自己的无忧无虑感受到了冲击，因为我以前一向认为，如果按照党的要求行事的话，我就是在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做好事，而我对可能产生的错误是不负责

任的，因为对历史负责的是党。可是现在，就是这个党，要直接追究斯大林的个人责任。他应当自己负责。那我怎么样呢？对我能是另外一个样子吗？

在一九五六年，个人责任的问题成了我的头等重要的问题。这也是由我当时的职位决定的。从一九五五年秋天开始，我担任总检察院的司长。我是作为受过苏联教育的、有培养前途的干部被任命的。在担任这一职务时，我同政治审讯和刑法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所领导的司的任务是监督国家机关遵守法制的情况。然而，国家机关是进行政治迫害的有效工具。国家机关根据公民的政治表现将他们分为优劣；国家机关的下属机构剥夺人们的财产和住房；在农村，人民委员会强制推行集体化，等等。在这方面就有很多事情促使人们考虑当时作决定的人应负什么责任的问题。而且，检察院是过去实行政治恐怖统治的工具之一，因此，有关非法迫害、政治审讯和司法谋杀的问题好象随时都会提到日程上来。

在我们机关的党员得知赫鲁晓夫批评了“约·维·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以后，“在我们这里，谁对这些事情具体负责”的问题就是无法回避的了。当时的总检察长是阿莱士，他是斯兰斯基案件的起诉人之一。这个案件的主要起诉人乌尔瓦莱克是最高法院院长。负责刑事案件的副总检察长是什瓦赫，他是什维尔莫娃案件的起诉人。在斯洛伐克，总检察长的代表是盖肖，他是胡萨克案件的起诉人。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对党的“蜕变”和对非法迫害的责任问题，就决不是学院式地研究问题，而是向那些高级领导人以及把他们扶上高位的更高级领导人的直接挑战。

在党内外的会议上讨论责任问题时，使我逐步看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这些人和其他一些人，他们知道、或者从他们所知道的情况中完全可以判断，他们是在把那些没有罪证、罪证相互矛盾或

者完全无罪的人送进监狱或送向死亡。而他们现在的态度是一致的，他们反问：难道他们应当对此负责吗？他们执行的是上面的命令，是党的决议，他们有党内大官们的明确指示。结论是，要么是“党”的罪过，要么谁都没罪，只是“发生了”非法行为和“蜕变”而已。这同在审讯纳粹战犯时那些战犯所作自我辩解的逻辑一样：他们仅是执行了领袖的命令。

我还记得同阿莱士的谈话，从谈话中我了解到，在审讯斯兰斯基时，起诉人和被告都从录音带上记熟了自己的角色，然后在法庭上就像在剧院里那样表演！他不否认这点，相反，他还辩护说，责任在剧本的作者和导演。我承认，他个人不可能完全阻止这件事。但是我问他：为什么要积极参与这出悲喜剧呢？当他知道了这只是在演戏，而且根本搞不清楚被告的交待是否真实，证据是否确凿的时候，他完全可以拒不参加。可是，阿莱士，这位宪法规定的法制的最高维护者，回答道：这在理论上虽然是可能的，但实际上却意味着我将要和被告坐到一条板凳上去。保命也是一条理由，尽管从道义上讲是站不住的。我也承认了这一点，同时又问道，既然他这么看，那他“为什么不想办法躲过这件事，以免祸及自身呢？”例如搞点伤残，这样就可以不参加审讯了。他说：“当时我没想到这个办法。”我在检察院几个月的工作中，在各种情况下了解阿莱士。我认为，他不像乌尔瓦莱克那样是个没骨气的人。后者是南捷克地区司法系统的便衣警察，后来当了政治警察并由此升上高位。他也不像什瓦赫那样是个恶人。什瓦赫是个毫无顾忌、权欲熏心的野心家，他原来是拔佳鞋厂的工人贵族，摇身一变成了“革命者”，并且作为“工人干部”被输送到司法部门。他也不像盖肖那样头脑简单，没有人格和骨气，可以为任何主子效劳。阿莱士在战前是县级法官，小公务员型的人，他对共产主义理想（这些理想为工人和小公务员合理地开辟了“上升”的道路）有自己的理解方式。

他个人更像苦行主义者，他不为个人利益争权力，但是他爱权力，因为权力把他从单调的县法院的公文堆中解救出来，抬到历史创造者的地位。我不怀疑，他当初在县法院审讯时是正派的，并且是恪守法律的，如果当时要法官或检察官背诵别人向他提供的脚本，那他会认为这是荒谬的而加以拒绝。

当他后来在生活中遇到这种处境的时候，也许他真的没有想到如何躲避它。他之所以没有想到是由于他根本没有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很可能，他确实胆怯了。但他担心的是表面的后果，而不是自己的良心。以前在当法官的时候，他可能有过良心，而从他开始“创造历史”之时起，就不照章办事了，他的那个良心也丢掉了。当初在他宣判一个偷鸡者徒刑时，他曾感到自己要对此案件负责，但是在对十一名“人民的叛徒，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社会主义的破坏者”判处死刑时，他可以轻巧地把责任推给“党”。他感到安全，没有担心，也没有考虑躲避，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就这件事追究他的个人责任，因为他做的事都是以“最高目标”的名义进行的。

他同主观上信仰纳粹主义并以其“最高目标”的名义在纳粹法庭上进行审讯的检察官和法官有什么区别呢？他不相信“日耳曼种族”的优越，而相信“工人阶级的利益”，这种不同就可以使他们区别开来吗？这种酷似感在一九五六年讨论检察院的错误时，突然钻入了我的心中，我用了各种思想论据想把它驱赶出去，但一点用也没有。这是我思想中一个全新的因素。因为在一个月前，我就知道了政治审讯的事，而我是从阶级斗争的“最高利益”来看的，并且我也用这些理由来解释各种怀疑。当然，不同的是，现在我对背景了解得更多了，而且很清楚，那根本不是正常的审讯。是的，三年前在莫斯科的一次讨论会上我曾说过，那不是“正常的审讯”，不适用无罪推定，责任要由党自己承担。但造成我思想转变的新

因素，说到底还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这一批评是原始的、也远非是“系统的”，并且出于实用主义的政治考虑，还把普通的人的道德观念偷偷地塞进了政治。尽管如此，它还是起了作用。因为由此产生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党不替斯大林负责，他应当自己负责。那么，谁会替我负责呢？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试着来自己承担责任。当时，以后更是如此，在布拉格的总检察院要这样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在《法律汇编》中公布的正式法律之外，在检察院和法院还有另一种法律，我们的行话称之为“内部发行”的法律。这是一种内部的秘密指示，规定总检察长、司长或副总检察长等各级领导对某些特定案件的办案原则。这些指示（在检察院由总检察长发布，在法院由司法部或最高法院院长发布）直接了当地规定应当做什么和怎么做。例如，为我所领导的司明确规定：对公民就某些决定（某些把人逐出住宅的案件，某些没收财产的案件，剥夺“富农”土地和财产时采取的一些措施，等等）所提出的申诉，根本不作实质性的研究，均以理由不充分予以驳回。数以百计的申诉就是简单地用如下一句话处理了：“检察院认为‘没有理由’改变原来的决定，并已通知本人。”下面是签字和日期。谁签字？一般是一个主管人签字，有的时候就写上：司长——某某（签字）。这就是说，以我职务的名义签的。有时主办人对某些案件有些犹豫，他就索性把文件直送给我，说由于事情“复杂”或“重要”，请我作出决定。如果仅是为了逃避责任，有时我同样可以往上推。但是只有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我才这样做。而且，逃避责任同样不能解决问题。

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的气氛下，过去遭到各种非法行为迫害的人们，开始大量地要求平反，并提出了申诉。继续执行“内部发行”的法律，就不仅意味着无视人们的命运，而且意味着继续执行普遍受到党的批评的旧政策并且要对之承担责任。在党组织作出决议

以前，总检察长拒绝撤销自己的指示和秘密方针，因为这些方针原是根据党的决议制订的。而这些方针指示涉及“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时期的各种运动。我们大家都知道，从现行的法律观点出发，在那些运动中发生的许多问题从法律上来说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我只有一个办法，即首先证明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案件是苏共二十大以后所必须处理的政治问题，然后逐步达到撤销那些指示的目的，以便开始实事求是地按照法律来研究公民的申诉，并尽可能地予以纠正。

我当时认为，从所谓“B字行动计划”开始进行纠正工作是最合适的。根据上述行动计划，五十年代初在布拉格（后来又在布尔诺、比尔森和其它州府）让数百人迁出了住房，并为了“公共利益”没收了这些住房。房主们被迁到边境农村，住在德国人被遣返后遗留下来的破旧农舍中。根据同一行动计划，布拉格郊区的一些休假用的别墅和高级别墅也被没收，房产主们被定为“阶级敌对分子”。整个行动是为了“公共和国家的利益”和按照“工人阶级”的需要而采取的。这一行动不仅一般地说显然是非法的，而且在许多具体的案例中所采取的作法也是非法的。这一行动牵涉的人数有限，与其它问题（如农村集体化）相比，这个问题不大。有些问题实际上在发展过程中已经自然而然地解决了，例如老人死掉了，年轻人的家庭关系有了变化，他们在结婚以后已在别处定居，等等。那些提出申诉的人，往往也不是要求退回原有住房，只是要求合理地解决他们被戴上的“阶级敌人”的帽子和被迫住在边境农村的问题。解决这样的问题并不是不可能的。

我搜集了手头有关这类事情的材料。情况表明，“为工人阶级利益”没收的房子，没有一处是工人住进去的。所有的房子都分给了军官和公安部队军官，后来有一些分给了捷共机关和其它政治机构的工作人员。乡间别墅和高级别墅由捷共中央接收，并分了

一部分给内务部。从“阶级观点”来看，原来的房产主根本不属于资产阶级，他们之中大部分人属于中间阶层，是医生、律师或职员。选择牺牲品的根据不是“阶级”标准，而是房子的质量。

我带着材料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去找党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哈鲁斯。他既不反对，也不赞成。他给我上了一堂阶级斗争课，并答应研究一下。结果是，一九五六年秋天以前，没有任何结果。苏联入侵匈牙利以后，还指责我“袒护阶级敌人”。这种指责当时是不公开的，到一九七〇年将我开除出捷共以后才公布。一九七七年我在《七七宪章》上签名以后，又再次公布。

在此期间，当然必须解决许多其它性质的具体问题。在我向州和县检察院发布的业务指示和文件中，我力图形成一种行动路线，即：虽然不急于撤销什么规定，但要保证严格遵循现行法律准则。当然，对当时各县的头目们来说，这简直是一场革命。在我的权限之内，我也曾对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几次抗诉。迄今为止，这种做法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总检察院从未采用过。后来我才明白，有关部门是如何用迂回的办法，通过党的机构来抵制抗诉的。但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党的官僚主义的势力比较虚弱，加上我有“莫斯科的体会”，这些都使我的抗诉未经很大的周折就通过了。这样一直到我搞了一次骇人听闻的、无法通过的抗诉。

当时的内务部长巴拉克（他同时也是党的政治局委员，是仅次于诺沃提尼的最有势力的领导人）由于个人之间的冲突，把内务部一个不太受欢迎的部门——新闻检查局的一个工作人员给开除了。这个人在接待日到我这里来提出了申诉。我认为，巴拉克的行为显然是违法的。由于我意识到巴拉克的特殊地位，我想绕过法院，以免造成丑闻，就采取了内部处理的办法：我向巴拉克提出了检察院的抗诉，这样就可能不动声色地平息事态。

然而，大约在三天之后却招来了大祸。巴拉克打电话给总检

察长说，总检察长的下级官员们显然由于某种误会而干涉起他这位部长的职权来了，他要求总检察长处理此事。总检察长自然是俯首听命。副总检察长把我叫了去，他挺友好地尽力向我说明我的行动的笨拙，他提出，如果我收回自己的抗诉，事情就平息了。于是出现了争论，接着是争吵，因为我拒绝那样做。而奇怪的是，我的上级本可以亲自签字决定撤销我的抗诉，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也很清楚，巴拉克的做法是违法的。他们选择了另外的道路，他们命令我收回抗诉。但是在关于检察机关的法律中有一条规定：检察官有权拒绝执行上级的违法指示。我引用了这一条规定，拒绝从命。

检察院成立以来，类似的情况只是偶尔发生，但总是带来严重后果。最终，副总检察长戴维亲自撤销了我的抗诉。而我和我的上级知道，这样搞下去是不行的。巴拉克当然是满意了，然而他好景不长。五年之后他同诺沃提尼发生了冲突，后者怀疑他在党的领导层搞阴谋。巴拉克通过自己同莫斯科公安部门的关系寻求支持，但是他失败了。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支持了诺沃提尼，诺沃提尼就以“滥用公职”罪让巴拉克受到审判。起诉人是军事总检察长萨麦克，他在我同巴拉克之间发生纠纷时是副总检察长。当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个审判案时，我不禁想到，此时此刻不知巴拉克在军事总检察长先生面前是否会回想起，他过去是怎样教训检察机关遵守法律的。直到一九六八年我才有机会同他交谈。那时，从监狱获释的巴拉克要求已经是捷共中央书记的我接见他。他说他得出了许多生活教训并向我谈到了其中的一些。他对我的主要的劝告是：在担任党的职务时，任何时候也不要同国内的和苏联的公安部门打交道。“我多么会应付他们呀，”巴拉克感叹地说，“可是你看我的下场！”但他对一九五六年的事根本没有想起来。他大概从来也没有从我所关心的角度来考虑那些事。

我在总检察院的问题最后是由同我发生了冲突的人帮忙解决了。总检察院的领导和捷共中央有关机构同意了我的意见，即以我的离职来解决事端。尽管在党中央全会上，捷共中央的一个部长伊内曼提议开除我和其他几个捣乱分子的党籍，但会议还是以调和折衷而告结束。给我作了一个鉴定，说由于缺乏经验，我没有很好地理解捷克斯洛伐克的阶级形势，犯了“机械搬用苏联经验”的错误。另外，还允许我转到科学院国家和法律研究所从事理论工作。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五日我到了科学院。三周后，苏联军队镇压了布达佩斯的“反革命”。在这之前，在波兰的“十月事件”（其结果是当时有革命批判精神的、反斯大林主义的哥穆尔卡进入了党的领导）期间，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就尖锐化了。在匈牙利事件之后，捷共所有害怕批评斯大林主义的力量——它们的地位是同斯大林主义紧密相联的——迅速发起了反攻。在党内，开始迫害几个月前勇敢地开展了批评并力争变革的许多共产党人。总检察院的党组织也粉碎了前一时期持批评态度的反对派。一名检察官甚至由于在党的会议上“污蔑盟国”——苏联，而被追究刑事责任。总检察院和捷共中央机关的某些积极分子甚至还企图再来整我，想把我开除出科学院。可是毕竟我还是持有党组织作了不到一个月的书面鉴定，况且在科学院还有更多的人发表了比我更为异端的言论，并且是公开地在报刊上发表的。于是，我总算通过了险滩，在科学院工作了十二年，直到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

* * *

布达佩斯街上的枪声和苏军对匈牙利的干涉，对捷共内部那些想制止批评浪潮的政治力量，对想保持现状、并以此保持自己的权力地位的政治力量，自然是有利的。然而，把捷共内部批评风气压下去的，不仅仅是这些力量进行迫害的结果。在出自过去的共

产党员手笔的回忆录和评论中，一般都没有谈到（或至少没有明确强调）一个使捷共内部一九五六年底得以制止批评的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共产党人当时感到害怕。

当然我不知道，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那些后来曾在捷共内部代表了改革派共产党人的具体的人。但是，如果我今天说，当时使我感兴趣的只是所谓匈牙利事件的一般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我本人就是在撒谎了。因为除了这些问题以外，这里还有人群拷打共产党人和把他们绞死在电线杆上的很具体的想象。而从我个人当时同非常多的各代共产党人的谈论中，我还记得，这种想象也占据了他们的头脑。这是个帮助诺沃提尼把赫鲁晓夫的批评在捷共内部引起的批评浪潮压下去的重要因素。

在对匈牙利暴乱的各种评价中，当时给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在布拉格私下传播的对卡德尔的评价。它甚至是我开始学习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动力。它在理论上给我的印象很深，我觉得，该评论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虽然也攻击了我，但它们是我所不会有、也根本不敢提出和思考的想法。因为，在这里除了迄今为止赫鲁晓夫对“个人迷信”所作的批评以外，还增加了重要的、从共产主义思想信仰出发的对制度进行的批评。然而，不管我在理论上如何被吸引住，实际上我并不认为，如果武装的人群现在冲上了布拉格的街头的话，他们会喊出“一切权力归工人自治”的口号。我觉得比较可能的倒是，如果所有那些多年来从检察院、法院、政府和党的机关只收到写着“复审理由不足，维持原判”的公文的申诉者们聚集和武装起来时，他们是会冲到这些机关的楼房里去的，而从大楼窗户扔出来的东西不会仅仅是档案而已。

个人责任的问题，使集体责任感或罪过我也有份的感觉具有新的份量。对过去过错承担的责任是笼统的，而没有仔细进行调查然后区分每个人所犯过错的程度。聚集起来的人群从来不会研

究这类事情，甚至即使想研究，也没有条件，何况从来就不想研究呢。而这种引起恐惧的“罪过我也有份”的感觉，党员们当时都有。当然，这对过去数月的兴奋是一瓢无情的冷水。我不得不承认，恐惧感实际上使我同那些我曾经瞧不起的人重新接近起来。当时的情况的确是如此。我的一位在青年联盟初期宗派主义横行年代的同伴、早在一九五六年秋就因激烈批评斯大林主义而被开除出党的金尔，当时就讲过他的考虑：“假如人们从街上跑来说，共产党员将被绞死，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现在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这他们是不管的，因为我在一个月以前还是共产党员。我的邻居是个斯大林主义的坏蛋，如果我不愿意和他死在一起的话，那我只能对他们说：‘先生们，你们可以把我绞死，但是，要同那位先生隔一棵树！’……”我多年以后还觉得，这种想法准确地表明了党内原来一致的斯大林主义者之间在一九五六年的分化，对那些从来就不是斯大林主义者的广大群众来说究竟有什么价值。因为，许多事情对我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新发现，而对他们则已铸成终生的悲剧。

然而，布拉格的街道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其他城市的街道都是平平静静的。党的领导的自信心又提起来了，从而也略微安下心来了。这样，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和捷共就进入了表面上平静发展的十年。但是，这种发展正好使得党内有批判精神而又不露锋芒的改革派力量能够最终在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时期，作为一种伟大的、有组织的力量而出现，并能提出进行重要变革的比较深思熟虑的主张。这种力量已经不怕、也不用怕在街上拷打共产党人的人群。然而，有趣的是，在“布拉格之春”时期反对民主改革的人，一直试图重新唤起一九五六年的这种恐惧心理，并再次利用它来为自己服务。一九六八年八月的军事干涉之后，干涉者自己及其国内的盟友也同样试图这么做。这证明，在这一点上，这些“现实的社会主义者们”的确现实地看到了一九五六年对党内批评潮

流进行镇压时，什么东西起了重要的政治作用。

在有了所有这些感受之后，我本人一九五六年底就陷入了内心上不能继续进行党的政治活动的状态。在构成我原来的信仰的诸因素中，许多因素突然瓦解下来，我自己不知道，在所有这一切之后，我原来信仰中究竟还有什么东西应该而且可以保存下来。但是，由于我的政治活动从来都是出于思想上的信念，因此，必然的结果就是，我现在实际上不能从事政治活动。而且，我处于这种好不容易才逃脱了党的处分的处境，我在党内除了不吭声外，别无他法。我到了新的、不习惯的工作环境，在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当研究生，这在科学院算是最底层。我的任务是成为一名理论工作者、研究人员，即做我从未做过的工作。

然而，所有这些看来不利的情况最后使我有一个最好的摆脱困境的出路：我可以开始继续学习。更确切地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可以开始系统地、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钻研那些过去从未学习过、同我主要的切身的问题直接有关的书籍，也即意识形态方面的书籍。我的学习期限是三年，在这期间我的唯一任务是通过几次考试和写我所选择的关于国家与法律一般理论的法学副博士论文。

我很快就发觉，莫斯科大学法学院传授的许多方面的知识是多么贫乏，其目标只在于培养经过专门训练的官僚主义者。直到现在，当我二十六岁的时候，我才第一次读了马克思以前的作者，政治科学古典作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里①的著作，读了莫尔、康帕内拉和其他作者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作品，以及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及其先驱者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的作品。我第一次得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韦伯和莫斯卡的观点，规

---

① 马基雅维里(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著有《君主论》等。他反对意大利的政治分裂，主张君主专制，甚至认为君主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所谓“马基雅维里主义”）。他的主张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译者

范学派法律上的理论提法，法律社会学，实际上整个社会学的书籍。对我来说，马克思主义本身也突然与莫斯科大学所挑选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的面貌不同了。大学所挑的书籍虽多——从《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一切主要著作，一直到斯大林的著作——，但是那都是一些经过相当仔细检查的书籍：这里缺少马克思早期的著作，也闭口不谈葛兰西和卢森堡，大学生只有从列宁的一系列批评和资产阶级的谩骂中才能了解到社会民主党人。考茨基，希法亭和伯恩斯坦，甚至某些布尔什维克，如托洛茨基或布哈林，也要从那里才能了解到。

这样，我实际上到五十年代末才学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大学在国家法律科学方面本来应该教给学生的东西。可是，这种学习对我来说远远不是只具有获得专业知识的意义。我不是把柏拉图和马基雅维里、马克思青年时期和葛兰西的著作仅仅当作属于高等教育的书籍来读，阅读时，我以巨大的兴趣钻进去，从中寻求我的主要问题——当前政治问题的答案或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古代和近代的作者，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帮助我改造并重新形成自己的世界观。我头脑中的斯大林思想体系被摧毁了。在它的废墟上开始产生这样一种信念：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合理的、内部矛盾的、并非达到终极的封闭的社会发展理论。这种理论同共产主义运动中实际起作用的政治思想是不一样的。

随着我本人世界观的重新形成，积极进行政治活动的能力和愿望也重新产生了。过去，在战后初期，那是自发的，是时代把我卷入政治。我当时实际上并不把自己的斯大林主义信仰和积极性理解为政治，而是当作革命地创造历史和新世界时自己应该做到的事情。在一九五九年，我重新进入实际政治领域时，那就迥然不同了。这次完全是有意识的步骤，是深思熟虑的决定。我也知道，我国的政治中，有一些完全确定的关系、情况和规律在起作用，如

果我想有所成就，就不能忽视它们，就必须尊重它们。我知道，这其中也还有人的道德问题。搞政治自古就是如此。

在作出这一决定的时候，我的观点是怎样的呢？这里，我将比较详细地谈一谈。因为它们有助于理解我以后几年包括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时期的许多政治态度和步骤。

* * *

勤于思考的、原来持斯大林主义观点的共产党人的思想，在一九五六年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是通往所谓改革的共产主义的。对他们来说，基本的问题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列宁）究竟写了什么。通过研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他们当然可以看到，马克思以及列宁有许多思想根本不同于党的官方解释者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首先引起改革派共产党人的注意的，是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他明确地主张人的自由和解放，对他说来，阶级斗争只是必要的手段。合乎逻辑的结果是，有批评精神的共产党人用马克思（或列宁）来反对官方的意识形态，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这种意识形态背离了马克思原来的思想，因而不是科学的客观认识，而是错误的思想意识。在科学和意识形态同客观真理的关系上把两者对立起来，是这一阶段改革的共产主义进行批评的基本出发点。

当时，我原则上也赞同这种观点，但是，在政治上后来逐渐采取另外一种观点。因为依据上述观点实际上仅仅能够进行经院式的理论批评和活动，这种马克思主义必然只是知识分子的事，只能关在图书馆里，或者在教研室里和专业杂志上发挥作用，但是不能取代全党的意识形态，不能把斯大林主义概念从数十万有信仰的共产党员的头脑中排除出去。这种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解释，是一种要求很高的、抽象的理论论述，对大多数从事政治实践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不易理解的，同他们的具体问题相去甚远。他们想

从理论中得到“行动的指南”，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理论家们不能使他们得到这种指南——他们虽然对迄今为止的、斯大林主义的指南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批评，但是他们未能向从事政治实践的共产党人提供另外一种通俗易懂的、具体的指南来代替它。

我的看法同社会科学各部门的那些未直接参与党的政治活动的改革派共产党人不同，我在五十年代末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力求获得客观的真实认识的努力）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政治实践中的指南）之间的矛盾，在政治上不能通过简单地把意识形态当作虚假的、歪曲了的、因而也是无用的思想加以反对的办法来解决。我相信，为了新的政策，必须改造现在的意识形态，代之以另外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也不可能同科学理论完全一样，而是为了政治目的把复杂的现实加以简单化以至歪曲。然而这种歪曲不应当同现实矛盾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在理论上妨碍认识真理，在实践上支持那些想压制如实地认识客观的势力。

学习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政治理论，特别是革命的政治理论，使我确信，理论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这类矛盾是一直存在的，并且从未以简单地放弃意识形态的办法来解决，因为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的理论是合理思维的产物，是符合于当时的各种关于社会的科学知识的理论。支配罗伯斯庇尔的思想和支配“第三等级”及革命时期巴黎人民的情绪的意识形态，只在某些点上是从这些理论出发的，但是总的说来，已把它们改变得面目全非。罗伯斯庇尔对理性的宗教式崇拜在这一意识形态中起了比卢梭“公众意志”民主形成论更重要的作用。

因此，卢梭作为一位思想家的著作对后代虽也还有其教益，但政治思想的实际发展却并未沿着回到“真正的”卢梭的道路走。

拿破仑的将军们就已根本不谈卢梭的著作了，然而确保社会变革（这些变革最初就是以卢梭著作中的理论为依据的）取得实际

结果的终究是他们。那些不仅在政治思想方面而且在政治实践方面要继续前进的人，首先必须对革命的那些实际结果作出反应，而不是仅仅刷新原来的指导思想。

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不是因为革命人民及其政治领袖要篡改他们所信奉的思想，而是因为他们要把思想付诸实施，因此，思想本身就将发生变化，以另一种形式存在，马克思把这说成是思想变成物质力量，因为它掌握了群众。可是，群众及其政治领袖必然会把思想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使思想服从于自己的目的。同时，关于社会的客观真理是否被认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的思想能否把搞政治的人统一和组织起来。思想的这种组织、统一作用首先就规定了：哪些思想，按怎样的顺序和逻辑，在实践中将构成有广泛影响的政治意识形态，而原来的理论中哪些思想则将受到压制、退居次要地位，或完全从意识形态体系中消失。有些思想对真实反映现实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对政治和组织目的来说却是不合适的思想。例如，盲从是基于感情，而不是以认识为基础的，但在盲从能更好地起动员、组织作用的地方，合理的科学怀疑总是事先就被认为是不合适的。因此，相对性和怀疑的因素在理论变为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受到排挤，在大多数情况下完全消失，而绝对化和信仰的因素则取而代之。人们根据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的需要来不断修改理论。当然，当思想通过群众社会运动的形式变成物质力量时，是必然要付出这种代价的。

当我五十年代末考虑马克思的理论同各共产党内实际起作用的意识形态的关系时，我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看法：这种关系同历史上出现的情况是非常相似的，共产主义政治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是不能靠再去研读“真正的”马克思作品的办法来解决的。且不说在政治上“真正的”这个概念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是很成问题的；就在马克思的著作本身当中，他的关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时期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过程的设想之中，有一些重要问题的立场也是自相矛盾的。我相信，在讲求实际的共产党人的头脑中起作用的仍将是受其政治利益影响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最客观的、科学的理论知识。因此，除了有理论以外，还必须有新的合理的意识形态，它对一系列迫切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将作出既符合共产党人的政治利益，又符合社会需要的回答。

对实际信奉的意识形态及与其结合在一起的党的政治工作，不应当只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予以放弃，而应当在实践中现实地加以改变和改革。我想，许多改革派共产党人思想上都得出了这样的看法。在捷共内部，政治工作各部门的相当大一部分干部和党员从五十年代末起也都赞成这么做。而且远非只有理论工作部门才如此。当然，对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来说，采取这种态度的主要动力并不是比较深入的理论和思想方面的考虑。其动力是他们日常的实际经验：对生产、国家管理、社会服务和所有其它方面的经验。如果合理地、用经验论和实用的思想加以总结，那么，这些经验都证明，现实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所反映的有很大不同，因此，有必要使意识形态的反映符合现实。

当然，改革派共产党人这样考虑问题，对非党人士即大多数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来说，也是一种喜出望外的事。在改革派共产党人的头脑中，这个多数已经是个必须考虑其利益和需要的因素。改革派共产党人已在考虑这样的统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其他的人也能表达自己的利益。然而，对改革派共产党人来说，在多数情况下，判断任何政治步骤正确与否的决定性标准，仍然是他们自己的、经过改革的关于概念、假设和社会准则的思想体系及相应的逻辑。生活在共产党机体之外的人的某些利益如果尚未被这一思想体系所包括，这些利益就没有什么地位和份量，对改革派共产党人来说，这种利益也照样会被当作一种令人不快的、原则上不受欢迎

的“对党施加的压力”，这种压力常常被看作违背社会利益的“非社会主义倾向”。也就是说，在改革派共产党人当时的主张中，有权从政治上决定什么是符合社会利益的，并不是社会本身，而仍是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

因此，从政治民主的观点看，六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的共产主义，依然要大大限制政治民主。但是，从实际发展的观点看，这种改革的共产主义是摧毁现存极权专政制度和为政治民主开辟道路的主要政治力量。它本身实际上并不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只是一条可以达到解决办法的道路。

对改革派共产党人来说，主要的问题仍然是，他们、他们的党和他们的意识形态应当如何克服自己的错误，应当如何正确地“表达全社会的需要”。这个社会可以不从改革的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他们党的问题出发，自己就能够找到解决办法的想法，在改革派共产党人看来基本上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他们仍然相信，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党毕竟比任何其他意识形态或政党更好地表达工人阶级和全社会的“真正的、历史的客观”利益。

一个从来不赞成共产主义思想信仰的人会觉得，改革派共产党人仍然是在共产主义的迷魂阵中打转转。可是，对有信仰的共产党人来说，改革的共产主义显然是他们能够走出这个迷魂阵的唯一道路，改革的共产主义虽然尚未消除这个迷魂阵，但是创造了一种局面，使自己的拥护者能够逐步认识到迷魂阵的确存在而且是不应再存在下去了。

我五十年代末参加改革的共产主义派的政治活动时，还远未认识到上述这些局限性。当然，这些局限性对我，对所有其他的人都是起作用的。

我相信改革的共产主义的方向是正确的，当然这不仅仅出自于对意识形态作用的一般考虑。同其他数十万努力对过去重新批

判地作出评价的共产党员一样，我也努力重新探索，从一九四八年到现在事态的发展究竟给社会、劳动人民、工人阶级带来了什么。当时的政策，我也曾在为工人阶级的“历史利益”的名义下积极参与执行。我得出的结论是：绝不能把这一事态发展的结果贬低为仅仅是消极的。相反，基本的发展变化是积极的，它不仅要求进行体制改革，而且也使体制改革得以进行。

新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就已经在捷克斯洛伐克稳定下来了。我们共产主义信仰的某些重要理想真的实现了。社会对此也表示欢迎。已经没有私人资本家了，不存在建立在私有制关系上的旧的阶级和社会划分。贫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消失了。衣衫褴褛的人、乞丐、城郊的贫民区，这些我童年时代可以看到的东西（在莫斯科留学时又曾看到），已经一去不复返地消失了，晚辈只有从电影里才能看到这类东西。疾病或年老可能意味着生存的灾难，这种恐惧心理也从日常生活中消失了。危机和失业的幽灵对人们已经不是一个威胁，这已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了。人们一般的生活水平虽然还不是富足的，但却是可观的，而主要的是不断有所提高。住房危机，这显然是生活水平中最明显的薄弱环节。斯大林主义的片面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把住房建设推到次要地位。但看来通过发展住房建设并假以时日是可以解决的，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然而，这里所说的不只是人们生活的纯粹物质方面。大多数人物质上有保障，这是他们总的说来平静和满意的生活赖以建立起来的基础。当然，这只是指这种生活停留在个人和家庭私人利益的范围内而言。置身于政治之外的人，本人对经济效率、发展文化和发扬思想自由的问题无动于衷的人，的确可以过得满意。他不必为自己的生存和保障自己的子女的生存而担心。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典型现象，日常生活中使人精疲力尽的竞争追逐所造成的

工作和生活的高速度，也从劳动人民的生活中消失了。日常生活虽然也有其他各种消极的现象，例如能够减轻家务劳动的服务行业和各种真正能起作用的服务机构不足，消费品的缺乏使得人们整天为买东西而占去许多业余时间，等等。但是，比较松散的工作和生活节奏，总的来说，使其中许多消极现象得到了缓和。在日常生活中，社会关系，工作过程中的上下级关系，两性、各代人和各民族的关系，显然有较大的平等，这些关系比过去资本主义时期民主。在捷克斯洛伐克，虽然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管理制度总的来说是同样的官僚专政，但在日常生活中却与苏联不同，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是很民主的。

大多数人的思想比五十年代初期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果在当时，在二月事件以后的最初几年，对新的情况进行批评时总是拿二月事件以前的情况相比，现在已经不同了。已经听不见这样的评论：这种或那种事"'在国有化前'是不可能发生的……。"在政治领域，一般也已经不是一九四八年以前那样拿共产党的政策同非共产党的政治方针相比较了。当然，批评反对还是有的，但是批评的出发点已是在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的基础上去变革事物，而不是向后退，恢复过去的资本主义关系。这甚至在几年前刚结束集体化运动的农村也是如此。就是在那里，恢复以前私人经营方式的想法也已经不是占支配地位的想法，特别是在年纪较轻的人中间更是如此。

当时我并不觉得社会现实本身不同于那时在党的决议中根据官方意识形态的概念所描绘的整个形象："社会主义基础已建成"，现在的问题是不要从这条道路后退，而要继续"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从政治意义上说，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为夺取政权去进行阶级斗争"，而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今天，在有了一九六八年以来的经验和感受之后，我知道我当

时对社会实际状况的评价也是相当简单化的。那仍然是享有特权的人们对社会的看法，它只能部分地、歪曲地反映没有特权的人们的生活。我当时觉得人们对现状一致赞同，实际上这往往只不过是对斯大林主义暴力年代感到厌倦的人们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示而已。一九五六年以后这种暴力放松了，人们对此表示欢迎，尽力更好地安排自己的私生活。那种看来像宁静的田园生活的东西，往往是摆脱困境的一种出路。在多数人觉得对社会政治问题的任何批评都是没有用处的情况下，这方面的反抗力也确实显得比较薄弱。人们的利益和需要以及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仍然被压抑着，不能尽吐真情，而改革派共产党人却以一系列政治妥协来延长这种状况。

"普通公民"，这种人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公民，他们避开公民的职责，钻到私人利益和需要的天地里去。他们的满足与其说是顺利改革政治关系的前提，倒不如说相反地是极权专政的支柱。这种"普通公民"的需要和利益已被专政扼杀了，他们是专政的产物，他们承认专政不可改变到这种程度，以致对它完全适应，并以自己不正常的生活支持它，使之得以实行。

专政也需要他们，因为这种"普通公民"说到底正是为其效劳的。所以，专政"普通地"给他吃，给他穿，通过国家电视给他娱乐并关心照顾他的健康。

新的社会关系的确立尽管有这些消极的方面，但是新社会确实做到了一些事情：社会的大多数人的生活获得基本保障，能满足自己的基本物质需要。人们不寻求倒退到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关系的道路，因为这种社会关系过去未提供过这样的保障。这种状况在一九六八年也同样得到了证实。那时，各种社会和政治的矛盾爆发了，各种倾向都可以自由地表现自己，然而，那种倒退到资本主义关系的努力也未能形成一个政治因素。在农村也未发生过一

次解散农业合作社的事件，只有极个别的人恢复私人小生产经营方式。

也就是说，改革的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倾向，它明确地反对恢复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的社会关系。在这点上，它是以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意志为后盾的，并且可以作为这个绝大多数人的真正想法的一个现实的代表。这决不是改革派共产党人的弱点。他们的弱点在于把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实际地位过分理想化了。

后来局势的发展才使我明白了这一点。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的过程中，一切迹象好像都在表明，改革的共产主义是会成功的。在我看来，主要的问题应该是把改革的共产主义思想变成捷共的指导思想，使掌权者按这种思想行事。就是说，首先要在捷共内部为此目的进行工作，争取使权力核心也接受这一思想。

这并非易事，但也不是不可能的。成千上万的捷共干部在五十年代末已有过类似的想法。因此，改革的共产主义政策在一九六八年真正成了捷共的政策。在六十年代，这样的方针已在党员群众中得到越来越强大的支持。但在较长的时期中，这一进程从外部是看不大出来的。

所有实行专政制度的地方都要搞密室政治。在搞密室政治的政府里，人们之间的差别，一般在外界是看不太清楚的。一九六八年之前，在捷克斯洛伐克，人们一般也不可能对那些党的书记处和政府机构中的当权人士进行区分。在"布拉格之春"以前，有谁能看到杜布切克和列纳尔特之间或者切尔尼克和英德拉之间存在着差别？又有谁对这种事特别感兴趣呢？

但是早在"布拉格之春"之前好几年，文化界和政治文化评论界的党员之间的公开分歧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们也享有特权，但他们的处境要求他们以个人的名义向读者发表文章，而不是

用匿名的方式。尽管有出版审查和作者的自我审查，但仍完全有可能从发表的看法和思想中，去发现某种政治态度上的差别。人们同情那些对现实日益公开地持批判和保留态度的人，同情那些因此而使自己的名誉地位遭到危险、并且常常在各种运动中明显遭受当局迫害的人。

那些由于发表自己的见解而遭受迫害的文化政治杂志评论家和各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者们，理所当然地在各阶层人民群众中享有威信。而那些在政府大厦里提出各种批评和建议的人们的活动则不是公开进行的，大多数并不公开自己的姓名，他们的成功或失败，除了少数专业人员外，一般是不为人所知的。

但实际上这是一条战线的两个部分：公开的知名人士离开上述匿名和不知名的人，就起不了作用，多数情况下反之也是一样。尽管如此，这种形势在诺沃提尼时期更加强了在政治方面本来就很猖獗的趋势，即根据讲话和声明来判断事物的重要性。这种趋势随后保持下来，并在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的几个月的过程中，大大地得到加强。政治声明的实现取决于实际的措施，但那时政治声明却比在政权机构范围内所采取的实际措施能起更大的作用。

一九六八年之后，改革派共产党人在国外发表的有关"布拉格之春"的著作，记载了一些记者、作家、社会科学界人士等的见闻、经验和看法。这些作者在"布拉格之春"之前以及在其过程中，多数属于那条可以看得见的战线上的人。另外一条战线的人绝大多数尚未公开表态。我认为这很可惜，因为许多有趣的和对认识整个事件有重要意义的事态经过因此就无法公诸于世了。此外，过去的当权者之间某些关系的发展变化对观察未来也是有用的。诺沃提尼掌权的最后几年的那种局势是否能在执政集团里再次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找不到答案，那么，也就无从得知"布拉格之春"

能否重演。

在六十年代，作为一个改革派共产党人，我在社会上和党的机关内部都工作过，因而有可能看到那时的当权派的内部世界。我不单是一个旁观者，而且也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我的命运在一九六八年是和这个世界连结在一起的。这比仅仅从事改革派共产党人的政治评论活动，对我整个下半辈子的影响要大得多。

* * *

捷共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在一九五九年发表了我的第一篇理论文章之后，捷科学院国家与法律研究所所长克纳普院士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就这一问题同我进行了谈话。我对他说，我希望把我的一些理论观点介绍给更多的读者。克纳普会心地笑着说："是不是想给更小的圈子看？"

他说得很对。当时在《红色权利报》上刊登类似的文章，意义不在于让上百万的读者读这些文章并受到感染。读者其实对这些文章并不注意，他们首先要看的是体育消息。读这些文章的是那些以政治、思想理论为职业或半职业的人，也就是那些政治部门工作人员、干部和党的积极分子。《红色权利报》上发表的看法和方案，有着指导方针的作用。《红色权利报》上登载的东西不只是供人思考而已，这些文章需要大声地读，甚至应该加以宣传。

此外，《红色权利报》虽然读者不多，但他们都是一些很有权势的人，例如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以及同他们接近的人。他们尽管不全部阅读，读得也并非很仔细，但是他们所管辖的下属机构都认为，凡是清清楚楚地发表在《红色权利报》上并且未遭这些人反对的文章，就可以认为是已经得到最高当局批准了的东西。

这样，我并没有穿过大门，而是通过《红色权利报》的版面，走进了捷克斯洛伐克当时的圣殿，进入了党的机构。很长一个时期我并没有担任什么正式的职务，但在那里却有一定的影响。不了

解情况的人常常错误地认为，判断人们在政权机构中的影响，只能或者首先要看他们担任职务的正式身份。在不了解情况的人看来，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府部长要比捷共中央机关的部长更重要一些。这当然是一种误解。其实，捷共中央的部长并不听命于政府的部长，恰恰相反，政府的部长往往听命于党中央的部长。因为党中央的部长更加接近真正的权力核心，接近党的政治局。党中央的部长还对所有政府部长以下的人员乃至部长本人的任命和升降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所以，东欧极权制度当权派日常生活中的这些现象，对不了解这些情况的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例如，如果他看到一个到部队视察的将军对他下属的上校、少校们突然间置之不理，而对站在整顿好的队伍里不显眼的地方的一个大尉握手言欢，一定会认为这个将军太奇怪或者是发了疯。实际上，那个大尉是捷共中央保卫部的工作人员，正在参加为期三十天的军训服役。将军和他的上校、少校们都知道，表面上他是他们的下级，但实际上他们的级别、职务，甚至于薪金和升降，这个大尉比他们都起着更大的作用。

但是，如果认为既然党的机关在一切机关中最为重要和最有权力，那么，掌握着这个诀窍，世上的事就都可以行得通了，这样看也要犯错误。医院的院长，甚至卫生部长本人，可能在一个负责卫生工作的捷共机关工作人员面前吓得发抖，但这个工作人员同时又必须小心翼翼地对待和他住在同一栋房子的内务部的公安军官，虽然这个军官并非在党中央任职。这位公安军官和他的上级在等级上甚至高于捷共中央保卫和安全部的工作人员，高于捷共中央书记和他的助手，也许还高于党的机关中的其他某些人员。这种人的地位往往甚至高于内务部长，因为他尽管不是“普通的”部长，但终究只是一名部长而已。

在党的机构内部，也远不是由每个人的形式上的等级起决定

作用的。譬如在六十年代诺沃提尼统治时期，真正起作用的重要标准是你是否隶属于同诺沃提尼打扑克牌的帮派。党的州委书记或部长如果同诺沃提尼玩过扑克牌，往往就比没有同他玩过牌的捷共中央书记更有权势。但是，那些同诺沃提尼玩过扑克牌的人、没玩过扑克牌的人、甚至于诺沃提尼本人，对待捷共机构的某些表面上普通而又无关紧要的工作人员却又小心翼翼。当我在实际工作当中遇到这样的情况时，我曾奇怪为什么一个书记会忽然对工作人员的意见表现出犹豫不决，尽管他在贯彻自己的意见时往往是颇有权威的。那个书记教训我说，机关里有那么一些同志，同他们说话就得像是在莫斯科说话一样。

在党的高级机构里知道哪些同志是这样的人，比你在高级党校取得博士学位更为重要。谁要是知道了这一点，就可以常常避免不愉快。这样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恰好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之前有那么多捷共机关的普通工作人员要到苏联或东德去休假。而且今天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捷共中央的一个负责科学院工作的工作人员会一下子成了内务部长，或者是为什么捷共中央国际部的一名工作人员突然成为党中央文化部长的最好人选。谁不了解这些，就只能在疑问中摸索，并且不断地感到惊奇。作用的大小往往不在于公开的职位高低。我没有和诺沃提尼一起玩过牌，也没有为克格勃服过务；但是我是属于那些表面上看不见、又对党的机构极为重要、起着党的机构的菌丝作用的人。没有这样的菌丝，就不可能长出庄严的权力蘑菇——权力的精华。一些个人以及整个政权机构都依靠这些菌丝，从中吸取自己往往得不到的营养。

党的机关——也包括最高领导机关，如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或中央政治局——是否在其所作的决议中批准或是不批准某个具体问题、具体建议和具体方案，这决不仅仅取决于领导机关本身。

各种方案都是由具体工作单位进行准备、制订和起草的，然后再上呈党的机关的成员进行讨论。但起草人既不是书记，也不是部长们，而是这些负责人的助理机构。当然，不管提出的方案如何进行修改，不管在讨论时作了什么变动，但基本上总是保存着那些较为低级的、对群众（包括党内群众）完全不知名的工作人员写进去的东西。某些思想在中央委员会或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在政府的决议、在法律、甚至在宪法中以什么样的文字予以表达，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取决于他们。因为法律、包括宪法的条文，都要由政治局通过，而向政治局提出、制定和修改这些条文的，就是这些机构及其所属的各种委员会和“工作小组”。

所以，争夺真正决定权的斗争也是在较为低级、表面上并不重要的组织机构中争夺阵地的斗争。捷共中央书记们都想方设法在书记处、在中央各部安置他们的私人“代理人”、忠于他们个人或能为他们献身的朋友。在最高当权者第一书记办公厅里找到的代理人尤其宝贵。书记、部长和那些高级领导干部真正能起多大作用，取决于他们在各种下级组织机构里有多少亲信和追随者。在这些地方，有各种由共同目标结合在一起的、非正式的、不知内情的人看不见的小派别和团体在起作用。

这一切只能为这些团体中相互支持的成员的个人名利服务。但是，如果发生了超出人事关系的问题，出现了不同的方针政策互相交锋的时候，这个官僚主义的渊薮又能一反常态，基本上成为一个反对官僚主义、争取政治民主化的战场。这就是六十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形势。统治机构里的一部分小派别和团体，日益变成改革派共产党人的工具。与此同时，另外的一些派别和团体则成为抵制和妨害改革政策的保守力量的工具。

我在《红色权利报》上公开发表理论思想方面的政论文章，对我来说，实际上是我在党组织权力机构内从事非公开的政治活动

的开始。一九六八年以前，我一直并不是党的机构的工作人员，我的职业是在科学院工作。但是，在六十年代，我的真正工作岗位正逐渐转移到党的机构。

当我经常在党的报刊上发表理论文章的时候，我也逐渐更多地被挑选去参加各种“工作小组”的工作，为党的机构和组织草拟有关党的意识形态问题、特别是关于国家、法律、社会团体乃至整个政治制度问题的材料。在六十年代的捷共内部，这些“工作小组”越来越成为党的机构研究各种各样问题的主要工具。这些小组的作用很难一概而论，但总的说来，它们逐步加强了不在党的机构任职的党员知识分子的地位，也加强了改革的共产主义的地位。表面上这些小组的成立是适应了要求社会管理科学化的潮流，但实际上它们的存在往往表明，党的机构本身缺乏进行分析和概括论述的能力。

后来，几乎党的机构在讨论所有的重要问题时，都由党的机构以外的人士组成“工作小组”来提供原始方案，小组中有政府和经济机构的人员，有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所的人员。这些人员实际上要对应采取的措施进行分析并提出方案，然后由党的机构的有关部门对这些方案进行修改，以便使之能为党的领导所接受。党的机构本身要执行的是双重的、自相矛盾的职责，一方面收集那些对实际问题具有很强批评精神的建议；同时又对这些建议进行删节，以折衷的办法加以修改，有时甚至抽掉了建议的实质。在上述基础上由党政机关通过的决议和决定，因而有时和“工作小组”原来提出的方案有很大差距，但在这种折衷的方式中，一些现实问题仍然能够有所反映。

在六十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为最高党政负责人起草报告和各种讲话，实际上也是使用这样的办法。捷共中央书记和政府成员虽然亲自审改自己的讲话稿，但实际上总是——只有少数例

外——照念他们各种“工作小组”里的助手为他们起草的稿子。

参加这些“工作小组”，逐渐使我越来越有可能把我的一些观点，有时是以各种改头换面的方式，塞进党组织的决议文稿和高级党政官员的讲话稿中。然后我又能以这些决议和正式讲话的用语为依据，并对这些用语作有利于进行批评和分析、有利于改革派思想的解释。我是在两个方面进行活动的：又进行公开的政治评论又施加非公开的政治影响。这两方面的活动是相互支持的，我所写的政治评论，得到政治决议和公开讲话的支持，当然，政治决议和公开讲话也得到我的政治评论的支持。

但是，类似的情况在六十年代远非只我一人。当时基本上以同样方式进行工作的有几十个各种科学研究所和高等学校的改革派共产党人。不少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也只能靠类似的方式，才能使自己的理论成为实际上起作用的政治主张。在官僚权力机构中以这种方式起到一定影响的人，当然也要付出必要的代价。他们和接受他们影响的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单方面起作用。权力机构同时对他们这些人和他们的改革思想也有影响。如果你要权力为这些改革派人员的需要服务，改革派分子也必须为权力的需要服务。

我还记得，在许多具体情况下，我必须权衡一切利弊并决定以什么样的代价去换取什么。问题远不在于我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能按照自己的想像把一些问题写到政治局决议草案、捷共中央书记或是政府总理的报告里去。这毕竟不过是一些具体问题。更糟糕的是，有时为了照顾到我在党的机构中所处的整个地位，在我并不相信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时候，我也必须明确地、公开地去“捍卫党的路线”。

例如在一九六一年，当诺沃提尼再一次宣称五十年代的政治案件问题已“最终地得到解决”时，我并不相信这个问题已确不存

在。尽管如此，我还要在会议上和报纸上为诺沃提尼的说法辩护，说是苏联的叶绍夫、雅各达、贝利亚，是因为他们亲身参与了犯罪活动所以没有恢复名誉，斯兰斯基同他们是一样的，也永远不能恢复名誉。一九六二年我作为捷共中央的宣讲员，曾在党的一些会议上为党的领导逮捕巴拉克进行辩解，说是他滥用内务部长职权肥己并盗用外汇，应对其追究刑事责任。诺沃提尼甚至还举办了展览，让普通老百姓去参观。展出的东西有衣服、衬衣、外币、各种绘画和艺术品。令人痛心的是，我心里清楚，整个事情另有政治背景。事实是诺沃提尼怀疑（当然是真的）巴拉克企图在捷共领导内部进行政变，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捍卫了党的路线"。

我曾经参与过一系列反对"修正主义"、特别是反对某些南斯拉夫观点的辩论。这大多是违心的。因为我认为这些观点倒是可以作为改变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制度的部分方针。但当时"批判修正主义"是捷共思想工作的重要任务，在这种时刻，背离"党的路线"就必然意味着要失掉我多年争取到的东西、失掉逐步在政权和权力机构内部争取改革整个党的政策的可能性。

当然，从政治上盘算的角度出发，为上述的作法进行辩解并非难事。我的确很清楚，以这样的作法为代价，我就有可能影响和参与制订党的有关进一步发展整个政治制度的方案。以此为代价，我就能保持继续发挥作用的地位。我认为这是更为重要的。一九五九年我写了一篇论马基雅维里的学术论文，我了解到，早在四百年之前，政权实践活动的情况已是和今天一模一样了，而马基雅维里有胆量公开正视这一点。他的结论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不能总是拿人的道德原则（即基督教道德原则）作为处理政治权力问题的准则，在这方面，只要对自己有利并能取得成功，就是道德的和正确的。

但是，从个人的良心，从我一九五六年以后感到的责任感来

说，问题就不那么轻松了。我给自己划了一条界线，规定自己不能为了政治上的考虑去越过这条线。这是我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对我来说，界线的那一边意味着违法和犯罪，界线的这一边则意味着我采取的步骤所造成的政治损失不致超过我自己预计的政治后果。我认为，一九五六年后，在我参加专政的政权机构工作的整个时期，我未曾超越过这条界线。我的决心有两次受到了威胁。第一次并不很大，但已非常明显。一九六六年强化思想工作（停止一些杂志出版、迫害文化界人士等）时期，我觉得，继续"支持党的路线"就必须越过那条为政治利益不允许超越的界线。当时我采取的办法是，中断了思想政治评论工作，放弃了一些职务，专门从事理论工作。结果是成立了专门研究政治制度问题的跨行业研究小组，由我担任组长，一直到一九六八年春天。我第二次遭受超越我内定界线的威胁是在一九六八年八月苏军干涉之后。我的解决办法是，在那年十一月我放弃了全部政治职务。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后面我将有较详细的叙述。

像我这样在政权组织机构中工作的改革派共产党人，由于所处的地位，思想是受到约束和局限的。就连当我们想要客观地分析形势，弄清社会进一步发展需要什么，社会本身的要求是什么的时候，也必须从一开始就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根据党内现状来考虑：哪些东西在党的权力机构里是切实可行的，哪些东西能够接受，哪些东西不能接受。这就使他们在言论中、甚至在自己的思想里也要进行自我审查。对于那些显然根本不能被政权机构所接受的问题，在思想上就不予重视，把它们搁置下来，认为它们在近期内不会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更不可能使它们变成党的实际步骤。

因此，六十年代的这些共产党改革派人士，常常明显地不同于那些在政权机构以外工作的改革派，虽然他们也在为社会和政治

发展的广泛的问题寻求答案。那些没有直接涉足于党的政治工作，没有在党的组织机构中任职，而只是在各种文化生活领域工作的共产党改革派作家、艺术家、记者，以及在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工作的人们，不了解某些主张是不可能通过这些党的组织机构去实现的，它们只能起限制作用。当然，他们也在力图使自己的观点贯彻到政治实践中去。但是他们认为，在这方面要想取得成绩，首先要靠从外部施加压力，靠社会舆论、各种社会团体（主要是知识分子团体），以及同政权机构联系比较松散的组织（如文化创作协会、科研、教育、文化机构等）对政权机构施加压力。

因此，这一部分共产主义改革派的总的政治方针，也比在政权机构内部的改革派更加民主和激进一些。在六十年代，《文学报》和党的报刊之间的差别很具体地表明了这种情况。这常常引起激进派和当局之间发生冲突。在这样的冲突中，政权机构内部的共产主义改革派往往扮演了在两极之间搞平衡、走钢丝那样不令人羡慕的角色。不过共产主义改革派之间的这些差别，常常只是他们扮演的角色之间的差别，而不是真正的主张和目标的差别。

我的改革的共产主义的政治活动在六十年代有些什么真的成就呢？

从一九六四年起，我在政权机构中，更确切地说，在捷共中央机构中的职务是捷共中央法律委员会①的秘书，同时在党和国家机构对政治制度、民主和法律问题公开表明态度时，我还充当官方

① 法律委员会，是捷共中央的几个委员会之一。在六十年代，党的领导把这些委员会当作谘询机构。当时还有经济、意识形态、农业、青年问题等委员会。委员会由捷共中央书记主持，法律委员会主席是考茨基。这些委员会的成员是捷共中央机构各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法律委员会委员有安全、军队及司法部部长马穆拉，国家代表机关和社会团体工作部部长维德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诺沃提尼的办公室主任奥尔斯佩格），中央国家机关的部长和主任（法律委员会的委员有内务部部长什特劳加尔，后来是库德尔纳，司法部部长诺伊曼，总检察长巴尔杜什卡，最高法院院长利特拉，总理办

的顾问和参议。可以说，从一九六四年以来，对党政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所有重要决定，我都可能以某种方式在准备的过程中贯彻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一九六八年之前，捷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并未改变国家机构中总的状况以及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情况。不过这个委员会在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七年倒是起了作用，使得法律和法制问题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对一九六八年进行改革时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已经进行了讨论并对当时的实际状况提出了批评，对某些具体规定进行了修改，使之更加民主一些。

我作为这个委员会的持有自己的见解的领导干部，成了一个受欢迎的人物。除了向最高机关和领导人提供谘询，参加为决定和决议起草方案的数十个各类“工作小组”之外，我还是解说人，从意识形态和政策的角度解释有关国家、民主、法律、政治制度等方面的问题。我曾为党史资料馆、州县干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公安及部队的工作人员数百个学习班和会议作过报告（在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中间有两个月份里，这样的报告一个月竟超过二十次）。我还根据内部需要，写过几十本小册子和文章，由党的机构和国家机关印发。成千上万的党和国家干部通过学习班和会议，熟悉我的观点，并且大多数人都赞同我的观点。

我在六十年代以各种方式向党和国家机关干部宣传的政治观点，已成了当时捷共公开宣传的观点，这些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公室主任穆拉尔，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仲裁长多赫纳尔，捷克斯洛伐克中央总辩护师赫拉兹迪拉），以及科研所和高等院校的工作人员（法律委员会的委员有捷科学院国家与法律研究所所长克纳普，布拉格法学院院长普鲁沙，高级党校的代表伊钦斯基，布拉迪斯拉发法学院院长佐洛特卡，布拉迪斯拉发市斯洛伐克科学院国家与法律研究所所长科什塔等人）。几乎一切重要的建议都要经过捷共中央的这个委员会的讨论，然后提交政治局。它的重要性还在于，它的地位处于政治局和其所属机构之间，因为政治局所属机构先向委员会提出草案，然后由这些委员会通过委员会主席直接把自己的意见提交政治局。

正如苏联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由于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取得胜利，许多事物必然要起变化。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内部的主要问题，已经没有作为镇压对象的阶级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了全民国家。主要的政治问题是，正确地体现整个社会的需要和利益，注意不要让人们的局部的特殊需要和利益挤掉劳动人民整体和共同的需要。

在过去，可以很容易地确定什么是符合社会主义利益的，这就是限制和消灭个体所有制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阶级关系。为此，不需要专门知识，只要有“阶级感情”就够了。哪些地方还有非国有化的工厂或是在合作社之外哪里还有私营的业主，这对任何人都是一清二楚的。但是怎么才能知道：化学工业生产是增长百分之五对整个社会有利呢，还是降低百分之十五有利？多种玉米或是多种豆子，哪个对工人阶级有利？对社会主义社会是华尔兹舞曲还是爵士音乐更适合需要？

提出类似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用这样的办法去治理社会也是有害的。我们只能以是否遵守以下两条原则来判断什么对整个社会主义社会有利、什么对整个社会主义社会不利。这两条原则是：对任何问题作决定时，都要以专业知识为依据；应该使社会本身有条件表明，究竟什么对社会有利。必须在整个政治制度中执行这两条原则。

应该让专家在经济和文化领域里实现他们的主张。今天，在多数情况下，没有文化，没有专业知识，就无法判断什么“对工人阶级有利”。同时也必须让我们政治体系的各个组织机构都能对国家的政策发表意见。主要是，让工会、青年组织和各种群众团体能真实地说出它们自己的利益何在。只有在寻求社会整体利益的过程中，让局部利益得以兑现，才能正确判断什么是社会的整体利益。这个道理对地区性的利益也同样适用。因此，必须增强人民委员

会和一切基层自治机构的作用。

为了能正确判断什么是社会的整体利益，每一个人都必须有条件来表明他们所关心和需要的是什么，以及他们有些什么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不能把法律解释为汇集到一起的随心所欲的规章条例。法律必须保证，局部利益的代表(团体和个人)能够有条件表明他们的利益何在，限制这种可能，就是违反法律。有不少这种局部利益是不合理的，但必须允许他们表明自己的意见。当然，这对危害社会的"利益"并不适用，但对这些问题，法律另有明确的规定。只有法律可以限制人们的权利。

共产党是整个社会体系的领导力量。但是不能因为过去在阶级斗争中有功，党就一劳永逸地具有领导作用。共产党必须在新的条件下不断地重新争取其领导作用。如果犯了错误，如果没有正确地维护整体利益，那么其领导作用就会削弱。有些人的利益和需要，党并不认为能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和需要，但是党必须允许它们提出来。必须用道理说明，为什么它们不是整个社会的利益和需要。党必须精于业务，明察善断，为党拟订决定的人，必须是精通专业的共产党员。靠发布长期适用的号令是不够的了。用党去代替应该独立行事的国家和社会机构同样也是错误的。党所起的作用应该是乐队指挥的作用，因此他不应以自己一个人的独奏来代替整个乐队。

当我在捷共内部宣传我的这些观点时，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些科学的成果。从真正的民主理论和马克思理论出发，都可以对这一套政治思想主张进行批评和嘲笑。但我当时和现在，都认为这在政治上并无实际意义。在我看来，有实际意义的是，在六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极权专政体制内，专政所依靠的那些人的思想，即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干部的思想，正在逐渐地倒转过来，对专政提出批评。尽管只是思想方面的批评，并且批评也不坚决，但毕竟是

批评。正是因为这些批评适应了多年为专政服务的那些人的思想，所以批评是起了作用的。按老样子继续向前走是不可能的了，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利益，必须进行政治改革，这样的思想在政权机构里已逐渐成为理所当然和可以接受的思想。

今天，我已不会再花上几年时间，在胡萨克政权的干部当中宣传类似的思想。这样做是白费气力，因为这些人的绝大多数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不是整个社会的利益，也不是党的“历史使命”所提出的共产党的任务，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当然，他们将来也会出于不得已而对制度进行改革，但这是出于看到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不能再保持下去，而不是出于对共产主义思想的信仰。但是，在一九六八年之前，我曾作过这样的努力。因为实际工作使我相信，制度的改革对于那些不只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原则和为了实现这些原则寻找出路的成千上万真正的共产党人是有意义的。这不是幻觉，一九六八年和在此之后的一九七〇年的情况已证实了这一点。因为，曾有五十万党员为了坚持改革观点而被捷共开除出党。

如果不是大批的捷共干部和党员在一九六八年以前好几年就通过实际经历看到了改革的必要，如果不是由于他们思想的变化，由于观察事物的思想有所发展，因而对政治制度逐步民主化有所准备的话，那么，历时数月的“布拉格之春”就不可能成为事实。“布拉格之春”能在政治上取得胜利，就是因为“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和自上而下的党的活动能够汇合在一起，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如果没有改革的共产主义在共产党专政政权机构内部进行了好几年的思想工作，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 * *

没有以诺沃提尼为首的党的最高领导集团的同意，共产主义改革派是无法在政权机构内部进行工作的。如果把诺沃提尼当政

的整个时期都比作斯大林式的黑暗时期，一九六八年一月之后才照来了杜布切克改革政策的光明，我认为这是对六十年代捷共实际情况的极大曲解。捷共胡萨克领导集团在捷共和群众团体内采取的作法，是诺沃提尼在其当权的最后几年里所不敢设想、更不敢付诸实施的。如果他们把诺沃提尼时代说得一塌胡涂，那就更是荒谬的了。不少西方的新闻工作者把事情也看得过于简单。譬如他们认为匈牙利当前的情况是自由主义的顶峰，与此同时，一谈到捷克斯洛伐克，就把诺沃提尼整个时期和斯大林黑暗时期混为一谈。但是实际上，"卡达尔化"七十年代末在匈牙利自由化方面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同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七年诺沃提尼政权的特点是很相似的。

同希克①的名字相连、被称之为"新经济管理体制"的经济改革，在诺沃提尼时期并非私下实行的异端邪说，而是经过党领导的批准并已实际执行的党和国家的法定政策。问题在于，当时的领导由于害怕经济改革会引起政治纠纷以至领导对局势失去控制，因而对经济改革采取了不彻底的态度。

只有捷共胡萨克领导集团才把全部改革斥责为"修正主义的希克主张"，并且禁止对其进行讨论。但是实际上由于实用上的原因，希克主张的某些原理仍然在经济工作中得到运用。

自从一九五六年以来，知识分子党员总是反复地遭受各种迫害，在各种运动中受批判，有些人还要经常吃苦头，不许他们发表著作或在科学、文化机构里工作。但这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暂时的，受迫害的人过一段时间又可参加社会活动，除了少数例外；即

---

① 奥·希克(1919—)，捷经济学家、科学院院士、捷共十二届和十三届中委。曾发表一系列著作，主张对捷经济管理体制实行彻底改革，被称为捷新经济体制的创始人。一九六八年四月捷共宣布《行动纲领》和重组政府后，出任政府副总理。同年八月苏修武装侵捷后流亡国外。——译者

使在镇压最厉害的时候，优秀著作也并非不能出版。《文学报》和其它一些杂志因受新闻检查而受到限制，因为它们的政治倾向是和共产党改革派相同的，对当权派是持批评态度的。一九七〇年以后，数百名作家、艺术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哲学家变成了锅炉工、临时工、擦窗工，天晓得还当什么别的工。而当年他们曾在科学文化研究机构里工作过，并且还从各个角度为一个共同的题目——批判诺沃提尼大作文章。而这一切都是发生在诺沃提尼当权的时期。

那么，诺沃提尼本人也许就是一个改革派共产党人吧？我认为并非如此，实际上他是斯大林时代的遗老。但他又并不只单纯地起了消极作用，他所起的作用是矛盾和复杂的。在六十年代，捷共领导集团和党政机构里还有一些人，情况和他们一样。一九六八年一月以后，诺沃提尼时代党的最高领导集团的一些成员，首先是杜布切克、切尔尼克的名字是和改革派的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个集团的另一些人，像捷共中央书记亨德利赫、考茨基等，却在一九六八年被赶下台来。不过，我自己认为，正是由于亨德利赫和考茨基的作用，改革的共产主义才能在六十年代捷共内部得到发展，他们在这方面比某些由于改革而取得领导职务或保留了原来领导职务的人所起的作用要更大一些。同任何一次政变一样，一九六八年的杜布切克改革也远远不全是论功行赏，而往往是根据个人恩怨或人事关系来进行赏罚。当然，后来在这方面也吃了很大的亏。

诺沃提尼算是老一代的共产党员。从一九二一年建党时就加入了捷共，战前是党的州①级干部，战争年代是在纳粹的最残酷的集中营之一的茅特豪森集中营度过的。他的难友说过，他曾发誓

① 按捷克斯洛伐克的建制，"州"相当于我们的省，下设县、乡。——译者

在战后不再过问政治，将专门照料家庭、住房和花园。但他没有履行自己的誓言，一九四五年他当上了布拉格州委第一书记。

我还记得诺沃提尼一九四七——一九五〇年时期的情况。当时布拉格州委的大多数干部认为他是一个行政官员，而不是一个政治家。州组织有权威的首脑人物是州委主席克罗斯纳士。诺沃提尼的几个副手、特别是克里格尔，在政治见解以及组织才能方面都比诺沃提尼要强得多。日常生活的琐事也说明诺沃提尼并不是一个能够洞察事物的人物。诺沃提尼之所以升入捷共中央书记处，是同他“揭发党内敌人”的积极性分不开的，是同他在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年为审判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作准备时的狂热分不开的。

诺沃提尼大概生来就缺少一般人所具有的一些品质。我在布拉格总检察院工作时，看到过一些文件，其中记载着难以想像的事：同斯兰斯基一起遭受审判的干部被处决之后，他们的财产以贱价卖给了活着的高级干部，当时诺沃提尼家（诺沃提尼夫人本人）竟去选购了克里门蒂斯① 的床单和中国瓷餐具！

执政党的第一书记、国家元首，亲自参与把一个人送上绞架，然后又躺在这个人的床单上睡觉，这样的事发生在二十世纪的欧洲，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这竟然又是事实。诺沃提尼一家也不是不了解情况。一九五六年我听克里门蒂斯夫人说过，克里门蒂斯担任外交部长时，诺沃提尼夫人同她的丈夫曾到克里门蒂斯家作客，那时他们就很喜爱这套中国瓷餐具。所以在克里门蒂斯被处决之后，诺沃提尼夫人就买了它。

二十多年之后我又提起这件肮脏事，并不是我想给诺沃提尼

---

① 克里门蒂斯(1902—1952)，斯洛伐克族，一九二四年参加捷共。一九三五年曾作为捷共的候选人当选为议员。二次世界大战后任外交部国务秘书，一九四八年后任外长。一九五一年因涉及政治案件被捕，次年被判处死刑。一九六三年恢复名誉。——译者

脸上抹黑，而是因为我认为，用事实比用各种政治论证更易于说明，诺沃提尼对斯大林时代的政治审判具有什么样的道义上的责任，这个在一九五四年作为党的第一把手、亲自判决了另外几个案件（其中一件是死刑判决）的人，具有什么样的人性。

一九五四年，诺沃提尼的侄女，当时在莫斯科学习，对她的几个亲近的同学谈到过诺沃提尼同她父亲一起喝咖啡的情景。诺沃提尼两手托着脑袋，悲伤地说："我不称职，我干不了，我没有这份能力。"我相信他说的是实话。当时他担心，会不会由于他不称职而对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造成损害。在他的思想里，购买克里门蒂斯的床单同工人阶级利益是不相干的，因而也就没有把它当回事。

诺沃提尼虽然已经变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并且堕落到犯罪的地步，但毕竟还是一个工人出身的干部。他的思想是一种奇特的混合物。他相信共产主义学说是正确的，对工人是有好处的；而同时他又表现出具有政客的奸诈和官僚习气的、阴谋夺权的天才，这些东西逐渐在实际工作中占上风，压倒了待人处世的本来动机。

他在权力极盛时期，曾下令在伏尔塔瓦河畔靠近奥尔利克城堡的人工湖附近，为最高级领导层建造了一个"休养所"。在这块围着篱笆、警戒森严的空地上，矗立着一些具有西欧设备水平的现代化别墅，专供政治局委员、苏联大使和其他首脑人物使用。同这些别墅分开，在一块较高的地方，有一幢孤零零的房子，取名"老鹰窝"，这是诺沃提尼的专用休养所。这幢房子并非仿照西方资本家的别墅，而是按捷克乡下农舍的式样建造的。前边有一个巨大的啤酒桶式的建筑，里面设有桌椅。一到星期天，诺沃提尼就同他的最亲近的人们（不是根据职位、而是根据私人关系）围桌而坐，按照自己的兴趣，在这里消磨时间——打扑克牌。这当然也是一种绅士派头，但这是一种来自恰高维采小镇的工人从别人那里学来的

派头。而他对此还颇有些怡然自得。

在当权的最后几年，诺沃提尼认为，他对自己的职务不仅能够胜任，而且干得很漂亮。他在一次私人谈话里，讲了他的政治格言：不必要求人们同意你，但必须要他们喜欢你，最重要的是要他们尊敬你；党内主要问题是，不能允许出现来自左边的反对派！右的不要紧，但决不能允许在你的左边成立任何组织。

这些格言的道理非常简单，对现实的社会主义政权来说，也并非愚蠢。诺沃提尼的格言说出了苏联集团各国党内官僚集团的实际经验。他们知道，可以不顾群众的舆论，实行不民主的统治，但无视人民必须有一个限度，如果超过这个限度，不能保证人民最起码的需要，或者是这个官僚集团表现软弱，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么人民就会失去对政权的尊敬。这个党内官僚集团的思想格言——不许出现左的反对派，也就是说在人民眼里只有这些官僚才能代表左派政策——只不过是马基雅维里思想在新的条件下的老调重弹，即如果建国思想能够得到维护，国家也就可以存在下去。

无可置疑，诺沃提尼是一个实用主义政客，他也不想把自己装扮成某种理论或思想的创始人。但是对他来讲，党的思想理论对实际政策起着普遍指导原则的作用。问题是，他的那一套思想理论的"法则和定理"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毫无疑问，是由官方发行的小册子里的那一套粗浅的教条组成的。但是有一点很为重要，这个才疏学浅、又爱摆架子的人物并没有把自身当作思想行动的是非准则，而是承认存在着超乎自己之上、并且不以权力大小为尺度的思想准则。

诺沃提尼还属于这样的一类老党员干部，他们个人同党的思想是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他们的一生，他们个性的形成，他们感到自豪的一切，所有这些都是由于他们把党的指导思想（不管对其理

解是何等的荒诞）当作高于个人的准则的结果。我认识不少这样的干部，他们由于同样原因，认为“党就是一切”，他们甚至在被开除出党之后还宣称：我的一切都归功于党（但出乎说这句话的人的意料之外，这话具有讥讽的意义而且非常真实）。

对于这样一类的人，某种思想一旦成为党的正式指导思想，一旦党据之制定党的措施和方针，那么他就诚心诚意地真心接受它，并以之作为行动的准则。这一类人甚至能够以党的意识形态的名义去干罪恶勾当而不认为是犯罪，因为除了这种思想所具有的道德准则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别的准则。一旦组织上改变了指导思想，他们的行动也就跟着改变。如果有人认为他们过去的行为应受责难，他们会真心地感到惊奇。例如科普日瓦，他是个老党员干部（我认为他和诺沃提尼是一个类型），五十年代初期作为公安部长曾积极筹划了虚构的政治审判。他在一九六三年向党的一个委员会宣布说：是的，逮捕是违法的，但当时对此是不予考虑的，有关遵守法律的措施是过了许多年以后才规定的。

如果这样的人掌握了最高权力并由他来决定什么是党的正式指导思想的话，要想使这种指导思想吸收一些对他过去的所作所为有所批评的新因素，那会是非常困难的。当然，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他也能作到这一点。诺沃提尼就曾遭遇过好几次这样的特殊情况。

赫鲁晓夫当权时期，新的、反斯大林的意识形态成为苏联的正式指导思想，也就是说，成了诺沃提尼以及整个捷共的领导机关的正式指导思想。因此，诺沃提尼这个大官僚本人，就处于必须改变原定方针的压力之下。在五十年代末，诺沃提尼在党内的地位还不够强大，不能把政治恐怖的责任推卸给别人，使自己保着原有的地位。然而在六十年代初，情况起了变化，老的哥特瓦尔德领导集团的两个重要成员萨波托斯基和柯别斯基去世了。巴拉克曾想在

政治局内部争权斗争中利用诺沃提尼对政治审讯的罪责为自己谋利。在赫鲁晓夫的赞助下，诺沃提尼把他投进了监狱。诺沃提尼在政治局里用赞同他的新人如亨德利赫、科尔德、胡迪克，代替了这些人员。在书记处内，站在他这一边的有新任书记考茨基，还有内务部长什特劳加尔。这样，捷共领导集团中的形势起了变化，已经不利于应对五十年代政治审讯负个人责任的人。因此诺沃提尼才有可能允许对五十年代进行较为彻底的批评，对政治审讯的受害者进行较为彻底的昭雪，因为他相信，现在已不会削弱、而且相反地将会加强他的个人地位。一九六三年，他这样干了，他把责任推到哥特瓦尔德时期领导集团留下的三个成员：西罗基、巴契连科和凯勒尔身上。他还把三个新的干部——杜布切克、列纳尔特和马·瓦楚利克安插到党的主席团里来。一九六三年，诺沃提尼在捷共领导集团中的力量对比，才达到了赫鲁晓夫在五十年代末清除了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之后所形成的状况。诺沃提尼权力的鼎盛——说起来也许不能令人相信——是和清除捷共领导集团里的哥特瓦尔德—斯大林主义分子分不开的。只是在消除了赫鲁晓夫政策对自己地位的威胁之后，黑夜的幽灵才在他的眼前消失。在漫长的七年里（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政治审讯的责任问题一直威胁着他作为掌权者的地位，这对他就像是黑夜的幽灵。现在党的领导集团真正是属于他的了，他并没有靠这个集团的人员当权，相反，这个集团的人是靠了他才取得领导地位的。

这个不声不响地组成的捷共新领导集团，采取了一项极其重大的步骤。第三个五年计划第一年（一九六三年）的失败，造成了经济危机，新领导并没有像过去那样采取老一套声誉扫地的办法，而是更扎实地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实行“国民经济管理新体制”。新政策的实质在于摧毁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发挥国营企业经济自主的积极性，运用市场的影响，争取更高的经济效果。这样，便

极大地破坏了经济领域里的专政体制，从而也为在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逐步进行体制改革提供了现实可能。党的干部政策也越来越对主张经济改革的人有利。切尔尼克进了党的主席团，什特劳加尔成了捷共中央主管农业的书记。

一九六八年之前若干年，诺沃提尼的捷共领导集团已经由这样一些人组成，他们大多数都不反对进行变更和改革的主张，因为要想继续向前发展，就必须这样做。许多在这些年代为这个集团服务、在党的机关任职的人的思想状况也是这样。必须进行改革的主张、必须改变陈旧的社会管理体制的信念，这几年已成为政权机构内部的主导思想。当然，对于改革的性质有着什么样的设想，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了。首先自然要想方设法在各个方面对改革的措施进行限制，使之不至于危害领导集团及其机构的权力，不至于损害大多数有关的具体负责人员。总的说来，这是实现具体改革措施的主要障碍，当时的局面是只能对改革进行考虑和议论（尽可能不公开地），而不真正采取改革步骤。最常见的主要办法是，收集一切论点来说明为什么某种改革建议是无法实现的（或现时无法实行，或建议中提出的方式无法实行）。但是党的领导和党的机构始终认为，过一个时期之后，只要改变一下方式，改革、包括政治制度的改革，还是必要的。

我认为，诺沃提尼本人也持有这样的看法。一旦他能保持自己的地位，并且在赫鲁晓夫思想政治路线的基础上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他便从内心把这条路线真正当作自己的路线。他以这条路线、而不是以过去的斯大林思想，作为衡量行动是非的准则。不过诺沃提尼在思想和政策上向赫鲁晓夫方面的转变，进行得太慢了一些。一九六四年底，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就被撵下了台。

众所周知，诺沃提尼当时同他的政治局一起，采取了少有的行动——对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进行的反赫鲁晓夫政变的方式

表示了批评保留态度。这次抗议至今作为喜剧性的奇闻仍在广为流传。我认为，像诺沃提尼这样一直对莫斯科唯命是从的人竟然能“造反”，说明了一九六三年接受赫鲁晓夫路线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以至于当莫斯科采取的新方针威胁到诺沃提尼的革新时，他也不得不起来进行自卫。

一九六四年以后，出现了如此奇怪的现象：诺沃提尼是公认的莫斯科的顺从傀儡（人民对他的评语是：“安东·诺沃提尼，干什么都愿意”）。但当他刚刚在捷社会上、在捷共内部以及政权组织中，根据改革的共产主义对斯大林大力开展批判的时候，在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当权派却已经明显地逐渐停止了这种批判，把批判放到了次要地位，并且逐渐恢复斯大林主义。这不能不加深诺沃提尼同莫斯科之间的潜在的、外表上看不出的矛盾。

诺沃提尼感到，勃列日涅夫的不信任是危险的。于是，一九六七年，他大概在试着另寻靠山。他同华沙条约组织司令雅库鲍夫斯基周围的元帅集团拉关系，该集团在莫斯科同谢列斯特更接近一些。一九六七年，勃列日涅夫本人在莫斯科的地位还不稳定，因此，就连某些附庸国的头头也把宝押在莫斯科统治集团中的另一些派系上。在国内，诺沃提尼又加紧了维持自己地位的努力，而放松了按照赫鲁晓夫的样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努力。他又在设法“拧紧螺丝”。从夏天开始，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用各种警察手段镇压作家、改革派的党员知识分子和中央委员会内批评他的人。

当时，以捷共中央国防和公安部长马穆拉为代表的、倾向于莫斯科“鹰派”的干部集团在军队和公安部门中的影响又在扩大。勃列日涅夫对此显然日益不满。所以，当诺沃提尼一九六七年十二月邀请他去布拉格时，他没有支持诺沃提尼去反对捷共中央内部的反对派，而是以自己的名言“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支持了反对派对诺沃提尼的斗争。勃列日涅夫的这一做法显然不是为了促成

"布拉格之春"，因为他最终还是派了坦克去镇压。唯一的解释是：勃列日涅夫要把诺沃提尼搞掉，因为诺沃提尼已不再是执行他的政策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了。①

诺沃提尼没有文化素养，他有的是在担任各种职务过程中取得的各种知识的大杂烩。在他的讲话稿中凡是要用外来语的地方，就一定要注上拼音，否则就可能出笑话。象某些没有知识的人一样，诺沃提尼也有一种病态心理。他对任何暗示他无知的人都抱有报复心理。但他的心理上还有另外一面，在实践中可以说是积极的方面：他尊重知识，并相信知识和科学是共产主义所不可缺少的。他对知识分子有时粗鲁，从他的地位来说，可以说是蛮横的，但总的说来，他对知识分子是尊重的。同著名的知识分子接触使他感到快慰。他经常举行同作家和艺术家的会见。显然绝非偶然的是，会见的地点正好选在马萨里克②在战前经常同知识分子会见的地方——兰尼猎场。

诺沃提尼在政治上常常是改革派的党员知识分子的敌人，特别是当他们不愿听从他的指示，不愿尊重他的政治权力的时候。但是他宁愿对他们进行争取，以便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纳入"党的政策"的轨道，而不愿进行镇压，把他们从政治生活中排除出去。他希望，知识分子既成为他统治的点缀，又成为"建设共产主义的工具"。有时，他觉得他的目的正在顺利实现，有时又觉得知识分

① 高级头目们出访总是带着一帮助手。我从勃列日涅夫的助手同诺沃提尼的助手的谈话中得知，来布拉格之前，勃列日涅夫曾问主管捷克斯洛伐克事务的助手："他们那里谁是第二把手？"了解情况的助手回答他说："在当时的形势下，人事上还看不清楚。""那好吧"，勃列日涅夫没有再进一步谈这个问题。显然，他认为，无论是亨德利赫，列纳尔特，杜布切克，或者是另外一个什么人，谁是第二把手都无关紧要。在他亲自同捷共领导人会谈以后，这种看法也没有改变。这就是他的名言"这是你们自己的事"产生的背景。

② 马萨里克（1850—1937），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五年捷资产阶级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在群众中，特别是知识分子中间，至今仍享有相当高的威信。——译者

子们在破坏他的目标。他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摇摆的，从赞扬、优待和笼络直到威胁和迫害。

实际执行他的知识分子政策、使之具体化和加以调整的人，主要是捷共中央的两名书记，亨德利赫和考茨基。与诺沃提尼不同的是，这两个人都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大学肄业，而且也聪明一些。据我看，考茨基是诺沃提尼时期党的领导层中最有学问的人了。他曾学习过逻辑学和数学，善于抽象思维，掌握数种外语，对世界情况和文化也最了解。他们两人是作为党的新闻记者开始政治生涯的，亨德利赫早在战前就是记者，考茨基则在大战期间参加秘密出版《红色权利报》的工作。一九四五年时，他们只有三十岁左右，在五十年代斯大林主义时期，都不是捷共的最高领导人。直到一九五六年以后，他们才对党的政策有了一些影响。他们的政治前途和事业是同赫鲁晓夫的思想和政治路线联系在一起的。

他们两人都是六十年代诺沃提尼政策的制订者，这一政策有着各种矛盾，但总的说来这一政策越来越朝赫鲁晓夫的政策方向发展，在这方面他们两人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他们自然都是"诺沃提尼的人"，是他把他们提到党的最高官僚阶层的职务上去的。但即使诺沃提尼下了台，他们也不是没有前途的。相反，从年龄上和政治上来说，诺沃提尼的下台对他们只有好处。当然，条件是，在诺沃提尼之后，捷共内部的政治形势仍保持不变。

六十年代捷共内部的共产主义改革思想是在他们默许和支持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没有亨德利赫的直接支持和保护，里赫塔永远也不可能在自己的研究小组里发挥科技革命的思想并依据改革的精神来影响党的意识形态。没有亨德利赫和考茨基的支持，我也没有可能宣传自己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而且一九六七年政治学小组制定的初步改革方案也不可能得到正式的支持。上述

两个小组的指导思想同一九六八年春捷共《行动纲领》①中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应该实事求是地说，如果在诺沃提尼统治时代，亨德利赫和考茨基不允许在捷共内部组织许多小组以改革派的思想为基础进行工作的话，单靠共产主义改革派的努力，捷共行动纲领就写不成那个样子。

为什么"布拉格之春"把亨德利赫和考茨基赶下了台，而同时却把诺沃提尼时期另外两名党中央书记科尔德和什特劳加尔留在台上，把诺沃提尼时期的政府总理列纳尔特也留在台上，而且还把同样是诺沃提尼的政治局委员的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抬到了民族英雄的地位呢？我想，回答是简单的。把诺沃提尼搞下台的党内政变，其第一阶段的发展是符合极权专政制度及其密室政治的规律的，即：关起门来，争夺党的最高领导权。如所有类似的政变一样，这次政变也必须牺牲那些公众对之有较多保留的人，而那些公众对之较少保留的人则得以保存，因为后者在公众中间几乎不知名。亨德利赫和考茨基长期在党的官方的意识形态部门工作：对新闻界、作家以及整个文化界所采取的不得人心的干预，一些众所周知的压制批评的事件，他们都曾积极参与。显然，新的领导如果不清除这些名声不好的人，就得不到反对派的党员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是新闻界人士——的支持。而相反，亨德利赫和考茨基在政治上的垮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而忽略了对其他一些野心家的政治面目的考察。那些认为搞掉亨德利赫和考茨基是自己的胜利的人，并没有反对比拉克、英德拉和雅盖什的上升。

在捷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工作的四年期间，我对考茨基有相当的了解。我还记得，有许多事情他显然是违心地做的。这个人私

---

① 诺沃提尼下台后，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新领导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公布的政纲。——译者

下里非常喜欢哈维尔的作品，我还记得他私下里称赞《通告》①。但在公开场合，他不仅以官方思想的名义扼杀了那个时期的许多文学作品和电影创作，甚至还在一些展览会开幕前亲手从墙上取下了“思想上有害”的作品。但是他的住房却没有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而是用现代派画家的作品来装饰。

考茨基可能是捷共领导中唯一早在六十年代中期就对意大利共产党寄予希望的人。他曾期望，在同当前表现为欧洲共产主义的潮流的联合之中，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会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他的想法是，当欧洲所有共产党——不论其是否执政——互相支持的时候，捷共的改革才能取得更大的成效。但在公众的眼里，考茨基则是亲莫斯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手。

考茨基为了得到政治上的好处，完全抛弃了自己的人格和良心。他是党中央书记，而不是主席团委员。多年来他一直想进入主席团。为了爬到党的阶梯的最高层，他为诺沃提尼充当恶人，在文化、科学界和知识分子当中干“见不得人的事”。对他来说，政治已同权力机构内部的密室政治融合在一起了，他出于政治野心所干的事情，已经无法再纠正了。公众对于那些情愿违心地干任何事的人，已不再关心他们实际上在想些什么了。

考茨基认为搞政治的人如果明显地使人们感到他是凭良心办事的话，那么他在心理上是外向型的人。而他认为自己是个内向型的人。遗憾的是，事实却正相反：他虽然是个不外露的内向型的人，但是决定他的行动的因素绝大部分都是外在的因素，而这又正是外向型的特点。

一九六八年四月，在即将决定撤销考茨基中央书记职务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前，他同我谈到是否应主动辞职的事。从他的谈

① 哈维尔是捷戏剧家，《七七宪章》的签名者。《通告》是他的作品。——译者

话可以看出，他还不明白自己的处境。他不理解为什么在现在，在进行他所赞同并且为之作了准备的改革时，要他离职他去？为什么现在，当捷共的对外政策比以前更加重要的时刻，却要他这个在这一方面既有经验又有各种联系的人离开工作？他很有远见地谈到了杜布切克新政的对外关系的意义，而他对这方面的基本问题无疑要比新领导中，包括杜布切克本人在内的任何人都看得清楚和准确。他确实不理解，他为什么不能继续担任主管国际事务的中央书记，难道仅仅是因为科研部门的党员，以及作家、艺术家和新闻记者都讨厌他，某些斯洛伐克人不喜欢他——由于他过去在某些斯洛伐克问题上也是诺沃提尼的工具？

那时，我曾怀着复杂的心情劝他辞职。我知道，他不是顽固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他确实可以为改革工作的，但我也知道，他呆不下去了。他辞去了职务，被放到不重要的地方，到莫斯科去当大使。在一九六八年的时候，对他的地位来说，这种安排就等于是脱离政治，因为当时布拉格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不是通过大使来办的，而且双方对他都不信任。

就是在一九六八年以后，考茨基对自己过去的事也没有真搞明白。他是一九六九年一月在捷共中央会议上第一个提议撤销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主席团决议的，上述决议谴责苏联的军事入侵是违背国际法的行动。我相信，他自己不认为入侵是符合国际法的行动。但他期望，他可以以此为代价重返政治舞台。他连在这时也没有明白，卑躬屈膝并不能获得另一些卑躬屈膝之辈或者根本没有气节的人的支持。何况他们与他已经不同了，他们已经大权在握，对他们来说，他只会成为一名多余的争权者。

同考茨基差不多，亨德利赫最终也成了自己在官僚机构中玩弄计谋权术的牺牲品。亨德利赫是搞政治调和的能手，但他是在政治机构内部搞，而不是在公开的场合中搞。在党的机关中，人们

说他是“和事佬”，他善于平息矛盾。但在公开场合，包括在党内的公开场合，他则是诺沃提尼在捷共内部统治的主要支柱和毫不含糊的代表。一九六八年一月以后，连他本人遇到的矛盾，他也已无法再平息了。然而，亨德利赫和考茨基不一样，他很明白自己的处境，并用他特有的办法来适应它——他退休了。在苏联入侵之后，他也未曾想法改变这一处境。

在胡萨克统治之下，亨德利赫过去的熟人，共产主义改革派——现在的擦窗工，临时工，或残休者，在布拉格的大街上还能经常见到他①。他有时停下来同他们呆一会儿，在进行亲切的谈话之余他也不忘提一、两个尖刻的问题，例如：“怎么样，你们还骂六十年代吗？”在《七七宪章》发表以后，在当局疯狂镇压宪章签名者的气氛中，有一个签名者在街上遇到了亨德利赫。他对《宪章》的评价是十分简洁的：“还没有够呀？堂·吉诃德，堂·吉诃德！”

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生活都是丰富得多，也自相矛盾得多。在诺沃提尼统治集团中也不例外，不像人们事后简单化地估计那样。六十年代捷共内部的改革倾向不是一股一致的、没有分歧的潮流，其倡导者、支持者和维护者形成了一条反诺沃提尼的统一阵线。改革倾向半官方地成了这一时期的气氛的主宰，在专政机构内部也是这样。

我是在当时的专政机构内部经历“布拉格之春”的，我不仅从近处和从内部了解了这个机构，而且还曾努力改造它。当时的领导层也是“布拉格之春”的组成部分。然而这个领导层并不像报刊和电视上任意宣传的那个样子，在实际上远不是那么高尚。

① 亨德利赫已于一九七九年五月去世。——译者

第二章

“布拉格之春”和领导层

一九六八年，记者们为了赶第二天的版面，对历史所作的评价往往过于仓促。为一目了然起见，他们把“布拉格之春”期间的共产党人简单地分为激进派、中间派和保守派。

我通常被划为中间派。对此，我是不大在乎的，因为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看我。例如，我曾坚持认为，国家有权干预新闻自由，只要国家政策的利益有此需要，就可按照严格制定的法律由法院出面实行干预。又如，我反对在一九六八年春天就允许建立新的政党。此外，我主张尽早召开党代表大会并进行选举，尽管很多人认为召开党代会和进行选举的事应当推迟，否则会使蓬勃发展的民主化运动过早地结束。

后来，当苏联的坦克碾上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舞台时，不止一个貌似磐石的庞然大物变成了一堆烂泥。在此时刻，我忽然对某些前不久还是公认的“激进分子”的人的行为感起兴趣来了。这些人是：切尔尼克，齐萨士，胡萨克，以及里赫塔或者索托拉等人，更不用说斯洛伐克的“激进分子”了。

要回忆一九六八年事件，就让我从这个问题开始吧。显而易见，我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至今还带着一些辛酸。这种辛酸并不是对个人遭遇的感叹，它另有实际内容。至今我感到难受的是，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虽然还不可能让我们在一个早上就把长期被玷污的祖国变成国歌中所说的“地上的天堂”，但已有可能作出不少

重要的改善。而在这样的时刻，捷克人竟然是那样地不愿理解权宜之计的作用。我至今还感到难过的是，多少聪明、正直和有献身精神的人竟然为在捷克实现乌托邦而不懈奋斗，以致把谋求一些切实可行的改善措施的机会也失掉了。直到激情的醉意逐渐消逝的时候，他们才抚摸着残破的希望，惋惜地想着："本来是不致于落到这种地步的，如果……"。

但是我在开头就想坦率地说，今天，在"布拉格之春"之后积累了差不多十年经验的时候，我确实并不认为，我当时的主张都是正确的。我现在也不相信，如果当时一切都按照我所设想的可能性发展的话，我所提出的目标就能得以实现。那些目标大概是难以实现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民主可能会比我所设想的还要少。而且事情很清楚，改革的共产主义不是什么最好的解决办法。尽管如此，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总还是可以生活在同今天不同的条件下，使他们更便于进一步寻求解决办法，哪怕是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他们的生活则可能会比今天更接近于二十世纪末的欧洲生活，我这里指的是人们普通的日常生活，不是指那种处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问题的生活。

但也可能连这一点也办不到。也许我认为可以行得通的改革，同样也会成为莫斯科进行"兄弟援助"的借口。那样，情况当然会比现在还坏，因为现在总还有一个可供后人回忆的时期，而在这一时期中，不可能的事情看起来似乎是可以实现的。那时只会完全证明，莫斯科不仅会用暴力镇压共产党人企图按照普选原则实行多党制的尝试，而且也要镇压那种虽然仍由共产党人继续统治，但搞的不是克里姆林宫所认可的那种极权专政的改革。

假设的话已经说得够多了，还是回到现实中来吧。同写有关一九六八年以前的情况一样，我在本书也不想对一九六八年的形势及其发展的可能性进行客观的分析，而只是谈谈个人的看法。象

前面的章节一样，我在这里也只谈及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现实的一小部分，我选择的材料也完全是我个人感到重要的材料。

*　　*　　*

诺沃提尼的下台使我感到很意外。我原来估计，领导层的变化将发生在晚一些时候，大致是在一九七〇年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之前的某个时候。这种变动显然不会发生在代表大会上，因为执政的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从传统上来讲，只是确认在它召开之前发生的政变，并且使新上台的统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设想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从一九六七年初开始，我就是根据以上设想来安排科学院研究小组的工作的。我估计，到一九七〇年代表大会时，小组工作的成果可以成为一个供新领导使用的方案，以促进政治制度的民主化。

一九六八年一月时，这个重要的小组开始工作还不到一年，但其研究已有某些成果。为了进行经济改革及相应的政治改革，小组已对那些需要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加以解决的问题提出了一些粗略的方案①。当时我就很清楚，要进行有实际意义的政治制度的改革，必须打破极权专制。我也知道，改革的步骤在实践中大体会怎样进行。关于把现存的极权专制改变为多党民主制的问题，我认为，在实际上必须具备一个前提，即：在实践中形成有效的民主制度以前，至今仍在实行垄断和专制统治的共产党不能失去领导权。当然，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知道，有些人在事先就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好像是要解决著名的圆求方数学难题一样徒劳无功。我当时不同意这种看法。至今我也不认为问题是根本不能解决的。如果说佛朗哥的法西斯专政在没有人民起义的条件下能够改革成为民主的政治制

① 本书不拟就该小组在理论方面提出的考虑详加阐述。我在《一九六八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尝试》一书中对之曾作过介绍。

度的话，那么，起源于斯大林主义的专政制度也必定是可以改革的。然而，这象在西班牙一样，需要十分有利的国内和国际条件。而从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历史学的观点来看，一九六七年捷克斯洛伐克有很多有利的国内条件可以成功地进行这一尝试。

当时已经付诸实行的经济改革①，在四个主要方面为变革政治制度创造了前提。例如，对经济生活的每一步骤都要发号施令的庞大的国家机器，已经不再那么需要了。除了制订中央长期规划的机构之外，可以逐步地把国家机器的有关部分变成企业和超企业组合的行政机构，并把它同政治性的国家机构分开来。再如，在执政党及其机构的活动中免除其指挥经济的工作。这样，一方面可以精减庞大的党的机构，因为指挥经济的工作占其整个工作量的三分之二；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共产党能够把精力集中到政治工作和大政方针方面来。此外，经济改革把社会主义企业变成必须尊重市场规律和生产效果的从事经济活动的独立单位，与此同时，它也造成了一种压力，要求提高专业干部的作用。这样一来，对干部的专业技能的要求就超过了对其"政治可靠性"的要求，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极权专制。这个制度如果不能以"政治可靠性"为尺度来确定人们的生活待遇和安定程度，它赖以生存的基本支柱之一就会垮掉。最后，经济改革还造成了一种压力，要求重新解决工会、工人和企业人员在工厂和企业的管理工作中所应发挥的作用问题。应当让他们通过奖金(利润提成)直接感觉到管理不善的恶果，为此，必须让他们对管理有某种形式的发言权。人们提出了发展广义的工人自治的要求，要求在企业和超企业的部门中建立某种形式的自治机构。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任何阶级或社会阶层，会由

① 一九六四年捷公布《关于完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原则草案》，强调利润原则，并规定于一九六六年起正式实行。——译者

于自己不同的社会地位而与另一个阶级或社会阶层产生根本的矛盾，并需要用极权专政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就是官僚阶层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也没有这样的性质。他们当中从事生产管理和社会服务的人为数最多，但他们所享有的社会特权并非必然要求实行极权专制；就是民主制度也可以将官僚阶层作为一个整体保留着，在某些地方（由于不再以"政治可靠性"作为尺度）该阶层中不少人甚至还可以改善一下自己的地位。官僚阶层中由于享有社会特权而同极权专政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政权机构里的那一部分人，他们人数既不多，对社会制度的作用也不那么重要，但由于他们在专制制度中居于掌权的地位，所以成了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相对的社会平等对民主的政治形式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为有利。从年龄上来看，当时居民中的多数人大半生是在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八年以后的社会政治关系中度过的。而在一九四八年以前曾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人（当时四十岁以上的人）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因此，在摧毁捷共极权专政的时候，当年政治上的胜利者同失败者之间的冲突重新形成有影响的政治倾向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减弱了。社会上各阶层参与政权的可能性都差不多。政治结构的民主化能使各个阶层都得到好处，只有控制着政权各个部门的一小撮官僚会受到损失。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也是一切都有利于民主改革的：极权专政是外来的、从外国（苏联）进口的制度，我国近五十年来的历史传统则主要是致力于建立多党的民主制度。

无论是从国家法的角度还是按照政治学来考察政治制度的结构，一切都是有利于民主改革的。在现有的宪法和法律准则的基础之上就有可能采取某些有利于建立法制国家的重要步骤。宪法和法律准则往往被表述得如此空泛，以致执行起来可以是五花八门、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其文字可以作有利于极权专政的解释，也

可以作有利于法制国家的解释。这是苏联型的极权制宪法和法律的普遍特征，因为这种专制同法西斯型的专制不同，它在表面上还装扮为民主制度，民主国家的许多原则在其法律中还普遍地得到正式承认。因此，国家权力的分工和相互监督等一套制度，本来根据现行宪法中关于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的地位的规定，就可以开始实行起来。法律规定，司法机构是独立的，所有的执行机构，包括政府在内，都从属于并产生于议会制的立法机构。只要在实践中遵守这种合法的关系并对选举法进行改革，就有可能从根本上破坏极权专政的制度，而用不着触及究竟存在几个政党的问题。

我当时感到，搞这种类型的改革，辅之以在社会主义企业以至整个经济领域中建立自治机构的体系，同时真正发挥工会和其他社会团体的积极性，是一种现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十分有效的办法。我曾设想，政治制度经过这样改革以后，让它先实践一个时期，实践本身将会指出进一步发展的最切实可行的途径。

从法律学和政治学来看，这种办法是扩大公民权、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权的现实办法。在这方面，只要认真贯彻一系列现行的法律准则，进行改革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首先要在实践中来一个转折。长期以来，在国家机关同公民的各种关系中，执行法律时总是单方面地有利于国家机关，而公民的合法权利实际上被否定了。当然，某些与言论自由和迁徙自由有关的问题要求对法律进行新的、符合改革的发展趋势的修改（如：需要废除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某些刑法条款，使公民享有领取旅行护照的权利，等等）。

然而在对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进行理论研究时，就已出现了十分严重的政治问题。毫无疑问，这两项自由对于极权专政转变成民主制的全过程来说，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但问题在于，在过渡时期，即在改变一党制问题尚未作为改革的现实的迫切问题提

上日程的时候，如何在政治实践中实施这些自由。而关于政治改革的设想，在有些地方遇到了在当初的理论讨论中尚未完全搞清楚的两个基本问题：一党执政的问题和改革在苏联集团其他国家可能引起的国际性后果的问题。

研究小组的人知道有这样两个问题，也曾进行过讨论。然而这些讨论大部分都是非正式的，没有什么书面材料和记录。因为，如果在一九六七年把这些问题正式提出来作为研究小组讨论的题目，小组就会面临被解散的危险。

那么，我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我是共产主义改革派，而不是非共产主义民主派。这一点，我当时并不隐讳，现在更没有理由再回避。我从来不曾想过要让捷共失去政权。我既没有政治上的利益和思想上的理由去这样做，也没有这样的个人愿望。然而，根据我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解，我认为正确的是，应当废除那种捷共作为唯一的、专制的垄断统治的政治力量的极权专政制度。我的设想是，共产党不是在这种专政的制度下，而是应该在多党民主制中掌握政权。

我知道，这里不能回避其它政党根据普选的民主准则同共产党进行竞争并分享权力的问题。在理论上，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多么复杂的问题。在总结一九六七年研究小组讨论结果的手稿中，我就曾写道：

“据我看，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不允许有两党制的政治模式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抽象地看，在社会主义多党制的模式中，两党制这种办法是最适宜的。它可以确保不致产生一党垄断的政治制度，而且还能够在政治生活中创造一种手段，来解决共产主义目标的假说同社会主义的现实之间所存在的根本性的矛盾（作为共产主义假说的创造者和实行者的共产党，可以不断受到从社会主义经验的‘现状’出发的另一个党的校正）。两党制可以在整个

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造成必要的‘平衡’，它与多党制不同，不会由于某些党的联合而在实际上打破‘平衡’，并以联合作为一个主体来实行政治垄断。同时，两党制还可以防止超越国家(人民代表机关)的范围去作政治性的决定的情况。而多党制恰好会促成这种状况，不管在形式上是联合政府，还是象我国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那种形式的民族阵线都是一样。因为政治决定不是按照法律规定的途径作出来的，所以实际上等于用迂回的办法取消了法律对民主进程的保证。我虽然认为，为建立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解决办法是可行的。但我没有把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抽象化，也不认为这种解决办法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实现。有关这一观点的分析已超出本文的范围……。"①

我当时这一观点的主要论据是什么呢？我想，这不仅仅因为我是执政党的发言人之一，而且还由于有些论据是任何政治学家或政治家，即或是完全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家，都不能轻易加以否定的。

首先，我曾认为，如果在政治体制中一系列大体上是我以上谈到的民主改革实现以前，就提出建立一个能在民主选举中同捷共争享权力的政党的问题，那将意味着威胁民主改革，甚至使这些改革夭折。因为一旦提出这样的问题，占垄断统治地位的捷共及其在各部门的成千上万的干部就无心去致力实现合理的改革，而只会本能地进行自卫。因为他们预感到在选举中会遭到失败，就将投身于维护旧的专制制度。

其次，我还曾认为，客观地从社会自身真正的需要来看，社会对政治发生影响的主要形式和方法并不是只靠政党的作用。即使

① 这一段引文的全文在捷克斯洛伐克从未公开发表过。这里系引自我的著作《一九六八年改革的尝试》。

是在具有传统的发达的多党民主制的社会制度下，在现代化、工业化社会中，由于实行了真正有效的人民监督，各政党在政治上以及在决定数以百计的十分重要的专门问题上，其作用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因为情况的好坏取决于执政党执行政策的情况如何，取决于民选的代表机关和各种形式的自治机构是否在真正起作用，人们是否能真正参与决定日常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取决于公民的权利（除参加政党的权利之外）、出版自由，等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要使工会和其它群众团体的作用、拟议中的工厂和其它社会领域的自治机构的作用，成为决定国家和政治问题的现实力量。这样一种人民参与决策的形式，在理论上本应是在废除私有制以后就该采取的主要形式。特别是我还有过一种设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民选机构在下述问题上应与资产阶级民主的议会不同，即它们的议员应该不仅仅是政党的代理人，而且还有其它各种组织、特别是自治机构的代表；议会中应直接设立没有政党参与的、由自治机构的代表组成的特别议院。

我认为，在政治改革的过程中，在政治制度上实行一系列上述这种改革，要比设想举行民主选举，在选举中由某一个新的政党取代捷共，然后再进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更为重要，也更加现实。如前所述，我认为有可能逐步争取捷共对其所控制的旧的专政制度进行改革，因为该制度已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在政治上自卫本能总是表现得很强烈的。在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可以在这种本能的推动下，通过上述的办法找到自卫的出路。实行上述办法的结果必然是使制度和捷共自身起一种变化，这种变化相当于摧毁极权专政的主要支柱。尔后，在比较民主的政权机构已在现实地发挥作用并得到相对稳定的时候，多党制的问题就将提上日程。在这样的条件下，多党民主制的发展就可以得到最终的、持久的保证，而无需首先由捷共以外的别的政党

采取措施来夺取现存的非民主的、专制的国家机器了。

从时间上来看，我曾设想，改革大约需要经过十年或再稍长一点时间。如果有人认为时间太长的话，那他不应忘记，今年正是"布拉格之春"十周年。我再说一遍，我今天无意去证明，我的那些设想都切实可行、并不会遭到莫斯科的反对。尽管如此，我还是比较详细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因为我想说明一下在"布拉格之春"期间，我在一些问题上之所以采取了当时那样的立场，是有一定的思想为指导的。我当时曾耽心，这个问题会被人过早地作为头等重要的问题带到实际政治生活中去，我所指的一方面是报刊(这种情况部分地确曾出现)，另一方面是某些力图起新政党的作用的政治团体(例如原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人，非党人士俱乐部中的某些小组等)。

那些根本不相信共产党人能够实行改革政策、并想在捷共之外不受约束地发挥作用的人提出这个问题，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不大理解，为什么某些基本赞同政治改革方案的共产主义改革派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还有，我不能理解，某些我的同代人，其政治经验基本上与我相同的人，他们真的会认为，比拉克和"保守派"以及杜布切克和捷共领导的"激进派"，竟然会同意以进行自由的民主选举——在选举中捷共将同某个新建立的、没有受到过去的罪过玷污的政党相竞争——作为执行新政策的开端。我不明白，这些人在政治上、在党内有了这么长时间的经历之后，对政治和党的看法居然能如此幼稚和充满浪漫主义。我当时和现在都不认为他们那时提出这个问题能够算作一种功劳。

至于第二个基本的政治问题，即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政治改革的国际关系及影响问题，我们研究小组早在一九六七年就很清楚，这个改革必得经受住克里姆林宫法庭的考验。然而，那时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并不严重，没有必要因此对研究和理论上的探讨加

以限制。内部研究本身不会引起莫斯科的任何干预，而过一段时间之后，开始实行改革时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反正是不能靠理论去解决的，因为这显然取决于到时候在莫斯科出现的具体情况（包括人事方面的情况）。

我在研究工作一开始就估计到了苏联可能会作出某种反应。一九六七年春我到莫斯科去，想具体地了解一下，苏联意识形态界是否有反应，会有怎样的反应。我在莫斯科的科学院国家与法律研究所作了一次报告，阐述了我们已着手制定的政治制度改革方案的实质。在同科研人员、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几次正式谈话和多次非正式的交谈中，我收集了他们对我们的改革方案的一系列具体问题的反应。

大部分正式的表态是很审慎的，我的想法只被称作是“有意思的”，但不明确表示可否。科学院意识形态界某些职位最高的人对整个方案进行了直接的攻击。例如，莫斯科的研究所所长契克瓦兹院士（顺便说一下，他后来由于不法行为和“不道德的生活”被撤职）在讨论我的报告时挑衅地问我，我的观点同资产阶级多党制观念有什么区别？我回答他说：总的区别在于，我所考虑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多党制，指的是劳动人民和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至于某些具体问题，特别是组织机构及其作用的问题，则没有任何区别。如果院士同志能具体指出哪些方面应有区别，如何区别和为什么要区别的话，我倒是很欢迎的。院士同志当然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感到惊讶的是，“资产阶级多党制”这个可怕的概念竟没有被看作是不言自明的论据。对于将经济管理的机构同国家和政治机构分开的方案，他们也是不赞成的。然而这种不赞同的态度部分地是针对当时在捷克斯洛伐克正在进行的、已经正式成为党的路线的经济改革的。

非正式谈话的结果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我的苏联同行们（其

中许多人是我的熟人或在莫斯科学习时期的朋友）认为，虽然在苏联难以将我们的方案作为在不久的将来即可实行的方案来加以考虑，但是，如果在捷克斯洛伐克真的能进行这样的改革的话，对于他们来说，也是特别重要的。他们认为，在苏联也需要搞改革和民主化。这时，勃列日涅夫掌权只有两年半，大多数人，特别是在党的机构内部，都认为他不过是个"临时政府"，因为党内各派暂时都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直接掌权。人们往往希望那个继续搞民主化的、执行专家路线的较合理的路线能够取得胜利。经常提到的人选是谢列平。没有什么人怀念赫鲁晓夫，因为党的机构中的年青人大部分认为他执行的对内政策是未经深思熟虑、杂乱无章的，而且还不断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试行大规模的、考虑欠妥的改组。只有个别人认为，民主化在苏联没有前途。我过去的一个同学是持这种观点的。他用明确的语言解释说："你想搞的东西，在我们这里连想都不能想。他们会把我们宰了。""我们"应理解为苏联官僚，"他们"则是苏联人民。

我回到布拉格的时候头脑中已形成这样一种想法：从长远来看，形势还不坏，可以期待在苏联也会发生朝民主化方向前进的积极发展。但是，目前我们的工作不能指望苏联思想理论界的支持，而是相反，必定会遇到他们领导层的仇视，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了。同情我们的人在数量上是多数，但是他们没有权力和领导地位。尽管如此，我总还认为，等到一九七〇年时，形势会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事后表明，这是我有生以来在估计形势方面所犯的最大的错误之一。

一九六八年一月我到"工作小组"工作时，对于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和现实道路的问题，就是带着这些看法去进行工作的。"工作小组"的任务是起草一个政治文件，它后来成为著名的捷共《行动纲领》，并在一九六八年四月五日得到党中央

委员会的批准，成为“布拉格之春”的正式有效的纲领。①

在文件中也体现了我的观点。这是第一次没有为了能在党的机构里“通过”而绞尽脑汁地去搞似是而非和含糊的概念，而是努力做到，使写入纲领的语言明确，并使它们能在政治实践中得以实现。但是，在一个基本问题上，即在关于政党和民族阵线的作用的问题上，捷共《行动纲领》的基本思想同我的观点是不一致的。

《行动纲领》是较短时期的政治纲领，涉及到的是政治改革的第一阶段。如上所述，我不主张在第一阶段就把将来在民主选举中可能与捷共争享权力的其它政党的产生和作用问题作为迫切的政治问题提出来。因此，我也不主张在这个纲领中提出各政党的

---

① 一九六八年捷共《行动纲领》是由“工作小组”写成的，小组成员大部分为科学研究所和高等学校的工作人员。捷共中央主席团虽然成立了拟定该纲领的“政治委员会”，并由科尔德任主席，而且委员有捷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的成员及其他高级干部，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参与撰写行动纲领的工作。科尔德自己到写作人员中间一共只来过两次，其中一次他提出：文字应简练，大约只需十页，并说他已同作家普罗哈斯卡说好了，如果给他提供基本材料的话，他可以写。因此，难怪勃列日涅夫一九六八年秋在莫斯科曾向西蒙了解，捷共行动纲领究竟是谁起草的。西蒙回答说，起草行动纲领的是一个以科尔德同志为首的委员会。这时，勃列日涅夫说：“我问的不是这个，我想知道，实际上是谁写的！”

捷共《行动纲领》的最后文本的作者如下：

第一部分：捷克斯洛伐克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福伊季克，卡普兰，里赫塔；

第二部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对社会进行管理的新体制——姆林纳日；

第三部分：国民经济和生活水平——西蒙，切尔文卡，以及几个经济学家，特别是希克，考巴等；

第四部分：发展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里赫塔和普罗瓦兹尼克，此外，教育部门、科学院和作家协会曾提供了部分基本材料，这些材料的作者也参加了定稿工作；

第五部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和对外政策——奥尔斯佩格。

上述作者组成了主要的“工作小组”，该小组在组织上由奥尔斯佩格领导，并在他所在的《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布拉格编辑部的办公室工作。他们工作的基本素材是由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提供的数十篇分题的研究材料，纲领的文本也曾在许多分组中进行了讨论，并根据这些分组成员的意见作了修改。

作用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中所能解决的。用一九四八年二月以来的办法限制其它政党，并将它写入改革的纲领性声明中去，这就意味着从纲领上明确地维护极权制度的一个支柱，使它在未来也继续存在下去，而且还唤起上面的人来关注这个问题。然而，一下子在实际上废除这种制度在政治上是不现实的，不可能不引起严重的危机和争权的冲突。

民族阵线过去的使命就是限制共产党之外的政党，而现在如果要提出让民族阵线发挥政治作用的问题，那就意味着把前面说的问题都一下子摆出来了。谈论民族阵线的作用而不谈政党的作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根据我的看法，在改革的过程中，应该让民族阵线内的工会和其它群众团体尽可能独立地发挥作用而不受民族阵线本身的限制。据我看，一九六八年初的民族阵线已成为政治僵尸，没有理由再让它复活。

但在捷共内部还有另一种观点，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以罗翰为首的某些政治学家组成的“工作小组”，该小组一九六七年在亨德利赫的赞助下研究了上述问题。亨德利赫把这个小组草拟的方案交给了我作为写行动纲领的基础。他们认为，可以恢复民族阵线，捷共可以通过它来影响所有其它社会组织和团体。其它政党的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这些政党只能作为形式上的组织来“点缀”社会制度。

一九六八年二月，我写了个书面的意见上呈给亨德利赫（他直到三月还是政治局委员和党中央书记），谈了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①。我谈到，如果在捷共行动纲领中接受关于民族阵线的这种方案，那是不正确的，也不符合改革精神。如果同时提出共产党之外的政党问题，就会在改革的第一阶段在实践中造成无法解决

① 一九七五年四月国家保安局搜查我的住宅时，将该文件的副本连同其它我个人收藏的文件都抄走了，我手头已无此文件。

的政治问题。因此，我建议在行动纲领中只是一般地提提民族阵线的问题，用宪法里的提法："由各社会组织和团体组成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民族阵线，是在捷共领导下的城乡劳动者联盟在政治上的表现"，此外，就让这个僵死了的机体在事实上靠边站，不要干预改革的发展。亨德利赫对此没有提什么反对意见（同我谈过该问题的其他领导人也一样），这样，在一九六八年三月拟就的差不多已经完整的行动纲领的草案中，就没有提到民族阵线和各政党的问题。

三月，在科尔德主持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对这个问题发生了争论和分歧。某些人反对我的意见，他们说，从实际的政治发展来看，关于共产党之外的其它政党的问题在当时已是无法回避的了，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不必要的关注和压力，要求捷共对此明确表态。因此他们要求，一定要在行动纲领中较详细地阐述民族阵线的作用，以及组成民族阵线的各政党的作用。当时最坚持这一意见的是现任捷政府总理什特劳加尔，斯姆尔科夫斯基也很支持他。当时也曾就今后的实际政策问题进行了坦率的讨论，例如，能不能设想，将来真的实行共产党之外的其它政党独立自主地参加自由选举的问题。所有的与会者都认为，这是不现实的。当时在会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认为在民族阵线改革的过程中不能允许在阵线之外再建立新的政党，这样就可在实际政治生活中避免发生各政党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

开始的时候我还想提出自己的理论论据进行反驳，说明他们的意见只会给政治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制造困难。但在讨论的过程中我认识到，从实际上来看，那些认为问题无法回避的人显然是对的，因为在三月份，社会的动向及其在报刊上的反映已经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关于其它政党的作用问题实际上已经摆出来了。在这次会议之后，我写了捷共行动纲领有关民族阵线和各政党的一段

话，也就是后来得到通过和发表的那一段。

起草捷共行动纲领的工作清楚地表明，我为改革的共产主义所作的努力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决定性的阶段。我在思想理论上的设想如今要经受政治的批判，要付诸社会实践。决不能再将这些设想搞得模棱两可，形象歪曲，如同在社会的大多数——他们处于权力之外而又受到权力的控制——漠不关心的情况下极权官僚制度通常所做的那样。我的那些设想接受实践检验的时刻，正是极权专制垮台以后，社会的大多数日益活跃地干预事态的发展，各种倾向的政治上活跃的集团拥有发挥、宣传和维护自己观点的现实可能性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政治的传统性的基本因素——争夺权力的斗争出现了，随之而来的，自然还有狂热、激情和不可避免的政治煽动。

后来我也进入领导层，进入政权机构的内部。我在那里所看到的东西使我颇为震惊。在那里，关于改革的意义和目标的基本概念少得可怜，而争权夺利的争斗却要多得多。争权夺利的问题往往会轻易地把对于政治、社会及社会生活进一步发展的整个前途都很重要的问题挤到一边去。为了不错过自己的机会，有些当权者的政治面目改变得是多么快啊！

我在政治上已不再是幼稚和充满幻想的人了。可是我也还没有变成官场里的老油条。我发现，这种状态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不是一个优点。幻想者和幼稚者也好，老油条也好，他们的日子要好过得多。而我们这些人，明明看到政治斗争的成败并不取决于理想，但却仍在为某些理想而奋斗，因此我们这种人的日子就不好过多了。我在自己周围见到过不少这种类型的人，但他们只占少数；幻想者和老油条则占压倒的优势。

*　　*　　*

人们至今还把解除诺沃提尼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这件事，

看作是一九六七年十月到十二月间捷共领导内部短促的突发事态的结果。在十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诺沃提尼和某些中央委员、首先是和杜布切克之间，爆发了冲突。冲突发生在许多问题上，主要是在党的工作方法和诺沃提尼本人的工作方法问题上。冲突也反映到党中央主席团的内部，而且尖锐化到有人建议让诺沃提尼辞职（保留共和国总统职务），而在力量对比上出现了平局（五比五）。一方是诺沃提尼，列纳尔特，胡迪克，拉什托维奇卡，西穆涅克；另一方是杜布切克，亨德利赫，切尔尼克，科尔德和杜兰斯基。诺沃提尼向勃列日涅夫求援，但勃列日涅夫并未提供支援，而是宣称，整个事情是捷共"内部的事"。十二月底，中央委员会开始讨论将党的第一书记和共和国总统两项职务分开的问题，次年一月，解除了诺沃提尼的党内职务。

在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之前，军队和保安系统的某些部分曾进行了戒备。看形势，诺沃提尼当时好像要用暴力，用逮捕和宣布紧急状态，来镇压反对派。但后来并未发生什么事。一名涉嫌的将军逃到了国外（后来揭露出他的贪污丑闻），另一名将军也自杀了。诺沃提尼本人的下台则进行得很平静。

在十二月和一月举行的党中央全会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反对诺沃提尼的强大的反对派，在这里面除了过去有名的反对派之外，一些人突然非常坚决地参加进来，如比拉克和英德拉，而过去，谁也不曾设想这些人竟然是反对派和民主主义者。"布拉格之春"历史的编纂者们简单地记录了这一切，谁也没有提出什么问题。

但是我认为，这里还是有些问题的。在杜布切克担任第一书记以前，捷共中央书记的人选，以至于其它比较重要的职务，包括党的州委第一书记的人选在内，都要经莫斯科批准。这本是捷共的习惯做法。而现在，勃列日涅夫难道能够听其自然，让"反诺沃提尼派"组成整个捷共新领导？他难道只是坐在克里姆林宫里，紧

张地等待着报纸上的报道吗？诺沃提尼准备在军队和警察中挑选“忠诚的干部”来保卫自己，难道契尔沃年科① 对此一点也不知道？众所周知，所谓“忠诚的干部”首先是对莫斯科忠诚。而为什么最后保卫诺沃提尼的戏剧性行动没有实现？

我很怀疑，莫斯科会对这一切听之任之，会听任捷共自行其是。我比较相信另一种说法：在勃列日涅夫访捷之后，莫斯科已不拟再拖延事态，决定在下一次中央全会上就把诺沃提尼搞掉。而动武的事也很可能就是总导演直接制止的，尽管我还认为，也许是诺沃提尼本人最后决定不采取这种步骤，因为他不愿使用武力来“反对党”。至于新的人选问题，克里姆林宫肯定考虑到了那五个反对诺沃提尼的人。除了杜兰斯基年纪太大之外，其余四个人中将有一人取代诺沃提尼，至于这个人到底是杜布切克，亨德利赫，切尔尼克还是科尔德(科尔德还是不太可能的，这样就剩下了三个候选人)，他们确实让捷共自己作了主。

莫斯科的导演必然看得更远一点。他会估计到，诺沃提尼的五个支持者当中，有些人坚持不到诺沃提尼的下台，他们的位置将由反诺沃提尼派的人来补充。在这种情况下，在反对派方面必然要安插绝对可靠的国际主义干部。我只能这样来解释为什么某些同志突然非常激烈地反起诺沃提尼来了。然而除了对事物的逻辑推理之外，我拿不出任何具体的证据来证实这一假设。

否则的话怎么能解释，交通部长英德拉会突然卷入如此原则性的政治纠纷，致使所有的与会者都感到惊讶；而当杜布切克和勃列日涅夫之间发生了冲突的时候，他又马上由激进的进步分子和新方针的拥护者变成了捷共领导内主要的“保守派”，而最后，当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以后，又以他的名义逮捕了杜布切克？

---

① 斯·瓦·契尔沃年科，曾任苏联驻华大使，一九六八年时任苏联驻捷大使。——译者

比拉克是“社会主义复兴者”吗？当然，他之所以反诺沃提尼，也可以作如下解释：诺沃提尼同杜布切克发生冲突时，他同时攻击了党内所有的斯洛伐克人，而比拉克是为了维护斯洛伐克才站出来的。但当时人们就已经很清楚，比拉克还代表了比东斯洛伐克更靠东面的利益①。是不是这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比拉克此时是杜布切克很亲近的朋友，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对诺沃提尼作了如此原则性的批判吧？可是以后的情况怎样呢？比拉克同英德拉完全一样，杜布切克同勃列日涅夫一发生冲突，他马上就很明显地在捷共领导内部代表勃列日涅夫的利益。而后来，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在苏联大使馆里，他又同英德拉搞到一起，准备由他当党的头头，由英德拉当“工农革命政府”的总理。

还有两个人，他们的事业是同捷共中央一月全会以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而后来也是同英德拉和比拉克坐在一块儿谋划着建立新的英德拉政府的。他们是：雅盖什，后来的捷共中央监察和检查委员会主席；巴甫洛夫斯基，切尔尼克政府的部长。巴甫洛夫斯基怎么成为部长的？是在一九六八年四月捷共中央会议上英德拉提议的，当时是作为补充意见提出来的，而且提此意见的只有他一个人。而雅盖什在诺沃提尼下台以前是何许人也？他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杜布切克上台后他才被选为该委员会的主席。他还当过内务部长库德尔纳的副职，库德尔纳后来被“复兴运动”赶下了部长的宝座。此外，他和巴甫洛夫斯基一样，还同英德拉在哥特瓦尔多夫城一起共过事。

象比拉克一样，雅盖什也是杜布切克提名任命的。有些人反对，因为他们看到他同保安部门的联系（不仅在布拉格），认为这对他的职务不是很合适的。而杜布切克却回答说，这是个好同志，他

---

① 指苏联。斯洛伐克东邻苏联。——译者

们在莫斯科党校学习的时候是住在一起的，肯定没有问题。如果说这里有导演插手的话，这确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导演，他选择了杜布切克可以视为朋友的演员。在长期受莫斯科导演控制的人们当中，杜布切克有很多朋友。

我不了解，杜布切克在一月最后几天，作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赴苏访问时同勃列日涅夫都谈了些什么。但这是在党和国家领导层作出较大的人事变动之前对莫斯科的首次访问。在这种场合，克里姆林宫的习惯是要相当具体地讨论"双方感兴趣的问题"。我不怀疑，杜布切克对比拉克、雅盖什和英德拉的信任在那里得到了由衷的支持。

对有些事情，包括诺沃提尼的下台，我们在布拉格感到惊讶，而在莫斯科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当然，历史会嘲弄人，幕后的导演后来越来越感到出乎意料，最后竟惊讶不已。杜布切克的第一大罪状是，他接二连三地干了出乎莫斯科预料的事：未经事先在克里姆林宫商量就任命了新的书记和部长！后来，勃列日涅夫也毫不掩饰地指责过他（关于这个问题，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谈）。勃列日涅夫感到这是"反革命"威胁的第一个标志。

且不论杜布切克领导班子中的"保守派"如何如何，一九六八年一月政治改革的开始就不是那么壮观的。十二月和一月举行的捷共中央全会的发言记录大约有一千五百页，但是涉及有系统的改革思想的发言大约只占五十页。唯一真正纲领性的发言是希克的讲话，他谈到了未来改革的目标和社会、经济、政治条件。有些发言提出了一些个别的、非常坦率的、在当时条件下很大胆的批判性的思想，但是没有人就政策的研究、范围和意义提出一个较完整的设想，以便在诺沃提尼不当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之后可以付诸实施。那些未来的激进派们在这次会上也没有摆出一副准备用多党民主制来代替极权制的政治家的样子。

当诺沃提尼最终放弃自己的职务时，中央全会仅发表了一项公报，公报中没有任何提法表明今后将进行根本的改革。这自然不符合中央全会的实际情况，但却说明，中央委员会在当时的情况下连自己也没有搞清楚，到底为什么要推翻诺沃提尼。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诺沃提尼的看法倒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他在捷共中央全会的发言中，把自己的离职同深远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不过他警告说，这些变革对“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危险的。大家知道，诺沃提尼在去职之后曾对自己的亲信们说过：“你们别担心，这很好。杜布切克是个意志薄弱的人，他不能胜任自己的职务。中央书记们也都是些窝囊废。最后还要靠咱们！”他预言的最后一部分未能兑现，但总的来说，他的预言并不像当时不少幻想家和“激进派”所认为的那样可笑。

杜布切克虽然在当选第一书记的前后都曾声称，应当用民主的方法治国，但这与其说是比较完整的和合理的政治纲领，不如说是他个人心愿的表白。他谈到上个世纪民族复兴中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关系，谈到聂姆曹娃和施图尔①，但却不谈实行联邦制。他谈到，他在斯洛伐克当第一书记的时候②，从不发号施令，而是说服同志们，使他们理解事情的是非。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历史学家戈西奥罗夫斯基曾发表文章说，国家成立联邦是符合斯洛伐克利益的，而诺沃提尼不能容忍，就决定要开除他出党；杜布切克知道戈西奥罗夫斯基是个坏同志和坏人（我想他的看法完全正确），他不反对开除，但是戈西奥罗夫斯基工作单位的党组织不理

---

① 博·聂姆曹娃，捷十九世纪民族复兴时期著名女作家，她有关斯洛伐克的作品及她个人同斯洛伐克知识界的联系，促进了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间的相互了解。

卢·施图尔，十九世纪中叶斯洛伐克民族运动领导人，政治家，语言学家，诗人。——译者

② 杜布切克曾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八年任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译者

解这一点；杜布切克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说服该组织，直到它理解为止。在同志们没有理解应当这样做以前，他没有简单地要求执行指示。杜布切克在捷共中央经常谈到这点，并保证说，他将用这种方法来领导全党。毫无疑问，他真是这样想的，但是由此很难判断，他究竟是怎样看待担任新职以后将要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

开始的时候，杜布切克根本不愿意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全党的第一书记。其他人说服他，说他应当接受这个职务，他们将"帮助"他。他不愿意的主要理由是，他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也没有能力来担任这样高的职务。他当时是中央委员会中能够得到必要的多数的唯一候选人。后来多数决定由他出任。在杜布切克当选为全国最有权力的人物之后，他立即就回布拉迪斯拉发去了。那里有一场冰球赛，他显然不愿错过机会。但别的事情是可以放一放的，因为一切都需要审慎地、冷静地用民主方式逐步解决。而人民也感到高兴，因为新的最有权力的人同他们一起看冰球赛！

我谈这些的目的不是要把杜布切克描绘成政治上幼稚和头脑简单的人。对杜布切克的这种看法，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相当普遍的。但是我认为，这不符合实际。对此，我以后还要谈到。我只想强调一点，就是杜布切克在他当选后最初的日子里根本没有想到，由于他的上台，在社会上和在捷共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就连诺沃提尼时代党务工作的老手，中央书记亨德利赫和考茨基的心里也很宁静，很满意。一九六八年二月的一天，考茨基对我说："你看，诺沃提尼在一月全会上预言，如果我们把他搞下台，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可现在有什么事？什么事也没有！"我曾努力纠正他的观点，我谈到社会上和党内一种意义深远的动向已有明显征兆，不仅在报刊上，就是在与世隔绝的书记处里也可以看得出这种动向。可是考茨基不相信，他说我把事情夸大了。大约过了两个月，他自己也不得不辞职了。

二月中旬一天的深夜，我在捷共中央书记处的走廊上碰到了亨德利赫，他显得很满意的样子。他对我说："我刚才同戈尔德斯图克尔[①]谈好了，我批准《文学报》复刊了！"这是作家协会出的一种周刊，一九六七年被诺沃提尼停刊了。《文学报》（后来叫《文学通讯》，一九六八年八月以后叫《通讯》）是诺沃提尼时期批判性的刊物的代表，批准它出版实际上就意味着取消新闻检查。我尽力说服亨德利赫，指出，在捷共行动纲领公布以前采取这样的步骤意味着报刊的观点将更加激进，将来就很难用行动纲领来约束它们了。"不会的"，亨德利赫肯定地说。"我同戈尔德斯图克尔什么都谈好了，他们不会写反对我们的东西的！"大约一个月之后，亨德利赫被解除了职务，原因之一是，报刊上对他的公开批评是如此之强烈，以致再不采取措施就会毁坏杜布切克领导的声誉。

除了亨德利赫从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调走以外，诺沃提尼时期党的领导班子——捷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的人员，在一九六八年初以前一直没有动。党的主席团只补充了几名新的成员，他们（除什帕切克之外）并没有给主席团的组成带来什么大的政治上的变化。从一月到军事干涉的八月这八个月中，有整整三个月的时间捷共领导没有就新政策发表过比较明确的主张，而是相反，不仅在实施改革上，而且在宣布改革纲领的问题上犹豫、观望。

我认为出现这种状况是有其原因的。整整三个月，党的领导层主要是忙于解决职位分配问题，因此，无法开始实施有纲领的、经过周密考虑的新的改革政策。如果我的这种看法错了，我倒会高兴，可是我耽心，我的看法还是符合实际的。然而社会是不会等待人们慢慢地去解决书记和部长职位的纠纷的，多年来被压抑着的矛盾逐渐公开暴露出来了。党中央总是提不出民主改革的方

---

① 戈尔德斯图克尔是当时的捷作家协会主席。——译者

案，方案就必然在别的地方产生：在报刊上，广播和电视中，在各种会议和集会上。

在职位之争没有解决之前，其它的事几乎都谈不上。有些人怕丢官，因为他们明摆着是诺沃提尼提上去的，而且在诺沃提尼统治时期干了不少该受谴责的事。这些人认为，他们现在出来赞成民主化，就能保住自己的位子。因此，亨德利赫取消了新闻检查。那些想当官的人出来赞成民主化，其目的是希望得到官职。现在同在诺沃提尼时期一样，向上爬仍然需要随声附和，不过要加上民主的倾向。当然我不是说，倾向于民主改革的捷共领导人都是受野心的支使，我对捷共内部共产主义改革潮流发展的阐述也否定了这点。但是我想指出，在诺沃提尼下台后的头几个月，在领导人中间民主"激进主义"蔚然成风，因而那些真正为民主改革而奋斗的人和那些首先是为自己的政治野心而奋斗的人之间的差别一度区分不出来了。

普遍的不稳定情绪笼罩着领导层，不论是在党的主席团，还是在中央委员会，至少有一半人感到自己的位子可能保不住。在政府和议会也是一样。在低一级的州、县政权机构，也有类似的情况。政治机关的各级工作人员也感到心神不定，神经紧张，不知所措。因为多年来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搞指挥和命令，搞行政决定和监督。现在他们正确地感到了，那些办法是没有前途的，因此，他们大部分人的积极性都发挥不出来了。

这种"上面的"不稳定性自然变成了"自下而上"的批评的良好土壤。心神不定的政权机关不敢用惯常的方法来压制批评和叛逆分子，因为尽管普遍地感到无所适从，但大家都清楚地看到，诺沃提尼被解除党的最高职务是党内批评和反对潮流的胜利。但是，这种不稳定的形势对于政治改革显然是不利的。而且这种状况拖得越久，两种对政治改革不利的因素就会愈加强烈地起作用：在改

革的纲领性方案形成以前，来自下面的对政治制度的压力已经迅速加强；政权机关由于上述压力而产生的恐惧会使它们起来反对改革，而不是为改革服务。

从一九六八年二月起，我个人认为尽速结束这一过渡状态是顺利进行改革的主要条件。在内部和公开的讲话中，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争取尽早公布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捷共《行动纲领》，争取很快自下而上地完成各级政治机构的人员调整。我至今认为，当时是有条件这样做的。

捷共行动纲领的文本在二月底就搞好了，这个文本与四月份公布的几乎一样。我曾建议在三月初予以批准和公布。在三月份将要召开例行的捷共县一级的党代会，选举新的县委会。接着召开州一级的党代会。根据我的看法，在上述党代会上，应该按新的政治路线的要求选举干部，为此就需要让人们事先了解阐明这一新路线的行动纲领。同时，上述党代会还可以选举参加党的特别代表大会的代表，当然这首先要由捷共中央作出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决定。

如果在三月初作出决定的话，捷共代表大会是可以在五月召开并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原来计划在五月份进行各级人民委员会的选举并在夏天进行议会选举，这两者可以结合起来都放在六月份举行。这样，民选的国家机构——从乡人民委员会直至议会的一整套干部的变动，在夏天就可以完成了。

上述作法我认为是可行的。它可以把非常强烈和带爆炸性的批评和不满的第一次冲击波同整个党和国家干部的正常的、民主的变动结合起来。这不仅不会限制，而且还会支持那种对一些个人以至整个体制的有针对性的、尖锐的和原则性的批评，而且可以使这种批评马上见到实际成效，即在党内和国家机构内，不再选举那些批评矛头所向的人，这些人都是极权专制的支持者。在这种

气氛下新选出的党和国家机构，就会取得必要的权威，有利于在选举后贯彻改革的全面方案，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地反对这样一些极端的倾向：它们不主张逐步进行整个体制的民主改革，而是要求迅速破坏这个制度的某些环节，不管其是否符合改革的要求。

我认为上述作法也是很有益的。因为从改革的一个主要问题来看，采取这种做法可以避免在改革的第一阶段就把建立共产党以外的反对党的问题作为迫切的政治要求提出来。选举进行得很迅速，以致使那样的要求无法实现。而到下次选举的时候，已经有可能制定比较完整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从国际的因素，即莫斯科对我国内政可能进行的干预来看，在党和国家机构中迅速解决人员的正常变动，就会使改革政策取得主动权。根据党章和国家法律调换那些受莫斯科控制的斯大林主义分子的工作，可以在莫斯科组成有效的反击之前就已经完成。即使有些情况会提前出现，例如由于来自下面的不断的压力（主要是通过报刊表现出来），极权制政治形势的发展就像火山爆发，从而使克里姆林宫受到刺激而几乎失去理智，但这种情况在五月份还不致于引起军事干涉。在党代表大会以后，莫斯科就完全不再有希望把部分党的领导人组成“工农革命政府”，又让拥有合法地位的“部分领导人”“邀请盟军保卫社会主义”了。

在当时认为采取这种政治步骤是可行的人，远不止我一个。许多党组织要求尽速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有两个或三个州委员会甚至将这一要求正式提到中央委员会。关于推迟进行国家机构的选举的方案也远不是作为正确的方案而得到一致同意的。但尽管如此，上述观点未能占上风。

我想，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有三种不同的、完全矛盾着的政治力量联合了起来进行反抗。

反对我所认为的正确做法的人，首先是主张对政治体制进行

激进的彻底民主改革的人。由于突然出现了可以在公开的集会上，在报刊上，在广播和电视上自由地、不受检查地发表自己的民主观点和激进的政治方案的机会，这些人简直着了迷。人们感兴趣地、经常是热情地听取他们的见解，自然也向他们报以掌声。党内和党外主张进行彻底的民主改革的人以为，过渡时期拖得越久，就可以争得并为将来确保更多的彻底的民主改革。反之，他们认为迅速实现党政机构的稳定则是威胁实现彻底民主化的步骤。因为还有太多的保守派以及"中间派"仍在掌权，而这些人将阻碍改革。结果会像在哥穆尔卡时期的波兰那样，在经过巨大的热情和民主的快慰之后，老的极权制又悄悄从后门回来。因此，要不断地、尽可能长久地从下面施加压力，以摧毁这一制度，并把这一制度的支持者彻底清除出去，不让他们参加未来的政治。

那些预感自己的事业快要完结了的人完全从不同的角度来反对迅速更换党政机构的人员，他们是斯大林主义者，真正的保守派，莫斯科的代理人，野心家，等等，这些人由于过去的狂热而臭名昭著。他们在局势不稳定的延缓中看到了自己最后的一点稳定，或者至少是希望。他们希望，形势的发展将达到一个危机点，政权机构由于自卫的本能而起来反对改革，那时，他们的机会就来到了。但在一九六八年春天，也许连最大胆的人也不曾设想，苏联军队可能来帮忙。他们至多只不过指望莫斯科施加政治压力，指望杜布切克在危机之中将不得不依靠他们。

第三股不赞成尽速调换干部的巨大的政治力量是莫斯科。在那里，显然在如何对待捷克斯洛伐克形势的问题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在下一章我将较详细地谈这个问题。但对克里姆林宫各派政治力量来说，重要的是，他们的影响不能比诺沃提尼时代弱，而且还要加强。在他们不能"牢固控制"局势的情况下，象召开党的特别代表大会并选举中央委员会这样的措施，莫斯科是无论如何

也不会欢迎的。最好是等一等，首先加强苏联在捷的地位，然后在事先能确定谁当第一把手，谁当第二把手的情况下，再决定召开代表大会。

在这三种互相矛盾的力量的联盟面前，我的可怜的“中间立场”自然是不能取胜的。从二月到四月，形势的实际发展也不是我所期望的那样。而这头两个月却预示了以后几个月将发生的许多带根本意义的事件和发展趋势。

如果认为杜布切克对待这一切，就像是一个圣徒或天真的民主主义者那样，容易受到来自左右两面老奸巨滑之徒的欺骗，那么这种看法是很幼稚的。在一九六三年，并不是天使们把杜布切克抬到党的主席团上去的，他是经过了在党内机关十四年的工作而升上去的。认为他不知道主席团是个什么样的机构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那是政治上幼稚的看法。他很知道这个机构的奥妙。他也很了解布拉格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的实际情况。

我在下面将谈到的观点可能使人感到意外并引起反对的意见。据我看，杜布切克对一九六八年二月到四月间的形势发展采取的态度，不是由于他认为有必要在社会上采取迅速和激进的民主措施，而是他权衡了政权机构内部的各种力量状况和莫斯科的态度的结果。杜布切克在一九六八年二月和三月曾听任激进民主派的自由发展的批评。他对这种批评的实际力量和政治后果，当时并没有正确的认识，而且也没有往深处想。他只是想利用这一批评来为自己一定的目的服务，而他的目的同那些提出批评的个人和社会力量的目的则是不同的。

当杜布切克接受了党的第一书记职务的时候，他虽然象征性地同诺沃提尼拥抱了，但是他自然明白，只要诺沃提尼仍然当总统和政治局委员，他就不可能自由地贯彻自己的政策，而且自己的地位也得不到保证。他知道、并且很了解权力机构内部各种小帮派

和不成形的集团的意义。他知道，诺沃提尼不是单个的人，而是属于一定的、权力地位很稳固的帮派。从他的政治的和个人的利益出发，他一定要把这个帮派排除出政权之外。

用简单的行政手段和强迫命令来贯彻自己的意图，这在过去也不是杜布切克所愿意做的。他确实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说服同志们”明了实行他所提出的措施的必要性。这就是说，要创造一种局面，证明他的意图是必要的，是客观上不可避免的。他正是想用这种方式来最后除掉诺沃提尼和他在政权机构当中的心腹。有一股批评的浪潮越来越明显地提出，诺沃提尼是否还能当国家元首的问题，这股浪潮为他帮了忙。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杜布切克很可能没有违背勃列日涅夫的意愿，但也并不是同他事先有所约定。

杜布切克自己没有搞过任何反诺沃提尼的运动。他在政治局同他一起开会，他甚至还经常表示，诺沃提尼同志还是总统，用民主的方法解决矛盾就应该是这样的，等等。但是在庆祝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二十周年的大会上，他没有让诺沃提尼去讲话。在对诺沃提尼的公开批评日益高涨的时候，他甚至亲自阻止他发表电视讲话。这些都不是政治上幼稚的举动，不是笃信无节制的民主的思想，而更多的是深思熟虑地推动一种局面的出现，使得诺沃提尼不得不自己提出引退。三月底，这样的局面确实出现了。

在他自己创造的、帮助他最终除掉了诺沃提尼的局面之外，还有些什么东西呢？这一点杜布切克并没有很好地意识到。迫于公开批评（首先是宣传工具发表的）的压力，还有另一些领导人辞职：内务部长库德尔纳，总检察长巴尔杜什卡，工会主席帕斯蒂日克等。具体地来讲，这些都符合杜布切克本人的意图，因为这些人都是诺沃提尼的心腹。但是杜布切克却没有料到，与此同时在实际上发生了更重要的事：在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够强行推动变革的力量。这种力量既不是党和国家机构，也不是权力机构内部

的民主化过程，这种力量是借助于新闻和言论自由而施加的舆论压力。这是一种议会之外的反对派，就是在议会作为民主机关在起作用时，它也照样可以发挥作用。

后来，在“布拉格之春”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力量加强并扩大了，在许多情况下已不再为杜布切克的意图服务，甚且在他所不愿意看到的问题上施加了压力。对这一切，杜布切克感到既惊讶，又惋惜。某些新闻记者可以部分地证明这一点。在五、六月份，杜布切克把他们召了去，尽力说服他们。他指出，报刊不应破坏他的意图，而应当更守纪律一些。在这些会议上，杜布切克是那样诚心诚意地进行说服，有时甚至都热泪盈眶了。但结果却是徒然。我还记得几次同他的个别谈话，这些谈话多少都接触到了这个问题。杜布切克总是真心惋惜地说：“他们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干？要是在诺沃提尼时期，他们是不敢的。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是在损害我？”

在进行这种谈话时，我曾好几次努力向他说明依我看问题在哪里。我曾希望，在这种具体的情况下，我能激起他对整个政治机构发展的基本问题的兴趣，使他最终能开始严肃地关心更广泛的问题——体制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关心个人的和权力的问题。但我未能达到目的。杜布切克听了一会儿，但看得出来，他还在想着记者们的忘恩负义。对这位听众来说，我的讲解显得太抽象了，他的思维肯定不是考虑体制的思维，他只是作为一个家长（也像勃列日涅夫那样），因受到政治问题的困扰而激动。当那些难以说服的“记者同志们”给他造成的委曲感过去以后，他的思想就完全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在我的话只说了一半的时候，他会突然提出其它什么不相干的具体问题。

关于杜布切克在政治上的行为普遍给人以幼稚印象的问题，我的理解是不同的。我在这里看到了杜布切克成长的特殊环境：他在苏联（中亚）度过的儿童和青年时期，在一党制的党的机构内

取得的政治经验，在斯洛伐克的政治纷争中取得的生活经验。这种特殊的环境造成了一个聪明、敏捷、但总的来说是很单纯的人，一个很正直的人，喜欢接触群众，不摆架子，并信仰伟大的理想。这一切因素塑造了杜布切克这个人物，并且规定了他在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时期所起的特殊的政治作用。

有人认为，对于民主理想的信仰指挥了杜布切克的行为，以致使他相信，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和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需要根据这些理想来行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在政治上是幼稚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大概更为符合实际的看法是，杜布切克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社会生活中的以及统治集团生活中的政治民主。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他的思想不是抽象的思维，也不善于从体制上思考，因此无法把他所主张的民主原则贯彻到实践中去。

马列主义的理想和原则对于杜布切克来说，是伟大的理想，是正确的，他信奉这些理想，他也认为和他一样的人都是好同志和正直的人。要是这种天真劲儿表现在政治上，那就是幼稚了。但是杜布切克清楚，这些“纯洁的理想”在实际的政治和权力的世界中，被罩上了一层另外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实际上起决定作用并且关系着一个共产主义政治家的成败。在自己的生活中和在长期的党的工作中，他对这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根本不幼稚。由于他有的主要是在斯洛伐克工作的实际经验，总的来说，他过高地估计了政治中的个人关系。此外，在斯洛伐克广大群众对领导层的压力总是要小一些，在那里，作为政治民主基础的公民的社会活动，在战前就不如捷克地区发达。

当杜布切克开始担任捷共的最高领导职务时，他一定想到了要进行政治上的民主改革，要改变迄今的统治方法。但是他心目中的关键性的措施仍然是过去的老一套。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党的实践家，他知道，主要的是要从政权中清除与他为敌的派别，建立

和加强自己的派别。他也知道，还需要在莫斯科稳住后方。上述两件事对他来说，比纲领性声明，比关于改革方案的研究，以及党的代表大会和选举都重要得多。只有新的第一书记在国内的机构中和在莫斯科保住自己的地位以后，才能谈得上别的事。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也差不多是一样的想法，至少大部分政治局委员是这样。在那个时候(到三月底)，最理解改革进程的，只有什帕切克一个人。

结果却产生了历史的怪现象：在一九六八年初春，正是由于杜布切克基本上还是使用一党垄断统治权时所惯用的那种领导方法，捷克斯洛伐克的新闻自由和以其为基础的舆论压力才得以迅猛发展，其步伐甚至迅速得与其它方面不相称了。

那么，从一九六八年一月到四月，杜布切克究竟做了些什么事呢？他在领导层里建立了自己的小集团，实际上掌握了决定性的权力。这个小集团由三人组成：杜布切克，切尔尼克和科尔德。他们三人在六十年代一起做党的工作时就很熟悉，而且互相信任。他们共同除掉了政治局里他们不信任的人。原来诺沃提尼当权时期的党的主席团委员，他们只留下三个人：列纳尔特，卡佩克和马·瓦楚利克。而这三个人都只是主席团候补委员(候补委员在政治局会议上无表决权)。留任的布拉格市委第一书记马·瓦楚利克，到五月的时候就被新的书记西蒙(现三人领导核心过去的同事，长期与科尔德在捷共中央机关共事)所代替。在党的新领导成员当中，还有五个同党的三人领导核心(多半是同杜布切克)有关系的人：比拉克(杜布切克个人的朋友，杜布切克安排比拉克代替他自己出任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皮勒尔(长期在高级经济部门任职，主要同切尔尼克和科尔德熟识)，什维斯特卡(《红色权利报》主编，曾背着诺沃提尼帮助过杜布切克)，巴尔比雷克和里戈(都是斯洛伐克的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的干部，杜布切克把他

们算作“自己人”)。

这样，党的主席团只有三个人——什帕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克里格尔，他们进入捷共最高领导机构并非由于同新的三人领导核心有个人关系。什帕切克是捷共布尔诺州组织早在一月份就推荐他担任这个职务的，他原来是该州的州委第一书记。斯姆尔科夫斯基由于一月后在公开场合进行了大量的积极活动而变得特别受欢迎，他实际上已成为很可能当选的总统的候选人之一。结果他担任了议长和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这是作为他未能进入总统府的一种补偿。克里格尔进入主席团是中央委员会内各派力量之间搞交易的结果。他在“布拉格之春”时期一直不是杜布切克个人的朋友。他在布拉格党组织内得到的支持比在中央机构中要多，在同诺沃提尼发生冲突时，他同希克，沃兹隆，普尔赫利克等人结成了联盟，而后三人均未被三人领导核心“选中”参与政权。希克是当时对经济和社会改革问题具有最完整的设想的人，但切尔尼克、科尔德和杜布切克都坚决反对他进入主席团。据我看，前两个人是出于个人的考虑，是故意贬低别人。

除了主席团之外，书记处自然也属于新的领导层。书记处的成员，除了主席团的三个人——杜布切克，科尔德和列纳尔特之外，还有六个新人：英德拉(关于他掌权的道路，我已经谈过了。此外，长期以来，他的工作职务也与切尔尼克和科尔德相接近)，萨多夫斯基(杜布切克的朋友)，沃列尼克(俄斯特拉发州党委书记，该地是党的力量最强的地区之一，切尔尼克和科尔德都是这一地区的人)，齐萨士，斯拉维克和我。

齐萨士成名的道路是曲折的，也是很有特色的。五十年代他在捷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里工作，他是一个比较有学问的斯大林主义者(他读过法国中学，战前上过法国第戎的大学)。他还为斯兰斯基全集写了赞扬性的书评，可惜是在斯兰斯基下台和被

捕前不久，因此，时代把他抛到了党的低级机关。一九五六年以后，他权力逐步上升，直至当了党的理论刊物《新思想》的主编。在诺沃提尼时期，他编了一个小册子（题为《我们与时代一起成长》），用比一般党刊有文采的笔调描绘了捷克斯洛伐克和捷共的发展，把这个发展说成是一个不断取得成就的过程，而诺沃提尼的领导对此有着根本性的功劳。于是，他赢得了诺沃提尼的好感，还陪他到国外去访问过。一九六三年，诺沃提尼把他提升为捷共中央书记。由于当时的有利的环境，齐萨士执行了比较自由的政策。布拉格改革派的知识分子党员们把他在捷共中央工作的几个月称作“宽宏大量的夏天”。这么一来，诺沃提尼又讨厌他了，把他调任教育部长。

由于他的女儿参加了一九六五年大学生化装游行时搞的“反党示威”，他丢了教育部长的职务，当了驻罗马尼亚大使，但是他却因此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这一点在一九六八年春天帮了他的忙。学生们在大街上呼喊并涂写着“要求齐萨士当总统”①的口号，这样，在公众的心目中他也是一名总统候选人。但领导层中对此根本没有考虑过。不过，上述原因，再加上他在部分知识分子当中很受欢迎，对他晋升为捷共中央书记一职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齐萨士像当年部分党的干部那样，是共产主义信仰和野心混合在一起的代表。当他被解除部长职务，被派到罗马尼亚去的时候，我曾在捷共中央大楼前偶然碰到他，他刚从诺沃提尼那儿出来。他面色苍白，情绪激动和沮丧。“太可怕了”，他对我说，“我刚到诺沃提尼那儿去了。我把心都给他端出来了，可是他却往上面踢了一脚。”我对他说，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教训：不要把心端给那个不值得向他交心的人。齐萨士瞪眼看着我，好象我的冷酷无情已经

① 学生们的这一口号，自然也包含着他们的偏激情绪。

太过分了，然后他走了。在一九六八年十月，那时已经很清楚，他和我的官都当不长了，我同他谈到了这个问题。“是呀，”齐萨士说，“可我干什么去呢？我反正不能干一个月拿不到一万克朗的差事！”我看着他，觉得他的人格已经降到一般水平以下了，我们就此结束了谈话。

斯拉维克进入捷共中央书记处，也不仅仅是由于他同三人领导核心的关系好。虽然他同杜布切克个人的关系不错，但他的上升却是多种原因促成的。他和斯姆尔科夫斯基差不多，在诺沃提尼下台后，他作为中央委员在党内推动了批评浪潮，以支持改革。他长期从事党的工作。先在《红色权利报》，后在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编辑部工作，五十年代末期是捷共中央宣传部长，还当过一个短时期的党中央书记。以后又担任过国际共运的机关报《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副总编辑，从一九六六年起，任捷共中央所属政治科学研究所所长，该所也曾同我领导的研究小组合作。

斯拉维克在政治机关从事各种工作时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也曾几经折腾。根据我的看法，他在六十年代（疑为五十年代之误。——译者）末已经是改革的真诚的支持者了。他当然也曾争取过要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担任更高的职务，但他不是一个野心家，从人格来看，这是个谦逊的人，是个老实人。因此，政治机构内部的各种派别都信任他。也许正是由于他同持各种观点的人都有联系，所以被选为杜布切克的中央书记。在一九六八年暴风骤雨般的发展过程中，他还是许多在幕后进行的特别是在中央和布拉格市组织之间发生的冲突、争吵和谈判中的联系人和调停人。不论是杜布切克还是克里格尔，不论是激进派的党员知识分子还是党的机关里的许多人，都同他关系很密切。

我在一九六八年四月成为捷共中央书记处成员。这对我自己

和其他人来说都很意外。因为在这之前我根本不是中央委员，过去我只是做些后台工作。担任捷共中央法制委员会的秘书，不一定要求是中央委员；而担任捷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则在一般的情况下应是中央委员。至于人们在背地里议论我算作哪一派的问题，那我应算为在一九六八年四月急剧衰落的考茨基和亨德利赫那一派（什维斯特卡除外，他上升了）。

我当时同杜布切克根本没有什么个人交往，他也不了解我。对切尔尼克，我只是一般认识。同科尔德的关系也许比较近一些，但也从来不是个人之间的合作和友谊的关系。

确实，我是捷共行动纲领的起草人之一，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主要的起草人。这加强了我在后台人物中的地位，但是我并没有想到会得到什么正式的职务。三月底，在组织新的党政领导班子的时候，曾提出让我担任总检察长，我拒绝了。我想继续从事基本的理论政策研究工作。从这个任命中我感觉到新的当权者会把我放在什么样的地位，因而我更未期待会得到任何党的高级职务。

我同起草行动纲领的“工作小组”其他成员一起，应邀参加了捷共中央四月会议，会上要最后通过行动纲领。这在诺沃提尼时期就是对后台工作人员的一种“荣誉报酬”的方式。这一次，我认为在对捷共行动纲领的草案作政治上的解释时，还需要说明一些我认为是重要的基本问题。为此我要求在会上发言，结果我被安排在倒数第二个发言。恰巧这个安排很重要，因为在我之后最后发言的人是诺沃提尼。我和诺沃提尼的发言无意中形成了明显的对照，从而更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讲话结束时，我还批评了杜布切克为首的新领导缺乏主动精神，是被形势拖着走的，而不是从政治上进行领导和指引社会上的运动。我还明确指出，如果“复兴过程”发展到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那个样子的话，改革也将受到威

胁。什维斯特卡虽然在《红色权利报》上把这句话删掉了，但是它却在中央委员会引起了注意。而且，中央委员会中保守派、斯大林主义分子是喜欢听到这样的话的。

在讨论行动纲领草案的过程中，现在的胡萨克的党中央书记、当时受考茨基领导的、行将去职的党中央部长哈夫林提议，选我为党中央书记。休息的时候杜布切克找了我，他建议我担任党中央书记，和齐萨士一起主管意识形态部门。我说，我还要考虑一下，但是我不愿意主管意识形态部门的工作。我想继续从事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和实施工作，因此，我想做能对国家机构、社会团体、民族阵线等组织的活动施加影响的工作，而不是做纯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但在那时，我的想法对杜布切克来说是不太合适的，因为他已经把那个位子留给英德拉了。我们商量的结果是，下一次休息时我把自己最后的意见告诉他。

我在考虑整个情况和我本人情况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看法：从我的角度看，最好还是继续在科学院对政治改革理论进行总的研究，同时又具有捷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及由此头衔而来的法律委员会主席的官方身份。我也曾经想过，过去为了研究经济改革问题，出版了一些党的经济问题杂志，现在也应当开始出版一种党的政治问题杂志。当时，政治改革问题还没有自己的刊物，只能反映在报刊和文化政治周刊上。我愿意主办这样的杂志。杜布切克同意。因此，我在一九六八年四月五日被选为捷共中央书记处成员，但没有具体分工主管哪一方面。

在杜布切克主持下的捷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工作了两个月之后，五月底，我自己提出要担任书记职务。因为我看到，在会上讲讲话对领导毫无影响，权力地位仍然是重要的。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我被选为书记。

在同一时间，另一个新人——埃尔班也当上了捷共中央书记

处成员。他被拉入这一机构，是因为他在一九四八年以前当过社会民主党的干部，他担任新的职务除了别的以外是要表明，社会民主党人在捷共内部还是有用武之地的，没有必要恢复他们的党。当然，埃尔班的升迁对那些要恢复这个党的人并不能起作用，也没有起作用。埃尔班同时也当上了民族阵线书记，但是他在那里实际上是反对民族阵线主席克里格尔的，因此后来赢得了宠幸，加上他在其他方面为“正常化”政策卖力效劳，所以至今保持住捷克民族议会主席这一并不重要、然而工资颇高的职位。

捷共新的、以杜布切克为首的领导班子就这样产生了，这是权力机构内部幕后冲突和妥协的产物，部分地也是党内和社会上日益增强的民主运动的压力的产物。从统治者各派之间力量消长的曲线来看，这个领导班子也算是当时那种时刻的相应体现。但从它在不久的将来所面临的严重政治问题看，它只是各种极不相同的政治力量的一个混合体，因此事先就注定了它将主要是搞内讧。这就证明，当权的三驾马车，杜布切克、切尔尼克和科尔德，未能对未来作出正确的估计，低估了局势的严重性。

当权人物在拼凑出党的新领导班子的同时，也确定了新总统和新政府的人选。当时党的领导相当一致地把总统职务理解为与其说是真正具有最高权力的宝座，勿宁说是只具有一般的、道义上政治上意义的职称。当时想寻找一位在广大人民中间和党内都享有威望的人物来担当这一职务。这一职务不应再同党的高级职务结合在一起。捷共领导人本能地希望能够找到一位“超党派”的总统，使人们看到他就会联想起战前第一共和国时的总统，但又不希望这位总统根本不是个共产党人。“如果能找到一位教授就好了”——科尔德这半句话说得颇为中肯。“如果尼耶德利① 还活着

① 兹·尼耶德利(1878—1962)，捷著名学者，对历史、文学及音乐理论等均有很深的造诣。二十年代初即同捷共合作，积极参加革命，曾任捷科学院院长。——译者

就好了”——这半句就不那么中肯了，因为在这点上他看不到马萨里克和尼耶德利之间的差别。由于要找个“教授”，候选人中也出现了科学院院长肖尔姆的名字。最后，所有有发言权的人都同意由卢·斯沃博达任候选人，总的来说没有太大保留。他看来确实在许多方面是个合乎要求的人物。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他被选为总统。当选后，斯沃博达向马萨里克总统墓献了花圈，这在一九四八年以来是见所未见的。

在“布拉格之春”时期，切尔尼克总理的新政府，总的来说比党的领导本身要好。那里比较内行、考虑问题比较合乎情理的人多些，其中许多人也更多地从方针上来理解改革工作的开展。这是因为在诺沃提尼时就已经有了一些基础。当时的政府总理列纳尔特本人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和诺沃提尼不同，物色干部时着重其专业能力。列纳尔特年青时受过拔佳鞋厂的教育，这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出来。一九六七年二月，我给他起草关于人民委员会问题的报告，有一天晚上我们两个人一起研究报告的文本。当时列纳尔特突然对我说：“你是个聪明人，你老在‘窝棚’① 干什么？跟着政府干吧。那里光瞎扯，这里是实干。”

这种话在当时对他来说也是危险的。但是，列纳尔特不是仅仅说些批评的话，他在政府及其机构中确实延用了一批有专业知识有能力的人，其中包括经济部门的部长，如弗拉萨克和苏哈尔达②。六十年代的经济改革虽是党的路线规定的，列纳尔特政府则为其实现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因此，切尔尼克上台时并非白手起家。此外，某些有才能的人，首先是希克和什特劳加尔，还有胡萨克等人，实际上是由于未

---

① “窝棚”，在机关内部传统地指党中央。

② 在一九六八年苏军入侵以前，弗拉萨克先任科委主席，后任计委主席；苏哈尔达任财政部长。——译者

能进入党的领导班子，而被“推”给政府的。尽管以后事态的发展表明，胡萨克和什特劳加尔的才能也可以用来反对改革，并根据莫斯科的愿望恢复极权专政，但他们比起比拉克和卡佩克这些“正常化”的支柱、一九六八年杜布切克为首的党的领导的装饰品来说，确实是能力强水平高的人物。某些新部长，如外交部的哈耶克，教育部的卡德列茨，文化部的加卢什卡，都是精通业务的人，同时又是民主改革的久经考验的拥护者。从这项改革的需要看，政府的许多部门在人员方面比党的机构配备得好。

八月二十二日，在苏联干涉之后，杜布切克的党的领导总共有九个成员愿意成立捷奸的“工农革命政府”（“革命法庭”无疑也可能成为它的一个机构，杜布切克同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切尔尼克和其他人一起，应当被送交该法庭），而整个切尔尼克政府只有一位部长（巴甫洛夫斯基）加入这一伙。党的几位最高级干部秘密为苏联的干涉作准备，而政府干部中只有邮电管理局局长霍夫曼和内务部副部长萨尔戈维奇干这种勾当。

巴甫洛夫斯基和萨尔戈维奇都不是切尔尼克任命担任政府职务的。正如我已经说过的，第一位是英德拉塞给他的，第二位是杜布切克亲自塞给他的。切尔尼克政府的内务部长是帕维尔，我曾推荐他担任这一职务。党的主席团三月底拟订新政府名单时，我被叫到捷共中央大楼。在那里，考茨基要我担任总检察长一职，他在这次谈话中也对我说，暂时还没有新的内务部长。几个可能的人选拒不接受这一职务。他具体谈到俄斯特拉发的捷共州委书记沃列尼克。总的来说，我们两个人一致认为，人们在当前情况下不愿意担任内务部长一职，这是不足为奇的。考茨基然后要我提建议，如果我有什么建议的话。我对他说，在我看来，内务部长应当是个了解这一部门情况的人，同时能保证在那里对整个机构进行彻底的清洗，把要对过去多年的违法案件负责的人清除出去，不许

今后从政治上滥用国家保安机关。当然，要找到这样的人是不容易的，不过我还是答应再考虑一下。考茨基回去参加主席团会议，我研究了各种可能性，认为帕维尔可能是这样的人选。

帕维尔战前就加入了共产党，西班牙内战时期当过国际旅的指挥员，战时在流亡英国的捷克斯洛伐克部队中作战，战后任捷共中央安全部部长，后任内务部副部长。他于一九五一年被捕。然而，尽管被施以一切非人的刑讯，他是从未承认任何捏造的指控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因此，在任何蓄意制造的政治案件中他都不曾被利用。在一九四八年二月担任内务部副部长后，帕维尔也搞过冤案。但是，他同时又因此非常了解保安机关及其工作方法和干部，谁也不能指望用什么方法骗他和唬他。就我对他的了解，我相信，他这位蒙受过不白之冤的党员，不仅口头上宣称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得出了结论，而且确实起了深刻的变化。

我叫人又把考茨基从主席团会议上叫出来，向他提了建议。考茨基同意帕维尔，并说将在会上把他提出来。以后对帕维尔当候选人的问题是怎么讨论的，也许别的什么人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或者有谁反对，为什么反对，所有这一切，我都不得而知。帕维尔后来真的当上了内务部长。他个人不仅不从属于杜布切克、切尔尼克和科尔德，而且从莫斯科的观点看来，也没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因为他当时不是苏联间谍网里的人。然而，据我所知，他的工作完全没辜负我们的期望，他恪守法律，并且认真彻底地着手准备清洗保安机关。但他走得如此之远，以至我有时也觉得有些过分。

例如，捷共主席团同苏联政治局八月一日在切尔纳会谈以后，我看到，切尔尼克晚上从切尔纳打电话给帕维尔，要求他叫保安机关没收最近一期《报道员》杂志。该期杂志已在发行网中，早晨将会出现在报亭上。但勃列日涅夫已经知道，在那一期上有一幅漫

画，因此他暴跳如雷，指责这是捷共领导违背了刚许下的“停止论战”的诺言。帕维尔拒不执行切尔尼克的命令，指出政府总理这样做是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切尔尼克在电话的另一头大叫大嚷，而帕维尔却平静地说：“总理同志，这样你就得另找内务部长了。”接着就把电话挂上。

我对他说，在我看来，这是例外的情况，也许他应当满足切尔尼克的要求。“可能是这样，”帕维尔说，“但是可以派一些同志去，不要派警察。我这么做一次，就会有第二次，这样我们就又退回到原处去了。以前，那也是以某种例外的情况开始的，后来就变成正常的做法了。”我想起自己十二年前拒不执行总检察长的非法命令，也记起我落了个什么结果。我把这告诉给帕维尔，并补充说，如果他也象我这样，那就可惜了，因为来日方长，他不应当由于个别事情上的固执让人搞掉。“那没有办法，”帕维尔说，“这样，那就让别人来干吧。”他就是这样不允许没收那期《报道员》杂志的。

帕维尔想要从保安机关清除出去的人，都是些为保证不再发生新的违法案件所必须清洗的人，当然他们也往往就是苏联间谍网里的人。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杜布切克很快就受到莫斯科的压力，要求制止这种轻率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把国家保安局从内务部分出来的建议，而杜布切克曾支持该项建议。后来，党的领导把萨尔戈维奇作为主管国家保安局的内务部副部长强加给帕维尔。萨尔戈维奇是克格勃战时的老特务，这是众所周知的。在主席团讨论他当内务部副部长候选人的问题时，有人明确地提请注意这一点（遗憾的是，我已经不记得是谁）。可是，杜布切克明确地支持萨尔戈维奇，坚持使他的任命得到通过。他的出发点大概是：反正必须有一个苏联特务来担任这一职务，如果能在这些特务中挑一个他个人可以信赖的朋友，这对他来说总要好一些。遗憾的是，他的希望完全落空了。

但是，为什么努力对莫斯科作出让步、本人又很了解苏联情况的杜布切克，从自己当政的最初几周起就遇到来自莫斯科的日益增长的刁难、不信任和反对呢？我想，不能说这仅仅是由于杜布切克政治上的幼稚，他并没有幼稚到幻想莫斯科会赞成民主改革，幻想一切都会毫无困难。杜布切克的确不会这么幻想。相反地，他知道得很清楚，在什么问题上以及为什么他会遇到莫斯科、华沙和柏林的保留态度。

我认为，在对勃列日涅夫的关系上，杜布切克也试图实行他在国内所使用的策略。他想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使克里姆林宫意识到，他的行动是符合捷克斯洛伐克形势的客观需要的，因而克里姆林宫终将被迫同意他的意图，在他身上寻求推行自己政策的保证。在这个意义上，他把广泛的民主运动也看作能够为其意图服务的因素。这一运动虽然将引起莫斯科的担心，但是这种担心同时又将迫使勃列日涅夫承认，杜布切克正是苏联利益的保证，假如采取其他做法，对苏联会更加不利，问题会更难解决。

根据杜布切克个人最深切的信念，他根本不会想到同莫斯科分裂。他会把这看作是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的威胁。从公开宣布的外交原则到具体的干部问题，他都清楚地向莫斯科表明，在原则问题上是可以信赖他的。然而正因为如此，他认为，他已赢得较为广阔的回旋余地，以便在他认为需要的地方，执行他自己的、比较独立的政策。因此，他才敢于采取某些独立的纲领性措施和干部措施，在报告中使用同勃列日涅夫不一样的或勃列日涅夫根本不使用的提法，任命未经莫斯科事先批准的人，等等。可是，当他觉察到要发生较严重的冲突时，他就立即根据莫斯科的暗示或明白表示的希望来采取步骤，企图以此来“说服同志们”。

为什么他这样做没有成功，下一章再详细谈。

*　　*　　*

但是，在权力机构按照各派势力的隐蔽的力量曲线来分配席位的时候，在权力机构之外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已经提到过的、最终也影响了统治者之间某些人事变动的那种压力的主旨究竟是什么呢？在这以前我曾经谈到过，对权力机构施加压力的方式，多数是对捷共行动纲领提出的逐步民主化计划不利的，从统治者的观点看来是妨碍改革的进展的。民主压力的强大浪潮所提出的某些政治口号和具体要求也是如此，这些口号和要求旨在同迄今为止居于统治地位的捷共进行对抗，如要求重建社会民主党，或要求把“非党人士俱乐部”变为独立于民族阵线之外的政党。然而，在“布拉格之春”时期这类倾向的意义，过去和现在都被政治上两种极端分子估计得太高和太大了。实际上，一九六八年“来自下面”的民主压力的伟大浪潮的基本内容，并不是由这些倾向来确定的。

人们首先关心的不是民主的政治形式和机构，而是人民和政权之间的关系的实质。他们最初曾胆怯地希望，在“布拉格之春”期间则由希望进而相信，政权和政府也许真的有可能成为他们的政权和政府，政权和政府的行动有可能真的取决于人们自己需要什么，想什么，说什么以及如何工作。说实在的，改革派政治家的构想中原来并未当作决定性因素的某些东西，后来却逐步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进入政治生活了。这就是人民对人道主义和民主理想的信仰，以及对改革派共产党人能实现这些理想的希望。

在最初的时候，在一九六八年一月搞掉诺沃提尼以后，人们只是好奇地等待着，看“他们”下一步大概要干什么。很少人相信，这对他个人会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更不会相信，在他的生活中会出现转折，因为“上面”又在斗来斗去。对党的领导变动的反应在党员中也许比较强烈些，但是，就是他们，工厂和城市的普通党员，对它的意义也很不清楚。人民在一月份的想法，同捷共中央书记考茨基一直保持到三月份的那种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的信念是一

样的。

可是，几周之后形势开始非常迅速地变化。人们在报刊上、广播和电视里听到思想自由得令人难于置信的讲话。起初，他们只是想听听究竟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新闻检查部门未进行干预，捷共中央未开会处分大胆的记者，也没有强调为了“人民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不允许”说什么。相反地，杜布切克在农业合作社代表大会上不仅谈肥料、生产率、玉米和牲畜头数，而且也谈“人的自我发挥”。不仅对服务性企业及其经理给以批评，而且对捷共、工会、公安机关和法院的工作方法也进行了指名道姓的、公开的批评，结果是捷共中央和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内务部长和总检察长被撤职。在党的公开会议上，人们越来越多地要求发言，这不是为了显示“人民的一致”，而是为了在会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进行讨论，对今后怎么办提出建议。有一次这样的群众性集会要求诺沃提尼放弃总统职务。警察未驱散会议，《红色权利报》事后对此也未加以谴责，每个人都可在收音机里听到会议的进程。而诺沃提尼在八天以后真的提出了辞呈，这使人们感到如同生活在童话里一样。

这种事情象征性地发生在一九六八年春天的第一天——三月二十一日。在这年的布拉格，不仅从天文上来说，甚至也不仅从政治上来说，而且实在地、真正地从人与人的关系上来说，春天开始了。人们开始相信，他们自己可以发挥些作用了，他们的命运取决于他们自己了，他们自己能够管理自己共同的、公共的事务了。

在社会生活中，有些特点往往只有在发生了某种对民族命运非常重要的事件的历史关头才会出现，例如我国在一九一八年十月、一九四五年五月就曾出现过①，现在这样的特点又越来越明显了。这是一种因漫长的绝望时期的结束，因压迫岁月的结束而爆

① 一九一八年十月捷人民摆脱奥地利长达三百年的统治，争得了独立。一九四五年五月纳粹德国对捷的统治覆灭，捷重获解放。——译者

发出来的高兴，是一种对于最初的自由日子的陶醉，是希望旧时光一去不复返的心情。造成这种状况的绝不仅仅是政治，更不止是关于民主政府的形式和机构的某项政治主张。这是因为人们觉得他们的生活在变化，坚定不移地朝好的方向变化。

当主张改革的、民主的共产党人在权力机构内部为扩大自己的影响而斗争，为反对那种在思想感情上只会搞独裁的共产党人和苏联在捷共内部的代理人而斗争时，一个新的、最强大的因素——全民族对当前时刻所寄托的希望，不顾改革派导演的计划，自己登上了“布拉格之春”的舞台。从三月到六月，正是这一因素越来越明显地支配着社会的和私人的生活。这是个希望和愿望的博览会，个人希望和政治希望交织在一起，由此产生某种节日的气氛。为了即将来临的美好时光，我们的民族甚至愿意宽洪大量地宽恕昔日的冤仇。

当然，在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的希望和愿望的博览会上，可以看到各个阶层和社会集团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希望提高生活水平，相信会较好地满足物质需要的信念是他们的希望的重要动力之一，社会进入消费发展阶段的事实在这里起了作用。其次，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各阶层都以本身的利益为出发点，努力争取更多地参与政治决定。在诺沃提尼时期，工人以及知识分子都对自己在社会生活的管理中发挥不了什么影响而不满。在各社会阶层的这一努力中，旧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总的来说已经不起作用了，起作用的是人们的希望和渴望，而它们是在一九四八年以后的新的社会关系中才产生的。在政治方面，人们首先要求当局像多党制民主国家那样，尊重他们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情况就是如此。但是，许多重要事情尚未得到说明。

国家仍然是人们往年所了解的那个国家。它的最高级干部换人了。但是，议会还是个未经选举产生的机构，因为，每个人都知

道，过去的选举实际上并不是选举。整个官僚管理机构继续存在，除了个别人事变动外，国家保安机关和声名狼藉的司法机关也还是依然故我。然而，人们还是把订婚戒指和祖母留下的珠宝捐献给这个国家的“金库”①。这是为什么？

捷共仍然是那个一家独裁统治了二十年的党。虽然它有了新的领导，但他们在一个季度以前同该党最高层的其他人还是一模一样的。是的，它宣布了新的纲领。但是在此之前它已宣布了多少个纲领？在半年前，假如举行真正的自由选举的话，这个党还不敢十拿九稳地指望，它得到的票数起码可以和自己的党员数目相等。而现在，非常客观地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约百分之七十的居民支持它的政策，其中大约百分之二十五毫无保留地支持。这又是为什么？

社会主义对人们来说不是抽象的概念。这是那种统治了近二十年的制度，现在人们怀着希望预祝这个时代的结束。尽管如此，大约百分之八十的人还是拥护社会主义。不错，人们所以这样做，也是为了国家的社会保险制度，为了国家对他们的生活福利事业的关心等。但是，群众往常对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难以尽数的不满，而且他们按照自己在实践中的了解，把这些不满的方面也看成是“社会主义”概念的组成部分。那么，现在他们的不满又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最后，半年以前这些人自己表现如何？人民还是同样的人民，并没有改变。他们不久前在国家的节日里还根据上面的命令装饰窗户，参加游行，在会议上奉命举手，以便以他们的名义拒绝、禁止和不允许做这种或那种事情。但同时，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私人利益，看看怎样伺机捞点东西，怎么欺骗国家和党，他们悄悄地想自己的事情，大声地按官方的要求说话。还是同

① “布拉格之春”期间，人民群众自发地捐献首饰珠宝，以加强国家的财力。
——译者

样这些人，他们两年以后又将怎么做呢？一切都是老样子，毫无两样——当然，这一点他们自己在“布拉格之春”期间也还没有料到。所有这一切该怎么解释呢？

我想，对这些问题只有一个唯一可能的答案，即相信自己的希望的人们，内心深处把人道的和民主的准则放在首要的位置上。这些准则经过漫长的世代在民族中成熟起来，不仅形成为我们民族的政治准则，而且首先形成为道德准则。这些准则已形成一种体系，它是上一世纪的民族复兴运动中就存在的，是奥地利统治时期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马萨里克建设并加以完善的。这种民主的和人道的准则体系，在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年代，在文化和政治中曾获得现代化，并曾批判地得到发展，在纳粹占领时期被暴力压下去，但是在一九四五年在社会生活中又开始实行了。捷共一九四八年以后的极权专政又用暴力把它压下去，同时也蛊惑人心地试图利用它，但是没有成功。一九六八年春，这一准则体系以新的力量走上政治舞台。

奇怪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大林主义专政年代在民族意识中加强了的，正是当局要彻底除掉的那些准则和理想。这些年代向人们有力地证明，否认这些准则和理想会导致什么后果。这种经验使有思想信仰的斯大林主义者也赞成改革的共产主义。对整个民族的多数人来说，这些经验则是表明人道民主理想和准则的有效性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在民族的意识中，这些准则比一九六八年早得多就已全部恢复名誉了。对多数人来说，它们从未停止在内心起作用。不错，敢于在实践中支持这些准则的人，甘冒风险和危险按照这些准则生活的人并不多。但是，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仅仅是道德上软弱的产物，这是专政所造成的恐惧的结果。

个人、社会集团以至全民族都知道，指导他们的行动的是恐惧，而不是他们内心认为正确的准则。他们不敢该怎么办就怎么

办。在这种情况下生活，既非易事，也没有乐趣。因此，他们把从恐惧中获得解放当作重新获得生命一般地加以欢迎。对帮助他们从恐惧中解放出来的人，他们充满信任、好感，并全力给以支持。正是这种情况——而不是改革派共产党人的改革纲领本身，或他们实际的政治品质——使得改革派共产党人在"布拉格之春"时期取得成就，使得杜布切克成为传奇式的人物。

因为，"布拉格之春"不仅仅是虚幻地而是的的确确给当时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带来了免于恐惧的自由。要做到这一点，总的来说不必等政治制度实行了持久不移的改革，也不需要有现实明确的体制改革的构想。如果只想取得暂时结果的话，甚至也不必完全彻底撤换权力机构中的干部。只要动摇权力机构，造成几个关键性变动，使专政机器的其余部分因不稳而暂时瘫痪就够了。只要不阻止在集会上，在报刊、广播和电视上自由发表意见就够了。做到这几点就能带来、也确实带来了免于恐惧的暂时自由。

民主人道的民族意识在摆脱掉恐惧之后，就承担了"布拉格之春"主角的角色，从四月至六月，威风凛凛地控制着整个舞台。可是到七月份，在这里就已经可以看到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克里姆林宫，它还有个由华沙条约组成的合唱队伴唱。免于恐惧的自由只是暂时的，恐惧又会到来的危险越来越显而易见。这不仅适用于民族，而且也适用于它的一个组成部分——改革派共产党人。现在，他们的命运已经联系在一起，双方都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民族对改革派的信任逐渐变成好像是授予全权一样，按当时流行的说法是给以委任状。

然而，事实同时又表明，即使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样伟大的东西，在权力和暴力的世界里，终究也是无力的，它本身不能消除通往民主自由道路上的一系列非常严重的险阻。戏是真实的，而不是幻想的，但是越来越有变成悲剧的危险。可是，想要修改剧本和

调换某些不合适的演员，已经为时太晚了。

所有这一切是怎样反映到统治者中间去的呢？

在广义的统治者中间，在整个捷共内部，即在全体共产党员中间，不管是改革派或保守派，也不管是干部或普通党员，正在按照他们对全民族意识所要求的东西的态度，发生越来越明显的分化。同意或反对把人道的、民主的准则体系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否正确的标准，这越来越明显地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之间观点上的分界线。这个问题首先是道德政治问题，甚至往往与其说是政治的问题，倒不如说是道德的问题。共产党人是本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全民族运动正如把其他人卷进去一样，也把他们卷了进去。他们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历史，受到他们良心的审判。这里所说的大多已不是依据情理进行的政治考虑，更不是推测，而是内心上、心灵深处所承认的人生准则。

改革派共产党人发起的对现极权专政进行政治改革的试验，已发展成为广泛的、民主的社会运动，其道德方面的含义是突出的，而且往往是具有决定性的。在这一运动面前，共产党人原则上重新分成两个营垒，在许多情况下按新的办法划分。大多数心里赞成全民族运动，承认其道义力量并服从它。当然，其中许多人以后在暴力和新的恐怖浪潮的压力下又改变了态度，正如只有当老百姓从恐惧中解放出来时，全民族意识才能在广大非党群众身上起作用一样。有些党员和非党人士以后甚至变成积极的“正常化派”。但是，在那几个月，只有一小部分党员明显地不赞成全民族运动的道德准则。由于在如此尖锐的道德政治冲突中不能中立，所以他们实际上不仅把自己排除在这一运动之外，而且成为它的积极的、顽固不化的敌人。这种划分以后非常清楚地表现在苏联八月干涉的日子里。可是，这种划分在这以前，大约从五月到七月，就已经形成。军事干涉给它带来的变化不大。捷共内部的这

个少数派，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他们出于各种原因，内心里把专制的、斯大林的暴政的准则体系当作自己的准则体系，并把它置于本民族大多数人的民主的、人道的准则体系之上。所有这些人，不管他们个人同苏联大使馆和克格勃的间谍网接上关系与否，都是俄国、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代理人。当然，非党人士不少也是苏联的代理人，有些是知名的（如普洛伊哈① 神父），有些是不透露名字的。

在这个意义上，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最重要的几个月，是人们"真伪分明的时刻"。这并不意味着，当时所有服从那活在"人民心中"的准则体系的人，后来都不会再否认以至积极地反对这一准则体系。如果期待出现诸如此类的情况，那只不过是一种幻想。然而，"真伪分明的时刻"表明，当人民从恐惧中解放出来时，谁也抗拒不了全民族的运动。在这一时期还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应该同什么联系在一起，又不应该同什么联系在一起，在人民大多数的心目中是泾渭分明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几个月也是"真伪分明的时刻"。人们拥护同人道民主准则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而反对同极权主义准则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同当局在此以前二十年间以及最近十年来的官方说法相反，也和多数人民表面上所承认的观点正好相反，因为在恐怖统治之下，人民不敢把自己的信念表达出来。事实表明，这种情况对当时的统治阶层，对大多数党员也是适用的。当然，从莫斯科的观点看来，这种情况的确是灾难性的。因此，军事干涉在这个意义上是个完全合乎逻辑的步骤。

*　　*　　*

一九六八年四月初上台的杜布切克的领导班子，同整个捷共

---

① 普洛伊哈曾任卫生部长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的主席。——译者

一样，也必须同社会上和政权机构之外所发生的事情打交道。在这个领导班子中，对全民族民主潮流的态度，对当时所说的“复兴进程”的要求的态度，也成为一个主要标准。由于在社会上，在这一事态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涉及到的不是纯粹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人的准则问题，因此，这些问题也牵涉到党的最高领导。这些领导成员本人的品质也因此突然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许多政治场合甚至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当然，从政治改革的需要来看，这又造成复杂的、非常矛盾的情况。

四月和五月，在新的社会形势的压力下，党的新领导原来形成的三驾马车——杜布切克、切尔尼克和科尔德首先分道扬镳了。

在这两个月中，杜布切克的政治作用以令人晕眩的速度增长，这显然使他周围的人以及他本人感到意外，无疑地也使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感到意外。事情的确是有其令人惊异之处：在共产党实行极权专政二十年之后，它的书记竟成了全民族民主人道运动的非凡领袖，这在共产主义史上无论何时何地都尚未发生过。

当然，杜布切克的政治作用之所以能非常迅速地增长，也还有其他原因。例如，民主改革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两大潮流中的各种政治倾向，都认为宣布自己忠于杜布切克本人，从政治上来说是最有利的，这一事实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比宣布忠于捷共行动纲领，从政治上来说比较灵活一些(因为有些集团正是对纲领的政治路线有各种保留)，在具体的政治问题上给人的约束较少，同时政治上也是得人心的、有效的，因为这迎合人们把政治纲领和一定人物等同起来的自然需要。因此，各种政治倾向的代表共同培植和加强杜布切克的威望，希望他们这一派最终能够利用这种威望来谋求私利。

可是，这本身还远远不能说明杜布切克在“布拉格之春”时期

的作用。他的政治演说本身也不能说明这一点。这些演说虽然在某些方面有个人的特点，特别是就其表达方式而言，但是，从内容来说，总的同当时其他官方政治演说没有太大差别。这些演说的产生也同其他演说相似，同杜布切克前后其他人当政时一样，都是由助手、“工作小组”或其他比较高级的干部写的（其中常常有整段整段的文字是由我执笔的）。各种倾向和政治色彩的代表都把自己的人派到“工作小组”去，这样，同诺沃提尼时期相似，送到杜布切克手里的演说稿的初稿，实际上是各派观点调和折衷的产物。杜布切克的政治演说本身并不能说明他这个人在一九六八年的作用。

报刊和电视也反映他的私生活，例如在游泳池跳水等等。也许这是理解他为什么深孚众望的关键吧？是他的微笑把人们征服了吗？特别是在统治者多年对人民只摆出官方的、官僚主义的面孔之后，这一切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实质并不在此。假如微笑能够决定一切，齐萨士就会成为人民的第一宠儿。然而，他的满面笑容只能感动某个生产牙膏的工厂，或者也能够显著地影响美国参议院的选举。可是，要想起到杜布切克一九六八年春在捷克斯洛伐克所起的作用，这是远远不够的。

我想，全民族支持杜布切克的主要的、最基本的原因，不是上面说到的这些东西，而是杜布切克相信自己的理想。在全民族迫切需要信仰的时候，他是个有信仰的当权者。人民正确无误地感到杜布切克有信仰，而他也同样感到人民有信仰。因此，他相信人民（我想，他是深切地、真诚地相信的），而人民也相信他。令人奇怪的是，杜布切克和人民这两者在具体情况下究竟具体地相信什么，倒并不比双方都有信仰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来得重要些。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多年来到处都是玩世不恭，信仰也只不过是形式的、僵死的东西。对我们的人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我

们人民的内心深处一直保留着道德准则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之中，人的真诚信仰、人道的信仰本身就是一种准则。

只有在这一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其他次要的情况，如杜布切克的一系列个人品质等，才能有意义。杜布切克不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物，这几乎随处都可以看出来。他在公开讲话时有些着慌、紧张，而这恰恰使他赢得了人心，乃至威望。他不是一个善于在大型集会上掌握听众的演说家，但是在十几个人的较小的范围里，他颇能把听众吸引住。他也善于听取别人的话，而且可以看出，他是怀着兴趣听的，并非事先就有固定不变的成见，他使人感到他并不固步自封，是可以接受别人的意见的。当然，实际上他最后往往仍然推行自己的想法，因为要真正改变他已确立的某种观点是很不容易的。此外，他外表文静，不那么显眼，不像专横的人那样故意显示自己、引人注目。我想，在党的所有领导人中，杜布切克是最不专横的，但远远不是最不固执、最容易受影响的。

杜布切克的所有这些品质也同他对权力的态度有关。他不是权迷心窍的人，也不是想利用权力来谋求个人私利的人。政治上最重要的也许是，对杜布切克来说，权力不是把他所信奉的共产主义理想推行到社会生活中去的合适工具。尽管他是有信仰的共产党人，内心里也自信是马列主义者，但他不相信暴力和权力的积极作用。对杜布切克来说，官方的马列主义小册子中所写的关于社会内部和世界范围阶级斗争的许多一般原理是适用的，但他实际上只承认暴力和权力在反击敌人进攻、捍卫共产主义目标方面的作用，而不承认它们在积极实现这些目标时能够发挥作用。而只要他自己不相信某件事情是阶级敌人的进攻时，他就反对使用暴力和权力，反对把它们作为实现自己真诚相信的理想、共产主义假设和概念的工具。

假如有人对杜布切克说，他在某件事情上的态度不是列宁主

义的，而是马萨里克主义① 的，他会同他争论，拒不接受。从某种角度来看，杜布切克完全有权这么做，因为他的确不是一个马萨里克主义的人道主义者。但在确定的情况下，思想标签、甚至完整世界观的较深的思想联系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人们对非常具体的问题的非常确定的态度才有意义。而杜布切克对暴力、专政方法问题的实际态度，就其内容来说，确实符合全民族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传统。这种传统正是按马萨里克主义的方式去反对专政暴力，渴望民主改良主义。

杜布切克成为“布拉格之春”的象征并不是偶然的。他的确具备必要的个人的和政治的品质。从这个角度看，选他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杜布切克个人的威信明显地有助于捷共改革政策的威信，而捷共领导中其他人则很难指望做得到这一点。可是，从其他角度来看，对捷共的改革政策来说，杜布切克的当选如果不是不幸的，也应该说不是那么幸运的。

杜布切克本人对自己的作用不很理解。我想，这是第一件讨厌的事。他没有意识到他的巨大声誉和政治威望是从何处而来的，而是认为这是全体人民都同意他的政治主张和观点的充分表现。简单地说，他正确地感觉到人民相信他，但他却误认为人民也像他本人一样相信“马列主义”，以及他的一切具体政治行动。我认为，随着他在全民族中的声望和人民对他的信任的增长，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作用。有些问题本来不是靠良好的愿望所能解决的，而必须有深思熟虑的政治措施。但对待这一类问题，他也觉得

① 泛指捷克斯洛伐克建国后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的思想。马萨里克早年极力反对迷信和教条主义，并曾反对以沙皇俄国为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主张接受西方文明，联合奥地利等西方民族。他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一向持反马克思主义、反十月革命的反动立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对马萨里克主义所下的定义为“世界主义、民族主义、假民主和假人道主义的大杂烩”。——译者

靠自己的声望和信任就能解决。他对自己反对克里姆林宫的意图的可能性也是估计得过于乐观（正如事实最后所表明的，他的乐观是没有根据的），这显然也是由于他相信，在向勃列日涅夫说明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反革命”危险的时候，他在全民族中的无可争辩的威望也将是一个决定性的论据。

杜布切克除了具有赢得全民族威望的品质之外，还有一系列别的品质，而这正是许多困难问题之所以产生的原因。除了我已谈到的情况，例如政治上过高地估计个人的因素，相信他的朋友在政治上也将永远像他那样去行动等；此外，首先是他的优柔寡断，或者更确切些说，在需要当机立断的时候，他往往过于迟缓。这是他不独断专行，总是事先“说服同志”的优点的反面。在许多情况下，当作决定所必需的一切情况都已清楚，大家都已令人厌烦地一再反复重申同样的赞成和反对的理由，当最后只等杜布切克一人来作决定时，他还是一再推迟作出决定。因此，决定实际上往往不是按他自己的希望作出的，而是最后只得承认既成现实。

杜布切克表面上虽是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伟大理想的政策的象征，但在内部，在党的领导中，从许多方面看却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人，是强有力的政治机关的首脑。他以这种身份基本上照旧执行非常有局限性的个人政策，在各种集团之间的争论和冲突中，以及同莫斯科的争端中，犹豫不决地搞平衡。尽管如此，由于在党的领导中也是地位起决定性作用，所以那些实际上反对杜布切克改革政策的人，也不敢直接出来反对杜布切克，而是相反地，努力争取他。

特别是比拉克，几次在党的主席团力图说服杜布切克，要他相信，他正在成为“反社会主义势力”的牺牲品。比拉克对他说，这些势力欺骗他，按照“同杜布切克一起反对杜布切克”的口号行事，而相反，比拉克本人的一切想法却同杜布切克一样。科尔德有段时

间也采取同样的立场。当这么做无效时，最后就出现直接的批评。政治局中的"群众代表"里戈（他是东斯洛伐克炼铁厂的党的干部）宣称，"下面的人"在议论，杜布切克在搞"个人迷信"。其他一些人，首先又是比拉克和科尔德，也忸忸怩怩地参加这一批评。

但是，杜布切克也不是天真到把这也看成是"同志式的帮助"，因此这类努力都毫无效果。

原来三驾马车中的二号人物切尔尼克，则根本不是个非凡领袖式的人物，甚至也不是个像斯姆尔科夫斯基那样的"人民代言人"式的人物。尽管如此，他四、五月间在社会上也赢得了相当高的威望，全民族民主人道"复兴运动"也加强了他的政治地位。

切尔尼克是个通情达理、讲究实效的政治家，经理式的人物，而不是意识形态专家或宣传鼓动家式的人物。他之所以能在社会上赢得信任，并不是以自己的信仰和为人坦率赢得的，而是以自己的求实精神和讲究待人接物赢得的。从这个观点看，在非共产党的政权中——只要不是把合乎情理、讲究实效和求实精神排除出政治生活的极权政权——切尔尼克也能成为一位好总理。而在极权政权中，他会成为合理的民主形式的支持者之一，他在诺沃提尼统治时期在实践中已表明了这一点。

对他来说，民主制度是一种比局限性颇大的极权政权合理而又有效率的制度，主要是因为这一点，他才拥护民主制度。当然，切尔尼克是个有才智的人，能干的组织者。因此，他也理解有能力的人的需要，即：在一个重视个人才能并使其在社会等级的阶梯上占有相应位置的制度下作为个人而发挥作用。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也赞成民主和公民权利。

在我看来，如果把切尔尼克在一九六八年民主改革中的表现，仅仅看成是一个实际上本来并不要民主的技术官僚的随机应变的作法，那是不符合实际的。切尔尼克支持民主发展，他也理解"布

拉格之春"时期全民族民主运动的道德含义。但这种道德含义对他本人来说不是决定性的出发点，在他的行动中不起约束作用。可是，当这些道德理想在社会中起着重大的政治作用的时候，他就尊重它们并努力按照它们的要求来行动。因此，当杜布切克在非政治意义上也越来越成为"复兴进程"的象征的时候，他同杜布切克的联合也更加巩固了。因为他在杜布切克这个非凡人物大树庇荫下，在政治上能得到好处。但是，我并不认为他仅仅是为此才那么做，他那时也是懂得"复兴进程"的含义的。

有一回，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从布拉迪斯拉发到布尔诺的途中，我同切尔尼克一起，到南摩拉维亚列德尼采镇的城堡公园散步。那是个星期天，公园里到处是人，许多人向我们致意，我们不时停下来同人们交谈，切尔尼克逗一个小男孩玩，到处都是可供拍摄新闻简报的感人场面。这使切尔尼克感动，他显然感到很舒服。但是，他与处在类似情况下的杜布切克是完全不同的。杜布切克在这样的时刻就不会考虑什么，心里也不会去权衡什么利弊得失，而只是同人们玩乐。切尔尼克则相反，意识到这种时刻对他的职位的意义。当然，在看到人们爱戴自己的时候，即使完全不从政治上看，而是一般地看，他也确实是感到高兴的。

当我们后来走到行人很少的道路，又只剩下我们两人的时候，切尔尼克突然若有所思地说："你看，这里一切实际上都是封建主、剥削者身后留下的。可是直到今天对人们仍然有价值。那些城堡的主人好像还住在里面。你觉得我们身后也会留下什么东西吗？"

为什么切尔尼克突然同封建主和城堡的主人这样心心相印呢？我想，他在这里无意地、下意识地表明，他在公园人群中间散步时，觉得好像是统治者在人民之中一样。因此，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切尔尼克的民主主义是怎样的一种民主。那是民主主义，然而是一种唯理的、有点贵族味的民主主义，是一种有感情的、

但不是无私的民主主义。但是，那终究是民主主义，而不是以极权主义准则为基础的思想感情。

由于至今一直在政治机关生活和升迁，切尔尼克当然非常懂得，在权力世界要取得成功，应该做什么和应该怎么做。他也执行有利于自己的人事政策，把倾向于自己的人安排到各种职务上去，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他在这方面总的来说比杜布切克做得好。他的行动比杜布切克坚决，能较迅速地采取坚定的立场，也常常采取独断专行的作法。他大概不是那种被权力吸引住和迷住的人。然而，他对权力的看法也非常实际、合理，把它看作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他也不是那种甚至想在违背人们的意志的情况下，用权力为人们创造幸福的狂热的意识形态专家。但是，他使用权力的时候比杜布切克多，即使在杜布切克会犹豫不决或反对用强力干预的情况下，他也乐于使用权力。因为他不那么相信信仰、良好意愿和说服的力量。正因为如此，在杜布切克认为还有可能“说服同志”的时候，他就已感到自己的意图有可能行不通了。

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在政治上可以结成互相积极补充和影响的两架马车。但遗憾的是，他们的这种个人联系经受不住苏联军事干涉的严峻考验——这一点以后再谈。然而，就在他们还构成捷共领导中的两架马车的时候，切尔尼克也未能有效地纠正杜布切克的一系列缺点。因为他是政府机关的首脑，而不是党的机关的首脑，不能直接解决党的权力机构内部的冲突。

原来的三头政治的第三个成员科尔德，在一九六八年四、五月间，站到与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完全不同的立场上去了。全民族民主运动的压力冲击了他的地位。科尔德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如果事态一直沿着这样的方向发展下去，对他栖身于政权顶端的前途是不妙的。

科尔德原来是俄斯特拉发的工人，从二十三岁起开始在政治

机关工作,一九六一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有个时期得到诺沃提尼的庇护。他个人在许多方面可能也使诺沃提尼感到亲切,因为他从某些方面看是一个诺沃提尼式的干部,他也是"一切得之于党"的人。他所受的教育不多,只受过党的政治教育(或宁可说"训练"),他的社会地位完全是他忠于党、忠于官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的结果。在党的机关中,科尔德常年在经济部门担任高级政治职务,但他没有、也未获得任何专门经济知识和能力。他的地位总是取决于他对党内冲突的风向观察得准不准。

我一九六八年以前就认识科尔德,我觉得,他在主观上也算是个诚实的人,按他自己的一套准则来衡量也是个正直的人。当他觉得自己看出党的政策中有某种不对的、坏的东西时,他就根据自己的良心来采取相应的立场,并顽强地捍卫这种立场,就像斗牛犬一样,只要它自己不认为已经咬够了,它就咬住不撒嘴。例如,五十年代蓄意制造政治案件的做法,违背科尔德内心所信奉的准则。因此,科尔德作为诺沃提尼时期最后一个"恢复名誉委员会"(一九六三年成立)的主席,也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根据当时的情况,尽可能彻底地解决这个对诺沃提尼来说很伤脑筋的问题。那时,科尔德非常有礼貌地对待遭到各种不同迫害的人,他也帮助当时即六十年代初还受到非法关押和指控的人,这样的事例也是为大家所熟知的。

但是,科尔德不仅不是个马萨里克主义的人道主义者,而且也不是个民主主义者。他是个典型的大老粗。他的人民性虽不是虚假的,但却是原始的、粗俗的,把人的需要简单地理解为首先是物质需要。至于精神需要,科尔德实际上只承认他自己的精神和道德所需要的东西,认为只有这些是人的需要。当然,那就少得可怜了。不仅如此,他对自己不承认的东西既不理解,也不能容忍。普通未受教育的、但并不粗暴的人一般是温顺的,而他一点也不温

顺。

还在诺沃提尼统治的时候，科尔德有一次曾以捷共某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到过巴黎。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大百货商店，他仔细地从下面参观到上面。晚上，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官邸，一杯接一杯地喝白兰地，最后挺真诚地说："我们的人民错过了多少东西啊，真可怕！难道他们不配享受这些东西吗？"他的确是真诚地、认真地那样想的。他之所以支持经济改革，这些感受所起的作用也许比经济学家希克的理论要大得多。

在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夜晚，苏联军用飞机已在捷共中央大楼上空轰隆作响，政治局在大楼里开会，争论如何对苏联的干涉表态，科尔德当时的说法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说："我们在这里胡扯，想要谴责他们，但在俄斯特拉发，我们的娘儿们这个时候已经在同他们睡觉了！"

我相信，科尔德的确是那样想的。但他没有意识到，那天晚上，就是最放荡的捷克淫妇也不会跟俄国兵走，因为她们的道德观念比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共政治局中的某些委员还要强些。当然，她们没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德论据，而科尔德会借助于这种论据，从道德上为自己解嘲。可是，科尔德不同于雅盖什，显然还有比拉克、英德拉和其他一些人，他们是苏联在捷共内部的直接代理人。科尔德公开转到反对改革的势力方面而为莫斯科效劳，这是他的政治态度和为人的必然结果。

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说，科尔德之类的人物反对民主改革，是因为被人家用特权、高薪等腐蚀了。我想，这种看法不完全准确。因为所有的高级干部这些年来都受到"权"字的腐蚀，但只有几个高干由于担心失去特权而反对改革。

同最高的政治职务联系在一起的特权总是相当大的。我多年来对其一般情况已有所了解，也知道一些具体的情况。但是，当我

一九六八年夏当选为捷共中央书记，天天都过着这种特权生活的时候，它还是使我感到十分吃惊。

我当时领取的是捷共中央书记的工资，每月共一万四千克朗。其中，八千克朗为名义工资，按规定须纳税；六千克朗为特别工资，用于与执行职务有关的各项开支，这笔钱属于个人基金，不必纳税。根据当时的统计材料，捷共中央书记的工资大约相当于捷平均工资的十倍，相当于我过去在科学院任职时工资的三倍。我在科学院工作时属于一级独立科学工作者，当时领取的工资与后来我在捷共中央所用的秘书们的工资大致相同。我领的只是书记的工资，那些主席团委员兼书记的人的工资就更高了。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政府总理和国民议会主席每月的工资可高达二万五千克朗。

起初我还以为，公务费用应当从“用于与执行职务有关的各项开支”那笔钱中开销，其实我错了。我办公室里开会用的食品、饮料、香烟之类，都是从办公室经费中开销的，就连交通费也不例外。当然，交通费实际上用不着开销，因为书记都有公务专车和司机，按内部规定公务专车是归个人使用的，所以这种专车其实不能算作公务车了。

我第一次以书记身份去布尔诺视察某工厂，归途中发现汽车后面放着包裹。我天真地以为，这是司机在外面等我时买的东西，准备带回家去。于是，我问司机买了些什么好东西。他惊奇地解释说，这是我的东西，是工厂厂长送的礼物。原来那是一些玻璃杯和一个木雕羚羊，是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风格和受礼人爱好打猎的特点精心制作的，很符合过去的高级干部的生活要求。不消说，这都是些小意思，是从“用于与执行职务有关的各项开支”那笔钱中开销的，只是这次是以厂长的名义开销的罢了。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在实际生活中已成为家常便饭，只要你稍作表示，礼物

就送来了，而且何止是些小意思。

后来，我渐渐了解到最高领导层日常生活的奥妙。他们若需要些什么，只要早晨告诉一下助手或者秘书，问题就解决了，小至于做套衣服，大至于在巴黎采购，无不如此。出面效劳的不是“时装商店”的经理，就是某一位驻外大使。所要之物虽需付款，但毕竟优待又优待，出钱有限。因为工厂（确切地讲是厂长）把向“书记同志”提供产品视为光荣，并且保证质量好，价格低，只收成本费。当然，替“书记同志”办这类事的人，也会在同样优厚的条件下为自己捞到某些好处。

我住的是普通出租房子，拒绝了要我搬进别墅去住的建议，因此，仍和过去一样交纳房租。但我完全可以搬到捷共中央辖属的房子去住，那里仅付“优待房租”，其他各项开支也由捷共中央财务处开销。此外，书记还有权享用疗养设施，住进奥尔利克林区经过特别圈定和有专人保护的别墅。我记得，使用这种别墅每季付二百九十克朗，相当于一个普通公民在乡间小舍休假两周所付的费用。但在乡间小舍里只能马马虎虎地睡个觉，要到池塘去盥洗，要跑到树林里去大小便。

这些仅是最引人注目的财政和物质方面的优惠。但是，担任最高职务后，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起作用，可以轻而易举地办到一切事情，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通公民为了这些事必须终日奔波。在享用社会主义医疗保健设施方面也不例外。上面有专门的国家疗养所，捷共中央书记患病可以住特别房间，那里设有会客室和电视，全国著名医生都赶来为他看病，他可以得到一般人享受不到的国外进口药品，如此等等。此外，他的全家都有权在疗养所看病。

一个人担任高级政治领导职务后，一切优惠便随之而来，不管他们的人品如何。至于那些享有优待并且有意为自己捞取更多好处的人，其情况就可想而知了。自捷共掌握政权以来，这已成为日

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情，即令是最民主的领导人也不例外。我前面谈到的领导人的工资待遇，同诺沃提尼当政时相比，已是有所降低了。杜布切克取消了当时流行的“分发信封”的做法：诺沃提尼根据个人的决定，经常把装有上万克朗的信封额外奖给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用以“改善”生活。

我从一九六九年一月起已转到民族博物馆去工作，每月的纯收入仅有二千零五十克朗。但由于我曾把担任书记职务那六个月的工资存入储蓄所，所以后来有三年的时间我的经济状况还不错。那些不仅是六个月，而是拿了六年高工资的人的收入该有多少呢？我至今还不完全明白，他们到底拿这些钱干什么，因为在捷克斯洛伐克不能投资开办工厂，也不能把货币转化为资本。根据我所知道的几个具体事例，我可以说，这些人买过汽车、别墅和各种奢侈品，也在子女甚至其他亲属身上花了大宗款项为他们购置汽车和别墅，以保证他们奢侈的寄生生活。对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来说，这样的人生目标是奇怪的，但事实就是如此！

过惯了这种生活的人自然会担心失去现有的地位，从而也会影响他们的政治表现。这种影响对任何人都毫无例外，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就我个人的情况而言，半年之后，我对一些特权就感到习以为常了，并且开始把它们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当然，这并未使得我为了保住特权而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但我肯定也不会建议取消国家疗养所的，尽管我认为这是腐蚀人的东西。特权从来是害人的东西，特权同权力连在一起时尤其如此。但是，腐蚀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则因人而异，因为人的品德不同，一个人在成为享有特权的强者之前，实际上早已形成了一定的品德。

就我所知，在捷共干部中间有两种人安于腐化，无所顾忌。第一种人开始时还有些道德界线，但他们逐渐由一个有信仰的人变得厚颜无耻，因而也就顾不上什么界线了。第二种人则完全不同，

他们实际上象古罗马的平民。这些人也是完全沉溺于腐化之中，但他们在掌握权力和分享特权之前，心里本来就没有什么道德界线，他们的道德观念如此之低，以致他们毫不脸红地接受腐蚀，而且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主观上通常并不感到自己已经腐化堕落了，他们按照自己的处世标准，甚至还认为自己是个很正直的人。在捷共内部，此种古罗马平民式的人在老一代中占优势；在一九六八年出头露面的那一代人中，厚颜无耻之徒居多数。科尔德按其思想状态来说属于平民之类。

就科尔德本人的情况而言，高官厚禄虽然对他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恐怕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对他来讲，权力和职务是他个人如何重要的证明，也是他生活意义之所在。他这样的人只有靠政权才能高升，失去权力的支撑他就会跌到最底层，吉凶难卜。他个人内心空虚，没有个性，完全靠外界来支撑。当他感到地位受到威胁时，他便会为了自己的安全转而投靠极权制度，并用“工人阶级的利益”为自己进行狡辩。

这时他自身会觉得需要听命于极权制度，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做是要有些勇气的。例如，有一次捷共中央开会讨论捷共拒绝参加华沙会谈问题(一九六八年七月，勃列日涅夫和苏联集团其他四党的领袖发出最后通牒，召杜布切克等领导人去华沙开会)，会上，捷共中央委员中只有科尔德一人出来表态反对拒绝参加。他公开表示，他虽然服从多数，不反对会议决议，但他不能同意这项决议，他认为勃列日涅夫是正确的。从道德标准来看，此时此地，他的为人如何是尽人皆知的，他简直不如一个在街上拉客的妓女，然而他却要向人显示，他是以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观点为出发点的，是诚实无邪的。我想，这两种人格在他身上可能都有，不能因为对一个人在政治上同情或反对而对他的某一方面视而不见。

科尔德扮演的政治角色的变化，完全是外界具体情况变化的结果。所谓外界情况就是社会上对他的公开抨击和批评越来越多，弄得他无力应付。在此之前，科尔德曾尽力想站在政治改革派一边，并想支持改革。他之所以改变政治态度，并不是由于他不能接受改革派的政治观点。在这一点上，他同比拉克有区别，比拉克从未接受过一九六八年的任何政治主张。科尔德所以改变政治态度是由于他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担心，他自己无力解决新的政治形势所带来的问题。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什维斯特卡的情况与他大致相同。

在我讲了关于科尔德的这样一席话后，人们也许会问，我既然对科尔德持这样的看法，是否还能认真地探讨一下他对民主改革所起的积极作用的问题？人们可能还要问，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对实现民主改革起促进作用？争取这样的同盟者是否有价值？

这两个问题都是重要的政治问题，我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他能够起促进作用；争取这样的同盟者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不是持这种看法，我在一九六八年以及一九五八年就不会投身到捷克斯洛伐克和捷共的政治活动中去。当然，政治同道德从来都有一定的关系，在某种情况下，这种关系甚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在政治这个领域内，重要的是人们起什么样的作用，而不是他们的个人品质和主观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所指的主要是人们的行动。把人们担任一定职务后所起的作用同他们个人的品德特点混为一谈，从政治角度（政治意图、政治力量对比和必要的政治策略）来讲，许多问题是说不清楚的。科尔德或什维斯特卡之流根本不可能成为有道义力量的人物，也不可能起这种政治作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从政治改革的观点出发，也并不要求他们一定要成为这样的人物。只要他们能起到力所能及的作用，对改革又不持敌对态度，他们对政治改革就是有益的。

当然，如果在民主的政治活动中所有重要政治角色都由品德高尚的人来扮演，事情就更理想了。但是，这难道现实吗？我国的整个政治制度有二十年是实行极权专政制度，在这种具体情况下，这难道可能吗？当时什么样的人有可能一步步地升上去担任最上层的领导职务呢？只有在权力机器的阶梯上已经占据一定位置的人，才有可能到达最高层。而过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在权力的阶梯上身居高位呢？很遗憾，"布拉格之春"已经证明，这种人是形形色色的，其中有些人瞬息万变的本领大得惊人。由此可见，当时身居高位的不可能都是政治和品德兼优的人，甚至大部分不是这样的人。

最后，就是在当年的非极权制的民主条件下，事情也从来不是那么理想的。难道在马萨里克时代，农业党、社会党等政党的高级领导人就是什么政治民主和人道主义的理想化身吗？难道他们那里就没有贪求名位的人，就没有卑鄙无耻之徒和腐败堕落之辈了吗？肯定也是有的，但他们在自己的职务上必须服从当时有关统治和管理的民主制度。而且，在政治可能发挥影响的范围之内，能够保障民主，能够保证人道主义理想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得以实现的东西，是民主制度，而不是掌权者个人的品德。

我个人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根据一九六八年"复兴运动"的深刻的人道主义宗旨，重要的是采取一切步骤，使开始实现的民主化管理制度的基本方面在实际生活中稳定下来，而不是揪住掌权者个人不放，幻想把投机钻营和道德低下的人赶出政权机关，换上道德高尚、忠于政权的人。我觉得，那些反对我这种观点的激进的改革派共产党人，真是比布尔什维克还要布尔什维克，他们沉溺于革命的激进幻想，认为只要搞得彻底并坚持革命的理想主义，靠政治和政权就可以保证在国内实现合乎道德标准的理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捷克斯洛伐克的教训已经够多了！

这里可以拿一九六八年的一些具体人物来作说明。例如，有些人觉得，政治局内保留科尔德和什维斯特卡对改革不利，认为胡萨克理所当然地应取代他们而进政治局。然而，胡萨克后来进了政治局以后究竟干了些什么呢？又如，一九六八年七月在捷共布拉格市代表会议上，有人发言对英德拉提出指责，说他在哥特瓦尔德州担任捷共州委书记职务期间曾是五人安全小组的成员。所谓安全小组，实际上是一种特殊机关，五十年代初在州里接管了法院的职权，非法把一些人投进监狱，有时甚至把一些人判处死刑。我作为捷共中央代表团成员参加了那次会议，英德拉当时没有与会。我知道会上讲的不是事实，因为英德拉在哥特瓦尔德州委任职时五人安全小组已经撤销了。于是，我发言讲了这个问题。当时，我对英德拉的政治倾向未抱任何幻想，因为事情很清楚，他反对改革，支持莫斯科来的一切东西。当天晚上回家时，里赫塔向我表示，要我考虑一下自己对英德拉的态度，否则就涉及我是否还能继续担任现在的职务的问题，要我认识到，在此情况下党内的"进步力量"将会放弃对我的支持。

里赫塔当时算是个"进步分子"，他是预见共产主义和科技革命遥远未来的思想家，也是"人道的社会主义"口号的发明人，后来，这个口号传给了杜布切克，并写进了捷共行动纲领。可以完全肯定，当时许多激进的改革派共产党人不仅会毫不犹豫地主张让里赫塔取代什维斯特卡或者英德拉的位置，而且也会主张由他来取代我的位置，因为他确实不是"中间派"。但里赫塔一九六九年后表现如何呢？他由于胆小怕事而变得十分卑鄙，他毁掉了多年来和他亲密相处的同事们的生路。在他身患重病躺在结核病医院期间，他既无职务，又无政治影响，简直濒于死亡状态，正是这些同事待他亲如兄弟，给了他多方照顾和关怀。

这里还有一件大家都知道的小事，发生在七十年代初期，不过

很能说明他的道德败坏程度。有一次，里赫塔用车载一个不相识的姑娘，路上遇到装运苏联士兵的军车，于是姑娘在超车时隔着车窗向士兵啐唾沫以示厌恶。可怜的姑娘也许是这样想的，反正用车载她的是个平常的捷克人。不料里赫塔超过苏联军车后把车停下来，把姑娘扔到公路上。他当然知道，苏联士兵一会儿就会赶过来，追上那个向他们吐唾沫的姑娘。我敢说，科尔德是不会这样干的。也许他根本就不愿用车去载一个素不相识的搭车姑娘，即使他这样做了，恐怕也只是向这个姑娘进行一通国际主义的说教。此人虽有“邀请”苏军八月到捷克斯洛伐克来的本领，但干那种具体事还是不在行的。他和那个风行一时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口号的发明人不同，他本人不是胆小鬼。

一九六八年夏，在社会生活和党的领导的实际活动中，涉及到道德和政治方面的问题每日可见，情况错综复杂。关于其他领导成员的问题，我在此就不想详谈了，因为把他们当时所处的整个情况弄清楚比这更重要。

* * *

有一次，因为要讨论国际问题，研究同苏共政治局即将在切尔纳会谈方面的事情，切尔尼克政府中的外长哈耶克列席了捷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会议。两小时后第一次休会时，哈耶克把我拉到一旁，小声说：如果党的领导是这个样子，我当这份子外长有什么劲儿呢？我告诉他，用不着担心，我现在还不照样是当书记，一切都需要冷静。

哈耶克为什么这样提出问题呢？原来在主席团的会议上，每个领导成员都在发表长篇独白，而讲的内容又都是一般性的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或者就是另一个极端，仅讲些具体琐事，例如，某某人说过什么话，发表过什么意见，等等。这就给局外观察家一种印象，会议是在进行清谈，人们相互表白自己的世界观，阐明自己

对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共二十大等一般性问题的态度；或者像是杂志编辑部在开会，就一篇文章是否公开发表争吵不休；又像是地方党组织的会议，对人们理发时讲的话也要作出什么政治结论。而局外观察家则一直还在等着会议开始讨论正题。哈耶克就是这样左等右等，希望会议能开始讨论同苏共政治局会谈的准备工作问题。他希望会议能研究一下，我们希望同对方集中讨论什么问题，我们如何论述自己的立场，对方可能提出什么论据，我们可以在哪些问题上让步、在哪些问题上不能让步，会谈在一些问题上可能出现几种具体结果，出现这种情况后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如此等等。

但他等来等去，会议始终未能讨论这些问题。他在会上仅得知，卡佩克对苏联是真心诚意的，而且谁也无法改变他的这一立场。比拉克在会上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情况很好，现在剩下的问题是为这座大厦添枝加叶，使之更加宏伟壮观，而有些人却偏要毁掉整个建筑，莫明其妙地另建什么新厦。皮勒尔在会上宣布，据某县的干部反映，有人在"231 俱乐部"①会议上扬言要绞死共产党人，这是货真价实的反共主义。另一方面，皮勒尔也相信复兴过程是健康和正确的。他认为，这两方面的情况都应向苏联同志说清楚。齐萨士谈了新闻自由问题，认为新闻自由对社会主义是必不可少的、有益的事情，必须反对由于存在个别缺点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新闻事业进行教条式的批评。里戈谈到，他所在工厂党的干部对今后可能出现什么局面感到没有把握而表示担心，并列举了一些具体事情，提醒大家注意这个问题。英德拉一言未发，对

① "231 俱乐部"是一个群众团体，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经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批准宣告成立，其成员为五十年代以来因肃反扩大化而被判处徒刑的人士，他们要求按照刑法第 231 条对于那些搞冤假错案的人判以"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罪"并予以惩处。——译者

会上的发言详细作了记录，他用的是带国旗标志编了号的大笔记本，一看就知道当时在捷是记录要事用的。党的领导一开会就是八小时、十小时、十二小时，有时甚至更长，历来如此，实在需要有很大的耐心。

我当时没作记录(后来我曾把这当作一件憾事)，因此，英德拉可以轻而易举地向我说明，我引用的话在当时的发言顺序不是这样，有些话这次会上根本无人讲过。他的话也许是对的。但所有这些话都可以在他的本子里找到，只是场合可能不同，发言的顺序不一罢了。照我看，这是捷共杜布切克领导在“布拉格之春”期间举行的会议的特点。

坐在会议桌首席的杜布切克，比较注意地听取了越来越杂乱的、众说纷纭的辩论。他让大家发表意见，直到他认为同志们已经自由地把话说完，没有新的意见要讲的时候，他才以惯用的方式讲出了他常说的教条：首先应当集中精力，解决有积极意义的问题，开展有益的工作，去克服消极现象。我们的政策有劳动人民的强大支持，有了这样的力量，最后必定胜利。

我的这些话并不是想要说明，党的领导人在“布拉格之春”期间就没有作出过任何政治上意见一致的重要决定。那时作出的许多决定是为大家所熟知的，并记载在文件、报刊和档案里，有关的历史学家有权在将来从中对捷共杜布切克领导集团的功过进行评价。不过实际上作出这些决定的方式同正常人所想象的民主决定实在是相去甚远。那时党的领导所采取的工作方式也能说明，为什么这个领导集团在其半数成员一直明显地反对进行改革，一部分成员甚至已经赞成苏联出兵干涉的情况之下，却能够作出符合改革精神的决定。

捷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的工作方法以及为其开会讨论准备材料的方式，和诺沃提尼当权的最后时期是一样的。每次开会总

是要提出许多讨论要点和至少一公斤重的文件资料，作为讨论的基础。我故意只说重量而没说文件的其他特点，是因为党的领导人们只是在开会前的一两天才收到成包的文件，体积和重量对他们就成了首要的问题。任何人即使是想要浏览一遍也是不可能的。这些文件包都是由助手们和党的机关进行处理，对各种文件提出意见。当然文件包里的文件最初就是由助手和“工作小组”成员起草的。对文件提意见的有时并不是文件的起草人，但有时就是那些起草文件的人。党的机关里所说的提交“组织”批准的事情，也和诺沃提尼时代一样，往往只是些细节，甚至细节比大事还要多。因为不安定的机构在不安定的时期总想使自己要办的事能得到党的领导的批准，以便自己能够推卸具体责任。大多数党的领导机构成员，对等待由他们作出决定的问题并不感兴趣，也不可能感到兴趣。尽管如此，他们也要耗费很多时间来讨论这些问题。

这些领导人讨论的问题，一般只有四分之一在政治上真正具有一定程度上的重要性和普遍意义。为解决这些问题所提的方案，也都包含在各种“工作小组”、组织机构以及党的领导人的助手们所提出的方案里。在这方面，改革派共产党人早在诺沃提尼当权时期已经起着重要作用，一九六八年春天，他们的地位又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肯定比在党的领导集团内部更为强大。在这些文件起草人中间，有些人既能搞方针规划，又能把方针同组织工作和实际计划相结合。因而同领导人在会议桌上进行的讨论大不相同，领导上批准的方案在政治上常常真正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总的说来是制订得较好的方案。

如果碰上突然事件，党的领导必须较快地表明政治态度、而幕后的大批助手又没有准备方案时，那就由领导核心自己推选两三个能够草拟方案的人去起草。与此同时，剩下的人则一如既往，继续进行讨论。方案提交领导人之后，再次引起一小时的、又是离开

正题的辩论，最后在普遍疲倦和头昏脑胀的情况之下，领导人只好原则上接受了几小时之前所提出的原方案。

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我和齐萨士经常受托起草决议案。例如，我和齐萨士一起，曾起草过两个在当时非常有名的决议：《捷共中央主席团对〈两千字宣言〉的态度》，以及《捷共中央主席团对五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同苏共政治局进行切尔纳谈判之前）来信的态度》。

《两千字宣言》事件对当时捷共领导的状况很有代表性，所以我要在此作较为详细的说明。此文的作者是作家瓦楚利克①，文字生动感人，选辞适当，要拿决议的语言与它争辩，那是极为困难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不战自败"，这已早有定论。《两千字宣言》是在捷共县代表会议开会选出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前夕，于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发表在《文学通讯》和另外大约三个日报上的。很多人在宣言上签了名——主要是知识分子，但也有运动员、知名演员，以及群众中不太有名的各行各业的人——，他们当中有改革派共产党人，也有非共产党人士，有入春以来就是激进派的人士，也有一些根本说不上是激进的人。

《两千字宣言》的内容本身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早就在报刊文章和广播电视评论里以各种形式谈论过了。可能只有某些段落——如瓦楚利克提出的，用建立"公民委员会"的办法，有效地使政治体制民主化的建议——，在此以前尚未在别的地方如此明确地提出过。无疑，作者首先想说出激进的共产党员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顾虑。他们担心，由于过多的保守分子、极权专制的

① 卢·瓦楚利克（1926—），五十年代从事新闻工作后专事文学创作，六十年代曾先后任捷作家协会刊物《文学报》和《文学通讯》的编辑。一九六七年因反对诺沃提尼被开除出共产党，旋即恢复党籍，一九六八年起草了著名的《两千字宣言》，苏军入侵后于一九六九年再度被开除出党。著名文学著作有：《嘈杂的公寓》，《斧头》等。——译者

拥护者还在捷共内部和整个权力机构中占据着很多职位，并且得到国外的支持，整个“复兴进程”可能要受到阻碍和威胁。说穿了，也就是清楚地表明了这样的顾虑：可能导致苏联的干涉。在通篇文件里，政治问题和人道、道德问题像乱麻一样，纠缠在一起。文件的这种表达方式，在当时是很典型的，但这样提出的问题在政治上没法作出回答。文件里还存在一些内在矛盾，这是因为作者特别重视的基本人道和道德问题，是用他自己所提出的含糊不清的政治办法无法得到解决的。如果瓦楚利克把这个文件作为他个人的文章只在《文学通讯》上发表，那就不致于引起紧张的政治局势，因为这尽管是独树一格，但也只能表明个人对时代问题所持的态度。

但是文件具有呼吁书、宣言书的性质。许多赞同的人签了名并且鼓动更多的人去签名。文件在好几种报刊上同时发表并非偶然：因为它本来就想成为有关当前局势问题公开讨论的主题。就这方面而论，文件想要影响捷共内部的重要讨论和党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实际上，他们想以《两千字宣言》及其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取代捷共的行动纲领和纲领的改革思想，而成为广大群众以及捷共内部的政治讨论的基础。这一切当然都说不上是什么犯罪，从民主的政治制度观点来看，也没有什么不正常。因为任何一部分公民公开申明自己的观点，为自己的观点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并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对公众施加政治影响、甚至对政府施加压力，这在民主制度下是正常的作法。

不过一九六八年六月底，捷克斯洛伐克的制度并不是这样的民主体制，不是各种不同的利益和观点随时都能以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见解的多党制政体。这样的政体下人们不会因类似的事件而遭受到重大打击，更不会因此而在政治上受到威胁，整个社会对这样的作法也是习以为常，并且深知这样的作法并不意味着图谋

政变，而那些申明自己意见的人也并不是想要夺权。在民主的制度里，当权派也都明白这个道理。可是在捷克斯洛伐克，情况却完全不同。在这里，还是刚刚要实现民主化和进行变革的极权政治体制，体制结构的变革还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只有唯一的一个重大例外，那时真是实现了言论自由。被统治者和统治者都还没有习惯于民主的政治生活。因此，像《两千字宣言》这样的呼吁书就起了不同的作用。被统治者对其意义看得过重，统治者也被吓得心惊胆颤，这和呼吁书的内容并不相称。

在一九六八年六月的时候，当权派内部的组成情况还很特别，以至于当务之急是首先以官方的改革纲领为基础，也就是说，在捷共行动纲领的范围内争取尽可能多地联合当权的人士。在当时能不能作到这一点还是个问题。在这样的非常时刻发表对立的纲领，就必然要危及这一进程，何况还有一个莫斯科在那里盯着。《两千字宣言》大致是在苏联集团五国共产党自华沙发出有名的最后通牒式信件之前两星期发表的。当时已经感觉到了它们的威胁，《两千字宣言》也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因此很清楚，支持这个宣言的人肯定是认为在此时刻应该宣布更加激进的纲领并支持比党的领导更为激进的势力。

从改革派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来看，使用这样的办法，对党的领导施加压力，使之也变得激进起来，这无疑是改革派共产党人中的激进派、特别是激进的党员知识分子的意图。但是，他们的大方向是什么？目的是把那些由于害怕丢掉乌纱帽而开始反对改革的人撤职。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当时的情况是，这些人本来大多数都是要在两个月之后党的代表大会上被撤职的。那么为什么又采取这种步骤？因为激进的改革派共产党人担心，撤职的人数太少。出于这样的担心，他们便自己捂着自己的眼睛，不看任何其它对整个改革更为严重和危险的东西。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自己认为，发表《两千字宣言》在政治上是极其严重的事件，并且在当时对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也是一种威胁。我不相信，人民会按瓦楚利克的设想，动手大批地建立“自己的公民委员会”。不过我担心，这一切说明，一些有影响的改革派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已经下定决心，要使用他们掌握的一切手段，大干一场，当时他们拥有的手段要比官方在群众中有影响的手段强大得多。这样的作法将在统治集团内部引起冲突，以至于危害改革的稳定，给党的领导招致来自外部、来自克里姆林宫的更大压力。我认为当时在政治上不至于引起比这更为严重的后果，但这已经是够严重的了。

那么，党的整个领导层对《两千字宣言》反应如何呢？六月二十七日，吃过午饭之后，突然召开了主席团和书记处的特别会议。我想，当时不在布拉格的人员没有参加，因为他们不可能如此迅速到会。据我记得，部分与会人员并不知道为什么开会。他们没有时间看报，只读专门给领导人准备的参考资料，那里还没有来得及转录《两千字宣言》。因此，讨论进行不下去，我们不少人像是学生在教室里悄悄地看夹带那样，在会议的过程中才阅读了被指控的宣言。

那些把宣言看作是对苏联宣战的领导人，首先在会上发言。他们谈到反苏挑衅，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内战，一九四五年捷克斯洛伐克的解放，以及同《两千字宣言》联系不大上的题目。斯姆尔科夫斯基在讨论中表示了相当反常的看法，过去他在讨论其它问题时都不是这样的。可能因为他刚从莫斯科回来，还受着莫斯科谈判的气氛的影响，他认为内战和坦克是迫切需要谈论的问题。他明确表示：“我不愿承担使局势发展到必须用坦克来解决问题的责任。”

很清楚，在那个时刻提出任何建议都没有什么用处。和其他

类似的情况一样，时间将会发挥自己的作用。果然，对第一轮题目进行一个小时的讨论之后，就开始讨论别的题目，研究《两千字宣言》作者和签名者的主观意图。人名非常之多，因而要讨论的材料也很多，例如谁大概会怎么想，他的目的何在，为什么参与其事，谁知道或是不知道这些人过去的情况，他们什么时候干过什么好事或是坏事等等。因为在《两千字宣言》签名者当中，不仅有一般的共产党员，还有一些捷共中央委员，所以也有必要讨论党章、有必要讨论民主集中制的列宁主义原则。这至少又讨论了一个钟头。

讨论之后，照例休会。休会有助于改变一下气氛。休会之后，往往开始讨论另外一些题目，但有时却相反地一切又从头开始。斯姆尔科夫斯基在会议过程中出去参加议会会议，回来之后把议员们讨论的情况向大家作了汇报。议会的讨论和党的领导机构的讨论是类似的，这又引起对某些问题进行再一次的讨论。讨论中有人——可能是斯姆尔科夫斯基——建议由政府出面对问题表明态度。这当然直接关系到切尔尼克。切尔尼克的意见是，党的主席团应该先表态，否则政府将根据什么去表态呢？于是，讨论中出现了转折，必须考虑要在决议里写些什么。因而又开始了新的一轮讨论，大家都想把自己的看法和关心的问题写进去。这样，讨论就又一次出现对全部改革方针发表意见的高潮。又是几个小时过去了，全部是泛泛的议论，什么行动纲领、积极的工作、民主运动的积极方面、出版自由，等等。

后来，终于提出了需要有人起草决议的问题，接着便授权给姆林纳日和齐萨士。由于我对此早有预料，故已作好准备，在讨论中提出了我的看法，通过讨论，来为我吸取我认为应该写进决议的思想作准备。然后我们就和齐萨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动手起草。我知道他大概会写些什么，他也知道我大概会写些什么。然后在此基础上共同写出初稿——有些地方我们把两人不同的提法都保

留下来，以供选择。在我估计主席团会选择我的提法的地方，我尽量争取把双方的提法一同保留下来，而他也根据他的看法，作了同样的努力。至少我们两人认真地讨论了为什么我们要把某些东西写进决议。在此期间，主席团的会议处于半休会状态，但还在继续进行纠缠不清的团团转的讨论，在讨论中谁大致会说些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说这些，大家事先都是一清二楚的。

室外早已天黑，普通人在看电视。党的领导人在继续开会。他们到第二天从特别参考资料中才能得知电视节目的内容，也许他们从中又为再次举行会议得到某些启发。黑夜里，在捷共中央大楼前面，停放着一些塔特拉 603 型黑色轿车，会议厅的窗子射出明亮的灯光划破了夜幕，过路的人也许由于对当时全国政治和民主的狂热而怀着敬意地赞叹，在这夜深人静之际，杜布切克领导集团还在那儿指挥“民族复兴的进程”。在黑暗中发光的还有几个窗子，那是书记们下属人员的办公室，各个房间都有女秘书、助手和司机，他们等待着，怕万一领导同志们需要作记录、提供帮助，或者是坐车外出。在不需要他们的时候，这些人员就处于待命状态，聊天、看书、织毛衣或是喝咖啡。

会又继续开起来，我和齐萨士宣读决议草案。当然又不只是对草案提出修改建议，而且再一次重复已经说过的那一套。切尔尼克因为必须连夜召开政府会议，离开了会场。可是皮勒尔来了，他由于喝了几杯烈性酒显得极其兴奋。当讨论到在决议里是否应该提到“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两千字宣言》作者们的好意”(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作者究竟是谁)的时候，皮勒尔向党的领导人担保说，他的那个州的民兵指挥员们都是拥护杜布切克的，杜布切克指向哪里，他们就打到哪里。会在继续开，意见越来越少，对草案的思想和内容未作任何更改，这样，国家政治权力最高机构的决议就慢慢地出生了。

会议室里烟雾腾腾，列纳尔特打开了窗子。室外，天已破晓，列纳尔特说：“诸位，别再昏头昏脑的了，外边鸟已经叫了。”大家沉默了一会。真的，朴素的列特纳广场上，鸟儿已响亮地唱起了欢乐的、完全是非政治的歌儿。保守的、进步的、中间派的，都没人要求发言了。杜布切克向大家表示感谢，会议结束。捷共中央主席团对《两千字宣言》所作的历史性的表态就这样地出世了。

不过，再回过头来谈谈政治。党的领导集团的这种工作方法到底意味着什么？党的领导集团各个成员根本没有把决议的内容当作自己个人对问题的看法而接受下来。从《两千字宣言》的背后看到内战和坦克魔影的人，虽然没有坚持把自己的想法写进决议，但还是把自己的想法隐藏下来并且保持下去（斯姆尔科夫斯基是例外，他在这个问题上不久就改变了看法）。另一方面，本来极愿意同激进势力达成某种协议的人，也没有坚持在决议里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同样地保留了自己的观点。所以，尽管大家都同意了这项决议（根据决议，主要是应坚持和具体实行捷共行动纲领所提出的路线，并且在这条路线下把所有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但是实际上领导集团内各派人士并不因此而改变自己的作法，作出决议之前怎样干会后还是照样干下去。

例如，一方面，英德拉向党的州委会发出内部指示，把局势简直说成是反革命政变的前奏，并且采取了应变措施；比拉克、科尔德、什维斯特卡、雅盖什这样一些人，在各种大小会议上也是各讲各的一套，内容大致都和作出决议之前一样。另一方面，克里格尔、斯姆尔科夫斯基在公开讲话中反复强调和解，主要是说，没发生什么严重问题，重要的是大家要有良好的意愿。领导人在和《两千字宣言》签名者会见时，讲话的基调也是这样。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拉维克，也许还有其他一些人员，参加了这次会见。

正像我在本章开头时所说的那样，即使一九六八年春夏的形

势完全按照我的设想发展，至今我也还不敢肯定，改革工作能否真的免遭不测。苏联大概还是要干涉的。在这种情况下，发表《两千字宣言》就比不发表要好。因为如果不从政治策略的角度去评价这个宣言，应该承认它是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的，因为宣言向人民指明，不管现政权的特殊利益与前途可能性如何，群众是能够作为自由人行事的。《两千字宣言》作为反抗暴政的记录，以其内容和方式为未来树立了某种榜样。瓦楚利克的宣言发表九年之后，布拉格又出现了另一个文件，即在某些方面相类似的《七七宪章》。签名的又是瓦楚利克和当年在《两千字宣言》上签过名的部分人士。这一次我也在上面签了名。签名的还有克里格尔、西蒙、斯拉维克，他们也都参加过那一次会议，对反对《两千字宣言》的正式决议表示过同意。

是这些人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也起了变化？当然，观点的发展变化肯定也是起了作用的。今天，统治捷克斯洛伐克的仍然是极权专政制度，但已不是想要进行民主改革的那个专政制度，而是相反，它要强化自己，使之成为暴君专制制度。因此，对那些想要保持自由人骨气的人，就只能在不自由之中把自己当作自由人来生活，而不管这会给专制政权造成什么困难。因为照顾胡萨克领导集团的处境并不会使民主的前景越来越接近，而当通向政治民主的大门一旦再次微微开启的时代到来时，自由公民的骨气就具有重大意义了。一九六八年的经验，包括《两千字宣言》的经验，对于这样的时代，同样也是有意义的。因此，我再一次在这里公开申明我的观点，我想这样作是正确的。任何关心捷克斯洛伐克民主的人不会因为我重申自己的观点而认为，往日的一个当权者企图表明他的主张在当时也许能够挽救局势，不会认为我是固执己见。我并不想表明这一点，而只是再次重申，连我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也没有信心。

当时在一九六八年夏季，我确曾认为，要想实现民主，除了对整个政治制度进行可以被人接受的、并且在政治上小心谨慎的改革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违背这个原则，就会给民主化的现实可能性带来损失。我不愿在此详细说明我对捷共十四大以后政治和国家体制发展的设想。我的看法已发表在我所起草的文件里，这些文件曾在国外出版。①

简而言之，我原设想，必须在最近两年的实践中检验捷共行动纲领所提出的改革会带来什么样的成果。这段时间是一个过渡期，在这个期间，要拟订国家的新宪法。这个时期选出的议会应是立宪议会。两年结束时，必须根据实际经验，建立新的、更加民主的选举制度，并且在宪法上保证在企业和其它工作部门建立自治制度。较为民主的工会和其他的组织已从实践中取得了经验。捷共本身根据新的、已经公布的党章草案，也已成为实质上更加民主的组织，它也从实践中取得了经验。我认为，改革后的捷共必须继续保持领导权。我认为，多党制问题以及多党参加民主选举问题，这在今后十年之内可以得到解决。也就是说，照我的推断，这个问题从方针到实际措施，在本书出版的今年都可以在捷克斯洛伐克得到解决。

从内政方面着眼，我看类似这样的规划在一九六八年夏季是切实可行的。六、七月间为选举出席捷共代表大会而召开的那些党代表会议说明，党内最强大的潮流是“中间派”潮流。支持这一潮流的人约占选出的代表总数的百分之八十，是大多数。其余大致是激进的改革派共产党人和往日的极权制度拥护者各占一半。在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主席团里，力量的对比也可以用类似的比例计

① 《坦克当头的代表大会——捷共非常十四大》，维也纳欧洲出版社一九七〇年捷文版第二一四至二二九页，“对十三大以来党的工作和社会发展的剖析以及党在最近期间的任务”。

算。

我估计，在捷共外部、在捷克斯洛伐克整个社会上，局势的发展大致将是这样：全国的欢庆热潮在捷共十四大之后将逐渐衰退，人们的困难、矛盾和不满将要出现。但是有理由相信，公民的大多数在此时期仍将会支持逐步改革的合理化政策。如果我的政治观点能在新的、由党代表大会选出的捷共领导人当中占上风，那就意味着要和改革派共产党人中的激进派发生冲突。我看这对民主制度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问题。在这样的制度之下，经常同政治上的极右或极左发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这种矛盾可以用民主的方法、而决不是用专制的办法去解决。

但是，我的政治设想也好，整个民族的发展也好，最后都不是通过民主争论和内部冲突的办法获得解决的。是克里姆林宫最后以命令的方式作出了决定，而这个决定的有效期是相当长的。

第 三 章

克里姆林宫的审判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将近午夜的时候，党的主席团会议尚未结束，突然，切尔尼克被叫出去接电话。他回来后宣布，国防部长楚尔来电话说，苏联和华沙条约另外四个国家的部队已经进入了我国的国境。我感到震惊，犹如几年前在一次撞车事故时那样吓呆了。这就是我的第一个下意识的感觉。

我脑海中有如看电影一般浮现出一幕幕的场面。战争刚结束时的街垒，坦克，倒在大街上的死伤人员和我的亲人们的面庞交替出现，一会儿是南捷克州的风景，一会儿又是莫斯科大学的庞大建筑。我明显地感到，我的共产党员的生涯就此完结了。接着我又突然觉得什么都没有意思，思索没有用处，采取行动也毫无意义。后来，我才回到那渺茫的、但可以触摸到的现实中来。同样是几秒钟前的那个会议厅和那些人，而今却完全变成另一个世界，与一瞬间前的那个世界已毫无共同之处了。

我像看电影一样，看着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听着人们的议论。切尔尼克进一步告诉我们，楚尔部长在办公室里被两个苏联军官扣押了，他们只准他给总理打这个电话，此外，什么都不许他干，其他高级军官的命运也大致如此。杜布切克听后说："他们真的动手了，冲着我来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有人，大概是克里格尔，提到这是对我们民族背信弃义的行径。有人提议，立即把斯沃博达总统请来开会。比拉克从座位上站起来，在椅子后面踱

来踱去，他大声叫道："你们整我吧！为什么不把我杀掉?!"谁也没有理会他，也许大多数人根本没注意到他，也根本没注意别人的言谈、手势和动作。大家都各想各的。我想，即使那些事先知道这场干涉并盼望其到来的人，包括比拉克在内，此时此刻也会感到震惊的。他们的震动倒不是由于灾难的突然降临，而是由于隐藏在内心的紧张突然松弛下来，以致使他们在一刹那间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

我愈来愈强烈地感到，我一生为之奋斗的一切就此完蛋了，我的政治倾向的最后阶段，改革的共产主义，也随之破产了。从全书中可以看出，我把它当作一种政策，而苏联的军事干涉使这一政策彻底破产了。我还猛然觉悟到，希望在军事入侵后继续搞政治改革是荒谬的。对军事入侵的可能性，过去我虽然考虑过，但那只是理论上的设想。这时我才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政治见解已没有任何出路，它成了多余的、无意义的了，它彻底失败了。

随后，我在发言时表示，我要辞去现有职务，因为在这种形势下，我已无法再为我一直自觉为之奋斗的事业继续奋斗了。杜布切克也表示要立即辞职。我认为，出于种种原因，他主要觉得这是他个人的失败。从他的话里可以看出，他感到了打击的沉重，但正如我前面讲过的，他对这一政治事件的理解是有些家长式的。从他的话音你会觉得他在扮演扬诺西克①的角色，即：如果他们对我有意见，那就整我一个人好了！就是非刑拷打，也由我个人担当！

他的一席话慢慢把大家带回到现实中来。大家议论说，谁都不能辞职，一切合法成立的机构及其领导干部都必须坚守岗位，决不能在干涉的压力下去成立什么新的机构，搞新的任免。这时斯沃博达已经来了，他也参加了讨论。他面色苍白，表面平静，内心

① 斯洛伐克民族传说中的绿林英雄。——译者

却很激动。他在整个会议期间话虽不多，但我记得，他明确反对任何人辞职或擅离职守。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就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开会也忘不掉那套会八股：要搞个决议，并委托姆林纳日负责起草工作（我想，是杜布切克提的建议）；要召开捷共中央全会，召开政府和议会会议。通过讨论，大家认为武装抵抗是行不通的。其实，那也谈不上是讨论，只是摆些事实而已。也根本无人主张武装抵抗，人们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都是引用各种论据来说明武装抵抗是行不通的，是错误的。

为什么不进行武装抵抗呢？许多人当时和现在都对此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没有身居党的领导岗位。为什么身居党的领导岗位的当事人明确排除军事抵抗的办法呢？现在先来谈谈当时的事实根据。

首先，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像苏联集团其他国家的军队一样，是没有独立性的，关键部门都有苏联军官，它的装备和技术设施（如军事通讯联络、密码等等），苏军不仅熟悉，而且是由他们直接控制的。军队的部署情况也使我们根本无法采取有效措施来抵抗华约集团的盟国对我国的侵犯。这支军队的指挥员的情况也不能确保在发生上述冲突的时候，不站到苏联方面去。姑且不谈进犯者的强大优势，从军事角度讲，一个国家也不可能单独有效地抵御苏联集团各国同时发起的进攻。它能做到的只是在明显优势面前，依靠各地的武装短暂地阻挡一下入侵者的前进而已。

为了把一九六八年八月的具体情况说得更加清楚，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杜布切克上台后对于军队领导的人事变动是根据他的个人关系和个人好恶进行的。按这一标准来说，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倒是“杜布切克的人”。可惜，他们还有别的特点。楚尔部长五月份就曾在华约国军队司令雅库鲍夫斯基元帅的面前把捷

军说得一塌胡涂，说它战斗力极弱。雅库鲍夫斯基听完后立即亲热地拥抱他，连连说："真是朋友之间的知心话！"这意味着什么呢？楚尔实际上向苏联元帅提供了苏军进驻我国的论据，即必须保证"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防御能力"，因为一旦"帝国主义发动进攻"，捷军本身是不可靠的。杜布切克时期我军的总参谋长是贝德日赫将军。此人既无能，又是斯大林主义分子，但他是杜布切克儿时的朋友，两人是一起在苏联中亚长大的。相反，普尔赫利克将军尽管在华约国规定的范围内尽力加强捷军的相对独立性，但却在苏联的压力下被解除了捷共中央国防公安部部长的职务。他是在忠于诺沃提尼的马穆拉①一九六八年一月下台后任职的。从七月起，这个部由杜布切克亲自领导，确切地说，这个部自此也就名存实亡了。当然，这番话只是为了更完整地说明情况，即使没有这个因素，从军事上讲，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也是无法抗击华沙条约国以保卫祖国的。

从政治角度看，武装抵抗实际上只能变成地方性冲突。很明显，这恰合干涉者的心意。这样就会出现和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一模一样的形势：互相射击、武装冲突、死人，等等，从而使所谓我国存在着准备打内战的"反革命势力"的论调更加可信。相反，如果干涉者对一个国家单方面发动武装进攻，而该国却一弹未发，这就向全世界最清楚地表明，究竟谁是侵略者。

此外，还有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因素。杜布切克领导的整个政策、捷共的行动纲领以及党的领导机构中的共产主义改革派的设想，都是明确地以这样一种思想为根据的，那就是：遵守对华约其它国家应尽的义务和民主改革这两者之间是不矛盾的。这绝非表面说说而已，捷整个方针政策的内容都是如此。捷共领导根本不

---

① 诺沃提尼时期的实权人物，长期担任党中央主管国防、公安事务的部长。现任捷共北摩拉维亚州委第一书记。——译者

打算也不愿意仿效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的做法同苏联闹翻。相反，它认为重要的是用实践来证明：在同苏联集团其它国家结盟的情况下，也可以执行独立的政治路线。

在这种情况下，捷共领导人在心理上也无任何武装抵抗苏联入侵的准备。这里我不好谈别人，但我可以说说我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如果当时由于捷共领导号召进行武装抵抗而造成牺牲的话，那么，我的良心是不会为此受任何责备的。因为我当时认为捷共领导通过抵抗行动所能得到的现实结果，是连一条人命也不值的。

就我个人来说，这一次夜间的会议和其后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会谈都使我意识到，我的政治态度直接关系着成千上万人的生死存亡。这样一种处境同明知不会影响人们的性命而只是抽象地议论某一件事是否正确，是否有原则以及是否道德等，是大不相同的。所以，斯沃博达总统当时一再反对让人白白牺牲，对此我是理解的，我不象那些明知自己不会对人们的流血牺牲承担责任而事后进行抽象议论的文人们那样去无视、甚至鄙视斯沃博达的那些论据。

但是，八月二十日夜间的那次党的主席团会议只谈到不进行武装抵抗的政治原因和要对人民的生命负责的问题。至于上述其他理由，主席团的成员们只是想到了，但并未说出来。那些为干涉效劳的人之所以对此问题不予考虑，则完全出于另外的原因。

后来，杜布切克忽然说，三天前他收到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他觉得有必要读给我们听听。他异常激动，读的时候比平时更加结结巴巴。信中充斥着当时典型的莫斯科的胡言乱语，说什么《文学报》和《报道员》杂志上刊登的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文章破坏了切尔纳和布拉迪斯拉发的协议①。读信时，也许有个别人在听，其实只不过是在走过场罢了。有人在担忧民族的命运和本人的前途，预

感到自己就会被逮捕或流放了，而另一些人则恨不得马上到苏联大使馆去成立新政府。但大家都坐在这里，沉默不语，各有所思，断断续续听到信的一点儿内容。其实，写信的人可能刚落完款就颁发了命令，规定于“H”时开始军事侵略行动。

不少人去打电话。我估计，主要是给家里打电话。我也想打，但是不行，因为我得拼凑对局势看法的文件。后来，杜布切克念完了信。有个同干涉者早有勾结的人还企图挑起争论，指责杜布切克私藏此信三天，因而酿成大错。遗憾的是，争论不起来。有人建议杜布切克给勃列日涅夫打电话。杜布切克逞强地一口拒绝，说他们自己会来电话的。接着，我提出决议草案，也就是那个《告全国人民书》。

草案中有句话是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能进行军事抵抗的，讨论后被删掉了。看来，领导人对“武装抵抗”几个字望而生畏，即使说“不进行抵抗”也觉得危险。原稿中下面的一句话是：“所以，我们的军队……未得到保卫祖国的命令。”这句话原封未动地保留下来了，但前面缺乏解释原因的句子。当时谁也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奇怪的是，时至今日，所有谈“布拉格之春”的文章在引用这个文件时，都没有发现这个漏洞。也许是因为在党的决议中比这更不合逻辑的地方也经常出现的缘故吧！

后来开始出现分歧，并且形成激烈的争吵，最后按老办法进行

---

① 一九六八年七月初，苏联纠集波、东德、匈、保等党在华沙开会。七月八日电召捷党领导人去华沙开会，企图再次集体对捷施加压力。七月十二日，捷方正式表态，拒绝举行多边会议，表示愿进行双边会晤。七月十九日，苏接受捷方意见，建议在苏境内举行双边会晤，双方全体主席团成员参加。二十二日，经捷方力争，双方达成协议，决定于七月二十九日在捷苏边境捷方一侧的城市切尔纳举行双边会谈。八月一日会谈结束发表公报，宣布八月三日在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发举行保、匈、东德、波、苏、捷六党会谈。八月三日，六党会谈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中写进了保卫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成果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译者

表决，表决是否起码应表示一下捷共领导支持人们对干涉进行非武装的、政治和道义上的抵抗。具体是这样一句话："捷共中央主席团认为这一行动(指干涉——译者)不仅违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各项原则，而且违背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主席团有表决权的人当中投票反对的有：比拉克，科尔德，什维斯特卡和里戈。无表决权而持反对立场的有英德拉，卡佩克和雅盖什。有意思的是，当时连他们也不敢说干涉是符合国际法的，他们只是坚持说这种提法只能使局势复杂化，说这是共产党之间的冲突，家丑不可外扬。他们不敢说干涉本身是合法的，而只是再三强调，我们也有错误，我们低估了干涉的可能性。至于后来那些人经常吹嘘的什么"阶级兄弟之间的兄弟般的国际援助"、"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挽救"一类提法，那天夜里可谁也没有说出口。

克里格尔和斯姆尔科夫斯基提出，谁赞同干涉，谁就是对民族的背叛。这句话引起了一场争论。最后，声明草案得到通过，投票赞成的有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什帕切克，切尔尼克，皮勒尔，巴尔比雷克；无表决权的人中持赞成态度的有西蒙，齐萨士，斯拉维克，萨多夫斯基和我。列纳尔特持何态度，我记不清了，但我有个印象，当时他也没有支持比拉克派。杜布切克只对"违背国际法"的提法有些犹豫，后来在斯姆尔科夫斯基一再催促他明确表态的情况下，他才说："咳！ 这也是事实！"表示赞成这个提法。斯沃博达列席会议，无表决权，我不记得他曾参与了那场争论。

已将近凌晨一点半了。我早在两小时之前就觉得我们这些共产主义改革派已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这时杜布切克才宣布散会，叫大家各返"自己的工作岗位"。整个亲莫斯科派都松了一口气，溜走了。但雅盖什除外，他大概负有监视他人的任务。切尔尼克去召开政府主席团会议了，齐萨士也离开了捷共中央大楼。其余的人都留下没走。

*　*　*

关于入侵之前捷共杜布切克领导集团同苏共政治局之间的关系的发展情况，迄今已发表过不少文章、评论和书籍。我当时并未参加捷共同苏共及苏联集团其它党，特别是波、德等党所进行的、导致相互关系逐步恶化的一系列谈判，如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的德累斯顿谈判，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至四日的莫斯科谈判，①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一日的切尔纳会谈等。直到苏联集团六国共产党代表在布拉迪斯拉发开会时，我才参与其事，不仅参加了会议，而且还同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一起参加了起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的工作会议。这个工作会议由每个党的第一书记和政府总理参加，有的人还带了顾问和翻译。

整个会议很简单：勃列日涅夫代表苏联代表团提出“声明”草案，然后用几个小时时间逐句进行讨论。对草案提意见的主要是捷共代表团。声明的内容就是苏联报刊社论中惯用的那些说法，不了解情况的人根本无法理解，这类话怎么值得党政首脑讨论这样长的时间。可惜，实际情况确是如此。

众所周知，布拉迪斯拉发会议是在苏共和捷共主席团切尔纳会谈的基础上产生的。在七月三十一日晚间的会上，谢列斯特以最粗暴的方式指责捷方并造谣说什么捷想要使喀尔巴阡山乌克兰脱离苏联，还说克里格尔是“哈里奇的犹太人”②，不配作他的谈判对手，如此等等。杜布切克等捷共代表团团员当时退出会场，表示抗

---

① 苏联为了对捷施加压力，纠集匈、东德、波等党于三月二十三日到东德的德累斯顿市举行会议，会议公报称，各党交流了情况和意见，坚信“捷将进一步发展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五月三日至四日，杜布切克率代表团赴苏谈判，希望求得经援和贷款，苏方对捷继续施加压力，对其经济要求未作肯定答复。——译者

② 哈里奇位于现波苏边界的南端，是克里格尔的故乡。——译者

议。这一天的会议以破裂告终。后来苏联政治局表示道歉，会议改成分组进行。八月一日上午，杜布切克同勃列日涅夫单独会谈，这次会谈产生了六国党在布拉迪斯拉发会晤的建议。①

据我所知，杜布切克同勃列日涅夫会谈以后确实认为，勃列日涅夫在设法对付苏共政治局中的"鹰派"人物（其代表是谢列斯特，后台是老一代的元帅）和乌布利希、哥穆尔卡的压力，他俩同"鹰派"人物一起造成了同捷进行公开冲突和对捷进行军事干涉的紧张局势。干涉的真正背景并非《文学报》文章中的一些说法，这不过是宣传。真正的背景是，他们认为整个苏联集团及其安全已受到威胁，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影响了该集团的战斗力和它在莫斯科霸权控制下的政治团结。

杜布切克和勃列日涅夫在会谈中就举行六国党会议的问题找到了共同点，即：如果勃列日涅夫想要显示整个集团的牢固团结，那么，捷内政问题就无需在会上讨论了。这一点杜布切克是可以接受的。这样，会上可以讨论一下捷克斯洛伐克对整个集团必须履行的义务，并在此基础上达成一些协议。倘若讨论内政问题，这些协议是难以达成的。在这种条件下，杜布切克同意参加类似在华沙举行过的六国党会晤，而勃列日涅夫也同意捷内政问题将不作为讨论的议题。有了这种先决条件，杜布切克在当时是愿意在任何承认莫斯科的霸权和捷克斯洛伐克从属于苏联集团的文件上签字的。他以为，这样可以摆脱"鹰派"的压力，避免军事干涉的危险。归根结底，这也符合他的思想状况，因为他确实从未想到要

---

① 切尔纳会谈只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公报，但保留了一份长达五百页的正式记录，作为密件存在捷共中央。未与会的捷共领导成员，包括我在内，都看了这份记录。关于会议的一些细节，我同亲自参加会议的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什帕切克和西蒙都具体谈过。有些情况已在斯姆尔科夫斯基去世后发表的回忆录中发表了（见一九七五年二月《通讯》杂志）。

使捷克斯洛伐克脱离苏联集团。当时他相信勃列日涅夫是不想进行军事干涉的，并且相信自己可以用这种办法争取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还曾向杜布切克许下诺言，保证在布拉迪斯拉发会议期间任何人(特别是乌布利希和哥穆尔卡)不得对捷的内政提出批评。

实际上，苏联准备在布拉迪斯拉发提出并要捷共代表签字同意的"声明"草案中，很多提法都涉及捷的内政问题。当然不是赤裸裸的，而只是肯定了华沙会议参加者信中所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有些话看起来像是报纸社论中的陈辞滥调，而且政治含义隐晦，但决不是无所指的。因此，引起了好几个小时的讨论。

在有了一九六八年八月的经历后再回头看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在布拉迪斯拉发会谈中捷共代表团所得到的全部措词和提法上的胜利都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可笑的，实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譬如，草案中有一段提法是说国际局势更加紧张，同帝国主义发生冲突的危险增加了。后来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改成"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国际局势仍然是复杂的、危险的"。草案中对德国形势的提法是，反对西德复仇主义政府的只有两种"和平力量"，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西德共产党。后来正式声明中只提"西德的复仇主义、军国主义和新纳粹主义势力更加活跃了"，并且明确指出，除了支持乌布利希和德国共产党外，还应支持那些"反对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和争取民主进步的力量"。在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具有普遍约束力一段话中，捷共代表团争取加上了这样一句话："同时各国党要创造性地解决今后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并要考虑民族的特点和条件"。

在布拉迪斯拉发"声明"中有这样一句话："对各国人民付出英勇努力和忘我劳动所取得的成果加以支援和保护，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国际主义义务"。一九六八年八月后，党内那些"正

常化"派一直把这句话说成是干涉的根据，说成是杜布切克曾承担义务并同意干涉的证据。一九七〇年，这句话又略事修改写进了捷苏条约，后来成为苏联集团国家的主权有限论这一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基础。

在布拉迪斯拉发开会时，确实就这句话讨论了很久。我想，捷共代表团中当时没有谁会想到这句话日后竟会被解释为同意干涉，不过人们是有所担心的。因为从"声明"稿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写上这句话并不只是一句空话，因为在这句话后面紧接着还有一句着重强调的话："这是全体与会者的一致观点……"。这种提法曾引起我的怀疑，好像是他们想要弄到文字根据，证明捷共曾同意这一句话。为此，我当时曾建议给这句话加上一个附加语："同时要尊重各国的主权和民族独立"，并建议把这一附加语同前句用破折号连接起来，后面用句号圈住。

勃列日涅夫当时马上就发言反对，他提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理由说，在这种句子后面加破折号在俄语上是不通的！从俄语角度加逗号或分号也都不通，总之，不让在那个有争论的主句后面加上这个附加句。他说，反正主权、民族独立、平等、领土完整和兄弟合作，在后面第三段还要明确提到，为什么每句话都要提呢？其它一些重要原则在行文中也没有重复，文字必须简练，等等。

勃列日涅夫的反应当然使我们对这句话背后隐藏的见不得人的意图更加感到怀疑。尽管声明是共同的，但乌布利希、哥穆尔卡和日夫科夫对这种句子毫无异议。相反，他们都支持勃列日涅夫玩弄语义双关的文字游戏。其实，这个文件从头到尾都是党八股式的陈辞滥调，不管是俄文本还是匈牙利文本，都是如此。顺便说一句，据我记忆，在这个问题上卡达尔未对勃列日涅夫表示明确支持，在争论过程中他甚至还支持了捷共代表团的一些修改意见。

是否勃列日涅夫那时就企图把这句话作为军事干涉的根据

呢？也许是这样。但我认为，当时他只是想应付各种可能的情况而还未作出要在十七天后进行干涉的具体决定。

杜布切克在布拉迪斯拉发想采取拖延战术，争取力量对比有利一些，所以提出，如果“联合声明”有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甚至阿尔巴尼亚代表参加签字，其国际意义会大得多。他自告奋勇要去争取铁托和齐奥塞斯库参加会晤，在此之前，声明暂不签字。他的建议简直是捅了马蜂窝，最后当然是毫无结果。

这次会谈以下午举行的午宴、隆重的签字仪式和车站上的拥抱、接吻而宣告结束。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苏联集团内部的“最高级”会谈，我的感受是可怕的。

乌布利希和哥穆尔卡好怒而傲慢，他们已衰老了。显然，他们对本国或邻国出现的任何新问题不仅不能理解，而且拒绝去研究。他们俩已完全陶醉于自己的权力之中。

我曾目睹乌布利希同杜布切克的一次谈话，当时乌布利希说：“我是到你们这里来访问的，但是在机场上我只听见人们一个劲儿地高呼‘杜布切克！’‘杜布切克！’听不到别的口号，这是不是由于我不懂捷文，没听懂？”

乌布利希显然认为这是捷克斯洛伐克在政治上背离国际主义的证明。就个人而言，如果高呼他的名字，他是绝不会发窘的，如果杜布切克叫士兵和小学生高呼“乌布利希”，他会表示欢迎的，因为那是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的“友好表示”！

哥穆尔卡和乌布利希不断地在公开的演说中对捷局势进行恶毒的影射。这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不友好，而且是对于那些在他们国内也引起了麻烦、使他们害怕、而他们的专政机关又完全无能为力的各种因素的一种自发的憎恶、愤懑和仇恨。

日夫科夫那时还比较年青（不到五十五岁），但他极其迟钝。多年来我对高级领导人并无过高的要求，但在活生生的日夫科夫身

边观察他，这可真是难得的生活经历。他在听别人讲话时，精神如此紧张和集中，生怕不这样集中就会听漏什么似的。工作会议开会期间，他有两次给勃列日涅夫帮了倒忙。那就是当勃列日涅夫改变观点、准备同意某种意见时，日夫科夫转不过弯子来，仍为原来的方案辩护，使勃列日涅夫很难堪。我还注意到，有两三次日夫科夫想发言，勃列日涅夫却假装看不见，然后再做手势叫他别插嘴。

在这些人中，不论从政治上还是就一般为人来说，卡达尔都是鹤立鸡群。我从多方面了解到，卡达尔对“布拉格之春”的态度与苏联集团其他领导人不大相同。我同卡达尔在布拉迪斯拉发的会面不仅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还给我一个印象，他在为人处世方面也是很有意思的。显然，一九五六年的经历不仅影响到他的政策，而且在他的心灵上也打下了烙印。

有一次，吃过午饭后，他与杜布切克和我一起留下，就当前的局势谈了半小时。在政治上，他的观点是：我们捷克斯洛伐克面临的局面是，如果自己不采取暴力来对付某些倾向的话，就有出现外来的暴力的危险。他在谈话中从未用过可能被指责为影射苏联干涉的提法，但同一九五六年布达佩斯事件相联系，就可明确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了。他说过，他把捷改革的成功看成是匈牙利发展的希望。他还谈到他个人的问题和感受，也谈到在苏联干涉以后他接管匈牙利政府时良心上的感受。他一再提醒杜布切克，那种处境要比他尚能掌握局势时所遇到的情况要困难得无可比拟。通过这次谈话我感到，卡达尔与哥穆尔卡和今天布拉格的胡萨克是绝然不同的人，他有政治家的特点，他善于维护表面看上去毫无意义的起码的民族利益，他顽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不会自己去损害自己的权力，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目标。当然，他这个政治家目标不高，也许在要他继续前进时，他会保守地阻止事物前进。但是，那次会见后十年来匈牙利国内政策的发展一再证明，卡达尔善

于把这种起码的目标逐步地、不加声张地向前推进。至于当着事态的发展一小步一小步地达到了应该进行更长远、更根本性的民主改革的时候，他是否还会继续干下去，以及究竟能干些什么，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大家知道，八月十七日，根据卡达尔的建议，卡达尔同杜布切克曾在边境城市科玛尔诺举行了一次会晤。根据我本人对他的印象以及杜布切克所谈的情况，我认为，卡达尔是在他知道莫斯科决定进行军事干涉后想警告一下杜布切克。卡达尔未向杜布切克透露这一决定，但明确向他暗示了干涉的意图。苏军出兵干涉后杜布切克本人也承认，对卡达尔的某些话是可以这样理解的。他还说，当他俩最后在月台上告别时，卡达尔很失望地问他："难道你真的不知道你的对手是什么样的人吗？"

就在这一天，勃列日涅夫代表莫斯科政治局给杜布切克写了我在本章开头讲的那封信。杜布切克直到那个关键的夜晚才把信拿出来。看来，杜布切克想必在收信的当时已经意识到，莫斯科发生了新的、情况不妙的变化，军事干涉已经迫在眉睫。不过我觉得，他当时未能迅速找到补救办法，因此，他和往常一样，决定采取拖延战术，待情况进一步明朗后再说。三天以后，情况明朗了，不过已经由不得杜布切克再来作什么决定了。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以后，人们曾无数次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杜布切克及其领导班子能不能用某种办法防止干涉？更准确地说，能不能预先采取措施，造成一种形势，使莫斯科不致于把干涉作为维护自己霸权的最后手段？捷共领导中那些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充当莫斯科的直接代理人、并企图利用干涉来加强自己权力的人，以及后来的"正常化"政策的信徒们，他们都认为，防止干涉是可能的。他们指责杜布切克说，党的领导没有通报德累斯顿和莫斯科谈判的情况，说杜布切克"隐瞒了"勃列日涅夫的信，等等。

这种指责是无聊的，是为“正常化分子”的利益服务的。为了能够严肃地回答这一问题，必须探索一下苏联领导最后决定进行军事干涉的原因。

我想，这些原因关系到两种性质的利益：一方面，关系到苏联的强权外交的利益；另一方面，关系到苏联领导集团中各派争权夺利的利益。由于这两种利益的共同需要，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鲁晓夫下了台。随后在莫斯科进行的关于今后方针政策的斗争，则是在一九六八年以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干涉而达到了顶峰。

从苏联的强权外交的角度来评价赫鲁晓夫的政策，其结论可以是各式各样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关于他的政策究竟对保证苏联在世界的利益起了什么作用的问题，看法是不一致的。赫鲁晓夫时代意味着“冷战时期”的结束，减少了同西方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开辟了苏联同世界进行有利的经济合作的道路，使苏联有可能用不同于斯大林时代的手段，用外交的、经济的、甚至军事的手段渗透到世界各个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从这个角度来看，赫鲁晓夫无疑是加强了苏联作为在战后新条件下的超级大国的地位。但同时，赫鲁晓夫却失去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连南斯拉夫也没有争取到，苏联军队还从奥地利撤出来了。他的反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倾向动摇了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政治关系，罗马尼亚开始摆脱苏联集团的约束。非苏联集团国家的共产党开始明显地失去自己作为莫斯科及其大国利益的代理人的作用。从这种角度来看，赫鲁晓夫则是大大削弱了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的地位。

然而，哪个更重要一些呢？是对美关系中的紧张缓和了呢，还是中国变成了反苏大国？是其在某些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远远超出自己的帝国边界之外的国家的影响加强了呢，还是在这一帝国内部，在东欧和中欧，从莫斯科霸权的角度来看，关系复杂化了呢？问

题在于我们是用怎样的政治和军事战略的更普遍的观点来观察事情的。在这里，大国利益的问题是直接同苏联权力机构内部各派的斗争相关的，因为正是这些派别看事情的出发点不一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在推行其大国利益时，军队成了权力机构中的决定性因素，而在战前，则更多地是依靠外交和共产国际。赫鲁晓夫时代末期，参加过战争的那一代元帅们在苏联军队中还有巨大的影响。这一代元帅们非常熟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斯大林时期的战略构思。用非常简单化的方式来说，这种战略考虑就是："抓在手上的东西才是靠得住的"。这是斯大林看待事物最根本的观点，用意识形态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的胜利和关于资本主义包围的理论。对于斯大林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把势力范围，即他可以直接用武力，用军队警察来统治的范围，建设成最强大的工业军事大国。整个势力范围就是那个"一国的社会主义"(这个"一国"里哪怕有十个形式上独立的国家，都是无关紧要的)。在同代表着"资本主义包围"的各国的关系中，"一国的社会主义"执行的是孤立主义的政策。由莫斯科控制的各国共产党已经变成了"一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代理人，它们是"一国"在世界这些地区的基地。

从这样的战略观点和如此理解的苏联的大国利益的角度来看，赫鲁晓夫时期确实是遭到一连串的失败。"一国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已经瓦解，中国的发展又开始形成了一个新的敌人。从传统上来说，所有的俄罗斯帝国都在这个敌人的面前吓得发抖，因为他是来自东方、来自亚洲的敌人，他使得成吉思汗和早年奴役俄罗斯的幽灵又复活了。对于首先只是想到常规武器和战争的老一代苏联元帅们来说，中国肯定是一个比大洋彼岸的、用未来的非常规战争的最新技术装备起来的"美帝国主义"要可怕得多的幽灵。

我认为，苏联参加过战争的老一代元帅们的哲学是造成赫鲁

晓夫下台和军事上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力量之一。同元帅们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还有苏联权力机构中的非军事单位，即党、政和警察机关的有权势的阶层，它们都是同一个斯大林时代的产物，它们都把赫鲁晓夫的政策看作是导致斯大林主义的信条在整个苏联帝国的各个国家内和俄国本国瓦解的原因。

然而赫鲁晓夫的政策并不仅仅是个人的政策，它在苏联权力机构内部也拥有有影响和有权势的维护者。在与苏联的大国主义政策相联系的权力机构中，属于这类人的有：与发展现代军火工业有关的集团，与该集团有关的一部分元帅和将官们（火箭部队等等），以及外交和外贸方面的集团。这些人对苏联的大国利益的看法，比起老一代元帅及与其有关的政治官僚们的哲学来说，无疑要宽广和现代化得多。这些人认为，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就必须在各种手段、首先是同美国竞赛的那些手段方面能够站得住脚，这既包括现代化的装备，也包括对遥远的、但是战略上重要的地区进行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渗透，还包括为保证苏联在世界力量的布局中占据有利政治空间的外交领域。

对这种大国战略的维护者来说，赫鲁晓夫时代并不是没有成绩的，相反，倒是沿着这一战略方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赫鲁晓夫在其统治的后期对于这个集团来说，也已不是最理想的代表了，因为他太好冲动，作了许多未经深思熟虑的决定，导致了严重的恶果，并在苏联官僚阶层内部引起了日益增强的反对。这加强了正统的斯大林主义的力量，威胁到那些主张非斯大林主义战略的集团的利益。当然，他们也认识到了赫鲁晓夫的一系列失败，特别是失掉了中国。

国内政治的权力机构中、首先是党的权力机构中有势力的集团，既投靠老一代元帅们，又追随那些坚持另一套大国主义思想的人们。这些集团不倾向于用斯大林主义的经济政治方法管理社会，

而是致力于用合理化的、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专家的方法，即按苏联观点也是民主的方法来进行管理。

与上述各种不同倾向相联系的所有勾心斗角都渗透到苏联党的政治局，其结果就是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鲁晓夫的垮台和勃列日涅夫当上党的总书记。在这以后的三年过程中，直至布拉格的诺沃提尼下台时，这些争斗在莫斯科仍未终结。像在类似情况下所常见的那样，那时看来是最有权力的人，勃列日涅夫，实际上是风云际会造成的沙皇，因为，任何一个集团都没有强大到足以建立起本集团的统治，于是大家就一起把勃列日涅夫扶到了金字塔的顶端。勃列日涅夫当时还不曾有“自己的政治局”，这个机构的任何一个成员的职务都不是他安排的，相反，是他们安排了他的职务。直到一九七〇年以后，勃列日涅夫才逐步搞掉了党的领导机构的大部分成员，换上了依附于他的人。

“布拉格之春”同克里姆林宫内的这些勾心斗角有什么关系呢？

诺沃提尼的下台同这些争斗就是有关系。一九六七年底，诺沃提尼成了勃列日涅夫个人不太感兴趣的一个人。这有两个原因：一则，诺沃提尼是赫鲁晓夫时代的遗老，同勃列日涅夫的关系不好；二则，从一九六七年起诺沃提尼就同莫斯科的元帅集团结成一伙了。这种关系也不是那样简单的。莫斯科从一九六六年起就要求在捷克斯洛伐克长期驻军，诺沃提尼抵制了这样的要求，没有同意苏联大量驻扎使用常规武器的士兵，但同意安置战略武器及其有关的专业人员(大约是八千人)。有一种看法，说诺沃提尼之所以同苏联“鹰派”搞政治联合是因为他企图减轻要在捷克斯洛伐克驻扎苏军的压力。他可能认为，他的较强硬的政治路线加上他同意安置战略武器，就可保证他在莫斯科“鹰派”中间得到信任，并减弱莫斯科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他同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关

系不好，也不会造成什么困难。诺沃提尼本人显然把勃列日涅夫看成是一个暂时的、不稳定的人物，认为把自己的命运同他联系在一起是不聪明的。

勃列日涅夫还期待搞掉诺沃提尼可以在捷克斯洛伐克加强他个人的影响，并削弱元帅们的影响。因此，莫斯科的“鹰派”把撤换诺沃提尼看作是自己的失败，把不久以后迅速发展的民主化运动看成是勃列日涅夫的过错。当时同“鹰派”集团有直接联系的是乌布利希和哥穆尔卡，他们反对“布拉格之春”的行动从一开始就是协调一致的。乌布利希和哥穆尔卡两人采取这样的态度当然都有明显的国内政治原因：他们的个人专权统治正处于和诺沃提尼政权相同或者更深的危机之中，而民主化的传染病正在邻国迅速蔓延。

来捷克斯洛伐克（在捷共、公安部门、军队和其它国家机关中）工作的苏联人，基本上属于莫斯科的“鹰派”。当时控制苏联驻布拉格大使馆的那个集团（契尔沃年科—乌达尔卓夫[①]），显然也是属于“鹰派”的。通过这一渠道送到克里姆林宫的一切东西，就其倾向性来说，一开始就有利于“鹰派”。

争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影响的斗争，也是一场如何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发展作官方解释的斗争，这一斗争在莫斯科从来就不是涉及正统观念的意识形态斗争，而是苏联政权机构内的派系斗争的一个直接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从一开始就密切地牵涉到勃列日涅夫个人的利益。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在克里姆林宫谈判时，勃列日涅夫曾偶然提到，把军事干涉也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这是一九六八年五月就决定了的。就是说，它不是在四月通过捷共行动纲领

① 苏驻捷大使馆参赞。——译者

和进行了人事变动之后马上就作出来的，同时也不是在捷共中央作出决议要召开特别代表大会和发表了《两千字宣言》之后才作出的。关于把军事干涉作为一种可以采取的(尚不是唯一的和最后批准的)办法的决定，显然在捷共中央五月全会(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一日举行)之前就作出了，因为当时勃列日涅夫在谈到五月的决定之后又接着说："后来感到没有必要"。捷共中央五月全会这只报春的燕子出现了。一九六八年五月四日，由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和比拉克组成的捷共代表团到了莫斯科。尽管当时对捷克斯洛伐克形势的批评比三月底在德累斯顿提出的要厉害得多，但那时仍未决定使用军事干涉的办法。谈判的过程(当时的报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运动亦如此)表明，克里姆林宫当时认为施加一下政治和经济压力就足够了。

然而很快(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九日的某个时候)就又决定把干涉作为一种可能的选择。看来最为可能的是，苏联领导的此项决定是在格列奇科元帅(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率军事代表团在捷访问)和柯西金(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在卡罗维发利"治病")从布拉格回去以后作出的。在此之前，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五国(后来的干涉者)首脑曾在莫斯科举行了秘密会议。捷共不仅没有与会，而且也没有受到邀请(和罗马尼亚党一样)。显然，会上哥穆尔卡和乌布利希施加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已考虑到了军事干涉。在苏联政治局作出决定之前，两个集团，元帅们和技术专家们或政治家们的代表到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视察"。其结果是折衷的方案：干涉是要的，但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进行。在实践中，还要考虑影响形势发展的其它因素。

是什么东西使得那些更讲理性的、实际上倾向于赫鲁晓夫的代表们在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军事干涉的问题上不同意"鹰派"的

意见呢？肯定不是由于他们相信，捷克斯洛伐克的“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民主化和准备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和苏联的希望。他们基本上同“鹰派”一样，是从苏联官僚集团的利益，从他们在社会内部以及整个苏联集团的统治出发来看待捷克斯洛伐克的发展的。他们反对干涉是害怕这种做法会使他们所认为的赫鲁晓夫政策在世界上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全部付诸东流。他们心目中的这些成果是：在对西方关系中紧张局势缓和的气氛和苏联同世界发展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前景。他们担心，在苏联国内，最终将削弱他们的地位，加强正统的斯大林主义势力的地位。

在苏联党的政治局中有一股从某种意义上讲有利于捷改革的力量，但导致这一力量得以形成的那些因素并不是改革本身。捷共的任何领导都不能影响这些因素的出现，它们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发展没有关系，它们是苏联在国际上和党内的利益和冲突的产物。那些不利于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因素的出现和存在本身也是一样。克里姆林宫的“鹰派”及其方针是早就定了的，同捷共的政策没有关系。

为使一九六八年的改革得以实现（这显然是一种比捷共行动纲领所设想的规模更小一些的改革），必须具备这样的前提：莫斯科的主要竞争力量之间继续保持和局，他们之间在对待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上结不成联盟，他们就军事干涉的必要性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捷共的政策只能对此起点影响作用，更多的就谈不上了。而且对这一局面起作用的还有国际和苏联国内的许多其它的因素，远远不只是捷共领导的政策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发展。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在当时确实算是友好的个别谈话中，勃列日涅夫对西蒙（他率捷共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节的庆祝活动）说：“你们以为，只要有权，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这根本是错误的。连我都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我想做的事情当中，大约只有

三分之一的事情我可以做到。倘若当时在政治局我不举手赞成军事干涉，那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呢？你肯定现在不会在这里坐着，我可能也不会坐在这里了。”

我个人相信，勃列日涅夫的这些话是经过认真思考的，因此，我对之也认真看待。我想，这些话可以证实我对当时局势的看法。克里姆林宫“鹰派”的成功之处，正是由于他们把反对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化的问题变成了当时解决莫斯科内部权力斗争的关键问题。他们是有意这样做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问题对他们特别有利，而对另一方，即更具理性（赫鲁晓夫式的）倾向的那一方则是非常不利的。从那时苏联各派势力组成的结构来看，他们是完全正确的。

当格列奇科元帅五月底从布拉格回去的时候，他带走的肯定全是一些有利于元帅们的方针的论据。柯西金带了一些什么东西回去呢？我想，他带回去的是一种很严肃的体会，即：把愿意更合理地继承赫鲁晓夫政策的这一派人的命运作为赌注，押在维护杜布切克及其改革上面，这将是很冒险的。对他们自己那一派来说是太危险了，可能使他们失去自己的权力。如果他们“不举手”赞成“鹰派”的论据（当时关于军队何时行动尚未作出一致的结论），也许他们真的很快就不能坐在政治局里了。

为什么呢？是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受到威胁”，还是因为捷有发生内战的危险？是因为那里有企图“回到资本主义去”的现实力量吗？是捷共领导正准备使捷克斯洛伐克脱离苏联集团吗？都不是。对这一切柯西金都很明白，那不过是意识形态和宣传上的胡说八道。这是一层意识形态的面纱，掩盖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矛盾的真相。作为这些矛盾的一方的共运内更具理性的代表人物，当然知道问题在哪里，因而即使有这层面纱，他们还是可以在适当时候找到一劳永逸的、正确的解决办法。但是我

不想在本书中卷入各国共产党政治局内部的讨论，所以不拟多谈面纱的问题。①

柯西金在“布拉格之春”期间，虽然不是从老一代苏联元帅及其同盟者的哲学出发来观察事物的，但无疑完全是以苏联的大国利益为出发点的。而他看见了什么呢？他在莫斯科时肯定已经看到了许多报告，到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又听到了新的情况介绍。他在这里同捷共杜布切克领导班子的某些成员谈了话，包括同齐萨士那样的为莫斯科所不了解的人。他也曾有几天直接呼吸到了“布拉格之春”的活跃空气，尽管是在很独特的环境中，例如在卡罗维发利温泉的长廊下。对于他所了解和经历的一切，他必然从苏联霸权利益的领导人的角度得出几条结论，尽管这些结论不完全是按斯大林主义方式得出来的，然而不管他愿意不愿意，这些结论使得他同“鹰派”的想法接近了。

他看到，极权专政制度在捷克斯洛伐克不仅陷入了深刻的危机，而且开始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地在起变化。对柯西金和所有苏联官僚来说，保证他们统治的那些必不可少的机构在捷克斯洛伐克已不起作用了。照柯西金看来，政权确实是不稳定的。柯西金肯定不会把杜布切克的信仰当作是结合实际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会认为它代表着捷克斯洛伐克各族人民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感情。他不能想象，如果让一个共产党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统治，怎么可能同时在那里保障莫斯科的利益。他无法想象，改革的全部设想，捷共行动纲领的设想，以及民主化的试验，将

---

① 在若干重要问题上，我在这里的叙述同我在拙著《一九六八年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尝试》（科隆因的克士出版社一九七五年捷文版）一书中的提法有所不同。当时是在一九七六年六月欧洲共产党会议之前，我的用意是借这一著作参与共运的讨论。我曾把该书辗转分送给苏、捷、匈、意、法等党的领导人。当时，人们曾认为该书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

会在捷克斯洛伐克为莫斯科的霸权提供必要的保证。赫鲁晓夫进行过胆小得多、对于苏联帝国来说危险性小得多的试验，但苏联官僚作为一个整体还是把他推翻了。

而且，柯西金当时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某些个人经历无疑也激怒了他。因为捷当权者没能使他这位仅次于沙皇的苏联帝国第二号统治者受到保护，免遭新闻记者的纠缠。有一次，他在长廊上散步，手里拿着杯子喝卡罗维发利矿泉水时，受到爱打听消息的女记者的突然袭击，他被拍了电影并在电视里放映，使人们看到他是怎样摇头晃脑回避不愉快的提问。同捷共中央书记齐萨士的谈话（柯西金指责他不久前为纪念马克思所作的《关于列宁主义及其对世界的普遍意义》的报告中使用了某些莫斯科不能接受的语言）也一定加深了柯西金的怀疑。照克里姆林宫有经验的统治者看来，齐萨士的所作所为说明他是一个不知深浅的新手，例如：在他正在受最高检查官的审查，审查他是否适合于掌管重要部门的时候，他竟敢捍卫自己的思想信仰。齐萨士后来才明白这一点。他向我谈到这次谈话中造成不良后果的某些具体措词，他把这归罪于自己俄语不好。后来齐萨士曾想方设法消除柯西金对他的坏印象，一九六八年八月以后更是积极。但是，已经不行了。他可能不只是俄语不好，而且对俄国文学也不够了解。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里就有一个小官吏的例子，他不识相地在某个老爷面前打了个喷嚏。后来他意识到，这可能会影响他的前途，于是他就想尽一切办法低三下四地道歉。可他这样做正好最终断送了自己的前途，因为他的行为表明，他不仅不会在上司面前控制自己，而且还要不适当地麻烦上司。

柯西金五月份访问捷克斯洛伐克时亲自看到，捷共杜布切克领导班子内部是不一致的，里面有莫斯科"鹰派"的代理人。这无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鹰派"人士可以通过这些人在捷克斯洛伐

克夺得自己的利益，他们为此目的无需克里姆林宫温和派的帮助，并且能够迂回地取得对温和派的优势。根据我的判断，这一切加在一起便导致了在五月底的某个时候，苏联领导就考虑到了把军事干涉作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一种可能的选择。若要军事干涉不发生，就一定要发生某种事情以增强克里姆林宫内比较讲理的温和派的地位，使他们不怕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同“鹰派”冲突。

然而，当时不论在苏联，还是在世界政治生活中，或者在捷克斯洛伐克本国，都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相反，从各方面来看，形势都是朝着最终可能进行干涉的方向发展的。在捷共中央五月会议以后已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次会议上通过了相当重要的政治决议，同时确定一九六八年九月九日召开捷共第十四次特别代表大会。上述决议确定了同反改革派交锋的政治界限和时间界限，因此，他们发动了攻势。攻势显然是从一九六八年六月下半月开始的。

在研究“布拉格之春”的时候，有一种看法至今还占着上风，即：捷共中央五月决议是保守力量的胜利，是反改革的行动。一般的看法是，在该决议中，把“右翼力量”当成了主要危险。然而，决议的文本就已表明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决议是我写的，我曾注意不使反对“左”、右极端倾向的政策被某种片面的提法所取代。捷共中央五月决议中称：“党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的根本问题，是不使政权和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受到威胁，不论这种威胁来自哪一方面，来自右的、反共倾向，还是来自保守力量方面，倒退到一九六八年一月以前的形势是符合保守力量的利益的，而那种形势是不可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的。”五月决议全部内容都是捷共行动纲领的框框，一点也没有缩小这个框框。这里比行动纲领更具体地谈到自治制度是迫切的实际任务，谈到民族阵线内部的关系，也谈到报刊和宣传工具的活动。后两个问题引起了改革派共产党人中

的激进分子的反感。这一部分人想打破行动纲领的框框，更多地干预政治制度。因此，五月决议对他们来说，好像完全是保守主义的胜利。但我认为，这个决议实际上是激进分子称之为“中间派”的典型表现：它坚持捷共行动纲领的框框，既反对保守派倾向，也反对激进派倾向。

确实，保守势力，包括苏联在捷共内部的代理人，曾设法将这个决议单纯描绘为对激进分子的批评，并利用决议中批评激进分子的地方来反对他们。但是激进分子并没有在捷共行动纲领的基础上进行自卫，而是大体上从《两千字宣言》的立场出发，进一步攻击保守派。各种政治力量未能在五月决议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团结起来，这两种倾向之间的斗争更激烈了。这种局面是激进分子和保守分子在六月份共同造成的。由于激进的改革派共产党人基本上控制了报刊、广播和电视，使得这一斗争暴露在公众面前，俨然成了主要的发展趋势。而在捷共内部，实际上这一时期是“中间派”的趋向占了上风，其拥护者大约占六月底七月初选出的党代会代表的百分之八十。对于反改革力量（包括苏联的“鹰派”）来说，两种情况都是他们的明显的失败。激进分子在公开场合的显而易见的攻势和“中间分子”在捷共内部实际上的巨大胜利都迫使他们发动进攻。他们选中的最合适的目标就是激进分子的公开言论，实际上他们进攻的矛头是对着整个改革派的，是对着捷共里的“中间派”的。在后来的入侵者发自华沙的信中还提到《两千字宣言》的签名人，把他们称作“反革命纲领”的维护者。然而，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不论是苏联士兵，还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萨尔戈维奇的部下，并没有去找瓦楚利克或者宣言的其他签名者，而是在党中央大楼逮捕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什帕切克和西蒙。

在捷共中央通过五月决议之前，莫斯科的“鹰派”以及与部分

苏联政治官僚、与乌布利希和哥穆尔卡结合在一起的元帅们，五月底就已经争取到把军事干涉也列为一种选择，然后他们就决定不放过这样的机会了。但是捷共中央的五月决议使他们的进攻稍有迟延。勃列日涅夫后来把五月决议称作是形势发展的“报春的燕子”，说形势按此发展下去可能没有必要进行干涉了。苏联政治局内的温和派，当时一定是以此来作为论据的。然而，没过多久，大约两、三个星期以后，“鹰派”占了上风，布拉格的激进分子和保守分子之间的斗争给他们提供了足够的弹药。对温和派来说只剩下了决议的词句，而“鹰派”却抓到了事实，他们把这一斗争故意说成是捷共内部的分裂，并称此事意义重大，威胁着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权本身，因而也威胁到苏联的利益。他们施加压力，以便进行干涉。他们这样做所取得的明显结果是召开了华沙会议。他们“邀请”捷共参加会议用的是那样一种方式，以致使捷共很难与会或者根本不能去参加会议，这样就使得分裂在最高一级也有了具体的表现。

捷共杜布切克领导班子能够接受这个“邀请”去参加实际不存在的讨论吗？当然能够。但是其代价只能是造成国内政治冲突，使干涉的维护者找到更多的证据。因为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进行什么讨论和达成什么协议，这只是一次宣读判决书的审判会，判决书的文本就是后来发表的公开信。对捷共领导班子来说，接受华沙会议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形势的估计，不仅意味着要放弃改革路线，而且必然会在国内引起群众对捷共领导的极大不信任、不满和反对。到华沙去开会，但不接受现成的判决，这意味着造成同莫斯科和其他四个国家明显的、不可挽回的分裂，而这又会给军事干涉的维护者增加新的口实。

后来决定采取的解决办法，即不去参加会议，同时要求进行双边会谈，显然是唯一可能采取的政治解决办法。但这只是在“鹰派”

的进攻中造成了短暂的间隙，而根本没有可能阻止进攻。为什么？我想，其后的事态已经不取决于杜布切克了。

通过华沙五党会议，“鹰派”已经达到了不能再后退的地步了，因为后退意味着他们政治上的失败。他们只能沿着已经走上了的这条道路前进，要么最终进行军事干涉，要么很快失去自己的地位。在切尔纳和布拉迪斯拉发谈判引起的短暂突变以后，根据我的推测，“鹰派”大约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十日左右开始了新的、最后一轮的攻势。

在八月初举行的布拉迪斯拉发会议以后，苏联政治局成员休假去了。按克里姆林宫的传统，领导人不在的时候总是进行宫廷政变的良机，不管这种政变可能成功与否。我虽然没有任何事实证明这一点，但我认为，在八月十日前后的某个时候，在“鹰派”和徘徊于他们及温和派之间的人士之间结成了某种新的同盟。该同盟的基础一定是很重要的：很可能是向某人提出，让他代替勃列日涅夫作总书记。这样一个候选人总是可以物色到的，而当时肯定是有具体人选的。我不知道他是谁，也许是谢列平或另外一个什么人。但总之我觉得，那时想要搞的行动肯定是举足轻重的大事。谁可能是这次政变尝试的参与者呢？我想就是后来被勃列日涅夫逐步解除了政治局和党的领导职务的那些人。

元帅们从军事上作了准备：什捷缅科将军，一个无可争议的斯大林主义的代表，突然被任命为华沙条约组织的司令。八月上半月活动日益频繁：元帅们从乌克兰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大部队进行了调动。大约在八月十五日，苏共政治局委员们中断了休假，突然回到莫斯科，很快就开了两个会，参加范围可能扩大到非政治局委员。在八月十七日和八月十八日这两次会上决定了进行干涉。

我认为，很可能勃列日涅夫和苏联政治局的温和派很快掌握

了主动权，并在军事干涉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同“鹰派”达成了一致，这样就防止了克里姆林宫里的政变企图。于是，勃列日涅夫反对者的主要论据也就不存在了。在这种形势下，在布拉迪斯拉发会议之后，杜布切克在布拉格采取任何步骤都是没有用处的，完全不能对干涉本身发生任何影响了。

在八月里可能影响这种决定的唯一事情，就是干涉有引起更大的军事冲突的危险。单单是同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冲突不会发生这样的危险。原因我已说过了。引起更大的军事冲突指的是同西方冲突的危险，而这种危险当时并不存在。一九六八年捷克斯洛伐克事态的发展不论是对西欧国家来说，还是对美国来说，都没有改变它们在欧洲维持现状的打算。至于美国，勃列日涅夫在八月十八日已有了完全的把握（下面将谈到为什么的原因）。

那么，谁是引起军事干涉的罪人呢？

无疑，一九六八年八月的侵略者苏联和它的领导集团是有罪责的。因为这个领导集团选择了军事干涉的办法来保卫自己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这个领导集团内部各个派别和个人之间的矛盾暂时得到解决，其代价就是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改革。各派的罪责虽然大小不一，但是他们都是罪人。他们代表了这样一种势力，为维护自己这个多民族的、文明程度不一的帝国的利益，即使对自己的盟友也不惜直接使用武力来加以征服，而且，他们实际上也不懂得使用别的办法。他们的利益实质上是强暴的霸权主义者的利益。从政治的和道德的观点出发，关于一九六八年八月的罪责问题，不能有别的答案。

但是，罪责问题不是与此相关的唯一问题。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们决定把军事干涉作为保障自己大国利益的手段，这是否是命中注定和不可避免的？是否有可能对形势的发展产生影响，以致使他们在采取这个步骤的问题上意

见统一不起来，或者从他们本身的利益角度出发，由于害怕损害了自己而最后决定不采取这一步骤呢？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是很不容易的，而根据我的看法，回答几乎根本不可能是一致的。而且，对这个问题的每一种回答都只能是假设性的，只能是对可能性的猜测，而这种可能性实际上并未出现，并且在以后也不能加以检验。在充分意识到自己想法的局限性的同时，我仍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改革派共产党人能够、而且也有义务做更多的工作，以便使苏联领导在军事干涉的问题上达不成一致意见，并使它在决定采取类似的行动时顾虑更多一些。

正如我在前面的章节中写到的，我始终认为一至五月是关键时期。看来，这个时期对莫斯科的"鹰派"来说，为取得其初步胜利也是关键性的。如果局势的稳定未被推迟，如果五月份就召开了捷共特别代表大会，莫斯科的领导在军事干涉问题上达不成一致意见的可能性也许会更大一些。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布拉格之春"大概也就不会变成那种全国性的民主运动和人道主义运动，而很可能只会成为主要是自上而下逐步实行的改革，只能是缓慢地破坏极权专政制度的宪章改革运动，而且它也不会激发出那么多的希望和热情，当然，可能也不会产生那么多的无望、失望和冷漠。也有可能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仍然会为反对改革而施加强大压力，以致连捷共行动纲领的原则也得不到完全和迅速的实现。

在六月到八月期间，关于是否进行军事干涉的问题已经越来越不取决于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局势的发展了。决定军事干涉的因素已经与捷克斯洛伐克改革派共产党人毫无关系。从捷国内形势中搜罗到的论据都是官方为实现干涉意图而搞的宣传材料。由于干涉意图有其自己产生的根源，所以很难相信，如果没有像《两千字宣言》这样的东西作为论据，一心想搞干涉的力量就不去找另外的论据了。

在这个时期，驻捷克斯洛伐克的苏联机构（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情报机构相配合）已越来越多地自己制造这样的论据了。有几件挑衅活动是众所周知的，例如，在索柯洛夫附近公路边发现"美国武器"，出现了各种传单，等等。① 还挑起了要求解散工人纠察队的签名活动。当时我曾亲自同内务部长帕维尔谈过，我们两人一致认为需要核查一下布拉格普瑞柯比大街上参与这一行动的人。帕维尔派去的公安机构查明，在积极宣传取消工人纠察队的人当中，有五十多名国家保安局的特工人员。这显然是国家保安局内的亲苏派组织的挑衅性活动。有名的"布拉格九十九人联名信"，显然也是苏联机关操纵搞的。而莫斯科的报刊对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这些事件，又总是非常敏捷地、夸张地和煽动性地加以利用。

在未来的干涉者们在华沙举行会议之后，在捷共领导当中还可以发现，整个亲莫斯科集团——比拉克，英德拉，雅盖什，科尔德，什维斯特卡，已经完全有意识地不再支持任何莫斯科会基本上欢迎的努力。在切尔纳会谈之前，我向捷共中央主席团提出了两项具体建议：建议特别授权政府禁止在三个月内发行刊登损害国家对外利益的出版物，建议制定民族阵线法，使民族阵线成为新成立的负有政党作用和使命的一切组织的唯一合法的基础。我当时预计，捷共代表团在切尔纳必定要被迫接受类似性质的协定，因此，为了改革的利益，在这次会谈之前先主动实现上述建议。而且这两项建议事实上并未脱离捷共行动纲领的思想。

但是，主席团连一项建议都没有通过。激进的改革派共产党人反对这样做，他们还影响了党的领导机构的其他成员。在这种

① 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经常出现来历不明的传单，有的表示要"从肉体上消灭"杜布切克等人；七月中在捷、西德边界附近"发现"一批美制武器，苏报刊曾别有用心地加以渲染。——译者

影响下，连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切尔尼克也没有遵守自己原来的诺言，虽然我事先曾同杜布切克和他们俩商量好了，他们最后还是没有支持我的建议。就是杜布切克后来也未支持这两项建议。但有趣的是，亲莫斯科集团中的人也没有支持这些建议，尽管他们三个多月以来，从没有放过任何机会，以便在领导机构的会议上把报刊上的某些文章，或者民族阵线以外的政治组织的活动看作是主要问题，并看作是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出来支持我当时的建议。要是在华沙会议之前，这肯定完全是不可能的。这种态度变化的唯一原因可能是：捷共领导班子中的亲莫斯科集团已在有意识地一致支持苏联的军事干涉，以利于莫斯科的“鹰派”，因此，它对任何可能缓和在切尔纳发生的冲突的事已完全没有兴趣了。

如果说我在某些地方指责了激进的改革派共产党人缺乏远见地、有时是不负责任地以自己的行为促使了不利于改革的形势的出现，这并不是说，我看不到捷共内部好斗的保守分子和捷国内的苏联代理人所起的根本的、有意识的反对改革的作用。从七月开始，这些势力在国内形势发展中已完全起着军事干涉的帮凶的作用了。这些人根本不主张搞民主改革，因此，对他们的反对改革的行动很难加以指责。从他们的意图来看，他们的行为是合乎逻辑和正确的。但是那些无疑是支持改革的激进的改革派共产党人就另当别论了。

从对待可能发生的军事干涉的态度来看，改革派共产党人中的激进分子有一个明显的长处：他们比捷共改革派的杜布切克领导更清楚和更准确地看到了这一危险。在这方面，激进的改革派共产党人没有抱幻想，他们差不多从五月开始就经常公开地提出警告说，莫斯科最终可能用军事手段来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运动。因此，他们也更多地考虑到了采取必要的行动，以挽救改

革免遭镇压，他们还倾向于在苏联集团以外的共产党和左派力量中寻求盟友，并且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也可以像一九四八年铁托在南斯拉夫做的那样，公开站出来对抗苏联集团，等等。

由于“布拉格之春”时期的激进分子主要是同报刊和其它宣传工具有关的知识分子，所以这些观点有时也公开表露了出来。这当然给杜布切克领导造成了一种很不愉快的局面，因为莫斯科可以抓住这些“反苏主义”的明显例证，并指责这是“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行为，威胁着整个苏联集团的利益。因此，捷共领导有几次曾十分尖锐地在这个问题上反对激进的改革派共产党人的意见。例如，在已经提到过的捷共中央五月全会的决议中说：

“共产党人不应忘记，歪曲和夸大一定的意见分歧直至散布关于‘军事干涉的危险’（如关于华沙条约国军事演习，等等）的谎情，都十分严重地损害着当前的政治路线，给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集团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帮了忙。

捷共中央声明，所有过去和现在同苏联领导人进行的党和政府级的会谈，其结果都是积极的，展示了加深合作和援助的可能性，这对解决我们某些迫切的经济困难是非常重要的，苏联同志表示了向我们提供这类援助的良好愿望。”

捷共杜布切克领导为了莫斯科的利益，有意识地隐瞒了事实真相，因为他们以为这样做对自己也是有利的。但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是那些对军事干涉提出警告、那些认为捷苏会谈中的矛盾不断尖锐化意味着改革已遭到威胁的人。这是无法否认的。当时捷共领导歪曲隐瞒真相也有他们的打算，只是事实最后证明，他们的打算是错误的，对时局毫无补益，纯系幻想。

我认为，要捷共执行同莫斯科和整个苏联集团决裂的方针，这在政治上确实是行不通的。当时唯一可以团结大家、使党内外矛

盾不致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的共同基础是：必须维护捷对苏联和华沙条约集团的关系和履行对它们的义务，这样，改革才能行得通。说实话，我还以为，杜布切克领导集团对这一问题的态度，远非出于他们在理智上理解到其政治上的必要性，而如果不说是在决定性的程度上，至少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领导集团中的改革派共产党人在思想上存在着幻想。

在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上要想说清楚别人的看法是不容易的。即使我确实了解当时捷共某些领导成员的想法，我也不想去转述别人的观点，我只想说说自己的看法。在"布拉格之春"期间，我倒不曾奢望莫斯科党的领导会把我们的改革视作什么典范。至于说到苏联，我认为那里确实没有进行类似的政治改革的条件，那里的社会生活民主化问题短期内解决不了，解决起来也很复杂。我也不曾幻想，苏联的外交政策会不是大国主义的政策。苏联总归是要把自己在苏联集团其它国家里的利益置于它自己公开宣布的、这些国家应有独立和主权的原则之上。我也不曾设想，莫斯科政治局的委员们，会把主要的心思用来考虑，如何更好地按照欧洲的社会主义传统，并根据马克思思想中固有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标准，来发展社会主义。但是，我的头脑里确有不少幻想，这些幻想直至一九六八年八月军事干涉之后才破灭。

在这次干涉之前，我总以为，莫斯科政治局还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的，不管他们按照怎样庸俗化了的理论去发展，他们至少可以同诺沃提尼时期的捷共政治局一样，仍然是社会主义思想占主导的地位。但这些都纯系幻想。对于莫斯科政治局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社会主义的概念早已同他们的权力、同他们在苏联所建立和维护的那套制度的概念混在一起了。认为现行的制度可以发展成更好一些、更完善一些和更民主一些的制度这种起码的理论设想，连诺沃提尼这样的人都曾有过，但对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局来说，这种

起码的设想也是不存在的。依我看，本书所述的政治社会变革仍是以共产主义为纲领的，但对苏联政治局来说，共产主义思想对他们的争权夺利早已没有意义了。

一九六八年八月以前我曾认为，苏联在一九五六年以后，已开始学习并已初步学会，使用符合被控制国的特点的手段来贯彻自己的大国强权政治。我曾以为，克里姆林宫在它有了同南斯拉夫和中国以及一九五六年同波兰和匈牙利的经验教训以后，将会使用灵活一些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的奴役手段，以免得到适得其反的结果。莫斯科政治局中可能有一些人有上述想法，他们在干涉问题上态度要缓和些，犹豫些。但这个政治局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最终总是要暴露出自己的本色，即当苏联估计自己不会遇到风险的时候，它是即使对自己的盟国也会采用最原始的统治方法来推行其大国霸权的。它根本不珍视同那些仅有相对独立性的民族国家所建立的同盟关系，只要不会引起世界大战，它就可以轻易地把同盟关系代之以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要求别的国家完全屈从于自己的绝对指挥。

头脑中的幻想，使我看不到苏联对其帝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民主力量所起的反动政治作用。我对赫鲁晓夫下台后所发生的变化，也缺乏正确的理解。因为，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七年，在我国正是党内共产主义改革派迅速取胜的时期，因此，我和许多其他党员都忽视了，苏联在这一时期正好是朝相反方向发展的事实。赫鲁晓夫本人固然算不上是个共产主义改革派，但他的政策毕竟始终是在瓦解着斯大林统治体制的机构，而在他下台后，有些机构又逐步得到恢复。

诚然，一九五六年对匈牙利的军事干涉也发生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但一九六八年前，我对这个问题是根据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去解释的，我认为，干涉的起因是由于拉科西时代极权专政的

某些机构遭到了武装攻击；另一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因素是苏共二十大刚结束不久，赫鲁晓夫的领导还不够稳定。而一九六八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则不同，这两个条件都不存在，因此我认为军事干涉是不可能的。这显然是幻想，因为布达佩斯街上开的枪，显然是苏联为了给军事干涉找借口而寻衅挑起的。其实，在苏联帝国中，不论那个地方有人想要争取民主改革和民族独立，克里姆林宫的任何一届政治局都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只要苏联仍在实行极权专政制度，任何一届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都会知道，苏联国歌中所说的“各自由民族的牢不可破的联盟”这句话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实际上帝国里任何民族民主运动对苏联都是危险的瘟疫。

我认为，正是由于杜布切克领导抱有这种共产主义的幻想，所以没有从一开始就努力为民主改革争取外援，以便创造一种政治气氛迫使苏联对可能出现的国际影响有所顾忌。杜布切克领导还一个劲地宣称改革只是我国的内政。其用意无非是怕刺激了莫斯科。甚至到三月底当克里姆林宫（包括乌布利希和哥穆尔卡）已明显采取攻势的时候，捷共领导仍不改变立场，而一再强调，改革是内政，我们不干涉别人的内政，别人也不应干涉我们的内政。它的政策是息事宁人政策，不断地向莫斯科许愿，说什么捷决不会触犯莫斯科在苏欧集团的利益，捷只要求能够使用不同于苏联的方法去处理本国的具体问题而已，等等。

所以，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夜间，当苏联袭击我国时，苏方完全有把握，捷克斯洛伐克不仅缺乏有效的军事抵抗，而且在国际上也得不到有组织的政治支援。当然，民主舆论对捷是抱同情态度的，某些共产党也是支持它的。但是，事先并没有建立起一套国际关系体系，以使克里姆林宫担心其军事干涉的政治后果可能影响其强权政策。罗马尼亚的例子就说明，这样的国际关系是有可能建立的。虽然，在短短的半年中是否来得及，这还是个可以探讨

的问题。但事实是，杜布切克领导根本就没有想这样做，尽管进行这项工作的条件始终是存在的。

当时，布拉格在政治上究竟能否对莫斯科准备军事干涉的进程施加什么影响呢？我想，要想施加影响需要做到两件事。其一是，迅速召开捷共非常代表大会，并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以前举行大选，以便更换全套党政系统的干部，使整个政治体制稳定下来（这样做当然会大大限制著名的"布拉格之春"全国民主运动的自由发展）；其二是，在共运内部，在对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中国以及在对"第三世界"重要国家的关系上，在对西方民主力量和国家的关系上，执行一种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执行一种符合于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改革的总精神的外交政策。

我在"布拉格之春"期间曾努力争取实现第一种可能，对第二种却未加争取。关于"布拉格之春"时期我国的国际环境问题，我和其他改革派共产党人一样，对莫斯科的强权政策的本质抱有幻想，因此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正因如此，我不敢肯定，当时国内政局如果能按照我的想象发展的话，是否就一定能避免干涉。

我想，捷共杜布切克领导集团，对未能设法保障"布拉格之春"的改革尝试获得成功，是负有历史的和政治的责任的。但是，如果指责杜布切克对军事干涉本身也负有部分罪责的话，那就是不公平的了。因为，这就等于当一个没有武器并且没有设法搞武器的人遭到强盗抢劫以后，去指责他也犯了罪一样。也许，这个人本应做事更周到些，更谨慎些，应该不那么天真，应该知道他的所谓朋友其实不过是个强盗。但是，绝不能因此就说，抢劫案的罪犯竟然不是那个强盗，而是别的什么人。

亲莫斯科的"正常化"政策的代表人物，从一九六八年八月以来，就一直从另一角度大肆鼓噪地批评杜布切克为首的领导。他们说，杜布切克等人应该从一开始就执行"正常化"政策，这样就

不会发生任何入侵了。当然，这也是事实。不过必须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就不会有什么政治改革了，不管它是采取真正的“布拉格之春”的形式，还是按照经过阉割了的《行动纲领》。这一类批评是根本取消改革的。如果一九六八年一月时改革派全都没有进入领导核心，进去的都是比拉克，英德拉，雅盖什，卡佩克之流的人物，那倒是确实不会发生苏联的军事入侵。但同现在相比较，这种情况也有一个可取之处，即：胡萨克不会被提拔起来担任领导职务。

* * *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凌晨，在杜布切克正式宣布主席团会议结束之后，会议厅外的走廊上好像蜂窝般地密集着人群。数十名党的干部和记者来来往往，围成一堆一堆地等待着指示。可惜什么指示也没有。但对某几件重要事项，还是做了安排。

例如，当时的邮电部长、苏联特务霍夫曼，同苏联安插在公安机关和捷通社的特务萨尔戈维奇和苏莱克等，企图按预订计划停止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广播。因此，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声明刚播了一句话，播音就被打断了，收音机中只有不祥的寂静。《红色权利报》主编什维斯特卡也一样，他禁止印刷上述声明，并准备了另一篇稿子。在此情况下，经斯姆尔科夫斯基的坚决干预，也由于电台群众的及时处理，在夜间两点以后，后备台又把捷共主席团的声明广播了出去，同时，印刷厂也将它印发了。

当时安排的第二件事，是召开捷共非常十四大。这是由布拉格市委领导提议的，当时的市委书记是西蒙。那天夜里，他和杜布切克曾对此问题进行过研究，据我所知，杜布切克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并不坚决。他主要是怕，在当时的情况下，大会的代表有可能被苏军一网打尽。总之，不相信这个会能够开起来。但他不反对市委尽可能把大会代表召集起来。这样，捷共十四大的组织工作在

那天夜里就开始进行了，八月二十二日清晨，代表们已在布拉格维索昌区的切卡德工厂集中了。

捷共中央大楼的上空，不断响着飞往布拉格鲁津涅机场的运载坦克和部队的军用飞机的轰轰声，而大楼里的人却慢慢走空了。各区、县的干部、工厂干部和记者们都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只有几名党的领导成员及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及不多的几名干部留在那里。有些人是听到广播以后赶来的。将近清晨四点的时候，我坐在杜布切克的办公室中，除杜布切克本人外，还有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什帕切克、西蒙、萨多夫斯基、斯拉维克、雅盖什和卡佩克。这几个人我都记得很清楚。此外还有两个领导成员，但记得不很准确。那就是巴尔比雷克和里戈。据我回忆，皮勒尔不在场，也可能记得不准。比拉克、科尔德、什维斯特卡、英德拉、沃列尼克和埃尔班当时肯定不在场。埃尔班八月二十日下午根本没参加会。我也记不起来，在头一天夜里的会上，他曾发过什么言。

大约在凌晨四点以后，一辆黑色的苏联伏尔加牌小轿车开到捷共中央大楼的门前，后面跟着装甲车和坦克。下来了一批苏联士兵，他们穿着伞兵服，戴着紫红色软帽，衬衫里面穿着海军衫，手持自动步枪。坦克包围了捷共中央大楼，许多士兵从各个角落走向大楼，有数名军官和一排伞兵径直跑进了大门。

这都是我们从窗口看到的，就像是看电影一样。但我头脑很清楚：我曾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热烈欢迎过穿这种制服的士兵，后来又同他们在莫斯科交了朋友，一起喝了五年的伏特加；他们并不是银幕上的影象，他们的手枪也不是去瞄准冬宫沙皇的军队，不是对准德意志帝国剩下来的卫兵，而是马上要对准我自己。这一点我是清楚的，但我心里却在想，我会讲他们的语言，我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军事制度和法令，我也知道他们休息时玩什么，还

知道他们怎样看待他们的团长以至勃列日涅夫本人。他们就这样把我打死？不可能！

真的不可能吗？为什么？难道我忘了斯特洛门卡宿舍那些打过仗的同学给我讲过的故事吗？难道他们没有枪毙过他们完全不相识的、对他们并不构成威胁而又手无寸铁的人们吗？但这一夜的经历，同我在二次大战时在海德里希暗杀事件①后大逮捕的那个夜晚，毕竟还有所不同。那天夜里，当纳粹占领当局搜寻暗杀海德里希的人时，军队和警察巡逻队也同样拿着手枪走遍布拉格。他们也到了我们住的那条街，我从窗口看到一个个黑影走进家家户户。我知道，我父亲战前是军官，橱里藏着一套军装，而且不知在哪里还藏了一支手枪。当时对敌人感到非常恐惧，我知道一旦这些德国兵跑到我们家，那一切就都完蛋了。最后，幸亏没来。

这次，我没有那种单纯本能的恐惧心理。当然，对即将闯进来的人来说，我并不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伙子。我知道他们有命令，可能是叫他们一打开杜布切克办公室的门就放枪。但更大的可能是，逮捕我们，把我们带走，然后我们也可能受到审判。事情肯定绝不会到此为止。到底前途如何，可以有好几种可能。以上并非我的看法，而是一种下意识的感觉，某种下意识的信念。这种信念来源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由于我长期来是共产主义政权体系中特权统治阶层的一员。

我此时的感觉，同一些党的干部由于斯兰斯基案件而被国家安全部门逮捕前的感觉是相同的。对这种机构他们是了解的，甚至有时他们自己也曾下令逮捕过人。在来抓他们的时候，第一个下意识的信念是：这肯定是个误会，这个政权不可能真的反对自

---

① 莱·海德里希是一九四一年希特勒派到捷克担任代理总督的纳粹将军，一九四二年五月被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从伦敦派到布拉格的伞兵所刺杀。其后，纳粹当局为了报复对捷克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译者

己。这是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一直处于执政地位的特权人物所特有的一种虚幻的信念。这种感觉远在共产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政权出现之前就曾有过。我想，天主教的上层人士被教廷审判时也会有这种感觉，直到上了刑或被当作异教徒放在柴堆上将要活活烧死时，才会丢掉这些幻想。是否我的所有幻想都被武装干涉这一事实所粉碎了呢？看来，当时还没有。

很难说别人是怎样想的，但我觉得，这种下意识的感觉不仅我一个人有。同我一起在苏军步枪下被扣押长达数小时的人们的表现，也证实了我的推测。斯姆尔科夫斯基在逝世后发表的回忆录中谈到，当杜布切克办公室窗下的苏联伞兵开枪打死一名站在高举国旗、高唱国歌的和平示威队伍前头的无辜青年的时候，他立即打电话给契尔沃年科大使，指责他，说他应该对这个青年之死负责，尽管他自己的背后也有枪口在指着他。如果他不觉得自己仍是占领当局的平等对手、自己和契尔沃年科乃至勃列日涅夫一样仍在执政的话，难道他会这样做吗？

我觉得，不仅我们有这种感觉，那些手持武器的士兵和军官也同样有这种感觉。突然，杜布切克办公室的门被冲开了，约有八名士兵和低级军官手持自动步枪冲了进来，从后面围着会议桌把我们包围起来，枪口对着我们的后背。跟着进来两名军官。职位高一些的是个上校，但他的身材并不高，甚至使人觉得有点矮小。他胸前佩带着一堆奖章，可能还有一枚“苏联英雄”称号的金星勋章。他很自信而且举止粗鲁。他宣布，我们将处于他的“保护之下”，接着开始发布各种命令。有人，可能是杜布切克，说了句什么，上校马上大声喊道：“不准讲话！安静地坐着！不准说捷克话！”

如果他不说这最后一句话（不准说捷克话），也许我还不会注意到他。这句话一下子刺伤了我，使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屈辱、恐惧和当权者（尽管现在已经无权）的自信等错综复杂的感情。

我提高嗓音用俄语命令式地高喊："你们要懂点规矩！不准乱来！这里是党的第一书记的办公室！难道上面让你们禁止我们说话吗？不会有这种命令！你们不能违反命令！"上校不高兴了，想说些什么但没有说出来。他看了看四周就走了出去。一会儿，他带了一些人又回来了，仍然是很了不起的样子，但不再禁止我们说话了。他开始登记我们的名字，可见他的上级还没有搞清他们究竟扣押了什么人，可能连所谓的"革命政府"和"革命法庭"的成员也还不知在哪里呢！

这些兵把房间里的电话线都扯断了，把窗子也关上了。大概是不想让我们听到被伞兵拦在外面的人群的呼喊声。人们此时高唱国歌，不时地高呼口号和杜布切克的名字。实际上，这些呼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尖声呼叫，还是透过窗户传了进来。我们围着桌子默默地坐着，背后伞兵的自动步枪对着我们。这时，西蒙从身后书架上随便抽出一本书。这是一本希腊史。

"好吧，"西蒙说，"瞧瞧我们的运气吧！"他边说边按照作游戏的办法把书随便翻开一页，然后闭着眼睛用手指指了一个句子，接着睁开眼睛朗读起来。那句话刚好引用了某种看法，可能是柏拉图的观点，说民主并不是最好的制度，因为它会导致纪律的全面涣散，连动物都能在街上任意跑来跑去。念到这里，西蒙把书合上说："同志们，你们现在知道他们为什么来了吧！"他的话缓和了一下令人窒息的空气，人们开始互相交谈。

克里格尔看了一下表，时针指的是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凌晨五点多钟。克里格尔说："他们起码要忙到八点钟，八点以前不会有什么事，大家都疲倦了，我劝你们睡一觉，我们现在需要头脑清醒。"说完了，他自己就站起来，走到杜布切克平日主持会议的椅子后面，找了块空地躺在地毯上，枕着公事包睡去了。

在杜布切克领导集团中，只有克里格尔和斯姆尔科夫斯基两

人是战前入党的老一代共产党员的代表。克里格尔原先住在乌克兰和波兰的领地哈里奇地区，那里战乱频仍，而多数战事都带有反犹太的性质，都是对犹太人的蹂躏，克里格尔在二十年代逃来捷克斯洛伐克。因此，谢列斯特说过克里格尔是一个“哈里奇”来的犹太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先后在西班牙和中国参加过战争，担任过军医。回国后也以医生为职业。懂行的人们说，克里格尔的医术是不坏的，他并不是那种在医学界靠政治立足的人。

我在一九四七年就认识克里格尔。当时他在捷共布拉格州委书记处工作，是诺沃提尼的副手。在党的干部中，他是最有智慧的干部之一。他有教养，有文化，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丰富的生活与政治经验，他的眼界比多数干部要开阔得多。正因为如此，同时由于他是犹太人并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这就导致他在五十年代在政治上的垮台。在政治失宠时期，他先在卫生界搞行政工作，后来正式当医生。进入六十年代后，他同斯姆尔科夫斯基一起被诺沃提尼选中作为样板，以显示自己对五十年代的受害者还是愿意给以平反的。其后，克里格尔成了党中央委员和议员，再次成为社会活动家。

六十年代，克里格尔没有搞党务工作，他从来不是那里的宠儿，不受欢迎。我在前面曾说过，一九六八年他之所以成为捷共领导成员，既不是由于他擅长党务，也不是因为他是什么杜布切克或切尔尼克的私人朋友，更不是科尔德的朋友。在领导层中，他一般持有近于共产主义改革派中的激进派的立场。但是，他的看法在政治上总是合情合理的。我甚至认为，在捷共杜布切克领导班子中他是最少幻想的人，对苏联强权政治的本质也是最少幻想的。在某些问题上他根本不抱任何幻想。

我同克里格尔的个人交往为时不长。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我们俩都被党抛弃以后才建立了个人之间的友好信任关系。我想，

由于我们在一九六八年对改革的可能性、速度、方法和政治界限等一些具体问题上有分歧，同时也由于我们的性格不一样，这一切都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在当时并不密切。据我看，克里格尔政治上明智，但同时很自信，坚定不移地贯彻自己的观点和方针，对不同观点的人持不信任态度，尽管他并不对这些人抱敌对态度，也并不固步自封。我在搞政治时也有类似特点，显然这就决定了我当时同克里格尔的关系。如果我们俩都搞政治并且都在掌权，那么我们的关系是不会好的。

在捷共的干部中，克里格尔没有把政治简单地理解为专政机构中谁统治谁的问题或争夺权势问题。对他来说，政治是捷克斯洛伐克乃至全世界的社会运动。因此，他作为政治家在一九六八年所关注的不是统治机构内部各种力量的消长，他关注的是全民的民主运动的力量。当然，这不是说克里格尔不懂得幕后的宗派斗争，或是逃避这种斗争。恰恰相反，在这些方面他也很善于捍卫自己的利益。社会本身的运动，对他的基本方针来说，一贯是重要的，正因为如此，他必然成为斯大林分子攻击的首要对象。此外，加上他还是“哈里奇的犹太人”，这就使他在克格勃的眼中成为出身不好的可疑分子。这一切都是于事不利的。

不仅在政治上，就在为人处世上克里格尔也是一个好人。我还没有见到过谁能够像他这样，在人们受压、处于危险境地或遭到打击时，善于这样自然地鼓舞人们的情绪，增强人们的希望和信心。他在职业上和性格上都是一位医生。当然，医生也不是天使，克里格尔有时也表现得很顽固和多疑，对他不相信的人甚至怀有偏见。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凌晨，克里格尔躺在杜布切克的办公室里真的睡着了。躺下刚有十来分钟他就打起呼来，第一声呼噜把八个伞兵都吓了一跳，他们本能地马上把枪指向躺着的克里格尔。最初我还以为他是故意假装睡着。他继续打着心满意足的、

变换各种声调的呼噜，过了一会儿，大家都看出他是真的睡着了，那些士兵也转过身把枪口对着其他坐着的人。

克里格尔的估计是正确的。大约有三个小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们多数人静坐沉思。相邻的人偶尔说几句话，也有人在看书。杜布切克的办公室有一间专用的盥洗室，谁到那里去，伞兵就跟到门口守卫，人出来后，他就走进去检查。他们做得还很认真，因为出来时袖子都卷到胳膊肘上边，手也是湿的。他们想必是把手伸到马桶的水箱甚至是伸到马桶里去检查的。

大约在九点钟，克里格尔睡醒了，又精神焕发地和我们坐在一起。这时，那个小个子上校又进来了，后面还跟着两名苏联军官和三名便衣。在这三个便衣开口讲话之前，我们就猜出他们一定是我国公安机关的人。其中有一个人四十来岁，浅色头发，体型稍胖。此人我看着有些眼熟，也许他曾听过我讲授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课程，或者曾在哪一个政治机关一道工作过，总之，我们似曾多次见过面。这个人站在那里没有说话。一个黑发、个子稍高的人宣布让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和什帕切克跟他们走。

我记不准是谁，可能是杜布切克，曾问过为什么要他们走。黑发的公安人员回答得较长，确切的原话我已无法回忆了，但其实质性的话是："以英德拉同志为首的革命法庭……"。斯姆尔科夫斯基当时曾质问，这算个什么机构，他作为议长对此毫无所知，宪法中也没有有关规定之类的话。但杜布切克打断了他的话，说："算了吧，约瑟夫，这是毫无意义的。"接着公安人员要他们交出武器。斯姆尔科夫斯基哈哈大笑起来，自己装着翻衣服，把口袋整个掏了出来，拿出一把水果刀放在桌上说："我们对自己的人民是不需要武器的。"被弄得手足无措的公安人员有些生气了。杜布切克用他特有的那种使人解除武装的微笑，冲着走近他的公安人员举着手

说："来，搜吧，搜吧！"苏联上校虽然听不懂，但也看得出来这一场戏演得不好，于是招呼他们快走。斯姆尔科夫斯基临走时，从桌上抓了几块方糖放在口袋里，并对大家说："这很有用，你们也装上点，这是我在鲁津涅坐牢时学来的经验。"说着就同另几个人一起走了出去。①

大家对事态的发展都很清楚。有人说："开始处理了。"一些人在开始设想"革命法庭"的审判。当拿枪的伞兵冲进办公室时，这些人认为一切都完了，那时也曾设想事情怎样了结。但现在的设想就更具体了。

其后的一段时间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但也是在不安中度过的。我对这一时间内的事情的先后顺序以及时间的长短，都记得不很准确。记得苏联军官又来过一次，把西蒙、雅盖什和卡佩克叫了出去。这次没有捷克人陪同。我们都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搭配，并试图说明其原因，因为西蒙和另两个人不是一码事，这三个人不可能同时站在"革命法庭"上。事后证明，西蒙是和前四个人一起被逮捕的，而另两个人则是去同苏联人开会的。

后来，看守们显然是得到了什么指示，态度有了些改变。他们坐在空着的椅子上，枪放在膝盖上或桌子上，这样，我们也不老觉得有枪口指着后背了。中午时分，布拉格各工厂的汽笛突然齐鸣。这些苏联士兵一下子跳了起来，准备战斗，后来又安静了下来。

"怎么回事？"看管我的中尉问道。他穿的是普通步兵服装，而不是伞兵服。他的表现从一开始就不坏。他就是纪录片中那个从杜布切克办公室窗口向外张望的苏联中尉。斯姆尔科夫斯基在回忆录中也说过，他曾同这个中尉在窗口观看楼下街上开枪射击一位捷克青年的情景。斯姆尔科夫斯基曾说，这个中尉"真是个好小

① 斯姆尔科夫斯基在其逝世后发表的回忆录中对这些细节的描述有些不够精确。

伙子”，我也记得他看到楼下枪杀群众后很激动，甚至眼中显然含有泪水。

怎么回事？“工厂的汽笛”，我回答说。他又问，“为什么呢？”我说：“我不知道。放我出去了解一下吧，我也想知道这是为什么。”中尉回答说：“我可没有这个权利。”后来我补充说：“可能工人们宣布举行罢工了。”

工人们拉响了汽笛？他有些不信。我问他为什么不信，中尉接着说：“怎么说呢？工人能够拉汽笛吗？经理处下了命令才会拉汽笛呢。”

这样，我就同看管我的中尉谈了起来。开始时我说，目前情况不同，是特殊情况，因此不能按常情去看待人们的行动。他好像还有些不信服。我接着问他，为什么把他派到布拉格来，他是怎么想的。他开始煞有介事地叙述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形势”，其水平同勃列日涅夫的信差不多。他能说出《文学报》和《报道员》杂志的名字及其言论。他讲的是颇有修养的俄文，只是有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我问他，为什么我国文学刊物上的文章能使他感到受了威胁。他在回答时有一件事使我大吃一惊，即他原是莫斯科文学院的毕业生，由于工作上不得意才转而在军队中工作的。

其他被看管者，也都按照自己的俄文程度，同看管者展开了讨论。看管斯拉维克的伞兵，甚至用法文同他谈了起来。那人也是个大学生，但他所受的教育却得到了这样特殊的应用。

包围捷共中央大楼的是有名的塔曼师。这个师的传统是与克里姆林宫的各种宫廷政变相联系的。这是一支经过挑选的精锐部队。应当承认，从情况难于预料这一点来看，选择这样一支部队也确是困难的。

下午，杜布切克的汽车司机布里兹尼克，从招待所的厨房里给我们搞了些吃的东西。不仅仅如此，他还给我们各家都打了电话，

报告了我们现在的情况，并且把我们亲人的问候写在小纸条上，放在咖啡托盘的垫巾下面，给我们送了来。布里兹尼克和杜布切克是在打游击时认识的，也就是在那时候他了解了苏联官兵们的习性并且学会了俄文。后来我还听说，他在当时竟然能够自由出入这座被包围了的建筑物，而且他的办法很简单，他只是向守卫说："我不归你们管，我有我的上级，我有我的任务。"当时，他们这些苏联人是由军事部门、警察部门和政治部门错综复杂地组成的，警卫人员对这种情况是无法搞清楚的。也许，布里兹尼克因此才能够这样来去自如。

吃完了饭，我们才发现那些看守是如何紧盯着我们吃剩下的肉冻、香肠、面包和啤酒的。我们当中不知道是谁问他们是否饿了。看守们泄露军事机密说，昨天下午以后他们还没有吃过东西。接着，他们贪婪地吃了起来，连执行任务的警觉性也忘了。我同"我的"中尉谈起当年我在苏联受军事训练时曾是苏军的少尉，我们那时使用的自动步枪同他们现在使用的枪很不一样。"我的"中尉听了后竟然欣然把他的枪卸开来，向我讲解新旧型号的区别，他夸耀他的武器，说它在炎热的中亚和寒冷的北极都同样可靠。我对他说，他最好还是带着他的优良武器到北极去。这时他才意识到气氛的不协调，匆忙把枪装好放在一边。

我想，如果我们同这个中尉不以现在的身分在一起同吃同住地相处一个星期的话，他肯定会承认这次军事入侵是完全荒谬的。可能，不少入侵者都是这样的。我们在党中央大楼这样一个特殊环境里，同精锐部队派来的看守进行着讨论。在布拉格的街上，在其它城市的街上，我们的老百姓也在同坦克上和大街上的士兵进行着成千上万次讨论。那些兵有的并不精锐，他们更不知道为什么跑到捷克斯洛伐克来，有人甚至不知道他们进占了捷克斯洛伐克。有的士兵就以为他们所到之地是西德，另一些人则以为是到

了以色列。这些兵可能最后也暗地里认为，最好还是坐在家里。但这又有什么用呢？他们不过是他们的首长和政府所使用的一伙不会思考的人群，他们只能按上司的命令去开枪、杀人。他们的看法如何，这对事情是毫无影响的。

五天后，我在克里姆林宫曾对格列奇科说过，我认为他的军队在捷克斯洛伐克住下去，思想上是会被瓦解的。格列奇科回答说："那也可能，但没有关系，如果瓦解的话，可以换防，换十次都可以。"他当时真是神气十足，逼得我反问一句："十次就够了吗？"他瞪了瞪我，摆着元帅的怒相，但是并没有说出什么就走了。

大约在晚上十点钟左右，那个小个子上校又来了，但这次完全换了一副面孔。他微笑着宣布说，现在正准备举行高级会议，捷方由杜布切克等同志参加。他还说，大家可以随便到哪里去，完全自便，早晨就可以正常地上班了。最后他补充说，事情正在平息，他个人对此是无比高兴的。他命令看守们退出，然后和我们握手，最后好像还同谁坐下来闲谈，那个人可能是萨多夫斯基。我站起来就走了。

我的家在党中央大楼附近，因此徒步走了出来。在伞兵组成的人墙后面，站着很多人在等消息。他们对苏联兵恭敬地放出来的自由人，都是有所怀疑的。有一个人认出来是我，喊我的名字，于是一大群人把我围住打听杜布切克怎样了。我告诉他们，现在大楼里一个党的领导人也没有，听说在准备政治谈判，杜布切克将参加谈判，等等。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种想法竟是那个小个子上校自己想出来的，并且不怕风险地把它散播开来。恐怕这也不是他的创造，而是听他的上级说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很难说有哪一个苏联领导人会认为需要在莫斯科同杜布切克谈判。这个问题是在二十四小时以后才在布拉格的苏联大使馆和总统府里定下来的，而杜布切克在四十八小时后才被送到克里姆林宫。次日，即一

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谈判的事还是一点影子也没有。相反，这一天本来是想要在苏联驻捷使馆里组成以英德拉为首的“工农革命政府”的。

* * *

八月二十二日早晨，我还没有决定究竟是到维索昌区去参加党的十四大代表的集会，还是去党中央大楼了解情况。我在夜间已经得到消息，知道在我们被软禁在杜布切克办公室的时候，党内的亲苏派比拉克、英德拉、雅盖什和科尔德等约五十人，在党的招待所“布拉格旅馆”里聚会。我也听说，人们在这个会上的发言表明，党中央内这一派人乐于同苏军合作，并选出了以比拉克为首的小组去试探同占领军司令部进行谈判。这些传说同苏联上校所说的同杜布切克会谈的说法相矛盾，但却同杜布切克等人被逮捕时，宣布那个以英德拉为首的“革命法庭”时，在我的头脑中所引起的想法是一致的。亲苏派可能正企图筹组一个由捷奸组成的党和国家的新的领导机构。当时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把具体情况弄清。因此，我在谈妥同维索昌区十四大代表的联系方法之后，就到党中央去了。

坦克还停在大楼前面，武装警戒线也还在那里，但出示党中央机关身份证后就可以进去。我们的办公室都空着。党的二十二名领导人中有十一人来了，这些人是比拉克、英德拉、科尔德、雅盖什、列纳尔特、什维斯特卡、皮勒尔、巴尔比雷克、里戈、萨多夫斯基和我。没有到场的主席团成员有被捕的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什帕切克和西蒙。齐萨士、斯拉维克和埃尔班等三位书记也不在。另一名书记沃列尼克的情况我记不起来了，记不得他是没有来还是在大楼里参加会议。我也记不清卡佩克的情况，但我想那一天他没有来。此外，来了两个人，他们虽系中央委员但并非领导成员，他们是诺沃提尼时期的总参谋长里蒂

士和切尔尼克政府的贸易部长巴甫洛夫斯基。

比拉克主持了会议，他解释说，里蒂士和巴甫洛夫斯基之所以来此参加会议，是因为昨天部分中央委员开会时把他们选进了同苏军司令部谈判的代表团。然后，比拉克介绍了谈判结果。根据他的看法，同苏军司令部和苏联大使馆进行谈判是解决当前局势中的任何问题的主要前提。他要求党的领导的残余部分把这个意图通知各州的党组织，并自封为可以进行最高级谈判的机构。

我同萨多夫斯基质问，杜布切克等人究竟怎样了。比拉克没有作出具体回答，他只说他曾得到保证，杜布切克等人现在苏联的保护之下，很安全。讨论中其他人，如皮勒尔、巴尔比雷克、里戈，甚至可能还有什维斯特卡和列纳尔特也都表示，在进行任何谈判之前，必须首先同被逮捕的党的领导人取得联系。比拉克关于组成新代表团的建议被否决，通过的决议是要求目前缺席的党的领导成员都参加会谈，而会谈的对手不应是苏军司令部，而是苏联大使。首先应要求契尔沃年科同勃列日涅夫联系，要求他释放六名被捕的领导成员，今后的一切会谈均须由党的领导集体来进行。当时甚至连比拉克、英德拉、科尔德和雅盖什也没有反对这样一个由各方面人士提出的建议，相反，比拉克接受了这一建议，并亲自给契尔沃年科打电话联系。

约至中午时分，我们同契尔沃年科达成协议，十一名领导人将去苏联驻捷使馆，并在使馆同勃列日涅夫取得联系（捷共中央同苏共的直通电话昨天已被闯入的士兵搞坏了）。比拉克还宣布，苏军将用军车把我们送到苏联大使馆。奇怪的是，除比拉克和英德拉外，大家都拒绝了这种交通工具。于是，比拉克和英德拉二人到院子里坐上了苏联的装甲车，其余的人挤进四辆汽车里开赴苏联大使馆。

大使馆周围当然是由数层坦克、装甲车和士兵保护起来的。

办公大楼里面像是一个兵营；全副武装的士兵、着军服和便衣的克格勃人员在楼梯上和过道里有躺有坐，所有的入口处和窗户旁都有岗哨。我们被领到契尔沃年科办公室旁边的一个房间里，屋里摆着伏特加、白兰地、葡萄酒、三明治和鱼子，但是找不到谈判的对手。据说大使同志有话，要我们在此等候，并为此表示歉意。

我们只好等待。大约半小时后，一个穿便衣的人找我谈话，他显然是苏联的公安人员。我和他出去后，他告诉我说，一个老同学托他向我致意。据我所知，这个同学是克格勃的一名中校。这个便衣还说，他可以帮我的忙。我告诉他，在这种情况下我能要什么帮助呢？如果你想帮助我，那就把契尔沃年科找来，让他帮我们同勃列日涅夫联系。他笑笑说，这种事他是无权处理的。这时我突然想起我需要打电话，需要同非常党代表大会保持联系，而这件事在大使馆是很难办到的。我告诉他，我还有个小请求，我想用保密机打电话，大使馆一定有这种机子。他真的帮了忙，带我到有保密机的屋子去了。我利用这个电话机打了三次电话，把谈判的情况通报了出去，其后，人们又把我的通知告知了非常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但转述时内容有些不够准确。

这件事引起了一场笑剧。在我们等候契尔沃年科的房间里（后来谈判也是在那里），有一架收音机。我们用这架收音机收听维索昌大会开会的情况。突然广播电台报告说，主席团的亲苏派人士正在苏联大使馆商讨成立捷奸政府，并说在场的人有的想参加政府，有的拒绝参加，等等。这件事使这些人非常震惊，科尔德几次大声喊叫："他妈的，他们怎么会知道的？"在场的人谁也没有回答。可以看得出，他们也很感不安，觉得在这里也不够安全。但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是我用契尔沃年科的电话干的。

我们等契尔沃年科等了好几个小时，等比拉克和英德拉也等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是坐苏军的装甲车来的。他们到大使馆后解

释说，就是因为这辆车才迟到的。装甲车离开党中央大楼，过了横跨伏尔塔瓦河的大桥后，就被挡住了去路，因为一辆电车和苏军卡车相撞后把路堵住了，当时装甲车也无法退回去。车长虽曾建议他们两人换乘其它车辆，但他们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占领者的装甲车里爬出来。就这样，他们在八月的骄阳下，在这个装甲怪物里坐了差不多一小时。他们来时是非常狼狈的，情绪也极坏。

下午，契尔沃年科来了。他听取了我们关于同勃列日涅夫联系的要求后又走了。大约一小时后他回来说，使馆同莫斯科的电话接不通。我建议他通过他们军队的司令帕符洛夫斯基将军的设备去联系。契尔沃年科断言，那里也接不通。对此，我说："真是糟糕，军队竟然不能同格列奇科元帅联系。"这位大使不动声色地说："是啊，这真是很不愉快的情况。"接着，契尔沃年科就转入了正题，他说：坐等联系实在是毫无必要的浪费时间，电话迟早会联系上的，那时还要商谈关于杜布切克、切尔尼克以及其他政治局委员的事，等等。他建议大家利用现在的时间具体地考虑一下，是否可以建立一个非常机构来渡过这一非常时期。这个机构应该是把党和国家的职能结合起来，就是说，成立工农革命政府。大使认为，在座的诸位可以构成新政府的基础，因为大家既有合法的身份，又享有苏联同志的信任。他建议我们讨论一下，然后又离开了房间。

情况清楚了，可以开始讨论了。当时在场的有我前面提到的十一名党的领导人，此外还有巴甫洛夫斯基部长和早就在大使馆等我们的萨尔戈维奇。但是根据我的记忆，里蒂士将军当时不在大使馆。讨论开始时有些僵，谁也不愿意具体地建议什么。后来，比拉克提出了对谈判的设想，他说现在要做的同大家下午谈的是一样的，在同莫斯科取得联系之前，大家先根据大使所说的意见初步搞个建议。他个人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当然，最后的决定还要等同不在场的领导人商谈后才能作出。

对皮勒尔来说，现在这个场面太尖锐了。可能他认为最好还是躲开，也许他想要在这个微妙的时刻把我和萨多夫斯基引开，因为我们目前的表现已经表明，我们是不会同他们合伙的。因此，皮勒尔建议由我们三个人组成中央主席团代表团去维索昌区参加非常十四大代表的集会，以便对大会的进展施加影响。我们从广播中得知，代表们的集会已经宣布这次集会就是代表大会了，并且还将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我拒绝了皮勒尔的建议并表示，现在这个筹建什么革命政府的党中央同维索昌的大会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我拒绝在这二者之间作中间人。此外，早晨我们已经做出决议，要大家一起同契尔沃年科谈判，我不放弃参加谈判。萨多夫斯基也拒绝了。这样，问题就无法解决了，在场的其他人谁也不敢同皮勒尔到维索昌去露面，而只是皮勒尔一个人也不能算是代表团。最后，他这个建议只好作罢。

随后开始了两小时的筹组新政府的谈判，这个新政府同时也是党的领导机构。这种艰难的组阁工作必须符合于前天夜里主席团的决议，任何人不得离开现有的职务。但是建立新领导的目的就是建立新机构，推出新领袖，因此有人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比拉克主持党务，英德拉主持政府工作。

我说这是个“建议”，因为它确实是在讨论中逐步提出来的。好像是排练好的一样，发言按如下顺序进行：比拉克、英德拉、科尔德、雅盖什、列纳尔特、什维斯特卡和巴甫洛夫斯基。可能还有皮勒尔，但他有些动摇不定，也可能是故意装的。巴尔比雷克和里戈好像是不知内情，有时干扰讨论。萨尔戈维奇在讨论时长时间不在场。萨多夫斯基和我则是外人。

比拉克表示接受职务，愿出任党的新领袖。他装作有些犹豫，然后又表示，既然同志们对他这样信任，他将凭着良心、不惜力气地工作，以使全党在这样困难的时刻里不致于听任命运的摆布。接

说他是能够当部长的，……。

里戈是共产主义运动中能够当上主席团成员的第一个吉普赛人，可能也是最后一个。有些时刻他还会表现出本民族的那种顽固的、不为任何事物所左右的性格。现在他的不愿当部长的情绪简直是不可动摇的。最后还是契尔沃年科解决了问题。在他回来后，他对里戈说："是的，你不必当部长，你还是在你的东斯洛伐克钢铁厂工作吧，只不过是当一名工农政府的成员，就象现在当主席团委员一样。"契尔沃年科这么一说，里戈也就心安理得地表示可以干。为什么不干呢？

讨论在继续进行，时间过去了，但是一直作不出具体结论。契尔沃年科再次出现时很不高兴地得知，革命政府一直还无着落，连总理也还没有。天色已经晚了，按计划应该早就一切就绪了。契尔沃年科没有办法，只好自己亲自动手。他宣布他刚刚同斯沃博达总统会晤过，他已经告知总统，党的领导正在开会，很快就会把今后行动的建议告知他，因此，现在这个会议必须尽快作出决议。

很明显，现在不好再拖下去了。我同萨多夫斯基悄悄地商量了一下，想要公开表示拒绝成立政府的方案，拒绝继续开会，同时重新提出原来的要求：先同杜布切克等人会合，然后再谈判。当然我们也考虑必须同时设法使我们能够安全地离开使馆，而不是同杜布切克在他被囚禁的地方会合。我们那时还不知道杜布切克等人在哪里。契尔沃年科撒谎说，他们都还留在捷国土上。如果指的是战前的边界的话，那倒是句真话，因为他们都被囚禁在外喀尔巴阡山乌克兰，① 分别关在克格勃的两所房子里。

契尔沃年科提到同斯沃博达总统谈判，这倒是给我出了一个主意，使我想起我认为是可以全面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我要求

① 外喀尔巴阡山乌克兰原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公民投票"划归苏联。——译者

说他是能够当部长的，……。

里戈是共产主义运动中能够当上主席团成员的第一个吉普赛人，可能也是最后一个。有些时刻他还会表现出本民族的那种顽固的、不为任何事物所左右的性格。现在他的不愿当部长的情绪简直是不可动摇的。最后还是契尔沃年科解决了问题。在他回来后，他对里戈说："是的，你不必当部长，你还是在你的东斯洛伐克钢铁厂工作吧，只不过是当一名工农政府的成员，就象现在当主席团委员一样。"契尔沃年科这么一说，里戈也就心安理得地表示可以干。为什么不干呢？

讨论在继续进行，时间过去了，但是一直作不出具体结论。契尔沃年科再次出现时很不高兴地得知，革命政府一直还无着落，连总理也还没有。天色已经晚了，按计划应该早就一切就绪了。契尔沃年科没有办法，只好自己亲自动手。他宣布他刚刚同斯沃博达总统会晤过，他已经告知总统，党的领导正在开会，很快就会把今后行动的建议告知他，因此，现在这个会议必须尽快作出决议。

很明显，现在不好再拖下去了。我同萨多夫斯基悄悄地商量了一下，想要公开表示拒绝成立政府的方案，拒绝继续开会，同时重新提出原来的要求：先同杜布切克等人会合，然后再谈判。当然我们也考虑必须同时设法使我们能够安全地离开使馆，而不是同杜布切克在他被囚禁的地方会合。我们那时还不知道杜布切克等人在哪里。契尔沃年科撒谎说，他们都还留在捷国土上。如果指的是战前的边界的话，那倒是句真话，因为他们都被囚禁在外喀尔巴阡山乌克兰，① 分别关在克格勃的两所房子里。

契尔沃年科提到同斯沃博达总统谈判，这倒是给我出了一个主意，使我想起我认为是可以全面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我要求

① 外喀尔巴阡山乌克兰原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公民投票"划归苏联。——译者

发言并建议说，按照捷的宪法，在政府总理不能行使职权时，总统可以主持政府工作。现在，在我们开会的时候，尽管没有总理，但政府依然存在。英德拉同志自己也说他不能领导政府。我们也没有就各部职务的分工达成协议，而现在政府各部都有合法的部长。因此，我建议，在场的各位全都到总统府去同总统一起继续会谈。至于我个人，我拒绝接受工农革命政府的任何职务。因为这样做就是变更现存宪法机构从而违反捷共主席团的决议，也违背了前天夜间曾参加主席团会议的总统的立场。看来，如果不讨论军事干涉和撤军问题，僵局是打不开的。

萨多夫斯基的发言同我的建议基本相似。契尔沃年科表面上仍保持冷静，但他显然已经意识到筹组革命政府的计划是行不通了。据我后来得知，在此以前他就有这个感觉了，因为他同斯沃博达总统会谈时暗示了成立新政府的事，总统当时就曾予以拒绝并要求率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与此同时，什特劳加尔副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当然这件事我在当时还不知道。

契尔沃年科首先找我来进行说服，他的意思大致是说：拒绝参加新领导是错误的。他认为我是有能力的人，没有理由拒绝参加，他理解，我现在可能认为一切都是无法解决、不可收拾的，但这是短视的看法，应该看得远些。像匈牙利那样，五年以后一切都会变的，现在看来好像是无法医治的创伤，几年后也会愈合的。应当考虑党和人民的前途和自己的前途，不要只凭感情的一时冲动。军队既然来了，就不该设想要它马上离去。如果那样的话，你们的国家会发生什么事呀？

我回答他说，我确实不认为既然他们已决定进行干涉，今、明天又会决定撤走。问题是他们来就来错了。这一步骤将会有长时期的后果，五年以后局面是不会平息的。匈牙利的事也并未解决，已经发生了的事不能说它未曾发生。总之，我坚持认为今后的会

谈应是最高级会谈，我再次建议去总统府并要求同杜布切克等人取得联系。

接着展开了一场简短的讨论，奇怪的是，竟然无人反对去总统府进行谈判。契尔沃年科详细地询问了根据宪法在总统参加的情况下处理局势的可能性，随后他也同意了去总统府的方案。

我们在苏联军官和装甲车的陪同下抵达布拉格宫总统府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来钟了。契尔沃年科自己先到斯沃博达办公室去了，显然是建议他主持政府工作。由什特劳加尔主持的切尔尼克政府正在与我们相邻的大厅里开会，政府成员差不多是齐全的。我们坐在那里等候，同时讨论由谁出面代表我们向斯沃博达转达在苏联大使馆开会时关于成立新政府的建议。比拉克和英德拉都不愿意出面，最后大家委托皮勒尔汇报。

总统办公室的门打开了，面带怒容的契尔沃年科从总统办公室出来，经过我们所在的大厅走了出去。斯沃博达接着走出来，他也很激动，但很克制，行动保持着军人姿态，背比平时挺得还要直。他同我们一一问候，并建议找正在开会的政府派代表来和我们一起商议。接着，他到政府开会的房间里去找了三名政府成员来。据我的记忆，这三人是什特劳加尔、玛哈乔娃和库切拉。①

什特劳加尔坐在我的对面低声问我："要谈什么？"我拿了一张纸条，在上面写了"问你是否参加工农革命政府"几个字，递给了他。他吃惊地看了几眼，又写了几个字递了回来。纸条上写了一句问话："这是什么东西？"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皮勒尔已经开始介绍苏联大使馆的建议了。②

---

① 玛哈乔娃当时任消费工业部部长，库切拉为捷社会党主席，任司法部长。
——译者

② 我在这里所说的、有什特劳加尔笔迹的那张纸条，当时我随手放在口袋里一直保存了下来。一九七七年四月间，公安部门到我家去搜查时，把这张纸条没收了。也许他们在看到这本书时，才知道这张纸条的来历吧。

皮勒尔的话音一落，我和萨多夫斯基马上发言，重申了我们对契尔沃年科的表态，表示我们不参加这个政府。什特劳加尔代表政府断然拒绝了皮勒尔的建议。斯沃博达接着宣布，这样的建议他不接受，永远不会接受。如果照这个建议办，我们民族就会把他象癞皮狗一样赶出总统府。

斯沃博达随即提出自己的设想：到莫斯科去，同勃列日涅夫会谈，向他们要回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人。他已经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契尔沃年科，并表示这是他唯一可以接受的办法。现在事情已经定下来了，明天早晨即将起飞。跟随他一起去的有三名政府成员：副总理胡萨克、国防部长楚尔和司法部长库切拉。库切拉不是共产党员，他去是代表民族阵线的。斯沃博达建议，党的主席团残存下来的这部分人选出三名代表和他一起去莫斯科。他说他认识勃列日涅夫，同苏联的元帅们也很熟，这一悲剧性的误解是可以说清楚的。他相信自己去莫斯科谈判，会使事态平息下来。最后他宣称："等苏军撤退的时候，你们等着瞧吧，我国人民将象一九四五年那样，用鲜花为他们送行的。"

斯沃博达这一番话前后语气的矛盾使我惊奇。但在我同他的接触中，这不是最后一次吃惊。不过无论如何，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夜间，斯沃博达在粉碎筹建捷奸政府的企图方面，确实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政治上说，当时起决定作用的，无疑是两天来全民进行的反占领斗争和维索昌区捷共十四大的召开，但斯沃博达个人在粉碎莫斯科的这一阴谋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事实。不能因为他后来的发展和扮演的不光采的政治角色，而无视他曾经起过的作用。

斯沃博达的话对党的某些领导人不仅是一瓢冷水，而且简直是一顿鞭笞。比拉克这时象是一条挨了打的狗。人们可以马上看到，他原来不过是一个满怀野心和恶意、渴望权势的、学艺未成的

小裁缝，① 但眼下他的主要感觉是恐惧，这是一种在关键时刻突遭惨败的恐惧，简直是一种兽性的恐惧。但是，他们这些人还不得不选派代表陪同斯沃博达去莫斯科。最后，他们选了比拉克、英德拉和皮勒尔。

这天夜里，我还同斯沃博达单独谈了半个小时。他告诉我，入侵后有一个女人给他打电话，要求他自杀，以表示对占领的抗议。他说他当时表示不能自杀，他有责任处理当前的局势。据他说，那个女人说："唉呀！总统先生，你要是自杀了该多么好啊！"不知道那个女人怎么搞到了总统的电话号码。不过，在那种时刻，这种事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我认为这可能是总统的幻觉，因为后来我听到好几个人提到他的这段遭遇，而他对各个人的叙述则有相当大的出入。斯沃博达谈到的另一件事，也使我感到他的思路是奇怪的。例如，他说他去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是把杜布切克、切尔尼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人要回来，他也相信他可以向勃列日涅夫和苏联的元帅们把这些人要回。但等他们回来后，他认为，杜布切克应该立即辞职，然后，一切问题自然都会解决了。他当时就是这样说的。临告别时，斯沃博达还对我说，谁在这一困难的时刻同他站在一起，他这一辈子是忘不了的。今后不管出现什么情况，现在支持他的人都可指望得到他的报答。

我回家以后，觉得这一天好像是在梦境中生活一样。实际上已经三天没有睡觉了，精神处于紧张状态的时间也已超过四十八小时。我吃了点镇静剂就躺下了。还没睡着又有人打来电话。这一次是希尔汉，维索昌大会新选出的主席团成员，他受大会的委托在杜布切克回国以前主持党的工作。他告诉我，维索昌大会选我为中央书记并通知我去办公，我答应在次日清晨去，并谈妥了去维

① 比拉克在一九三一至三四年间学裁缝。据称因资质愚钝，毕业时未获得完全合格的缝纫师证书。——译者

索昌的办法。

* * *

八月二十三日是星期五，早晨我在去维索昌的途中第一次在白天看到了被占领的布拉格的街道和人群。前一天，我去苏联大使馆时，先是经过了布满了苏军的街道，后来到的是布贝内茨别墅区，这里住的不是布拉格的一般群众，因此，当时显得很平静。今天，我是从市中心出发，通过几个主要的工人区，如卡尔林区、利奔区，然后到维索昌区。在这些地方，苏军和坦克不像昨天所见到的那样密集，但全民反抗占领的景象却是既形象生动又令人信服。

所有的墙上都刷上了口号或贴着手工制作的各种标语。尽管占领军采取许多措施禁止出版报刊，但报刊和宣传品还是从各个印刷厂大量运出，人们就站在大街上全神贯注地阅读着。这个城市给人的印象是，全民已经团结起来，正在对外国入侵者进行一场非武装的、消极的反抗。人们用国旗和国徽的图象以各种办法装饰着街道、橱窗和人们的外衣衣领。被苏军子弹打死的人们的牺牲地点都摆着简单的纪念牌，放着鲜花和国旗。街道名称的牌子或是被扯了下来，或是贴上了别的名称，如“杜布切克大街”，或是把许多街名的牌子加以调换。十字路口的公路标志被打碎了，有的把指示箭头调换了方向，有的则涂写上各种字样，如“去莫斯科——2000公里”。有的墙壁上留有子弹的痕迹，有的商店橱窗被打碎了，但多数这种橱窗都被人们巧妙地布置成反对占领的橱窗。

多数口号的内容是捍卫国家和民族的主权，这一内容又经常是同争取民主社会主义的要求相联系的。有的口号援引列宁的语录，有的横幅则写成“列宁你快醒一醒，勃列日涅夫在发疯！”杜布切克和斯沃博达的名字醒目地写在大楼和各式围墙上，对杜布切克、斯沃博达、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切尔尼克表示信任的口号，构成了沿街装饰的主要内容。有的标语反映出过去多年来反美宣传的

影响，因为那时把美军驻扎在西欧等地也称作帝国主义侵占。在用捷文写的“滚回去”的标语之间夹杂着许多当年国际流行的标语，例如把“美国佬，滚回去”换成“伊万，滚回去”，有的标语是“美国在越南，我们这里有苏联”，等等。有些人把苏联的捷克文缩写 SSSR 的前两个 S 写成闪电形状，使人一看就联想到希特勒的党卫军。也有人画了个镰刀、斧头，后边画了一个大等号，然后画上一个纳粹的卐字。还有一种很典型的讽刺标语和漫画，用非政治性的手法嘲笑占领军，把他们说成是被人利用的傻瓜。也有一些标语是用俄文写的，不过其中有些只是用俄文字母拼成的捷文字。

这些标语和站在街心同坦克上的俄国兵进行辩论的人群，都证明了我国人民是企图用论据去影响占领军。这种情况在一九三九年三月纳粹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是未曾发生也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人们断定这些“伊万”们是受自己政府欺骗的蠢人，他们搞不清他们是在干什么，因此，想要向他们把事情解释清楚。我们这个民族好像也和我们这些长期当官的党员一样，总觉得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一场误会，都不会是真的。

非常代表大会所选出的主席团，就在维索昌区切卡德工厂的庞大的建筑群中工作。武装的工人纠察队守卫着通向主席团办公地点的道路。非常十四大的文件，以及新选出的机构所采取的政治步骤，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国外也曾出版专集，因此，我在这里就只谈谈我在那里工作的两天中所获得的印象。

我认为，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在许多方面都对事态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捷共能够作为一个政党在多数群众的心目中继续保持着决定性的政治影响，主要就是由于这一大会的召开。大会对新出现的形势明确地表了态。杜布切克领导集团在八月二十一日夜间对侵略所进行的一般的笼统谴责，被十四大具体化为若干政治要求，即：撤走

占领军；所有依据宪法就任的官员全部返回原职；遵守国际法准则，包括遵守华沙条约的规定。代表大会没有提出退出华沙条约和宣布中立等要求，这显然是接受了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的教训。大会还要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给予支援。在新选出的机构中没有给亲莫斯科派和保守派留下任何职务，从而明确地剥夺了他们的权力。此外，当时的国民议会和政府都承认了这次代表大会。这一切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形成一种印象：捷共作为国家的政治领导力量仍在继续发挥作用，继续执行"布拉格之春"的路线。代表大会在不多几天的时期内使人们感到"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派已经确实取得了胜利，尽管总的形势意味着改革派已遭到彻底的失败。

这一情况对国内政治以及莫斯科下一步的打算，都是很重要的。对苏联的政治局来说，这个代表大会的召开出乎他们的意料，并且使他们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局面。这次军事入侵在政治方面也曾有所准备，尽管设想得很不周密、很牵强，但他们确实曾进行过努力，以使这一军事行动在政治上显得合法一些。根据干涉后最初几天苏联报刊的宣传情况，根据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捷共领导人中所发生的各种事情以及事后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我认为进行军事干涉时的政治计划大致如下：

捷共领导人中同干涉者勾结的一派以比拉克、英德拉、科尔德和雅盖什为主，其中还包括什维斯特卡、皮勒尔、列纳尔特和卡佩克等人。他们估计能够争取到里戈、巴尔比雷克甚至还有沃列尼克的支持。这一派人曾向克里姆林宫保证能够搞到充分的根据，以使干涉合法化。他们为此目的所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在八月二十日的上午，地点是党中央英德拉的办公室。在原订当天下午十四时举行的主席团会议上，他们本想把英德拉和科尔德关于形势报告的意见书列为第一个议题来讨论。这个形势报告是党中央机关的情报部门（负责人为约·卡什帕尔）提出来的，其

内容是用故意歪曲了的以及一些客观的材料拼凑成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科尔德和英德拉的意见书就是以这个报告为基础的。根据莫斯科的需要，报告片面地把国内局势说成是“反革命”发动的反社会主义行动已经成了现实的危险。比拉克这一派估计表决意见书时能在主席团里取得多数。在这种时刻，皮勒尔、巴尔比雷克和里戈等人投谁的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但是，皮勒尔和巴尔比雷克在后来表决主席团声明时并没有支持占领。这是因为这一表决不在亲莫斯科派的计划之中。如果真的对科尔德和英德拉的意见书进行表决的话，这两人大概是会支持意见书的。按他们的估计，主席团正式委员在表决意见书时会形成六比五的局面，使杜布切克处于不利的地位。候补委员中，他们估计能得到列纳尔特和卡佩克的支持，而支持杜布切克的则只有西蒙一人。主席团以外的领导人中，属于亲苏派的有雅盖什、英德拉和沃列尼克，属于杜布切克派的有齐萨士、萨多夫斯基、斯拉维克和我。书记处成员中上述这种三比四的局面只是个表面现象，事实上那三个人的地位要强得多，因为他们控制着全部机关并掌握着实力最强的俄斯特拉发州。我们这一方面的齐萨士和斯拉维克都是搞意识形态的，萨多夫斯基管农业和中央机关的财务。至于说到我，我所主管的工作从研究制订政策的角度来看的确是重要的。但在发生政变的时候，起作用的是各部门里各派势力的力量对比，至于为这些部门草拟方针路线的书记究竟对此持什么态度那是不重要的。

在讨论科尔德和英德拉的意见书发生分歧时如果进行表决的话，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中将会形成十一比十的局面而有利于意见书的起草者。埃尔班那时也是领导人，担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民族阵线的书记。但据我的记忆，他当时并没有参加会议，这是出于巧合还是另有别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按照埃尔班的为

人来说，虽然不能排除他倾向于保守派的可能性，但他大概是会设法保持中立的，也有可能会跟着杜布切克举手。只要科尔德和英德拉意见书能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他们马上就会依仗多数迫使主席团讨论勃列日涅夫的来信，并在讨论中提出给勃列日涅夫复信。这封复信可能就是一封要求莫斯科提供“兄弟援助”的信。这是第一种可能性。另一种可能性是，在讨论勃列日涅夫的来信时，他们故意制造分裂，然后同政府机关中的苏联特务一起，即同诸如巴甫洛夫斯基、萨尔戈维奇、霍夫曼以及其他一些人，特别是部队里的人一起，单独搞一封那样的信。然后，在外国军队开进来以后，马上宣布成立“工农革命政府”，同时“革命法庭”也立即开始工作。

苏联《真理报》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发表了一封署名“党、议会和政府部分人士”但无具体人名的信。这封信是确实有过的。在苏联特务、捷通社社长苏莱克的办公室里就曾发现过这封信的抄件。当然，那上面也没有签名。我想，可能在当时根本就没有征集签名，所以至今这封信在捷也没有公开发表。不过，即使曾经征集过签名也不可能发表。因为如果有这样的信的话，那么胡萨克、什特劳加尔、凯姆普尼和佐洛特卡等“正常化派”的现任最高领导人，就无法证明自己在当时也曾有一份功劳。而他们所不喜欢的诺沃提尼时期的斯大林主义激进派，却能够据此吹嘘自己的功绩。对这样的局面胡萨克是不会感兴趣的。但是，根据我的看法在这封信上是不会有什么签名的，因为这封信本来是应该由“工农革命政府”的成员来签署的，但建立这个新的领导机构的计划完全破产了，所以签名的事在当时就已作罢论。

八月二十日下午主席团会议开始讨论议程。争论是十分尖锐的，但最后确定先讨论代表大会的文件，然后再讨论科尔德、英德拉的意见书。杜布切克很顽固地坚持要按这样的议程开会。我不认为杜布切克此时已经意识到，再过几个小时干涉就要开始了。

他显然是想把勃列日涅夫的信拖到会议快结束时再拿出来讨论，因为讨论这封信势必引起很大的争论，而杜布切克当时主要是想把代表大会的文件先弄好。另外，这封信和英德拉他们的意见书之间的内在联系，明眼人一看就清楚的。

亲莫斯科派的第一次冲击，被官僚主义的例行公事、被程序问题挡回去了。这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就是如此。我想，有两方面的情况可资解释。一方面，他们搞的是一种官僚主义的政变，因此遇到官僚主义的障碍时就无法逾越了。另一方面，亲苏派这些人当时心虚胆小得很。会议议事日程的顺序一经通过，再要想改变，就必须有几个亲苏派公开出面制造冲突来坚持自己的意图。但要想这样作，亲苏派就必须当机立断，而不能还是相互协商一阵子再做决定，因为过了这一两分钟就一切都晚了，会议已经开始讨论代表大会文件的草案了。他们这些人缺乏搞政变应有的那种决断和胆量。

在此以前或后来发生的事件中，他们的这种思想状态都不时有所表现。八月二十二日在苏联大使馆时，他们就是这样的。八月二十日夜间在杜布切克办公室时，比拉克大叫“你们整我吧！”也是表明了他们的心虚和恐惧。诺沃提尼的亲信，他的办公厅秘书杨·斯沃博达，在入侵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以后，曾经叙述过一段故事。八月入侵以前，有一次斯大林主义分子曾同一些苏联代理人在宁布尔克县秘密聚会，为入侵做准备。主席团里的亲苏派原订也派几名代表参加会议，但到了开会时，他们吓得不敢来了。杨·斯沃博达说，最后只等来了比拉克一个人，而他来时也是吓得魂不附体，连话几乎都说不出来了。

八月二十日夜间，他们对入侵给以政治支持的第一个计划失败了。但导演在继续指挥，他们并没有就此停手。八月二十二日晚间，在苏联大使馆，他们又一次失败了。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第

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已经召开。莫斯科的总导演，被迫改变计划，接受谈判。利用的对象是斯沃博达总统，但同时被迫接受那些原拟交付“革命法庭”审判的人们来作为谈判对手，即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等人。

这几个人的处境，在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五，开始发生变化。那时他们被关在喀尔巴阡山中克格勃的房子里。上午，勃列日涅夫给杜布切克打来电话，然后就把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运到莫斯科。八月二十五日，被逮捕的其他人（克里格尔除外），以及包括我在内的留下的中央领导成员，分别从拘留地点和布拉格被送往莫斯科，同杜布切克和斯沃博达会合。苏联被迫以杜布切克为对手来进行谈判。因为，一方面，事实证明，他们的代理人是无能的，预计的政变没有搞成。另一方面，十四大新选出的领导班子，对莫斯科来说，又是根本不能予以考虑的。

八月二十二日开始的捷共十四大，尽管对局势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但它在政治上也有一些弱点，这特别反映在新选出的机构上。我所说的“弱点”，同后来“正常化派”所宣传的弱点，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断言，代表大会的举行和选举新的领导等都是非法的，是违反党章的。这种说法全然是无稽之谈。因为，任何一个组织，只要他是以代表大会为自己的最高权力机关，那它就必须承认，当正式选出的代表大会代表们拥有必要的多数时，他们就可以以最高权力机构的名义行事，而不受关于举行大会的日期以至某些组织条例的规定的约束，因为最高权力机关有权修改乃至撤销以前的任何决议和规定，这当然包括召开大会的日期的规定。按照捷共党章的规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以及各机构的权力，都是代表大会给的。因此，硬说占代表总数三分之二的代表大会所做出的决定（宣布自己的会议为代表大会）是违反党章和篡夺权力，这显然是荒谬的。我所说的弱点并不是指这一情况。

十四大选出的领导机关，把自己当作一个临时性的机构，公众也是这样看待它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是这样。代表大会和中央机构，在当时都有义务确认那些被劫持的同志们的职务。他们都继续当选为主席团成员，成为在中央缺席的最有威信的人。党内党外都认为目前一切都是临时性的，要等他们回来后才能进一步解决各种问题。当时担负具体工作的同志，包括被十四大选出、代表杜布切克的希尔汉，在党内外都没有很大的名气。他们自己也有临时观点。总之，十四大在形式上选出了新的领导，实际上只是表示支持旧领导，支持杜布切克领导集体中别人想要用军事干涉颠覆掉的那一部分人。新的中央委员会，把改革的前途、党的命运以及自己的命运，都交到这一部分人的手中。但这些人不仅没有能出席大会，而且根本不在国内。莫斯科谈判开始时，同苏联政治局谈判的主要人物，根本不知道国内这些天发生了什么事，不知自己进行谈判的后盾究竟如何。

维索昌新选出的主席团，由二十八人组成。其中有十八人为上一届捷共或斯共的中央委员，或者是在政府中任要职。例如胡萨克和佐洛特卡二人，均曾任副总理。有十五人（过半数），不在布拉格，因而无法参加大会。当时最有威信的人全都不在场，六人被劫持，希克在南斯拉夫，胡萨克参加了代表团在莫斯科，齐萨士在八月二十六日以前躲在布拉格郊区。此外，斯洛伐克的代表，如佐洛特卡、兹拉克、贾日基、帕夫伦达等，都在布拉迪斯拉发市。党的领导人从莫斯科返回之前，在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主持工作的新主席团的成员，主要是以前的州、县和企业的干部，如赫京诺娃、利特拉、卡布尔纳和莫茨等人。有些人则没有在党的机关中工作过，缺乏必要的威望和支持。暂时代替杜布切克的布拉格高等经济学校教授希尔汉，就是如此。再如，一九六八年六月上台的广播电台的台长海兹拉尔，也是如此，他在党内虽然曾居高位，但一

九五一年后一直受迫害。新的主席团进行工作时，主要是依靠布拉格的市委机关和部分中央机关。这些机关由马·瓦楚利克领导，他在诺沃提尼时代曾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现在不是主席团的成员。我也不是主席团成员，八月二十三、二十四日这两天，我是以中央书记的身份工作的。我的联系对象，主要是只愿意同上届大会就是中央书记的领导人打交道的人们，例如，同工会的领导人商谈罢工的形式和组织问题，同工人纠察队商谈有关这一支武装力量的问题，以及同民族阵线的代表们接洽，等等。

我想，不仅是维索昌大会选出的各级干部有临时感，党的其他机关干部也有临时感，认为新的领导无非是过渡几天，等到党的主要负责人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就可告一段落。但他们每天都要执行成百上千个艰巨的组织任务，为各种声明和表态拟订草案。还有许多记者来往奔波，使中央和地下报刊、广播电台保持联系。斯沃博达和杜布切克愈是不见回来，临时性局面维持得愈长，人们的不安和紧张情绪就愈大，人们对国家前途乃至个人命运的担心也随之增长。总之，十四大只能是一种临时性的安排。

在上述情况下，党的机关中约有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人甘愿承担一切风险，积极地为十四大服务，他们把新选出的机关的决议和指示具体付诸实施。另外有一大部分人，他们也支持代表大会的路线和行动，但他们估计形势可能不久就会发生转折，因而是小心谨慎的。这两类人合起来约占百分之九十。这些人反对占领，支持杜布切克和其他被劫持的人，这些人绝不肯同占领者合作。

持对立立场的人在中央机关的干部和职工中只占极少数。他们准备同占领者合作，指望改革遭到彻底失败并使极权专政得以复辟。但在领导人回国之前，也即八月二十七日之前，他们大多只是被动等待，还不敢同苏联兵积极合作，也不敢公开表示自己的观点。当时捷共中央机关一共有五百来人，其中只有不到二十人在

八月二十二日以后继续到被苏军占领的党中央大楼去办公。那时，代表中央主持工作的是科尔德。有一次他给我家里打电话时透露出他当时的心情。那次他是通知我去莫斯科参加会谈。当他听说我不在家并且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的时候，他说："怎么不知道？还能在哪里呢？准是在维索昌，他们差不多都在那里。这有什么好怕的？如果他们害怕，那我就更该害怕了，在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苏联在捷共机关内的主要代理人，在这些日子里分别呆在莫斯科和德累斯顿。他们在那里拚命工作，为占领者的宣传制造材料。他们制造了大量的诬蔑、谎言和斯大林主义的宣传套子。然后，这些东西都由所谓"伏尔塔瓦"广播电台予以广播，并由苏联和另四个干涉国共同搞的刊物《消息》报付印散发。不过，他们谁也不敢出面在电台念这些稿子，尽管当时十分需要找到一个讲捷克话的人。因此，播音员讲的捷克语，在发音和语调上，都使人不愉快地回忆起一九三九年三月的广播员①。但也有一个人，即奥尔斯佩格，曾在电台上讲过话。关于这件事，我们从莫斯科回来后，在八月三十一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我曾问过他，他毫不掩饰地为自己辩解说："他们原来答应把声调调节一下再播送，结果这些混蛋原封未动地播出了，我有什么办法呢？我这个因为经常喝酒而搞坏的嗓音是谁都可以认得出来的。"

有几个亲苏派的代表，这些天躲在家里等待时机，卡佩克就是这样。改革派中也有人躲了起来，此人就是齐萨士。八月二十日夜间，杜布切克宣布散会以后，只有他一个人回家去了。清晨时分，萨尔戈维奇派国家保安局的人把他抓了起来(他们自己说是保护起来)，但若干小时后又把他放了。其原因估计是，二十一日上

① 希特勒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德国人用捷语广播公告，发音有浓重的德语口音。——译者

午英德拉组织“革命法庭”的阴谋已经破产了。后来，一直到维索昌中央停止工作的前一天，他一直藏在他的朋友、法学院院长普鲁沙在波杰布拉德市近郊的乡间别墅里。其间，他曾写过一封信，叙述他如何被逮捕，怎样“逃出”，现在则是藏身于“捷克的优秀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中间”，当然，信中还向人们致以“战斗的敬礼”，等等。这封信在八月二十四日曾由广播和报刊予以发表。

捷共十四大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民族阵线和政府之得以保存，改变政权机构并同占领者实行合作的图谋之所以遭到挫败，起决定作用的是全体人民表现出来的反对苏联军事干涉的鲜明立场。这是“布拉格之春”的硕果。“布拉格之春”本来是为改革体制而进行的尝试，后来发展成为全民的、民主的人道主义运动，成了一种超政治的事业，道义的和人道主义的事业。除了我在前面涉及国际关系时谈到的一些看法之外，上面所说的事实也经常使我怀疑自己在一九六八年所采取的“中间派”的立场究竟是否正确。因为，即使改革仅限于采取一些自上而下的步骤，军事干涉照样也会发生的；但像八月所出现的那种全民一致的壮烈的抗敌斗争，以及对杜布切克领导所表现的无比信任和非常守纪律等情况，却大概不会出现。回顾过去，我可以说，我的关于改革进程的设想，只是在苏联不进行军事干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

在反干涉的全民斗争中，人们每天都创造出成千上万种进行斗争的具体方式和方法，从而把日常生活变成非常有效的消极抵抗的体系，在这种消极抵抗的面前，侵略者的暴力机器完全是无能为力和一筹莫展的。这一切使莫斯科政治局很快就面临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办？全国都处在侵略者的军事控制之下，但军事控制竟对当前局势无所作为。人们只做暴力胁迫下不得不做的事情。但是，当着军事当局还不能采取大规模镇压措施时，当他们还不敢进行大屠杀或自己直接出面进行统治时，所谓暴力胁

迫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电台照样进行广播，报纸和传单照样出版发行，一切都同占领者的意志针锋相对。至于管理机构，从各级人民委员会到政府，都继续存在，它们不仅不受占领当局的控制，而且根本不理会占领者。人民不仅是自“想”其是，就是在行动上也好像是政府并没有被推翻，眼前的一切都只是短暂的插曲而已，一切仍将恢复干涉前的旧观。

是的，在大军进驻的事实面前，上面所说的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而且这种状况也不可能永恒地持续下去。但只要这种状况存在一天，占领军就是无能为力的，除非他们对群众进行大规模的暴力镇压。而这又是莫斯科在国际上的总的利益所不能允许的。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被强大优势所侵袭的小民族，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在政治方面实际上占了上风。当时的一份报纸上曾打了个比喻，说是大象踩不断绣花针。这个说法还是相当中肯的。从形势对人民有利、使占领者为难这个角度来说是如此，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如此，也就是说，象已经来了，而它的确是庞大的，总得要想办法解决问题。人们当时也都意识到了，消极抵抗尽管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武器，但它只是一种暂时的办法，它不是也不能是最终的解决。人民以及非常代表大会，当时把解决问题的授权书交到几个人的手中。他们就是当时还在莫斯科的杜布切克、斯沃博达、切尔尼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

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这些天，同英雄主义气氛同时并存的就是这种临时过渡的情绪，人民和坚持工作的改革派共产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占领者及其在莫斯科的头头们也有这种感觉。八月二十四日晚间，我怀着在即将结束的临时状态中将要承担重要使命的心情，做好了到莫斯科去的准备。

* * *

我去莫斯科参加谈判是杜布切克坚持要求的结果。另外，我

也还肩负着维索昌新选出来的主席团的委托。同我一起去的还有什维斯特卡、列纳尔特、雅盖什、巴尔比雷克和里戈。科尔德在被占领的党中央办公大楼里留守。卡佩克离开布拉格躲在一个什么地方。书记处成员齐萨士、萨多夫斯基、斯拉维克、埃尔班和沃列尼克等人，则没有得到邀请。其余领导人当时都已经到了克里姆林宫，一部分是陪同斯沃博达去的，另一部分则从俘虏一变而成为党的代表团成员，在此以前，他们被劫持并由军用飞机运往喀尔巴阡山，在克格勃的监视下被囚禁起来。

我们也是乘的军用飞机，同机的还有几个苏联军官和一些木箱，箱子里放着他们这些天在布拉格拍摄的电影。我们默默地坐着，这些天的表现彼此都清楚，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八月二十五日，星期天，莫斯科时间上午九时许，我们抵达伏努科沃机场。一些海鸥牌高级卧车把我们送到列宁山政府宾馆，这里离莫斯科大学只有几百米。

十三年前学生年代每天看到的莫斯科景色，如今又重新映入我的眼帘。多么熟悉的景色啊！在我的记忆中，这种画面往往是同留学时期愉快的往事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我看到的不是记忆，而是现实，几个小时之前收入我眼底的还是被占领的布拉格。晨光照耀着的莫斯科，同过去并无二致，但现在已蒙上了一层阴影。黎明时布拉格街道上布满了不祥的坦克，手持自动步枪的士兵往返徘徊。莫斯科已经不是我年青时代的莫斯科了，这里是占领者的首都！周围已不再是学习年代的伙伴，住地熙熙攘攘地到处都是便衣或穿军服的克格勃警卫，态度彬彬有礼，但却警惕地执行着任务。此时此刻我不禁感到生命真是毫无意义，我多么希望我已不在人间。可惜，我还活着，而且我还得冷静地参加商谈今后怎么办的问题，继续干那些荒诞无稽的事。

他们把我带到克里姆林宫的一间屋子里，那些陪同斯沃博达

前来莫斯科的人已经到了，此外，还有以总理身份出现的切尔尼克，并有斯姆尔科夫斯基、什帕切克和西蒙。杜布切克、克里格尔和英德拉，都不在那里。我从布拉格带来的大皮包，装满了各种材料，有报纸、传单、新选出的党的领导的公报，还给第一批被逮捕的同志带来了他们同事的私信和几封家信。此外，还有维索昌党代表大会主席团给杜布切克和斯沃博达的信。我本来想先见杜布切克。但斯沃博达告诉我，杜布切克躺在床上，不能参加讨论，他可以带我去见他。杜布切克睡在一间苏方分配给斯沃博达及其陪同人员的房间里。斯沃博达从议事厅带我走过了两道门，打开第三道门时，我就见到了杜布切克。

他躺在床上，盖着被。但是由于天热，被子掀开了一角，半个身子露在外面，毫无知觉地躺在那里，显然是吃过了镇定药。额头上贴着一块小小的橡皮膏，脸上露着吃过麻醉剂的人的茫然表情。我进门后，他居然醒了，张开眼睛，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这时我很自然地想起《圣经》里说的圣徒司提反殉道时微笑着的样子。杜布切克同样也有着受难者的表情，而照射着他枕头上的阳光代替了圣光。我走到他的跟前，抚摸着他的脸庞。他说话断断续续，很不连贯。他说，他当时还看不了信，要我把信压在他的枕头下面。我照办了，然后，还想口头和他谈点什么。但他的健康状况使他根本无法谈话。我在他床上坐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杜布切克当时精神完全处于崩溃状态，额头上的伤是他在浴室中摔倒时在脸盆上碰破的。总统的私人医生给他治疗。下午，他的情况好转了，我记得，切尔尼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同他谈过话。直到次日，正式会谈开始以前，我才同他谈上话。那次会谈的内容就是准备签订著名的《莫斯科协议》，杜布切克没有参加有关这个协议内容的集体讨论和争论。

克里格尔也没有参加讨论，他根本不在克里姆林宫。第二天

的情况证明，苏联领导一直不想让他参加会谈，甚至根本不想让他回布拉格。这方面的情况以后再谈。

英德拉也未出席会谈。他也生病住院了，不在克里姆林宫。据说，他生的是美尼尔氏症。这在当时倒是很符合他的情况，因为，这病的典型症状就是失去平衡的能力。他当时就算没害病，也确实六神无主，分不清上下左右了。只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即他的工农革命政府彻底完蛋了。

还有两个政府成员，两位部长，楚尔和库切拉，没有参加关于莫斯科协议的会谈。除了党的主席团成员外，参加这次会谈的还有斯沃博达和胡萨克。谁都知道，这次会谈很难算得上什么会谈。因为在八月二十六日晚上协议签订之前，苏方迄未以任何机构的名义出面同我们会谈，而是由一些个人向我们提出哀的美敦书式的建议；另一方面，我方除了八月二十五日夜间的会议外，也谈不上有什么集体的共同立场。从苏方来说，这样做的原因是清楚的。他们根本不想会谈，而只是想迫使我们接受他们提出的投降条件。切尔纳会谈的经验告诉他们，如果进行会谈的话，谈多少天也不能使苏方达到目的。捷方无法采取共同立场的道理也很明显。党的领导已分裂成两派，一派想成立工农革命政府，另一派是这个政府想送上被告席的对象。前一派人，不论莫斯科政治局要往协议中塞什么，他们都准备同意。关心会谈的只剩下杜布切克派，即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什帕切克、西蒙和我。当然，也包括斯沃博达和胡萨克，他们当时还没有明确地依附于哪一派。

我抵达克里姆林宫时是八月二十五日的上午，有些问题在前两天已经谈定了。至于在这之前会谈情况如何，谁参加的会谈，各持什么立场等详细情况，我都不甚了解。我这里提到的会谈指的是八月二十五和二十六日两天的会谈。我来之前有三个重要问题已经解决了。第一个问题是保持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前的党和

国家的领导人选，不再成立任何别的领导班子。这一点对杜布切克派有利，苏方承认了失败。另外两个问题的解决都有利于莫斯科。一个是不承认维索昌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另一个是捷领导人同意撤销由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捷克斯洛伐克局势问题的议案。我认为，斯姆尔科夫斯基、什帕切克和西蒙等三人，大概是在上述问题见分晓后才参与会谈的。斯沃博达及其陪同人员、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曾参与上述问题的谈判。

我从杜布切克屋子回来后，向其他人详细介绍了国内局势，确切地说，阐述了我对国内局势的看法。简言之，我的观点如下：由于全民族进行了消极抵抗，占领当局已处于危机之中，它如果不对人民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就无法控制局势。维索昌党代会维护了捷共在人民中的威信，议会和政府不但拥护这次大会，而且坚定地反对占领。这一切，基本稳定了占领者想要破坏的原来的政权机构。不过，这种局势只是暂时的，有一定的危险性。只需几起小小的事故就可能酿成冲突，占领当局就会失去冷静，双方可能谁也控制不住局势。一般地说，大家都在等待克里姆林宫的会谈结果。杜布切克、斯沃博达、切尔尼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享有崇高威信，只要莫斯科达成的解决办法得到他们的一致支持，国内大多数人是会接受的。但是进行妥协必须有两个前提：第一，必须保证外国军队撤出捷克斯洛伐克，并尽可能规定撤离的具体日期。第二，必须保证以捷共《行动纲领》为依据的政治路线能继续得到贯彻执行。我还详细介绍了广播、报刊、电视所起的作用，以及它们的工作条件。我把满满一皮包的报纸传单都分给他们看，这些报刊和传单生动地反映了国内的局势。

大家提出不少具体问题，也对当前局势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讨论。新参加会谈的人中，据我所记得，说话最多的要算什维斯特卡和列纳尔特，他们没有强调全民反抗的力量，而是竭力强调局势若

再拖延下去，就会出现危险，强调我国国家机关同占领当局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必须进行合作，否则，就会同群众发生不必要的冲突，等等。但是，他们并未另外提出什么新的政治解决办法，也没有反对撤走外国军队和确认捷共《行动纲领》的政治路线，没有反对把这两条作为莫斯科会谈的必要前提。谁也没有提到什么“对付反革命的兄弟援助”，也未指责行动纲领的政治路线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

此外，我还向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什帕切克和西蒙，个别介绍了比拉克、英德拉、雅盖什企图在苏联使馆成立政府的前前后后。他们向我简单描述了八月二十一日夜间，我们在杜布切克办公室分手后的遭遇。我们还商定在以后的会谈中我们五个人统一步调，当然，等杜布切克能重新参加会谈时自然也包括他。

后来，切尔尼克对我说，我们应该草拟一个最后公报的方案，并尽早交给苏共政治局。他已有一个腹稿，经过大家讨论，委托我和西蒙两人形成文字。下午，我到克里姆林宫文书处口述我们的方案，让他们打印出来。

我们方案的内容，实际上只是将七月间捷共主席团给华沙会议五国的复信中所持的立场，加以改头换面而已。当然，某些论据和整个调子都根据新的形势有所改变，那就是某些消极现象有所突出，特别是我们承认，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对那股强大的政治压力已失去了影响和控制。我们仍然不同意把局势说成是“反革命”的，我们认为全民族运动中积极的社会主义和民主趋势是主流。我们同意，五个邻国对我国局势的忧虑是事出有因的，而捷共对此低估了。但我们认为，干涉本身于事无补，实际上是犯下了悲剧性的错误，所以，五国首先必须撤军。在撤军的基础上，我国的改革运动，简言之，应该照顾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布拉迪斯拉发的结论是可以作为出发点的。至于国内政策，

我们强调捷共《行动纲领》仍然是以后制定路线的基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一方案是由切尔尼克交给苏共政治局的。

我们的方案惹恼了苏共政治局。他们把方案退还给我们，并指责说，完全是最后通牒，说什么我们应该明白，我们目前的处境是不能递交最后通牒的。也许是为了让我们懂得自己的处境，苏方提出了自己的完全是最后通牒式的方案，这也就是后来签订的《莫斯科协议》的基础。苏联的方案开始遭到我们的一致拒绝，甚至连亲莫斯科派都未予支持。我们的这一态度是由斯姆尔科夫斯基通知苏共政治局的。

我已记不清搞了多少个方案，修改了多少次。各种各样的方案和建议，总是由我方代表团的两三个成员交给苏方一个或两个代表。他们不管自己是否系全权代表，总是立即就表态，当场或过一会儿就把我们的文件退回，我们大多数的方案和建议都遭到拒绝。我方经常是由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什维斯特卡、列纳尔特、西蒙或我，分别出面去办交涉。对方则分别由柯西金、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出面。我一般是和西蒙一起出面同波诺马廖夫会谈的。

在我们进行笔战的同时，其他人在自由活动。白天，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分别同我方代表团某些成员进行个别交谈。至于亲苏派成员比拉克、雅盖什等究竟干什么，我是一无所知，而且对之毫无兴趣。因为我要草拟各种方案和建议，所以在集体开会时我往往不在场。实际上那里只有少数代表团成员参加，而且只是三三俩俩地讨论各种问题。

从苏共政治局下午明确拒绝了我们的被称之为最后通牒的方案后，我们就只讨论苏联的方案了。最后签字的定稿与草稿主要只有三处不同，即：最初文本有赞扬军事干涉的提法；没有任何关于苏军自捷克斯洛伐克撤军的规定；没有确认捷共政治路线的正

确，相反，从有关否认捷共十四大的合法性以及关于要求进行某些人事变动（具体指撤换克里格尔、齐萨士、希克、内务部长帕维尔和外交部长哈耶克）的规定中，可以引伸出全盘反对捷共改革政策的政治含意。为了改变这几处提法，双方进行了拉锯战。

在此期间，捷共杜布切克领导班子中的亲莫斯科派大体持被动态度。从他们的角度来说，这是明智的。他们懂得，提法如何是不关紧要的。所以，他们没有对苏方原来的建议表示明确的支持，也没有人反对我们代表团提出的修改。反正他们自己什么建议也不提，只是静观，看最后如何收场。我们代表团中有两个人帮了苏方的大忙，那就是胡萨克和斯沃博达，他俩当时还没有党内领导职务。斯沃博达至少还是从事实出发的，尽管是片面的，他认为每一小时的拖延都意味着军队和群众发生冲突的危险会进一步增长。胡萨克则是一个劲地迎合苏联的方案，只要一提到维索昌召开的捷共十四大，他就要把讨论压下去，宣称既然这次代表大会没有斯洛伐克的代表参加，那么就不能算是合法的。

斯沃博达从八月二十一日凌晨起，就对局势有了一个固定的想法，后来一直没有改变。事实上，他不仅不是改革派的政治家，而且根本算不上什么政治家。他过去是军人，第一共和国时的军官。第二次大战时，形势把他推上了舞台，偶然的机会使他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兵团的司令，在苏联领土上同苏军并肩作战。那时，在战争中，他已形成捷克斯洛伐克无论如何都要依靠苏联的想法。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之前，他任国防部长，尽管形式上不是党员，但实际上他不仅是捷共的代理人，而且是完全亲苏的。在对苏关系上，他根本不考虑国家主权。他看待一切问题都从严格的军事观点出发，他认为，不倒向苏军就是反对苏军。与其说他是个共产主义者，不如说他是个亲苏的军人。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论是不通的，对其极权统治也并不理解，但却坚信，我国必须毫不含糊地倒向苏联。

他就是从这些角度来看待一九六八年八月的局势的。这样，他的观点必然同苏联元帅们的观点相接近，因为对元帅们来说，所谓民主只能是民主地研究对捷克斯洛伐克这块地方如何实行军事控制，此外，别无民主可言。对军事控制，斯沃博达是并不反对的，这就是理解他的政治态度的关键。一九六八年三月他当选为总统后，曾到马萨里克墓地上献花圈，这只是出于他对我国的创始人的某种出自内心的感情，他宁愿仿效马萨里克而不愿学诺沃提尼。如果不发生军事干涉事件，斯沃博达也会在国内发扬民主。但是，一旦需要对亲苏不亲苏作出决策时，他无疑会以军人的明确性选择亲苏的道路。

八月二十二日凌晨，他告诉我他要去莫斯科把杜布切克要回来，但同时他又说，让杜布切克回国后就辞职，一切就都会平安无事了。当时，我听了觉得他的说法中有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等我来到克里姆林宫后再观察他时，才明白了他的这种表现根本没有什么矛盾。只有那些把我国政治民主改革看得重于苏联元帅的想法的人才会有矛盾的感觉。而斯沃博达正好相反，所以也就不存在什么矛盾了。鞑靼式的办法，即绑架和杀害合法领导人是他所反对的。但是，把莫斯科不能接受的领导人通过辞职等文明一点的办法搞掉，那他就不反对了。他不主张不顾一切地进行干涉，他只想使干涉的方式不致过于野蛮并造成流血冲突。

在莫斯科会谈期间，有一次，斯沃博达对整个杜布切克领导班子发起火来，他大声喊叫说："你们老是不停地空谈，已经谈得让人家把国家都给占了，还在谈！现在办事应该正视现实了。我这一辈子见到的死人能堆成山，我决不允许再让你们的空谈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亡。"

关于流血的危险，倒不是斯沃博达臆造的。我带去的维索昌党中央主席团、国民议会和政府给代表团的信中就写着："日益增长

的厌烦情绪和占领军与我国人民之间的紧张关系，都是目前的危险因素。”但是，来信者都把我国发展民主的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所以信中要求斯沃博达中止莫斯科会谈，快同杜布切克、切尔尼克一起回国，以便稳定局势，并同国内商量后再同莫斯科继续会谈。

斯沃博达却不这样看，也不愿意立即回国，而是想带着协议回国，以结束临时状态。在莫斯科，他不仅同勃列日涅夫商谈，而且还同苏联元帅们交谈。可能他对自己的地位不像家里写信人那样抱着很大的幻想。他知道，就算他想走也走不了，换句话说，也得等签了克里姆林宫规定的投降条件才能回布拉格。他心里根本没想反抗，他来的时候就准备这样办了。他认为，反抗是没有用的，反抗都是政治家们的空话。

我在本章一开始就说过，斯沃博达确信不应作无谓的牺牲，这一点我也是赞成的。在会谈期间，斯沃博达不断用死人、牺牲来吓唬我们代表团，迫使我们尽快结束会谈。至于协议中给捷共今后的政策能留下多大余地，对他是无所谓的。这无疑是给苏联帮忙。尽管如此，我认为，他和比拉克、英德拉、雅盖什等一类主张极权专政并为军事干涉秘密做了准备的人是不一样的，同胡萨克那类为了满足个人权欲而立即倒向占领者的人也有区别。斯沃博达的动机同那些人不一样。我并不同意他的动机，只是想探索他的动机，而不是替他辩护。

依我看，斯沃博达并不是在关键时刻背叛了“布拉格之春”的民主改革。事实上，是“布拉格之春”把一个从来不是什么民主政治家的人抬了出来，并尊之为一国之首。这个人是我们捷克斯洛伐克的老元帅，在许多问题上，他同苏联元帅的想法并无不同。捷克斯洛伐克不是大国，所以，我们的元帅也没有霸权侵略野心，相反，作为小国的元帅，军事上早已习惯于听命于大国的元帅，他早

就把自己的命运同苏联元帅联系在一起，永远联系在一起了。

一九六八年八月，斯沃博达被莫斯科利用了，后来，他又让莫斯科和胡萨克任意驱使。斯沃博达完全陷入了反改革的、“正常化”政策的泥坑，成为这一政策的可悲的陪衬。这一切都是他幼稚的亲苏思想、他老年的僵化以及军人普遍具有的那种自信所造成的。他逐渐地成了一个使民族感到难堪、使主子觉得不顺手的人物，最后，于一九七五年被赶下了台。

胡萨克在克里姆林宫时，就开始了角逐捷共第一把手的宝座的战斗。的确，当时他对改革派的两项要求都表示了支持。一项是最后协议中要保证外国军队撤走，一项是重申捷共行动纲领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他又坚决支持苏联关于否定维索昌捷共十四大的要求。这个问题，在我到来以前已经基本决定了。但是后来，对这个问题又重新进行了争论，并设法寻求政治上较妥善的妥协办法。

我本人特别希望能够找到这样的出路。我认为，捷共十四大对挽救捷共在人民中的威信，援救被捕的杜布切克派领导成员的生命和维持他们的地位，都起了重要作用。如果同莫斯科一起把它简单地否定掉，那就太荒谬了。我来莫斯科就是代表大会选出的新领导，因此我个人也同这一大会息息相关。其实，我倒不是维索昌新选的党中央主席团的成员，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什帕切克、西蒙和胡萨克才是主席团成员。从形式上讲，倒是他们才有资格来捍卫（或谴责）这一大会的立场。但是，他们没有亲自参加会议，没有受到当时气氛的感染，对于人们对新选出的领导人的期望也无亲身感受。而我则不同，我眼前不断涌现出在切卡德工厂工作的那些人的具体形象，我不能不考虑，他们在占领期间的一切努力一旦被宣布为“无效”时，他们将会有什么反应。

斯姆尔科夫斯基、什帕切克和西蒙，也是在我党代表团已同意

宣布党代表大会无效后才抵达克里姆林宫的。他们也设法重新讨论这个问题。他们也认为，简单地抛弃捷共十四大是不可想象的，何况这个会议还拯救了他们本人。所以，这个问题多次被重新提起，而且设法找一个新的折中的解决办法。后来，我们总算想出了妥协的办法，那就是不承认新选出的捷共中央（这也是苏共政治局最关心的问题）。十四大本来也曾表示，大会讨论并未结束，选举也不是最终的定论，大会将于近期复会。所谓“近期”当时考虑约为两个月的时间，也就是大部分苏军撤出捷领土之后。到那时再对已作出的决议进行修改，并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那时候将把维索昌的有些领导成员遴选到领导机构中，以保证改革派在党的领导机构中占优势。这一主张被接受了，在协议中对此问题的提法体现了上述主张。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我们回布拉格后召开的捷共中央全会上，也是按此精神办的。

显然，胡萨克曾向苏联政治局保证，他将使捷共代表团接受宣布十四大无效的主张，他也确实这样作了。这就使寻求折中办法的努力遇到不小的障碍。但最后，连他也同意了折中方案，不过他是怀有严重的个人目的的。因为，他当时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维索昌党代表大会把他选进了主席团。折中方案可以保证他遴选为主席团成员。本来，为此目的他可以走另一条道路，那就是他可以在斯洛伐克党代表大会上使自己被选为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这样就不用管维索昌会议怎样选举了。所以，他曾打电话给布拉迪斯拉发，叫原订于八月二十六日举行的斯洛伐克党代表大会推迟到代表团回国后再举行，他的那伙人也答应了他的要求。在我抵达莫斯科时，胡萨克坚信斯洛伐克党代表大会是不会按期举行的。我当时告诉他，他的想法错了，我可以肯定，第二天斯洛伐克党代表大会将开幕，并将支持维索昌会议，而且维索昌会议还派出代表团参加大会。我还把代表团的组成告诉他，这是在我离布拉

格之前就已决定了的。胡萨克听了我的话后，自信而轻蔑地笑了，显然他把我看成大傻瓜，根本不懂得如何搞政治，对我的话毫不相信。总之，他肯定大会开不了，斯洛伐克人是离不了他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的。

晚上，他了解到斯洛伐克党代表大会第二天真的要开了，也知道大概不等他了。这对他的自信心是一大打击，这时候，他才愿意在维索昌大会的问题上寻求折中方案，以保证这一大会的新领导能遴选到党的最高机构中去。因为，对于他攫取权力来说，这一条路虽非通向大门，但总可算是通向太平门了。不过，胡萨克原来的目的还是达到了。斯洛伐克党代表大会虽于八月二十六日召开，但二十七日他就赶了回去，并设法让大会宣布维索昌大会无效，这样，他就实现了自己对莫斯科所作的保证。同时，他也被选为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开辟了进入布拉格政治局的平坦大道。斯洛伐克党代表大会第一夜的讨论，由于胡萨克没有参加，所以还是通过了反对武装干涉的决议，其精神和维索昌大会完全一致。

在克里姆林宫会谈中，胡萨克总是以杜布切克、斯沃博达和切尔尼克的朋友和同盟者的面貌出现。特别对斯沃博达，他总是给以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对斯姆尔科夫斯基的态度，当时已经有所保留。什帕切克、西蒙和我这些人在政权机构中的地位不算重要，对他来说是不在话下的。那时候，他对那些亲苏派，即今天的同伙们，例如比拉克、英德拉、雅盖什等，也并不欣赏。他给苏共政治局留下的印象颇佳。要离开莫斯科时，柯西金曾对我说："胡萨克同志既有才干，又是好党员。我们以前不了解他，这次印象很好。"

我对胡萨克从未抱过幻想。我是在一九六八年三月才认识他的。我们那时都在科学院工作，他在布拉迪斯拉发，我在布拉格。我领导的研究小组研究捷政治制度演变的问题，在讨论捷克和斯

洛伐克民族关系的国家体制问题时，胡萨克曾参加会议。

当时，我从他的朋友和敌人那里都听到过不少有关他的情况，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很有野心并正在努力重返政治舞台的政客。但他的实际表现远远超出我的预料。我们研究组的发言一般都很具体、坦率并习惯于听取各种观点。胡萨克在会上的发言却是摆出一副领导人的架势来发指示，高高在上地向愚民们阐述正确“路线”。他的讲话内容极其保守，重弹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的旧调，其内容早被苏联和苏欧集团其他国家的实践所否定，他把探讨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多党制民主政体这类问题的大门，完全堵死。在民族关系上，他主张建立联邦制国家。他的发言总的说来是不容他人提出异议的，有的地方是盛气凌人的，也是很富于煽动性的。

讨论后我对他说，他的发言作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是不错的，但没有思想内容。胡萨克好不容易才压住了心头怒火。显然，从此我就成了他的敌人了。当时他给我的印象很坏，我根本不想和他交朋友，是友是敌对我都无所谓。

胡萨克是法学家，战前就是斯洛伐克的党员知识分子，后来，做过地下工作，他所起的最大作用是一九四四年八月在斯洛伐克参与领导了民族起义。自那时起，他的政治生涯和本人的发展都是充满矛盾的。他的发展既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民族的悲剧，在苏联的支持下，我们这个民族已经被他统治了十年之久了。

就他个人而言，一方面，他是捷共斯大林主义的哥特瓦尔德领导班子中的政治家，他执行了他们的路线和方法；另一方面，他又自成一家，他的才干超出大多数其他领导人，他有独特的见解和信念（特别在斯洛伐克问题上），所以后来必然同斯大林主义的哥特瓦尔德的领导成员发生冲突。这一基本矛盾在胡萨克的整个政治活动中都有反映。

二次大战时，胡萨克在斯洛伐克搞地下工作。一方面他代表

了当时共产党的官方观点。譬如，他曾向哥特瓦尔德建议，战后把斯洛伐克并入苏联，作为加盟共和国，并说什么这是斯洛伐克民族大多数人的宿愿。他片面而笼统地把留在法西斯斯洛伐克国的捷克人都说成是捷奸，还警告说，抗战时，犹太人很不可靠，应该把他们孤立起来。斯大林就往往根据某一部分人的阶级、民族和宗教信仰的特点而把他们说成是可疑分子，对他们加以歧视，甚至消灭。胡萨克和捷共哥特瓦尔德领导班子也都是这样做的。

他在一九五一年被逮捕之前，一直是积极贯彻斯大林政策的干将。一九四六年大选后，他担任斯洛伐克行政委员会①主席。但在那次大选中斯洛伐克共产党失败了。胡萨克为挽救局势、使共产党能独揽大权而使用的手法，实际上就是后来捷共在一九四八年所使用的那种手法。胡萨克为了在政治上分化和丑化自己的政敌（当时的斯洛伐克民主党和天主教会），他不惜借助于人为制造的事件。他作为行政委员会主席，曾积极参与国家保安机关策划的反对非共产党政治人物和教会人士的事件。毫无疑问，某些反共人士当时同斯洛伐克的战败势力以及法西斯化的天主教政治势力确实有联系。但是，胡萨克通过警察制造的事件造成一种印象，即所有的共产党以外的政治流派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来说全都是现实的危险。他不是设法在民主选举中争取大多数，以便加强党的实力和地位，他靠的是密室政治，包括靠警察制造事端和使用专政暴力。

不过，胡萨克这个斯大林分子与布拉迪斯拉发和布拉格的其他斯大林分子还有所不同。譬如，他确实努力使斯洛伐克的民族利益不致受到布拉格集权制的压制。他也不是那些水平不高、但

① 按捷克斯洛伐克当时的体制，斯洛伐克地区具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其地位约高于一般的自治区，低于联邦制的共和国。行政委员会是地区的最高执行机关。

——译者

把持专政实权、并善于搞国家机关事务的人。他主张靠智能来管理，主张由有才干、有水平的人来进行管理。那些借助于胡萨克的帮助才得以跻身于政权机构（斯大林主义的党政机构）的人，并不真心把胡萨克当作自己人，而认为他是外人，是有个人主义的、野心勃勃的人物，都有些怕他。在权力机关中，他被称为“老爷党员”。从胡萨克被捕一直到他获释后很长一段期间里，官方的宣传机器一直没有给他摘下“老爷党员”这顶帽子。胡萨克本人为斯大林主义在我国的胜利确是作了杰出贡献的，但后来他自己也成了它的牺牲品。因为，在其他斯大林分子的眼里，他是个精明强悍得有些危险的人物，对布拉格中央集权的拥护者来说，他又是个斯洛伐克民族利益的危险的代表人物。

胡萨克前半生的仕途是极其坎坷的。在斯洛伐克起义时，他主张斯洛伐克同捷克重新组成统一的国家，好像是忘掉自己过去曾建议把斯洛伐克并入苏联一样。他以为从此以后斯洛伐克人，包括他这位斯洛伐克的政治家，将能够为民族的利益施展一番了。实际上，后来却建立了集中主义的专制制度，这一制度扼杀了不少社会利益，其中也包括斯洛伐克的利益。一九四五至一九五一年，胡萨克施展了全部本领来巩固捷共垄断一切的大权，并以为这同时也就加强了他自己作为共产党政治家所拥有的权力。但结果是他被逮捕并判处无期徒刑，因为他曾为之奋斗的专政制度并不把他当作自己的不可侵犯的宠儿。相反，这个专政的最上层人士把他看成是危险的竞争对手。

胡萨克的被捕，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和西罗基之间个人冲突的结果。西罗基在哥特瓦尔德和诺沃提尼的政治局中，都是斯洛伐克斯大林主义的另外一派人的代表，这一派人为了实现集权主义不惜完全牺牲斯洛伐克的民族利益。胡萨克和西罗基两人在五十年代的权力角逐中曾是对手。如果那时胡萨克获胜，他也会理所

当然地把西罗基关起来。不过，事实是胡萨克被关了起来，根据自己从未犯过的“罪行”被判处徒刑，并先后在斯大林式和诺沃提尼式的监狱中尝了十多年的铁窗风味。

一九六三年给胡萨克恢复名誉的时候，诺沃提尼像对待斯姆尔科夫斯基那样，曾想要给他个财政部副部长的职务，使他重返政治舞台。胡萨克当时拒绝了这种安排。那时我还不认识胡萨克，但我觉得他这样做有两种考虑。其一是，他察觉出诺沃提尼此举的目的是想把他调离斯洛伐克，使他脱离自己的政治基地。其二，副部长的位置对胡萨克来说显然是太低了。我想，那时胡萨克本来预期这个变化要大得多，自己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监狱生活虽然使胡萨克这个精明强悍、野心勃勃的政客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他在许多方面仍是依然故我。他饱尝共产主义专制制度给一个被打到最底层的人所带来的苦难，但是，他肯定坚信自己与众不同，不会永世不得翻身的。出狱时，他显然自认为他应该占有很高的位置。因为他认为自己是真心信仰共产主义，自己的所作所为全都符合工人阶级与斯洛伐克民族的利益；也因为他认为自己比当时当权的人要能干得多。他肯定会认为，制度必须改革，不过他所想象的改革必然是符合他从前的政治主张的改革。长期的监狱生活使他脱离社会实际，这对他的思想当然也会有影响。他出狱时，与其说他是一个民主主义政治家，不如说他是一个有坚强个性的政治人物，他自认为自己肩负着救世主的使命，应该为人们驱邪除魔，并亲自示范，教导人们政治应该是怎样个搞法。

我认为，胡萨克的自我表现是和政治、权力紧密相连的。他深信，他的使命就是给别人指出正确的道路。斯洛伐克一位改革派共产党人库西曾对我说，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凌晨，他在布拉迪斯拉发党中央办公楼门前遇见了胡萨克，那时，周围坦克密布，充满被占领的气氛。在坦克的隆隆声中胡萨克告诉他的第一句话

是："我要把我们的民族从这场灾难中拯救出来。"显然，不是坚信自己负有救世主使命的人是说不出这种话的。

一九六三年后，胡萨克主动同布拉迪斯拉发和布拉格的改革派共产党人、特别是党员知识分子，进行接触。几年来，他一直摆出一副讲究原则的批评家的姿态来反对诺沃提尼，巧妙地在自己周围团结了各种反对派，以致不少重要的改革派共产党人都把他看作是一个能够接替诺沃提尼的人选。诺沃提尼越来越惧怕他，企图缩小他的政治影响，想方设法压制他。那时，再抓他入狱已不可能了，只得用各种歧视办法来压他，结果反而助长了胡萨克的威信。胡萨克也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局势。

诺沃提尼倒台后，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科尔德等筹组新的领导班子时，胡萨克又未能如愿以偿。他们三人都不愿让胡萨克登上党的最高领导层的宝座。杜布切克把他的朋友比拉克推上了斯洛伐克第一书记的宝座，从而使胡萨克在斯洛伐克的希望也遭破灭。显然，他又一次失败了，最后只好屈就副总理的职务。

至于"布拉格之春"，胡萨克认为这一时期只是个临时性的过渡，他明白，阶级阵线和权位都还将重新划分。这一时期，他的处境相当困难。从内心来说，他并不相信激进改革派的争取实行多党制的意图是正确的，也不认为这种意图在政治上真能付诸实施。在私下谈话中，他把激进的改革派共产党人，特别是布拉格知识界称为"复兴进程的掘墓人"。在他眼里，杜布切克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在政治上既幼稚又外行。而他自己的能力和政治现实主义，要比他们强得多。我认为，他对苏联的强权政治倒没抱多大幻想。他在斯洛伐克民族起义时对此早就领教过了。这次起义在军事上之所以遭到失败，就是因为它不符合斯大林的某些战略利益，因而苏军没有直接给以支持。但是，他认定决不能同莫斯科发生冲突，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思想上信仰共产主义，另方面也因为他是政

治上的现实主义者。一旦发生这种冲突，他总是心甘情愿地向莫斯科妥协。但是，他的政治观点很难找到一种政治力量，来把他抬上最高权力的宝座，因为捷共中的亲苏派和斯大林主义集团是不屑于同他联盟的。所以，他设法同要求进行人事更动的激进派结成联盟，但在这些人面前他又不得不隐讳自己的观点，甚至把自己的观点完全隐藏起来。

不少改革派共产党人在六十年代以及后来的“布拉格之春”期间，都把胡萨克当作政治上的盟友，甚至是自己的好友。而胡萨克不过把他们看成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但还不是实现其救世主使命和夺权野心的理想工具。关于这一点，许多人直至一九六九年胡萨克爬上了权力的顶峰之后，才恍然大悟。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过于历史学家许贝尔的遭遇了。许贝尔一九六八年任捷共高级党校校长。在诺沃提尼统治的末期，他曾千方百计争取为胡萨克平反，并争取他能重返政界。他和胡萨克共同反对过诺沃提尼，为此，一九六五年被诺沃提尼赶出高级党校。直到一九六九年四月胡萨克取代杜布切克出任捷共总书记以前，许贝尔还积极为他在中央委员会的改革派人士中争取选票。他当时坚信胡萨克是搞“卡达尔化”、挽救一九六八年改革政策的最好的政治家。可是，一九七二年他就被捕了，被胡萨克判处六年半的徒刑，其罪名是颠覆共和国。其实，许贝尔并没有改变，他只不过主张保留残存的一点改革政策，试图把看法相近的改革派共产党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向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那里寻求支持。胡萨克本人曾遭受诬害而身陷囹圄，他明明知道为什么要抓许贝尔，也很了解监狱中屈辱性的待遇和有害于健康的恶劣条件，但他仍然把许贝尔监禁到一九七六年底才释放。

一九六九年以后，大多数帮助胡萨克重返政治舞台并支持他取得党内最高职位的人，都被他搞掉了。他所联合的人，有许多恰

恰是他根本看不起的、被他当作诺沃提尼的愚蠢走卒的人，其中名列前茅的就是比拉克。当然，他这样做也是形势所迫。因为，他上台的时刻，正是捷共第一号人物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必须绝对地屈从于克里姆林宫的时候。而克里姆林宫恰恰需要他把过去的盟友搞掉，把多年的政敌捧上台。当胡萨克接受莫斯科的恩赐时，他应该知道而且也肯定知道，自己要付出什么代价。他并不笨，他的智慧比他今天的政治局中的大多数伙伴要高得多。可以肯定，他在接受最高职务时心中很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也知道今后必须如何行动。他毕生都在觊觎着权力的顶峰，所以一旦机会来临，他就不惜放弃他过去的许多想法，不惜牺牲许多过去的盟友。他无法克制自己的权欲，宁肯付出这样的代价也要接受莫斯科的恩赐，当一个被占领的国家的首脑。

莫斯科政治局起用胡萨克这一着棋，确实在捷克斯洛伐克打开了有利的局面。胡萨克以前不是苏联在捷共内部的代理人，在六十年代他同许多改革派共产党人有关系，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对他抱有幻想。人们以为他代表着某种中间的政治潮流，以为他会设法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我国有不少人长期相信这一点，西方记者至今还在宣传这种观点，他们把胡萨克写成是防止走极端的人。这种看法是缺乏根据的。实际上，胡萨克的政策完全是按照莫斯科的要求办事。如果说，有时候极端的观点未能得到贯彻的话，那只是因为克里姆林宫也不主张采取过激的行动。在捷共内部，在党的权力机关和各个隐蔽的宗派之间，他从来没有、至今也没有建立起支持自己的嫡系势力。他既不是捷共中所谓的健康核心，也不是那些一九六八年为苏联军事干涉卖力进行准备的人，也不是政治经济机构中的务实派。他是克里姆林宫所选中的人物，他超乎各派之上，又置身于各派之外。这既是他力量之所在，当然也是他的弱点的根源。他现在和将来都只不过是苏

联派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掌权者，一旦形势需要，克里姆林宫会无情地把他搞掉。

一九六八年八月胡萨克在克里姆林宫时可能根本没有想到，捷国内政治制度在他执政时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想，当时他倒不见得想把三分之一的党员都搞掉，把他们说成是"反革命的帮凶"，可能也不会想到，他一贯藐视的比拉克会成为他的主要支持者。尽管如此，当时他肯定已自觉地向党政最高职位攀登，并不惜为此而牺牲"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政策。

八月二十五日夜晚，克里姆林宫中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阵势是五比七。五名民主改革派，即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什帕切克、西蒙和我，对七名亲苏派，即比拉克、雅盖什、什维斯特卡、皮勒尔、列纳尔特、巴尔比雷克和里戈。英德拉以及杜布切克和克里格尔都不在。改革派仍不断争取对最后文件的苏方草案作些修改，以便使捷共改革政策的活动余地能够更大些。但这种努力往往遭到斯沃博达和胡萨克的制止。楚尔和库切拉两位部长以及当时的驻苏大使考茨基在一旁静观，他们根本没有干预会谈，但显然会毫无反抗地在苏联建议上签字。

苏共政治局不断给会谈施加压力。在同我国代表团成员个别谈话时，他们时而恫吓，时而用恩惠和许诺唤起个别人的希望，使他觉得他个人能得到苏方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制造一种威胁的气氛，主要是以两件事相威胁。

其一是，使我们意识到，倘若不在苏方的最后通牒上签字，我们就别想离开克里姆林宫。这一点苏方不仅不隐讳，而且多次强调："反正你明天不签，下周也得签，只是个早晚的问题。"毫无疑问，苏方确实会这样做的。我党那六名被捕的主席团成员，对此早有准备。因为他们已经领教过对异教徒进行审讯的第二阶段了。那时刑具已经摆在他们的面前。这个说法绝非形象譬喻，而是事

实。我知道，他们早同生命告过一次别了。这固然会给人增添力量，因为摆脱掉对死亡的恐惧之后，命运也就置之度外了。但是，如果前途并非是无可挽回的死亡，相反，通向生活之门又重新打开了，那么有些人在心理上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自杀的人，在被救活以后很少会立即做第二次尝试的。

杜布切克领导班子中的某些成员的处境，与其说是作为国家代表团的团员参加政治会谈，倒不如说他们正在受强盗的讹诈。根本的一点是，我们都明白，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克里姆林宫宁愿在捷克斯洛伐克制造政治上毫无意义的大规模流血事件，也不会作分毫的让步的。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二个威胁。这一点，苏方不断通过斯沃博达的口转达给我们，也在谈判时直接向我们作过暗示。他们表示，人民群众一旦同军队发生冲突，军队就会得到开枪还击的命令；他们示意我们应该懂得，达不成一项政治协议，莫斯科是决不会让步的；如果事情一再拖延，那么，责任将由我们承担，我们要对我国和平居民的生命负责，等等。

稍微再深入考虑一下，就可以断定，莫斯科其实是轻易不会走这一步的，因为，如果采取这种非常措施，在国际上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对我们民族来说，则将是一次历史性的、道义上的重大胜利。因为，我们的民族在历史上一连串各式各样的投降以后，终于有一次能对占优势的侵略者进行英勇的反抗。这可以使我们民族挺直腰杆。尽管我们当时曾想到这一点，但我们谁也不敢承担血腥战争的责任。我们也不敢寄希望于即使达不成协议、也不会发生大屠杀的假设。克里姆林宫同这些本想送交革命法庭加以审判的人进行谈判、争取达成协议，这本身就是一种让步，就是不得已的一着，也是当时人民消极抵抗所争取到的最大成果。一旦谈判不成，克里姆林宫可能会又按照原来的打算行事，而且只会更残酷些。比方说，一个强盗用枪吓唬人时，如果不开枪也能达到目的

的话，那么他确实只是吓唬吓唬而已；但如果他的情况不妙，被逼得无路可走时，仍然说他只是吓唬人而已，那就是一种幻想了。苏共政治局并非毫无经验的新手，他们继承了斯大林镇压群众的丰富传统，一九五六年布达佩斯罪行就是一个证明。

如果在我国直接由军事占领当局进行统治，从而使侵略的各种细节都更加完备的话，这对莫斯科是不很有利的。但是，那些决定进行军事占领的势力，不一定不敢作这种决定，甚至在一定的情况下，他们肯定会这样作。实际上也不一定要等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局决定，只要将军中的鹰派人物同意就可以了。搞屠杀是他们权限以内的事，只需把责任推给"反革命"或捷克人的暴乱就行了。

我们知道，苏联领导人是迫于不得已才同杜布切克会谈的。他们企图利用杜布切克和其他领导人，通过他们的手去完成那些比拉克和英德拉没有做到的事。但这一企图能否成功，还取决于杜布切克等人。莫斯科想要利用的工具也可能砸到莫斯科的脚上，并且给杜布切克派重新创造某种政治条件。妥协的道路无疑也提供了机会。这种机会究竟能否得到充分的利用，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了。不管希望多么微小，这终归是一种现实的政治前景。同军事屠杀相比较，对改革政策和对民族来说，我们认为这种前途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前途。

苏联政治局对我国事态发展的看法，准确些说，对是否要进行军事干涉的看法，是不一致的，这并非是什么秘密。所以，我们考虑到，军事办法的失败可以加强那些原来反对动武的人们的地位。同莫斯科搞政治妥协终归只能对克里姆林宫有利，但也不一定必然会完全葬送捷共的改革政策。鹰派的要求可以用驻扎少量苏军（主要是战略武器）来加以满足，这样，就不一定会使改革政策完全被扼杀，当然，这一政策肯定会大大遭到阉割。只要能达到这一步，就有可能在较优越的条件下实现某种"卡达尔化"，即在没有流

血事件，没有流放，没有警察镇压的情况下创造一种局面，使改革的发展趋势不致于万劫不复，也不致重建那种毫无前途的极权专制的政府。

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什帕切克等，我们几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这样想的。当然，每个人还各有打算，后来这些想法上的差别也起了作用。我们五个人对未来所抱的乐观的程度，也是有所不同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想法有可能是把希望当作了现实，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尽量往好处去设想。在我们之间进行讨论时也常常提出疑问，有时我们对自己的信心也加以嘲笑，有时这个人或那个人又丧失了信心。我还记得，好几次我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一种毫无逻辑和根据的想法，觉得我们的一切想法都是荒谬的，我们都在自欺欺人，而实际情况则很简单：我们所要签署的是投降书，我们正在放弃一切，我们的人民只能把我们的行动看成是背叛。有一次，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我曾对斯姆尔科夫斯基说过（什帕切克和西蒙可能也在座），对我个人来说，这次会谈有一个意外收获，这就是我有点理解哈赫了①。他们谁也没有怪我，大概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哈赫。所不同的是，有些人把自己的怀疑抛弃得早一些、彻底一些。我想，最先相信完全有必要接受苏联的哀的美敦书的人，是切尔尼克。

当然，这样一来，估计各种可能性的前提就变了。可以肯定，当时参加谈判的亲苏派全班人马、楚尔和库切拉两位部长以及考茨基大使，是对任何一种最后通牒书都会欣然签字的。此外，斯沃博达和胡萨克也会签字。假定切尔尼克肯定也签字的话，那么，对苏联政治上的胜利来讲，剩下的唯一障碍就是杜布切克了。因为，

① 埃·哈赫（1872—1945），一九三八年慕尼黑协定签订后取代贝奈斯出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总统，一九三九年三月，他奉召去柏林签署卖国条约，承认捷克是德国的保护国，并任保护国总统。——译者

斯姆尔科夫斯基不签字，虽然会使局势比较困难，但这毕竟在政治上还是能够控制的。至于我本人、什帕切克、西蒙和克里格尔是否签字，那在政治上份量不大，我们这些筹码不可能对天秤起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直到八月二十六日，在预计举行签字仪式的那次会谈之前，杜布切克的立场仍不明朗，而且是变幻莫测的。八月二十五日夜间，杜布切克还没能参加会谈，当时有人曾几次找过他。杜布切克表示支持我们提出的全部修改方案，希望我们起草个文件，继续进行谈判。但是，在文件最后完成之前，关于他是否明确表示"赞成"，是否准备在文件上签字一事，他暂未表态，也不愿讲出自己的意见。

八月二十五日夜里，捷代表团全体人员，除了杜布切克、克里格尔和英德拉以外，再次聚集在会议桌旁，在切尔尼克主持下，就明天是否在协议上签字的问题逐个进行表态。协议尚未最后写好，明天将在同苏共政治局全体成员的联席会议上最后成文，还有可能作出某些改动。苏方当时尚未接受从捷领土上撤军的条款（这一点后来写进了双方签署的协议）。因此我认为，要每个人事先明确作出赞成协议的表态，那怕仅仅是原则上表示赞成，并且不排除经过努力尚有可能对协议作一些改动，也是为时过早的。就是在这次会上，斯沃博达对所有的人大发雷霆，抱怨他们的空谈招来了外国军队的占领，而现在还在喋喋不休地继续空谈。胡萨克也催促人们赶快表态。当时的气氛是令人异常痛苦、紧张而又歇斯底里味道十足的。在这次会上，我仍然拒绝表示"赞成"，想待第二天看看最后一次会谈取得什么结果，再决定自己的态度。其他的人当时都已表示"赞成"。至于那些没有参加会议的人，英德拉的态度是非常清楚的，克里格尔的态度尚不得而知，杜布切克表示明天再表态。当时只有杜布切克的态度有可能对情况的转机发生

比较大的影响。

会议在八月二十六日凌晨两、三点钟时宣告结束。我在三点钟以后来到了列宁山上的政府别墅。像在克里姆林宫一样，这里大厅的桌子上也摆着伏特加、白兰地、鱼子、鲟鱼和其他美味。我走进自己的房间，疲惫不堪地倒在床上。没过一会儿，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我开了门，只见来了一个身着剪裁合体的睡衣（看来里面没有再穿别的衣服）的小姐。“同志，您需要什么?”这个宝贝妖里妖气地问了这么一句，然后诱惑地一笑。我真不知道，作为克里姆林宫接待的政府客人，我还会受到什么优待，也根本无意去证实这个问题。我厌烦地说，我希望给我安静，随后就关上了门。

自八月二十日那个决定命运的夜晚以来，我只睡过三次觉，每次不足四小时。我吸了成百支香烟，喝了几十杯咖啡。在那些不眠的日子里，气氛始终是紧张的，无论在杜布切克办公室里被人用冲锋枪对准后脑勺，还是在苏联大使馆和维索昌，或者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气氛都是一样的紧张。我感到异常疲劳，盼望能睡一觉，但是办不到。我脑子里思想零乱，只有某些意象、感觉、无穷无尽而又不合逻辑的画面和幻影，虽然其间偶尔也出现过一些清晰和简单的认识。

我打开窗子，向花园了望。清晨新鲜的空气渐渐使我平静下来，幻觉不见了，头脑逐渐清醒了。只有这时，我的脑子才对事物作了一番通盘的思考，抓住了那些带根本性的东西。因为当时我处在各种事件、谈话、会议和决定、一大堆具体事情的不间断的激流中，我要起草议案和汇集问题，把议案和问题译成俄文，并且要考虑当时可能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因此，我起的作用只能像个机械的计算机。我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或者像机器的连杆牵动着我，或者像某种能够发出信号的物件，指挥着我运转。我自身经历过的事情，虽然印在心上，然而我的脑子却没有时间对此进行加工

分析。现在，从这些经历、印象、感觉和内心的隐密等一大堆东西里，有许多问题闯入了我的脑海，并且要求给予答复。概括起来讲，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对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作出答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如今我在莫斯科半像人质，半像政府客人，这是我的整个生活和我自己政治态度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这种状况是我自己造成的。老实讲，这种状况不是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才确定的，而是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就定下来了，因为早在那时，我就已明确地根据自己的决定和信念加入了那些"永远"屈从于莫斯科及其目标的人的行列，而他们也是明确地根据自己的决定这样行事的。至于我和其他的人当时为什么这样做，导致这样做的理由和想法是否考虑得当，现在已是次要的问题。如今事情已经发生，而且是我自己这样决定的结果。诚然，我十余年来已很清楚，莫斯科是罪恶之乡，我不愿听从它。但我能做什么？我想通过改革在捷克斯洛伐克改变这种状况，同时我还幻想莫斯科最终也会怀有结束此种罪恶的诚意，因此我觉得，他们将会允许我这样做。我这样设想，虽然有一定理由，但另一方面，多年来也有许多雄辩的事实叫人们做出全然相反的设想。当然，我低估和忽视了后者，因为它不合乎我改革的共产主义设想的胃口。

一周之前，任何不合逻辑的事情均未发生，莫斯科仅仅是决定不再继续容忍改革的共产主义的尝试，因为对它的切身利益来说，这实在太危险了。照莫斯科看来，唯一合乎逻辑的是，把我放在克里姆林宫被告席上并且质问我：你是否还"永远"跟我们走？须知近二十年来你一直是这样讲的呀！他们想听到的只是同意或者不同意这样的话，他们对细节一概不感兴趣。他们不仅对我如此，对扮演人质和政府代表双重角色的其他人也是这样。

斯沃博达老将军骂我们，希望我们看清自己的处境。他这样

做是对的。他明了当时的处境，他对莫斯科明确表示“赞成”，他要求大家也照此办理，谁若不愿这样做，就请表示“不赞成”，只是不要再拖延时间了。苏共政治局竟然像是一帮匪徒，这真弄得我们茫然不知所措。但这也是我们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卡达尔曾这样问过杜布切克：“难道你真的不知道，你的对手是什么样的人吗？”他认为杜布切克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我们确实都是些白痴，我们的痴心就在于有那么一套改革的共产主义思想。

我的腿部发麻，于是靠近窗台，坐在敞开的窗子前。这时，一个着便服的男人从附近的柏树丛中走过来。此人是干什么的，不言自明。他走近窗子，和那位小姐一样，向我提了同样的问题：“同志，您需要什么？”我告诉他，什么都不需要，随后离开窗子，躺在床上。从花园里这个男人的出现也可以看出，莫斯科对诸事的考虑要比我周全得多。在那里布置这么一个人，大概是怕万一我不愿明确表态时会跳窗子的。也许只要这个人吹一下哨子，立即就会再跑过来两个克格勃人员，窗户不高，他们会毫不费劲地在底下接住我，我的腿肯定是不会摔断的。

已是清晨六点，九点时将在克里姆林宫继续进行谈判。我正在考虑在苏方最后通牒书上签字的问题。我知道，在上面签字，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些人全部生活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不签字，意味着完全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我能做到这一点吗？我觉得，我是想这样做的，只是我的全部政治努力的现实结果、包括我最近致力于改革所得到的现实结果在内，实在是太惨了。但丁① 说得好，好心不得好报，最后只有通向地狱的路一条。我决定不在协议上签字。我实在太疲倦了，我昏昏入睡了。

---

① 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早年参加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他的诗集《新生》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创作影响很大。他的代表作《神曲》以幻想的形式，暴露了封建专制和教皇统治的罪恶。——译者

九点过后，我们再次聚集在克里姆林宫。为了使大家了解我的态度，我把不在协议上签字的决定告诉了切尔尼克和亲苏派代表比拉克。为了使事情行得通，我建议采取以下办法：我去找熟识的总统医生开个证明，然后躺下称病，不再去参加两党主席团的集体会谈。让我去参加会谈而又不签字，这会引起一场闹剧。我不愿这样做，也不愿因此而使那些已经决定签字的人受到什么影响。但我自己是不想签字的。比拉克表示，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不过他讲这话时毫无热情，脸色阴沉，冷若冰霜。切尔尼克把什帕切克找来，大家一起讨论我的这一决定。随后，我分别同斯姆尔科夫斯基和西蒙谈了这个问题。讨论的结果，最后我改变了自己的决定。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

他们四个人告诉我，他们也经历了类似的阶段。当莫斯科把他们从俘虏和囚犯变为政府代表时，他们就这样做了，因为他们深感已不能继续负责地决定什么事情，最后只好改变自己的立场。他们承认，他们这样做仅是解决个人当时处境的一种办法，而不是解决政局的办法，他们自己对此种政治局面的造成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表示，我昨天的态度反而使他们更加确信，妥协并不是毫无希望的事情，同一九五六年遭受外来干涉后的匈牙利的情况相比，在捷克斯洛伐克可以造成一种比较好的、比较有前途的局面。诚然，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行动，但我必须看到，我这样做只是给自己和自己的良心找到某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解决国家政治前途问题的办法。如果现在我退出党的领导，这只能加重他们处境的困难，使尚有可能挽救的许多事情受到损害，而且势必会把他们所有的人推向一种困难的境地，使人觉得似乎签字仅是个人的事情，签字是对人的荣誉和良知的背叛，而不是把签字看作一种义务——为摆脱当时的局面寻求一条政治出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对此都负有责任。我后来得知，杜布切克将要

参加最后阶段的谈判，他将坚持对条文作若干修改，其中特别涉及到从捷撤军问题。

这个晚上与过去不同了，过去我只是一个人考虑自己和个人的往事。现在是新的一天，我又来到了众人之间，我的脑子像机械的计算机一样又开始起作用了。尽管如此，我在灵魂深处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我个人对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也负有政治责任，现在不设法寻求出路等于逃避自己的责任。于是，我又同他们四个人多次就政治解决办法的具体设想问题，详细地进行了讨论。

当我最后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表示同意和大家一起在协议上签字时，我对今后的政治前途曾作过以下设想：

不管协议作出怎样的修改，它毕竟会给莫斯科造成优势，带来单方面的政治好处，并使莫斯科有可能不断施加压力来反对捷共的改革政策。但同时协议也将提供一系列的可能性，为改革政策的推行争得一块天地。最后的结果究竟如何，不取决于协议文字本身，而取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力量对比，也取决于莫斯科的力量对比。此次回到布拉格后，政权机关和政治机构的关键部门仍继续掌握在改革派的手里。而且，全民反对占领的巨大力量，将从上到下进一步削弱亲苏派在整个政权机关中的地位，尽管协议给亲苏势力提供了明显的保护，但仍有可能把它们排挤到更次要的岗位上去。起决定作用的问题是，最迟到年底前使苏军撤走。当然，有一小部分部队不在此例，近两年来莫斯科一直力争要这部分部队进驻，看来是无法不让他们留下了。在同一时期内，要召开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和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两件事都是有可能办到的，因为莫斯科在国际上谴责占领的强大舆论的压力下，将会对局势平息下来发生兴趣。总之，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在莫斯科政治局中，“鹰派”将处于守势。

这一切都只是有实现的可能性，但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如果

到年底形势的发展是另外一个样子，改革的政策保不住的话，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改革派必须在尚有可能自己选择继承者的情况下交权，这样就排除了“工农革命政府”最后取得政权，从而使捷共整个领导都由苏联的直接代理人所取代。莫斯科也会赞成这一变化，因为这样可以除掉杜布切克，而比拉克和英德拉现在又使莫斯科如此失望，以致莫斯科感到他们已不再符合要求了。因此，莫斯科将会接受“第三套班子”。这些人将用类似“卡达尔化”的办法过渡数年，然后再转入改革的新时期。其前提是，捷共要继续保持那些长期在共产主义改革路线指引下成长起来的干部，防止那些在党的内部破坏民主化的宗派集团和苏联的代理人篡夺领导权。

据我看，上述考虑的成败，完全取决于杜布切克周围的改革派能否牢不可破地团结在一起。而这正是我们曾经相互允诺了的。我对捷共领导层中人和人的关系从未有过幻想。就在几年以前，那里还在互相残杀，总是在搞着阴谋诡计；一个星期以前，一部分人被另一部分人逮捕。但现在说的并不是那个另一部分人，也不是官僚机构中的什么小集团。杜布切克领导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在这些日子里共同经历了这样多的事，以致竟使我相信，凭着互相信任，凭着尊严和良心，凭着誓言和允诺，可以在政治上和在这个集团中建立某种持久性的东西。然而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表明了，这只不过是我的又一个幻想而已。认为克里姆林宫将不再逐渐然而始终不渝地去贯彻自己原来的意图，而会致力于任何其它的事情，也同样是一种幻想。

然而，在我们遭到强盗绑架、充当人质的情况下，我们怎么竟会当真以为，过一段时间之后，克里姆林宫会放弃完全消灭它所不称心的政治力量的计划，而会有兴趣来安定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呢？大约有两个答案。其一是：那是我们的愿望，因此我们要自我安慰；其二是：尽管我们是改革派，但我们毕竟仍然是虔诚的共产

党人。当然，这只是一种开脱，而政治上、道义上的证明则是不存在的。

中午时分，我宣布将改变自己的态度，要和其他人一起签署协议的时候，切尔尼克带着毫不掩饰的、真正愉快的心情同我拥抱。但这种愉快心情，在骨子里终归还是自私的。他高兴的是，再也没有人和他不一样了，而且将来也没有一个人能说："我没有签字"。然而，他高兴得太早了，克里格尔很快就扫了他的兴。

前一天，我们就曾经谈论过，为什么克里格尔没有和我们在一起的问题。苏联方面想尽办法找了种种借口来解释，并在同捷共中央领导人的个别谈话中极力孤立克里格尔。但到了要签字的时候，已经不宜再拖，他们只得把克里格尔带到克里姆林宫来。起先，斯姆尔科夫斯基同他在另一个地方谈话，尔后在下午，他来到了我们当中。他的处境是屈辱性的，对我们大家来说也是很丢脸的。不论有什么理由和借口，我们确实是在克里格尔不在场的情况下开的会，而现在，则把既成事实摆在他面前，要他签字。克里格尔断然拒绝了。我们大家在开始的时候就是这种态度。他还停留在我们昨天开始讨论时所处的阶段。然而，克里格尔却没有进入下一阶段，他坚持不签。

我们大家都在说服他。斯沃博达单独向他重复了他自己昨天的讲话，并且向他大声喊叫，直到克里格尔提出了抗议，斯沃博达才住嘴。我还记得克里格尔是怎么说的。他说："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把我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或者把我枪毙？我已经估计到了这一点，我不能为此就去签字。"关于作出妥协的政治上的理由和妥协后的前景的话，他根本听不进去，而且拒绝参加讨论。他的行动没有给人以政治家的印象。在此刻，他像一个生命受到强盗威胁的人，作为赎身的东西，强盗们要的是他的名誉，他的孩子或妻子，而不是金钱。但这个人却说："不！你们杀了我吧！"我想，近三天来

一直像犯人一样被隔离着的克里格尔认为，他是注定要死了，因而也就视死如归，不愿意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违背良心的行动来玷污这一生命。

我说这些的目的，不是要贬低克里格尔拒绝签字的政治意义。我说这些，是因为我认为，克里格尔当时首先是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政治家行动的。事后证明，他的行为比我们更适合于当时的形势。我们的确像是受到强盗讹诈的人，但我们却陷入了幻想，以为我们是政治家，是在同另外的政治家讨论政治问题。

克里格尔后来说，他不参加同苏共政治局的任何谈判，他又让人给隔离起来了。可是苏联方面主动提出，要他参加谈判。导演显然想让苏共政治局看到捷克人之间公开的争吵，以及其他人同克里格尔的分道扬镳。但杜布切克坚决反对，结果会谈是在克里格尔不在场的情况下举行的。为了相对称，英德拉仍继续不参加会谈。最后，我们（这次杜布切克也参加了）坐在大会议桌的一边，苏共政治局坐在另一边。

会谈在下午很晚的时候开始，由勃列日涅夫主持。他毫不脸红地用愉快的声调说了一大堆关于同志关系和共同利益的话，并说，我们将以此为出发点，就复杂和严重的局势中的下一步行动，达成一致的意见。他谈到，苏联领导是如何带着惋惜和痛苦的心情决定搞军事干涉的，这是如何地不得已，因为对他来说，社会主义利益高于一切。他赞扬了苏联的忠诚朋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斯沃博达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智慧，表达了他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热爱，而且看得出来，他被自己的言词感动了。

根据计划，捷方领导人也要回答几句类似的话，然后才开始逐段讨论协议文本。杜布切克精神状态一直很坏，为准备谈判，医生给他打了针，因此，切尔尼克第一个发言。他讲得很实际，没有讲那些关于同志关系和永恒友谊的废话。他十分小心地捍卫了捷共

行动纲领的路线，并在言词中否定了军事干涉是符合社会主义利益的行动的说法。

对此，苏共政治局有人插话表示反对，这就使得形势紧张起来了。接着勃列日涅夫参与了争论，他拒绝了切尔尼克的说法。随后出现了一刻紧张的沉默。切尔尼克讲完了话，杜布切克接着要求发言，或者也许是他不顾程序规定就讲起来了。开始的时候，他结结巴巴，吐词不清，但他渐渐地恢复了常态，流利地直接用俄语讲话。他满怀激情地维护捷克斯洛伐克的“复兴进程”，他的讲话逐渐变成了争辩和对干涉者的控诉。杜布切克作的是即席讲话，他讲的话心口如一，因此，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比较感人的。

勃列日涅夫马上(也是即席地)起来驳斥杜布切克。这大约是整个谈判过程中苏方作的唯一真正有意思的发言。勃列日涅夫讲的也正是他想的。他简要而明确地回答了三个基本问题：莫斯科最不喜欢“布拉格之春”的是哪一点；莫斯科如何看待自己集团的国家的主权；莫斯科认为什么是国际政治中重要的东西。

勃列日涅夫没有作关于“反革命势力”和“社会主义利益”的长篇讲话，而是具体和明确地指责杜布切克处理内政问题时未事先征得他的批准和同意，甚至全然不顾他的指示和劝告。“我是一开头就愿意帮助你反对诺沃提尼的，”勃列日涅夫对杜布切克说，“在一月份我就问过你：他的人对你有威胁吗？你想换掉他们吗？你想换内务部长吗？想换国防部长吗？你还想换谁？可是你却说，不用换，这都是些好同志。然而以后，我们突然听说你把内务部长、国防部长以及其他部长都换掉了，你还撤换了党中央书记。”

勃列日涅夫接着说：“二月份我就对你的报告提了意见，我提醒你说，有些说法是错误的。但是你竟不作修改！怎么能这样工作呢？在我们这里，甚至连我自己在准备报告的时候，我还要请全体政治局委员提意见呢。是这样吗，同志们？”勃列日涅夫明知故

问地说，并用眼睛望着坐在他旁边的整个政治局的人。那些人点着头，并在嘴里咕噜着什么，表示赞同自己首长的讲话。讲话人接着说："我们这里是集体领导，其前提是，你自己的意见必须服从大家的意见。"

勃列日涅夫是真的生气了，因为杜布切克辜负了他的信任，没有将自己采取的每一步骤都提交克里姆林宫批准。"我信任你，并在别人面前维护你，"他指责杜布切克说，"我说过，我们的萨沙①是个好同志。可是你却使我们大家太失望了。"在讲这种话的时候，勃列日涅夫的声音总是痛心地颤抖着，他断断续续地说着，简直要哭出来了。他好象是一个深受损伤的家长，他确实认为十分自然和唯一正确的是，由于他是一家之长，家庭的其他成员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和听命，因为他的意见和意志自然是最大的权威，他是为大家好。如果认为这一切应该是另一个样子，那他是决不容忍的，他很自然地把这看作是敌对和叛逆的表现。

勃列日涅夫从这一条主要的罪状——布拉格不是任何时候都向克里姆林宫请示——又引出了所有其它的罪状："反社会主义的倾向"泛滥，报刊随心所欲，"反革命组织"正在产生，捷共领导在这些势力的压力下不断后退。如果没有得到勃列日涅夫的批准和劝告，杜布切克就什么也别做，如果他从自己的报告中删去勃列日涅夫建议他删掉的词句，如果他只任命勃列日涅夫同意的部长和书记，那么，任何可怕的事情都不会发生。概括起来，这就是勃列日涅夫对"布拉格之春"的态度。

勃列日涅夫以后又对杜布切克说，鉴于这一切，莫斯科最后才明白，不能信赖他的领导。而长期以来维护了"我们的萨沙"的勃列日涅夫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因为这已经牵涉到另外的、

---

① 萨沙是杜布切克的名字亚历山大的昵称。——译者

最根本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问题了。

勃列日涅夫广泛地谈到了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牺牲，谈到牺牲的战士和被杀害的平民，谈到巨大的物质损失和苏联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苏联以这样的代价赢得了自己的安全，其保证就是战后欧洲的分治，具体地来说，就是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结成了“永恒的”联盟。根据勃列日涅夫的看法，由于数以万计的苏联士兵也为我国的解放付出了生命，对他们的坟墓，我国人民不仅不应玷污，而且应当尊敬，这是符合逻辑和合理的。我国的西部边界不仅仅是我国的边界，而且是“社会主义阵营”共同的边界。苏共政治局也没有权力使这次战争的成果遭到威胁，因为它也无权坐视苏联人民的牺牲遭到亵渎。

勃列日涅夫承认，当前，在军事干涉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是困难的，人们很动感情。杜布切克领导班子现在有些事情看不清，这也是可以原谅的。“这一切在今天对你们来说好像都是不能接受的，”勃列日涅夫说，“可是你们看看哥穆尔卡，他在一九五六年的时候也像你们一样，反对我们的军队帮助波兰。如果我今天说，我要从波兰撤走苏军，哥穆尔卡就会马上坐着专机到这里来求我不要那样做。”

勃列日涅夫没有举出任何证据证明“西方帝国主义”确实在威胁着捷克斯洛伐克。他没有引用当时充斥苏联报刊的任何一个谎言，例如什么“西德复仇主义者”已经动手准备进行军事袭击，到布拉格去的旅游者当中充满了美国军官，云云。他的逻辑是简单的：我们在克里姆林宫已作出了结论，不能再信赖你们了。你们在内政上为所欲为，甚至做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事，好言相劝你们又不听。你们的国家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士兵到过的地区，这是我们用巨大牺牲换来的，我们决不会放弃这个地区。这个地区的边界也就是我们的边界。由于你们不听我们的话，我们感到受

到威胁。为了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为你们的自由献出了生命的死者，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向你们派兵，以便使我们在我们共同的边界内感到安全。这是一个不取决于外部条件的原则问题，至于是否有人在威胁我们，这并不重要。这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应该是“永恒的”定局。

勃列日涅夫个人好像感到很惊奇：这么简单的事，你们怎么不明白呢？这是怎么回事？像“主权”、“民族和国家独立”这样的词，在他的全部讲话中根本没有出现过。但另外一些为“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利益”作正式辩护的常用词句，也没有出现。讲话中只有一个简单的思想：战争中我们的士兵到了易北河，那里也就是我们苏联的边界。

勃列日涅夫接着说，对我们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是不可侵犯的，我们要维护它，哪怕冒着发生新的战争冲突的危险。接着他明确地说，就是有着这样的危险，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干涉仍然会进行。不过他补充说：可是现在不存在发生这种冲突的危险。我问过约翰逊总统，美国政府今天是否仍完全确认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的决议。八月十八日我得到回答说，如果是涉及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美国政府毫不保留地确认决议，至于南斯拉夫，则需要谈判。你们看，会发生对你们有利的事吗？不会。不会因此而发生战争。铁托和齐奥塞斯库同志将出来讲话，贝林格同志将出来讲话。他们能讲些什么？你们寄希望于西欧的共产主义运动，可是它在五十年内是不会有任何意义的！

这又是简单而明确的语言。勃列日涅夫给我们共产主义改革派们上了真正有价值的一课。我们，这些傻瓜们，还在考虑什么适合于欧洲（包括西欧）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他，一个现实主义者，却知道它在五十年内是不会有任何意义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不就是因为社会主义的边界，或者说苏联的边界目前是易北河吗！这是

美国总统也同意了的，因此，也许五十年都不会变。贝林格算什么？他有坦克吗？难道他能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吗？

勃列日涅夫显然已预料到，在这明确易懂的阐述之后，连杜布切克也会明白自己所处的地位，从而有可能开始讨论即将隆重签署的文本。可是事与愿违，杜布切克进行了反驳。我已不记得他说了些什么，以及说的是什么具体问题，但是他把勃列日涅夫惹火了。勃列日涅夫打断了他的话，叫喊了起来，脸变得血红，最后怒气冲冲地说，迄今的全部谈判显然毫无意义。切尔纳的事件又在重演。这是多余的，不会有任何结果。因此，他宣布中断谈判。

勃列日涅夫以及苏共政治局全体成员都站了起来，准备离开。面对发生的混乱，斯沃博达说话了，他想重新平息风暴。勃列日涅夫楞了一下，听了他的讲话，然后转身走了。他只说了一声"下一步怎么办，还要协商"，就走了，后面跟着整个苏联的"集体领导"，鱼贯而出大厅。

我至今也搞不准，当时的事是否偶然发生的。我当时的印象是，那是事先排演好的戏。因为勃列日涅夫的反应和他下令离开，是与当时的形势不相符的。我确实已记不得是什么话引起了这场风波。但我认为，杜布切克没有说什么太厉害的话，至少没有说过任何在此之前不曾说过的话。会谈的以后进程反而表明，这是苏共政治局有意安排的场面，其目的是要为通过文本造成一种气氛，让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派们注意把自己不合时宜的意见压到最低限度。但不论造成这种场面的是什么原因，大厅里出现了紧张和混乱。

杜布切克差不多又垮了下来。他发着抖，神经紧张，语无伦次。医生来要给他打针。他把医生赶走了，说什么也不需要。突然，他使大家惊愕地宣布："我不签字了！他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反正我不签字了。"一些人，其中有切尔尼克、斯沃博达和斯姆尔科夫斯

基，跑到他跟前，接二连三地劝他说，这不行，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我也认为，就这么来改变谈判，现在已经不行了。而且我还认为，这是杜布切克一时冲动，过一会儿他将改变自己的态度。我同他谈了一会儿，我对他说，我们大家轮流同他谈，目的是要说服他，以便使谈判能继续进行。杜布切克听着我们大家说，没有反驳，但不肯改变自己的态度。他对我提出的所有论据的回答是："难道你看不出来，他们一点都不明白，他们干了些什么？"他一再说："我不签字。"

这是杜布切克表现出有远见的时刻。如果他昨天夜里参加了我们的讨论并采取这一态度的话，就会从根本上影响谈判。而现在已经不行了。最后他还是让人给他打了一针镇静剂，在大家施加的第二轮压力下，他屈服了。

在上述情况发生以前，双方都进行了积极的活动，以使谈判能够继续下去。不论是斯沃博达、切尔尼克以及改革派的其他人，还是比拉克和雅盖什，都跑出大厅到旁边的一些房间里去了，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及其他一些人也在那里。斯沃博达最后还受到勃列日涅夫的接见，他们一起谈了些什么。这一切使谈判中断了大约一小时。谈判重新开始的时候，已经是夜晚了。

复会后的谈判已不大具有戏剧性了。逐段地讨论了文本。苏联方面总的来说比原来要缓和一些。我已记不准，在谈判的最后阶段对文本的词句作了什么改动。但里面有两处重要的提法：一个是关于军队在"暂时"驻留后撤退的问题，其条件是"正常化"的进展程度；其次是关于苏联方面支持捷共中央一月和五月全会政治路线的问题。在后一个问题上，谈到四月全会（在这次全会上通过了捷共行动纲领）时，发生了争论。象那次在布拉迪斯拉发一样，勃列日涅夫从修辞学的角度拒绝接受在"一月"和"五月"全会之间加上破折号的建议，因为那样一来，就意味着包括四月全会了。他

最后坦率地说："苏联政治局认为行动纲领中的某些提法是不正确的，因此，不能完全同意这个纲领。"说到底，我们自己也清楚，这个纲领需要作一定的修改。但是苏联政治局却明确支持五月决议，在该决议中，不仅认为行动纲领是正确的，而且还宣布它为基本路线。但是，五月决议还具体地指出了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后来就保持了那个样子，"莫斯科协议"没有包含明确支持捷共行动纲领的内容。

在午夜前一切都准备就绪，签字的时刻来到了。突然，通向大厅的门敞开了，大约有十名摄影师简直是奔了进来。好像听了口令一样，整个苏联政治局一下子都站了起来，每一个人都向长桌对面的捷克斯洛伐克对手张开了双臂，准备拥抱。这是一个由摄影师的闪光灯照耀着的荒谬绝伦的场面：苏联政治局委员们十几双手臂依次张开越过长桌。我突然感到，这好像是一种奇异的植物想用自己的带粘液的爪子把我们抓住似的。我没有站起来去履行相应的动作，而是抵着会议桌的腿向后一蹬，我坐的椅子在打蜡的地板上朝离桌子大约三米远的墙滑过去了。我在墙边挨着考茨基大使停住了。他同那些没有上会议桌的人坐在一起。考茨基的眼里露出了真正恐惧的神色，悄声地对我说："你疯了！"我没有理会这点，但是我说，首先我不愿意拥抱，总之，我不能够。桌上的拥抱仪式已经结束了，摄影机记录下了这个场面。

然后，双方主要领导人签字的场面也被永久地记录了下来。接着，象摄影师和记者们进来的时候那样，一下子又让他们离开会议厅，又关上了大门。我突然从桌边听到波德戈尔内讲话："姆林纳日同志，不签字吗？"他注意到了我的逃避，而且他必然也会注意到，因为我就坐在他对面，大约他的拥抱正应该是对着我的。那些尚未注意到什么事情的人，一下子就四处张望起来，看我怎么了。我说，"我签字"。我站了起来，就在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民主改

革的判决书下加上了自己的亲笔签名。

每一次紧张活动的结束所带来的松弛，不论它是悲剧性的还是喜剧性的，也笼罩着签字仪式结束后的气氛。但很快又出现了紧张气氛，它使人迅速地看到不带幻想的现实。这是有关克里格尔的问题所引起的。这件事本应是关于强盗行劫的侦探小说描写的故事，但它却发生在克里姆林宫的谈判桌上。而根据公报所述，这次谈判是在“同志式的友好气氛中”进行的。

在谈判关于去布拉格的具体问题时，有人提出，应该让克里格尔到克里姆林宫来，以便他能同整个代表团一起走。勃列日涅夫亲自作出了反应，他说，克里格尔最好不要和代表团一起回布拉格。“你们把他留在这里”，勃列日涅夫说，“他没有签字，他会给你们找麻烦的。”杜布切克，也许还有斯沃博达，作出了相当强烈的反应，他们说，代表团必须全体回到布拉格，没有克里格尔不能走。但勃列日涅夫却继续坚持，并设想克里格尔将如何破坏协议，他将如何夸耀他是唯一未签字的人，并将组织反对派来反对“整顿的努力”。

我想，在背后还有一个连勃列日涅夫也得照办的脚本。我们大家一下子都明白了，克里格尔仍在被拘留着，他仅仅是个人质，而不象我们，同时又是代表团成员。勃列日涅夫自己在说到他的时候，也象在说一个不属于我们之列的犯人那样。斯沃博达说，回到布拉格以后，他将为克里格尔及其妻子在兰尼猎场安排住处。勃列日涅夫理解，这是向他提出，斯沃博达将亲自把他关在一座漂亮的监狱里，他说：“他会从你们那里逃跑的！你们谁能为他担保？”

强盗头子不是在索要释放人质的赎金，而是要求人保——象在侦探小说中一样。什帕切克、西蒙和我，我们三个不约而同地说，我们为克里格尔担保。但这还不够，就释放俘虏问题又进行了密室会谈。杜布切克、斯沃博达、切尔尼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同苏联政治局的头头们到了旁边的房间，关着门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记

得，雅盖什也通过自己的关系，大约是通过主要导演的警察部门就释放克里格尔问题施加了影响。结果是很丢脸的，对克里格尔来说又是屈辱性的协议：俘虏将直接在机场交接，不能放他到克里姆林宫去。

在这一切之后，克里姆林宫的头头们还提议在行前不拘形式地、友好地坐一坐。柯西金也开起了玩笑，他的愉快热情的举动与自己的性格简直是格格不入，他说，俄国有个古老的习惯，亲近的客人们在离开主人家以前，一定要从容地坐一坐，喝杯告别酒。我想起，我从什么地方读到过关于一个蒙古氏族的习惯，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特别喜欢的俘虏跑掉，就在他的脚掌上穿一段马鬃，这段马鬃慢慢就长在他的脚掌上了。只要俘虏不想站立和逃跑，马鬃对他是无妨的。而柯西金说的挽留亲爱的客人的习惯要人道得多，这样我们大家就同我们的主人们一道坐下了。

坐了大约一小时，最终变成了两、三成群的交谈，而交谈则决不是没有用意的。柯西金朝我走来，交谈了几句以后他问，我是否认为实施协议是现实的，我认为有什么问题，我是如何看某些人事问题的。后来，关于人事问题谈得越来越多，我意识到了，柯西金是想通过这一途径来了解我的实际观点。这是比政治思想方面的谈话更可靠、也是更简单的谈话。关于我是怎样看"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不能说明很多问题，最能说明问题的倒是我对切尔尼克、胡萨克或者对英德拉究竟怎样看。

我当时坦率地对柯西金说，根据我的看法，如果莫斯科的政治局把那些要在八月建立"革命政府"的人视作自己的主要支柱的话，那未来将是可怕的。我点了比拉克和英德拉的名。"这些人……！"柯西金不屑地一挥手。他特别称赞了胡萨克。他这样说也许是要给我点明方向。他后来也没有怎么反对我的说法，即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不能让极端的倾向占上风。我明确指出，克里格

尔、齐萨士、帕维尔、哈耶克和其他人可以离职，但前提是，那些在八月里名誉完全扫地的人也必须离职。我当时感觉，柯西金想迅速和缓整个局势，而这是符合我们的设想的。

第二天，已经是在布拉格了，我从杜布切克那里得知，作为今后建立良好关系的条件，勃列日涅夫要求他保留比拉克和英德拉的党内职务。

勃列日涅夫和政治局其他成员同我们一起来到飞机场，在那里举行了正式的告别仪式，并被摄影机永久地记录了下来。克里格尔真的已坐在飞机里了。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莫斯科时间清晨两点钟，飞机起飞了。我们又都默默地坐着，而这一次则是由于另外的原因。现在每个人都在设想，国内的人将如何评价“莫斯科协议”。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之中任何人的想象都不是乐观的。

抵达后的主要角色都已经分配好了。斯沃博达将第一个作公开讲话，接着是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早上将去政府，斯姆尔科夫斯基去议会。杜布切克抵达后将马上同捷共中央维索昌的主席团谈判。由于要尽可能在午后就发表讲话，所以必须准备好讲话稿。又象在八月二十日前的情况一样：委托姆林纳日和西蒙起草。我们就在飞机里写起来了，因为这两个小时大约是我们今天所能有的最安静的时间。

我想，这是我起草的最重要的一个讲话稿。杜布切克后来在书面上、主要还是在讲话的时候，作了修改和补充。这就是那次有名的讲话，除了讲话的词句之外，杜布切克强忍住的眼泪也起了很大的政治作用。通过这次讲话，杜布切克达到了我们大家在心灵深处认为不可能达到的目的：人民再次相信，并没有失掉一切，还剩有相当多的希望，而杜布切克就是去实现那些希望的人。

结 束 语

一九六八年秋天，我在克里姆林宫形成的看法，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同事件的发展相吻合。十月初我已开始明白，我的看法不过是一种错觉，事态的发展将是另一个样子。杜布切克领导集团内部，在他这一派人员当中，出现了分裂将无法制止的严重预兆，而在当前、在同莫斯科达成不利的妥协的情况下，想要实现已经开始执行的政策，这些人员的团结一致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唯一的成绩是：党的主席团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增添了一些新的成员，其中七名是在维索昌党代表大会上被选进主席团的。除了克里格尔之外，所有被捕和押送莫斯科的人都是主席团的成员。与此相反的是，八月二十日深夜投票反对谴责苏联干涉的那四个人当中，只有比拉克一个人由于勃列日涅夫的直接干预而保留了原职。英德拉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没有被撤除书记职务。他还因病留在莫斯科，没有回到布拉格。很清楚，他的未来命运将留待以后决定。皮勒尔、列纳尔特和巴尔比雷克，在八月二十二日曾同意参加工农革命政府，也保留了在党的领导机构中的地位。不过，他们全部人员在新的捷共中央主席团的二十四名委员中只占少数。当然，这时胡萨克和斯沃博达也成了主席团委员。

九月间，莫斯科的特使、当时的副外长库兹涅佐夫来到了布拉格。很明显，他还具有党的全权代表身份。他来到之后，立即开始工作：逐个地同党的领导成员会谈，对形势作出判断，对在会谈中发现的矛盾作了记录并巧妙地加以利用。从我同他的谈话以及他同其他领导成员的谈话得知，他的主要任务是向莫斯科建议，在捷

共领导成员中，对哪些人应该给以支持，哪些人必须立即从领导机构中开除。他的谈话总是以表扬同他谈话的人开始。譬如同我谈话时，一开始就转达了勃列日涅夫的个人问候，并且强调说，勃列日涅夫同志很重视我在《红色权利报》上发表的文章。他对什帕切克说，八月二十日他被逮捕完全是出于误会，莫斯科的同志们对此很感抱歉，而他，什帕切克在克里姆林宫享有充分的信任。通过这些自由无拘束的谈话，使他弄清楚了每一个人对有关《莫斯科协议》的一些具体问题所持的态度。库兹涅佐夫故意使他提出的许多问题和发表的所谓个人的看法，带有一点挑衅的味道。最后他偷偷地把话题转到对人们的议论，来了解人们对这个或是那个党的领导成员——从杜布切克一直到英德拉，有什么看法。

当时库兹涅佐夫在笔记本里记下了一些将来不予考虑的人员名单。单单因为我对英德拉的前途所发表的意见，我大概也已肯定是名列其中了。库兹涅佐夫问我，对英德拉"该怎么办"。我说，英德拉不是还在莫斯科嘛，所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个人的意见是，他根本不必回布拉格。库兹涅佐夫本来就不怎么和善的面孔一下子更绷起来了。他可能认为，我是在暗示斯大林时期那些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再也出不来了的党内干部。所以，我便接着说，我的意思是让英德拉留在莫斯科，譬如说，作一个驻经互会的代表。我还说，照我看，他在八月间的表现已使他不能再回布拉格担任政治职务。我同柯西金在克里姆林宫已经谈过这一点，柯西金不仅没有反对，而且接受了我的意见。于是，我和库兹涅佐夫的谈话便失去了伪装的真诚和善意，我们很快地便结束了这次谈话。

我认为，在同库兹涅佐夫的谈话中，首先背弃在我们之间统一步调的协议的，是切尔尼克，他在后来几次单独访问莫斯科时，也是如此。早在九月间，切尔尼克已开始希望莫斯科在调整领导班子时会继续支持他，因而放弃了八月间在克里姆林宫答应要同杜

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以及其他一些人采取一致步调的协议。他以这样的希望作代价，出卖了我，也出卖了斯姆尔科夫斯基，最后出卖了杜布切克。他联合了同他有私人友好关系的什特劳加尔，也联合了胡萨克和斯沃博达，很可能，他估计在杜布切克下台之后，要由他担任捷共第一书记。一九六九年四月，杜布切克由于莫斯科的压力，必须放弃职务时，曾亲自建议让切尔尼克作他的接班人。杜布切克无论如何不愿把这个职务交给胡萨克，因为他担心——事实证明是非常正确的——胡萨克的狂妄野心、权欲，以及他的另一些品质，将会把整个党引向比以往更加严重的灾难。切尔尼克虽然性格软弱，但他还能保持“正常化”的、合理的和实用主义的主张，否则，诺沃提尼时期已被夺了权的捷共党内斯大林主义残渣余孽就会重新胡作非为。

切尔尼克在莫斯科谈判中，首先破坏了党的领导人关于从捷逐步撤走苏军的协议。我们之间曾一致达成协议，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都必须坚持《莫斯科协议》中关于全部撤军的规定，而切尔尼克对此根本不予考虑，率先在莫斯科同意了一九六八年十月签订的关于苏军在捷驻扎条约规定的内容。这实际上使大约十万苏军无限期的驻留合法化了。

切尔尼克用这种办法，使自己继续担任总理，直到一九七〇年一月。不只是在杜布切克下台之后，而且在那些接受过他一九六八年八月在克里姆林宫的热烈拥抱、领受过他要坚决采取一致行动保证的人全部被开除出捷共中央之后，他又干了好几个月。但是最后，他自己也作了牺牲品，他的知心朋友什特劳加尔坐上了他的席位。在下台之前，切尔尼克在公开场合大骂一九六八年的民主改革，大骂自己参与了的改革行动。八月里被指名要受“革命法庭”审判的人们当中，他是唯一这样干的人。

他在一九七〇年春季被开除出捷共之后，才又清醒了一阵子，

在私下谈话时，他简单地宣称："我把名誉地位都输光了。"

杜布切克在一九六八年九月以后，也过于相信他能用幕后交易和同勃列日涅夫达成协议的办法，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并得到莫斯科的支持。他还不知道，莫斯科早已最终地把他一笔勾销了。他不知道，克里姆林宫由库兹涅佐夫开场、并由许多别的人继续上演的这出戏，其目的无非是要用另外一个人接替他的职务。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一九六九年一月向他谈了我的看法。他不同意并且对我说，恰恰相反，他在莫斯科已经渡过了难关，一旦他能让勃列日涅夫相信他已牢牢地控制局势，军队也会撤走的。杜布切克说："有那么一些记者和一些人，他们不了解自己在莫斯科不受欢迎，如果没有这些人给我找麻烦，我早就可以同莫斯科谈妥了。"杜布切克的这番话，是在帕拉赫为反对向占领者投降而自焚之后的第一天说的。杜布切克当真相信，在莫斯科和在基辅打猎时，同勃列日涅夫的非正式谈话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大约一星期之前，按照莫斯科的意图，主要由胡萨克积极施加压力，斯姆尔科夫斯基被迫辞去了议会主席的职务。杜布切克留任原职，但在他周围的人员已为数无几，只剩下切尔尼克、胡萨克、什特劳加尔和斯沃博达。捷共中央书记当中的改革派人员，只有什帕切克一个人了。其他的书记就是比拉克、英德拉、列纳尔特这些人，以及当时显然属于切尔尼克派的凯姆普尼。实际上，对莫斯科来说，要搞掉的只剩杜布切克一个人了，而杜布切克在这个时刻却仍然以为自己已经站稳了脚跟！当时我说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我仍然说不清楚。可能是从勃列日涅夫开始，所有的人对杜布切克都当面撒谎。但是杜布切克当时怎么能够相信他们呢？

在此以前，早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四日谈判时，杜布切克已经亲自把我勾销了。本来参加这次谈判的代表团，是由杜布切克、切尔尼克、胡萨克和我四人组成的。我甚至还受委托为代表团的谈判

准备方案，我也起草好了，但是在起飞去莫斯科之前，把我从代表团里除了名。杜布切克当时对我说，这是因为勃列日涅夫只要三个谈判对手，苏方也只有三人参加。当然我对此并未重视，我知道，不让我参加谈判是出于别的原因，不是勃列日涅夫的主意就是胡萨克和切尔尼克的主意，或者是他们几个人都不愿让我参加。杜布切克、切尔尼克、胡萨克三驾马车自莫斯科归来，带来了超出《莫斯科协议》范围的、更多的附加投降条件。代表团接受苏军无限期驻留，同意党代表大会无限期地延期，也注意到了苏联政治局的意见：捷共的行动纲领是一个错误的纲领性文件。同时又更多地撤免了一些人员，其中也有我一个。

过了几个星期之后，杜布切克才对我说，他在莫斯科出卖了我。其实在他告诉我之前，当代表团从莫斯科回来之后，我很快就清楚了。我同杜布切克单独谈到过：莫斯科的压力不断加大，目的在于要逐步把所有的改革派分子全都从领导集团里排挤出去，所以必须立即考虑第二个解决方案，即由他和他的人自行引退并确定一些接替的人，这些接替者应该能够最小限度地把进行改革的现状保持着，不要同斯大林主义残渣余孽以及苏联在捷共内部的代理人发生冲突，避免使捷共遭到严重破坏，以致将来无法再进行改革。譬如比拉克就毫不隐瞒地说，他认为，为了使捷共成为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党"，现有的党员人数应该减少一半。当时我看到，要想不让比拉克、英德拉、雅盖什等这一帮"工农革命政府"人物最后控制局势，唯一的可能是：不让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什帕切克、西蒙和我这些人来反对他们，而是让另一帮人去同他们周旋。具体地说，就是让切尔尼克做党的头目，什特劳加尔做政府首脑。如果这些人取得最高职务，就能够把胡萨克留在布拉迪斯拉发，就能够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并牢牢地控制着捷共内部的斯大林主义残渣余孽。因为他们这些人同这些残余分子没有联系，他

们是同党政经济机构中的比较通情达理和实用主义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的。虽然政治改革将停顿几年，但总的说来，局势仍将以改头换面的“卡达尔化”形式，朝同样的方向发展。

杜布切克不同意我的看法。他没有把形势看得这样糟，他觉得无论是对于全局还是对他个人，形势并不这样坏。他拒绝辞职。但他也没有劝我不辞职。这使我感到，他们在克里姆林宫已同他谈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便休假十四天。我离开布拉格，先是睡足了几天，然后到野外和森林里去对局势进行思考。但是，我对政局的进一步发展并没有改变原来的看法。捷共领导集团在签订《莫斯科协议》之后，已经无法依靠人民群众的自发积极性这样一种主要力量了。接受了“局势正常化”路线，我们就丢掉了一九六八年八月以前让人们自由发表意见的全国民主运动。杜布切克领导集团八月底回到布拉格之后没干别的，只是逐步地安定平息了全民反占领的抵抗运动，把这个运动加以限制，使之不再惹莫斯科发火，不再让莫斯科为加速“正常化”施加压力。在当时的情况下，捷共领导之所以能够达到目的，是因为领导和人民之间有着某种默契：人民理解，作出的牺牲将是巨大的，但实际上其目的是为了把力量保存下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完全需要真正把力量保存下来。在这方面，除了我对杜布切克所谈的办法之外，看不到别的可能。如果我们不这样干，莫斯科就会继续发动攻势，直到把杜布切克和他的一伙人全赶下台，这他们是办得到的。但是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为达到此目的，把捷共在六十年代被形势发展所淘汰的势力动员起来，使十多年在改革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切归于毁灭，并且出现一个像比拉克设想的那样的党。因此，我下决心再次尝试去说服杜布切克和其他一些人。如果我不成功，无论如何我就得辞去所有的职务，因为继续留任已对局势的发展不起作用了。我们可

以把自己的职务保留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但是，反正莫斯科已经作了决定，我们所有的人都得下台。这对改革的前途毫无积极意义，而是恰恰相反。

十月底我回到了布拉格，同斯姆尔科夫斯基、什帕切克、西蒙，并且又再次同杜布切克交换意见。前三人基本上同意我的看法，但他们如何作出决定，要取决于杜布切克的态度，因为，如果他不下台，不安排好新的第一书记，光是他们几个人辞职，仍然起不到相应的政治作用。当时好像是只有西蒙，即使只有他一个人，他也决定要辞职。而杜布切克并没有改变原来的态度。到了十一月初，他便明白地对我说，我如辞职，对局势会有帮助，因为克里姆林宫曾经同他谈过这个问题。当然，在辞职之后，并不是在政治上不再起作用了，他将听取我的意见，他家的大门不论白天和晚上对我都是敞开的，其他的领导成员对我也是如此，等等。随后他提出让我当文化部长。

我对他说，八月间在苏联大使馆我本来可以接受同样的职务，但是我拒绝了，今天我仍然拒绝这个职务。任何职务，只有能让我通过它在实际工作中对民主改革的发展施加影响，对我才有意义。对这样的安排没有考虑的余地，我将把自己的问题当作私人问题来解决，重新搞我的研究工作，不担任政治职务。杜布切克对此表示同意，这样我们很容易地就达成了协议。

作为捷共中央书记，我的最后一个任务，是要和什帕切克一起，起草捷共中央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全会通过的决议。这是我的最后一次尝试，至少是从文字的角度上，在一定限度之内，把改革派的政治路线保留下来。但我内心并不相信会获得成功。后来决议的文本和我同什帕切克起草的并不一样。中央全会开会之前的夜里，杜布切克（也许还有切尔尼克和胡萨克）乘飞机去和勃列日涅夫进行磋商。于是，应该防止批准军事干涉使之成为合法的段

落，从决议的草案中消失了，与此相反，又添上了关于捷共内部"右倾机会主义"危险性的辞句。老实说，那时不管怎么办，对我都是一样，我辞职的同时也放弃了对局势的发展发挥作用的可能性。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捷共中央委员会会议批准我辞去党内一切领导职务。虽然我仍然是捷共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但后来只参加过一九六九年一月召开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一月十六日帕拉赫自焚那一天开始的。当消息传到布拉格城堡的时候，中央委员会正在那里开会，有名的女医生拉士科娃要求发言。她说听到在这里所作的发言和对她的攻击而感到可耻，帕拉赫的自焚可能是因为听到了这里所作的发言而作出的绝望抗议。这几句话讲完之后，她的讲话就被粗野的叫喊所打断，捷共中央委员会里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和苏联的代理人对她进行狂吠。后来，以毫无原则地为"正常化"卖命而出名的诺维①，立即对帕拉赫作了讽刺挖苦的发言。帕拉赫之死，在随后的日子里震动了全民族的良心，但是坐在那里开会的、应对这一切负责的人，却绝大多数一点也没有受到触动。

在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前，莫斯科送回来的英德拉若无其事地又出现在主席团和书记处的会议上，这使我感到浑身难受。除了克里格尔之外，应该受他的"革命法庭"审判的全部人员都同他坐在一起。大家也都装作好像是若无其事。英德拉同志又回来了。此外，好像过去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当他那一伙人向拉士科娃发出喧嚷叫嚣的时候，我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也同样感到浑身难受。我心里想，在这个社会里，不久可能又要发生互相逮捕，甚至是互相残杀了。到那时候，克里姆林宫可能就会认为捷共

① 维·诺维(1904—)，二十年代末入党，战后曾任《红色权利报》主编，五十年代遭诬陷入狱，六十年代初恢复名誉。——译者

的情况已再次“正常化”了。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参加过会议。四月选举胡萨克担任党的首脑，九月把我从中央委员会除名，我都没有出席。其实，推翻诺沃提尼、选出杜布切克、接受捷共行动纲领并且也选举了我的，不就是他们这一伙人吗？

我为什么相信他们在“布拉格之春”的表现会是他们的真诚的政治态度呢？我不是已领教过十几年，知道萨波托斯基不仅是一个深思熟虑的长者，而且是一个举手赞成把多年的老朋友和老同志处以死刑的人？他们现在又这样干起来了。在这个社会里，这样的作法也许真的就是正常的。

一九六九年九月，我被开除出捷共中央委员会之前，党的主席团所设立的委员会曾找我去谈话。委员会是由皮勒尔、埃尔班、沃列尼克三人组成。他们过去一直在党的领导机关里和我共事。谈话开始好像是长期分离的老朋友相遇时那样的友好闲谈。然后皮勒尔直截了当地、以亲切的口气宣读了早已由胡萨克控制了的党的主席团的意见：同志们认为我不是极端分子和右派分子，他们很珍视这一点，因此同志们也就更加盼望我能够顺利地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要我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发言，谈两件事：一是一九六八年七月拒绝参加同未来的侵略者在华沙的谈判是错误的，二是早在一九六八年夏季，我就对斯姆尔科夫斯基说过，他的政策是见风使舵。除此而外，对我没有更多的要求。如果我能作到这一点，我就可以继续当中央委员。我问，如果作不到，将怎么办呢，皮勒尔简单地回答说：“那你就不能再当中央委员了。”

于是我说，我办不到。关于参加华沙的谈判，我现在也不是这样想的。至于斯姆尔科夫斯基，虽然我确实说过类似的话，但我认为，这样的说法并不能表明斯姆尔科夫斯基的特点。如果我们再有机会在主席团坐在一起，如果我又认为他在办错事的话，我会再

次对他这样说的，不过我将是面对面地讲，而不是为某个第三者的肮脏意图服务。

对此，皮勒尔说："你看，本来我就认为你不会这样干。说实话，我也喜欢这样。看一看有些人成了变色龙，真是令人感到可怕。在你之前，齐萨士也来过这儿，说实话，我真感到恶心！"当然，皮勒尔自己才是自愿成为变色龙的一个人，虽然他干得并不利落。所以我对他说，我也很高兴，因为他在看到变色龙的时候自己会感到恶心，那么他今后不会有好日子过。他停止了貌似亲切的胡扯，匆匆地中断了谈话。后来据我了解，这三个人最后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从原则上谴责了我的"右倾机会主义行为"，这是把我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理由。

实际上所有坚持"布拉格之春"政治路线的人，都同我一起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其中也有斯姆尔科夫斯基。本来是要我对斯姆尔科夫斯基进行诽谤的，我如果这样干，也许会保住我的中央委员资格。斯姆尔科夫斯基本来是一个面包厂工人，战前已经是共产党的干部。他毕业于莫斯科共产国际列宁大学，战争时期作地下工作，从一九四四年起，任捷共地下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布拉格起义时任捷克民族委员会副主席，随后担任捷共领导成员和农业部副部长至一九五一年。从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五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非法关入监狱。一九六三年恢复名誉后，诺沃提尼让他重新参加政治生活，任部长、议员，一九六六年任捷共中央委员。除克里格尔之外，他是杜布切克领导集团中共产党老战士的唯一代表，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明显地具有他们那种人的典型特征。

当他认为某种看法正确时，他就顽强地予以贯彻，他是善于在群众集会上向人民发表煽动性演说、勇于斗争的政治家。他机灵敏锐，洞察事物的政治意义，而且行事果断。但他的丰富经历也使

他相信，错误的决定不应顽固坚持，而应及时改正。因此在讨论问题时，他从不堵塞言路，比较容易、譬如说比杜布切克要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承认自己观点是错误的，应该改变。斯姆尔科夫斯基如果改变了信念，他能以同样的热情和同样的办法，像维护原来的观点那样去维护他的新观点。这就是为什么“正常化”的卫士们有可能把他在不同情况之下的观点变化搜罗起来，说成是斯姆尔科夫斯基没有骨气的证明，并且广为散发题为《两面派政治家》的小册子，对他进行诽谤。

斯姆尔科夫斯基的政治态度，有时确实作了很大改变，但我相信原因并不是没有骨气。在所有那些涉及到名位乃至生命的危急关头和严重的形势下，斯姆尔科夫斯基一生中从来是刚正不阿、坚定不移的。从他在战争时期参加地下工作到被关进监狱（只有少数入狱的共产党员当时能像他那样进行自卫），直到一九六八年八月的日子，他都是始终如一的。在那样的情况下，斯姆尔科夫斯基不仅没有改变而且顽强地捍卫了自己的立场。只有满怀信心和信仰去捍卫自己生命价值的人，才能够作到这一点。“布拉格之春”对斯姆尔科夫斯基来说，当然是实现了他个人一生的希望和信仰，他带着这样的自觉，为他的理想而工作。“布拉格之春”也向他提供了最后政治活动的实际可能；他已五十七岁，身体也不好。所以斯姆尔科夫斯基在这个时候寻找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也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已经正常化了的”捷共中的残酷的野心家们，如果把野心这个词作为行为的动机，硬扣在他的头上，这样的作法只能是他们大量肮脏活动纪录中又一个最卑鄙的阴谋。

在形势不是极其严重和危急的情况下，斯姆尔科夫斯基倒是常常摇摆不定的。当我谈到一九六八年六月党的领导进行关于《两千字宣言》讨论的问题时，我已讲过这一点。前面提到的皮勒尔要我讲的问题，也是一个类似的事例。在切尔纳谈判开始之前，

我向党的主席团提交过一份批准民族阵线法的建议书，我认为这个建议可以改善我们参加谈判的地位。斯姆尔科夫斯基事先答应给我支持，但是在开会时他变了卦。他的一些激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顾问影响了他。会议中断后，吃晚饭时，我坐在他的旁边，我向他说了些含有指责他的政策是见风转舵这样意思的话。斯姆尔科夫斯基意识到他在这件事上欺骗了我，我想，当时他曾感到不好意思。为了给自己作辩护，他说了一些难堪的话。斯姆尔科夫斯基说："请你看看现在报纸上按名望大小排列的顺序吧，我已经排到了第五位了。"这话真使我恼火，我问他如果报纸上不再许可公布名望的次序，那将按什么行事呢。斯姆尔科夫斯基不再答话，继续默默地喝汤。坐在旁边的人都听到了我们的谈话，我想，在场的也有皮勒尔。

一九七〇年以后，在被开除的党的领导成员之中，第一个出来大声疾呼地反对"正常化"政策的是斯姆尔科夫斯基。杜布切克、克里格尔、什帕切克、西蒙、斯拉维克和我，当时还在沉默。尽管各有不同的原因，但大家事实上对什么都保持沉默。现在的问题是，要么人们像牲畜进入屠宰场那样不声不响地走上更新了的极权专政的断头台，要么那些在不久以前担负过政治领导责任的人，那怕只有一个人，能作出反应。一九七一年九月，斯姆尔科夫斯基作了反应：意共《新路》杂志发表了他的谈话，这是捷共领导集团的人员对"正常化"政策发出的第一个批评声音。斯姆尔科夫斯基在此非但毫不犹豫，而且正像他在一生当中好几次在极其严重的情况之下那样，是冒了很大风险的。

当然，这不仅给他带来了在全国人民当中所享有的威望，也使他遭到胡萨克政权对他的仇恨和加强了的警察监视。到一九七四年他的生命结束时为止，他一直享受着这样的双重待遇。当权者甚至在他死后还要对他进行报复：斯姆尔科夫斯基至今在布拉格

没有坟墓。他的骨灰盒安放到他家的墓穴①之后，不久就被人盗走了。后来公安机关装模作样地说，他们在从布拉格驶往维也纳的快车的厕所里找到了骨灰盒！并且造谣说，有人企图把斯姆尔科夫斯基的骨灰带到奥地利去安葬，对我国进行挑衅。警察局虽然把骨灰盒归还给家属，但又不准把它埋到布拉格的墓地，因为可能再次引起“挑衅”。对帕拉赫这样一个人，胡萨克政权就怕到如此地步，一定要把他在布拉格奥尔尚公墓的坟墓毁掉。对于斯姆尔科夫斯基，他们也给了同样的待遇。能受到布拉格如此“正常化了的”政权的这种待遇，实在也是无上光荣了。

被开除出党中央委员会之后，我还保留了半年党证。一九七〇年三月，正好是我的党龄就要进入第二十五个年头的时候，雅盖什把我叫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在历史上的最大一次清洗开始了，这次清洗的结果是，大约三分之一的党员没拿到新的党证。我是属于作为典型第一批被开除出党的，第一批的处理要为其他的党组织作出榜样，使它们便于掌握为什么开除和把什么人开除出党。雅盖什没有亲自参加办理我的开除手续，而是由监委副主席曼佳克代表他。

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事，不到一个小时就告结束了。我根本没有申请新的捷共党证，因为我不同意一九六八年的军事干涉，不同意一年来捷共执行的政策，因而也不相信自己能够履行这个党的党员义务。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虽是一个可以自愿参加的组织，但是只要领导上不同意，你是不能自愿退出的。胡萨克集团不愿意因为我不想要党证就不发给我，他们是想要通过开除我，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说明为什么要开除我出党的决议稿已经写好了。但是对那些

---

① 按捷的风俗，一个家庭可以在公墓租一个墓穴，安放家庭成员的骨灰盒。
——译者

像是五十年代检察长在政治审讯中起诉时所讲的话，我拒绝签字。委员会勾掉了或者是修改了这些段落，写好了记录，总共用了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

谈话完毕，我在捷共中央大楼里还去了一趟厕所。过了一会，厕所的门开了，审查委员会执行主席曼佳克由于同样的生理需要，一下子闯了进来。看见我在，他吃了一惊，但为时已晚。他便站在我旁边的瓷便器之前。“你要为我们麻烦一阵子吧？”我问他。他说：“可不是，今天还有三个。”然后，两个人仍然站在那里，沉默无言。本来我已经可以走了，但我故意多呆了一会。我想让曼佳克先走，让他选择一句告辞的话。我所感兴趣的是，对我这样一个被开除的人，他还会不会使用捷共通用的招呼语“劳动光荣”。曼佳克急着要走，也实在非走不可，便决定使用一个折衷的办法，说了一句“再见，同志”，便匆忙地离开厕所。

如果在二十五年以前，当我满怀热情和理想参加捷共的时候，有人说我会这样荒唐可笑地丢掉我的党籍，那我就会把他当成不共戴天的敌人。但是现在，这竟然变成了事实。二十五年前，我想不到我会被开除出党。现在我骤然感觉到，结束的只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阶段，新的、更重要的阶段还只是刚刚开始。在这一切之中，也隐隐约约地包含着一种解放的感觉。

随后我在捷克斯洛伐克过了七年，但已不是生活在特权者和当权派之间，而是同被抛弃的人们在一起。我为之献身二十五年的党竟使我陷入到这样的境地，却又不停止对我的关心。但是，党把这个关心的任务交给了那些专门同反对承认其极权主义统治的人们打交道的人——政治警察。这七年的经历，无疑同过去大不相同，完全是另一类型著作的题材。